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 内容简介

本书是研究和介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家们丰富理论成就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以较大的篇幅，对 14 位无产阶级军事家(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军事思想，逐一展开论述，观点鲜明，材料扎实，夹叙夹议，通俗易懂。是国内外有兴趣研究当代中国军事理论的朋友们所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 前 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然而，这种被称为“集体智慧”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哪些？每一位代表人物都阐发了哪些内容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又是怎样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探讨这些问题，对于完整地准确地研究和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科学体系，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在人们很重视研究现代军事理论。所谓“现代军事理论”，可以理解为是指同我们现实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用以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军事斗争的理论。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过，在研究现代军事理论时，也还面临着这些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植于何处？它与我们传统的军事理论有哪些联系与区别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它可以盖得很高很大，但再高大的建筑物也必有它的地基存在。中国是最早对军事问题进行理论思维的国家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家们在本世纪中叶结合中国国情所创造的丰富的军事理论，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近。这些理论成果正是中国现代军事理论的主根，正是中国现代军事理论这座大厦的基石。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必将有助于推动现代军事理论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

有了这样两点基本的考虑，我们就着手编写这本书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动机的话，那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青年朋友的反映，他们要求有更多的将理论和实践揉合在一起的学术著作，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理论成果；一些外国朋友也常常抱怨说，他们想研究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成果，却苦于缺乏必要的材料，也较少看到中国出版的理论研究专著。所以，出版一些能把理论和实践揉在一起的、信息量尽可能大一点的公开读物，可能会部分地满足上述要求而受到欢迎。

于是，编写本书的目标就勾划清楚了：

第一，让读者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怎样从各个层次与各个侧面，对中国革命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杰出贡献的。

第二，让读者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给我们留下的那些丰硕的理论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构成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主根和基石，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第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让材料（事实）说话，少发空论，从实际出发，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尽可能多地满足中外读者对研究思路和研究材料的需求。

当然，要完满地达到上述要求也并非易事。这里只写了14位军事家的理论成果，尽管这些内容已构成了主体或者说基本部份，但毕竟还不能说是全部理论成果。这本书只能作为初步的研究成果出版，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确信，将会有质量更好的学术研究著作相继问世。

潘石英 谨识

1990年9月于北京寓所

# 毛泽东军事思想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潘石英

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权威的定义是“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sup>(1)</sup>也就是说，它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和中国军队问题全部认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军事科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上述定义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是当代中国军事思想最重要的基石。本文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一些探讨。

## 一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

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斗争。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时间长达22年。正是这场宏伟的革命战争，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国情的熟悉与研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产生的主观因素。

青年毛泽东曾经信仰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sup>(2)</sup>，主张哲学救国<sup>(3)</sup>和“呼声革命”<sup>(4)</sup>。而在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

毛泽东首先是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萌生进而形成武装斗争思想的。

192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全身心地从事农民运动，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武装问题。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sup>(5)</sup>、《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sup>(6)</sup>、《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sup>(7)</sup>、《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sup>(8)</sup>、《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sup>(9)</sup>等一系列著述，明确提出必须建立农民武装才能推翻地主阶级武装的思想。1927年春夏，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终于失败。在这历史发生转折的关头，毛泽东批评共产党内专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的倾向，鲜明地作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他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思想。这在当时各种革命尝试都归于失败的条件下，具有尤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接着，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发动湘赣边地区的秋收起义，开始了他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长期实践。在起义遭到挫折以后，毛泽东果断地带领部队向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井冈山转进。从这时起，到1933年初的五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转战于赣南、闽西地区，经历了从小部队游击战到较大规模（先是红4军，后是红1方面军）运动战的战争实践，他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概括：（1）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2）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3）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些理论，在毛泽东早期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述中，以及大量指挥作战的文电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

1935年初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又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对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全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又一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在这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10年里，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军事理论思维也更为深邃。他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篇章，还撰写了军事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以下理论：（1）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2）战略防御的指导规律；（3）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4）军事辩证法。这就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1946年~1949年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作战规模越打越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组织指挥了包括震惊世界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交战，取得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十大军事原则”等著作中，以及为数十分可观的作战文电中，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实了关于战略进攻的理论，关于战略决战的理论，以及关于战略追击的理论。这样，已经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又有了重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继续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直到他1976年逝世。在这段长达27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贡献是：（1）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的历史任务及其基本指导原则；（2）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揭示现代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若干新的军事规律；（3）在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正确关系；（4）制定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实践，又经过他长期不懈的理性思维和理论升华，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得到充实和发展。

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来自革命和战争的实践，而且是长时间理论提炼的结果。如果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喻为一棵大材的话，那么战争实践就是它的土壤。理论概括是抽象的，而历史的实践则是具体和生动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概念出发，这就要善于进行历史的回归，即把理论放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并联系当前的客观实际，才能把握住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真谛。

## 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

本世纪4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毛泽东“军事学说”、“军事路线”以及“军事思想”等等概念以后，就开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对这一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其基本内容，从开始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

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且呈现愈益深化的趋势。

革命战争时期，人们的斗争环境和任务不同，切身感受各异，提法也很不一样。

1940年。杨松在《中国文化》第5期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的文章，他归纳“最近十余年来”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时指出，“建立了新的人民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学说”，他认为毛泽东“发挥了和具体化了马恩列斯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学说。”(10)张如心在1941年提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11)陈毅在1942年撰文《伟大的21年》指出，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时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获得了正确的解决。提出了以弱对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以农村对城市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战略战役方针；提出了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联合运用的战役战术方针；提出了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陈毅强调说“这不是平常军事家或者一本兵学书上可能解决的问题。”1943年，陈毅在新四军“七一”干部报告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占领了革命阵地，创造与锻炼了强大红军，创造了革命的新的战略战术，有了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12)1943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1944年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从武装割据、建设红军、抗日战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为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心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13)人们知道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本人起草的，又经过了党的中央全会讨论和通过，是全党之共识，具有权威的性质。几天后，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在这个报告中，朱德着重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方面充分阐释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并且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14)这个报告也同样具有权威的性质。因此，在这以后的研究著述中，通常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为“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两个组成部分，或者再加上一个“战略战术”而成为三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大体上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上情况告诉我们，从1940年杨松提到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系统贡献，直到党中央在1945年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作出决议，其间经过了五年时间的研究、酝酿和传播。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科学体系首先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存在于群众之中，然后在必要时才由党中央作出决议。而不是必须先由党中央作出某种决议之后，才能研究、酝酿和传播。

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在科学体系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认识 and 新的提法。50年代曾有一度试图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纳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或“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体系中去，按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的不同框架，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分别装进去，使之融为一体。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并不科学，也不成功。1958年7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实际经验，灵活地运用了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创造性地制定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制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军事路线。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8年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朱德在人民解放军建军31周年的纪念文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15)

50年代中后期及其以后。人们更为自觉地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科学体系进行探讨。

1959年，陈伯钧在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指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概括起来说，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军事辩证法（方法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聂荣臻在1960年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一次全面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本原理和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之后，国内的研究工作虽然不免受到泛滥一时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过一些过分拔高和夸大的不科学现象，但在学术界以下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的理论成果；第二，它的科学体系仍然可以归纳为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战略战术三个部分。

1977年，叶剑英在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他指出：“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毛主席在建设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伟大实践中，极大地发展和完善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更加丰富和发展了。”(16)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以很大篇幅阐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且指出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这个讲话，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建国将近30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概括。

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外国人士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位游击战专家，着重研究他的游击战思想。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使游击战战略化、系统化、普遍化的创始人，而且构成了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体系”。日本的伊藤皓文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为6个部分：战争理论；战争的定义，特别是战争的目的论；战争和政治，强调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和政治领先的原则；战略防御，根本点是积极防御的思想；速决战和持久战；人民战争。日本的持田真一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5大战略，即统一战线战略，游击战争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和核战略。日本官方出版的1962年《日本防卫年鉴》则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起来有10个部分：革命观；战争观；对武装力量的价值的估计；关于党和军

队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尊重士兵和人民的思想；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精兵主义与全民皆兵结合，现代化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用对敌人的仇恨激励民心；古代战史的研究。《日本防卫年鉴》还指出，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书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指出，毛泽东战略理论由6项原则组成：具体地分析情况；重视情报资料；研究双方互相反对的特点；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他指出，前3项原则是研究战争的基本思想方法，后3项原则是作战原则，而第1项具体地分析情况是“理论基础”。戴维逊强调说：“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17)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亚洲部主任杰奎斯·格勒曼茨则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由军事哲学、战略思想、军队建设与后勤思想、精神力量与人的因素的思想、军事力量与社会相结合的思想等5部分组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活跃，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更趋深入。进入80年代以来，在这个研究领域表现出以下动向。

1. 明确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概念，并且要求从科学体系上完整地准确地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针对林彪、张春桥等人在军队系统肆意歪曲、篡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做法，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建议“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18)只有这样，才不至割裂、歪曲或损害毛泽东思想。

2. 更加重视和强调对战争观、方法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集中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若干结论，因与发展中的客观实际不相符而逐渐丧失其现实指导意义，从而显示出居于更高层次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普遍指导意义。有的主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体就是战争观和方法论，甚至可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直接称之为“军事辩证法”或“军事哲学”。

3. 主张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进行更细的分解，以便能与各项实际工作直接挂钩。因此，除了两部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三部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结构方案外，还出现了四部分（以三部分为基础，把战争观和方法论抽出来，独立存在）、五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军事哲学、军事学说、建军理论、战略战术、军事指挥）、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把五部分中的军事哲学拆开，分列为战争观、方法论两部分），以及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案，是武装斗争思想；农村根据地思想，战时财政经济思想；军事辩证法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等等结构方案。还有的主张把政治工作、后勤思想也分列为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方案中，有并排（平面）结构的，也有分层（立体）结构的。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甲论乙驳，不一而足。80年代以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提出的结构方案之多，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领域，

呈现出一种似乎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表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一方面又表现了高度分化的趋势。其实，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趋势，都应该把它看作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认识深化的结果。它标志着这项研究工作已经跨进一个新的阶段。

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这方面，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概莫能外。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会产生把科学知识的个别内容分离出去的要求，使之成为具有自己的特殊对象、课题和方法的新的分支学科。这就是不断分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在已有学科领域中，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日益深透和精细。这种趋势导致科学的划分越来越细，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目前在我国，生物科学已经分化为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昆虫学、生理学、神经生物学、人类学、水生物学、微生物学、病毒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生物学等 18 个分支学科。而在本世纪 50 年代我国生物科学却只有不到 10 个分支学科。心理科学目前我国也已分化为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等 9 个分支学科。而在本世纪 50 年代我国心理科学只有两三个分支学科。这种不断分化的趋势，不就是研究领域扩展和研究工作深入的重要标志吗？

也正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又会提出学科不断综合的要求。这是在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各个学科的不同运动形式中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并具有某种共有的规律和特点。于是，人们又从狭小的学科领域里跳出来，要求把原先分散在各个专门学科的，互相隔绝的知识、思想和方法，联系和综合起来，从而开拓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领域。例如，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发现在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工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广泛领域中，都存在着与之相关的知识，于是新兴的环境科学便应运而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领域，提倡从科学体系上认识问题，以及强调战争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也是综合化趋势的一种表现。综合化的趋势，还表现在横向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兴起，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相互渗透等方面。

不断分化又不断综合，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是彼此密切联系的。不断分化标志着向微观世界的进军，不断综合标志着向宏观领域的发展。整个科学就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交替、渗透和运动中得到发展。现代科学发展的总特征就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辩证统一。80 年代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领域里出现的意见纷陈的动向，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积极现象。因此，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结论，去规定必须是几个部分和几个层次，而是应放手让它在实践中和各种学术流派的切磋探讨中，求得新的发展。

### 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把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提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9）他深刻总结了旧中国的军阀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教

训，也研究了苏联武装斗争的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认识人民军队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夺取政权离不开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各种民众斗争和民众组织都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这些斗争和组织都是围绕着夺取革命战争胜利这个中心。因此，毛泽东概括说：“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20）。

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里，军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要把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高度军事素养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创立一整套崭新的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应当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而斗争的，它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当是这支军队的根本属性和唯一宗旨。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在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这支军队不是单纯的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1）就是说，除了主要地执行战斗队的任务以外，也要担负工作队或者生产队的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支军队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纲领的工具，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在军队中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各级部队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系统地运用于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建立有领导的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保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使人民群众把这支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军民一致，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军队与人民对立的现象。这支军队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推行进步的政治教育，造成主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保持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军政首长命令指示的付诸实施，保证军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立自己强大的国防”（22）的历史任务，并明确指出国防的基本使命是“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23）他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4）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25）。军队现代化，就是“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他提出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海军和陆军各特种兵，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军队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6）。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军事训练是军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军队只有不断提高军事素养、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加强战备，增强协同作战能力，才能随时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革命战争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进行战争的坚实基础，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革命战争的主体和胜利之本。动员群众参加战争，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就造成了克服

一切战争困难的条件，从而就能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经济落后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旧中国，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三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干部、发展生产和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并向全国作波浪式推进，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才能最后取得全国政权。在武装力量方面，人民军队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同时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这样就能最有效的发挥全体军民的战争伟力。主力兵团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执行固定地区内的作战任务，游击队和民兵则不远离家乡，配合正规军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保卫家乡。实行人民战争，还要求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和妇女的斗争，同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同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配合起来。要尽可能多地扩大自己的同盟军，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一些外国学者正确地指出，“人民战争理论，不只是纯军事的战略论和战术论，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战争论”（日本伊藤皓文）。

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以灵活机动为特点的战略战术。这是中国人民军队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所形成的。1928年，红军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形成与当时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游击战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并产生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割据，波浪式的推进，强敌跟追，盘旋式打圈子等军事政策。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发展的基础。美国牛津大学教授萨莫尔·格里菲斯指出，“革命的游击战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它的基本因素是政治，是人，强调政治教育和争取人民；它的取胜之道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27）中国革命战争，在作战指导上从来不拘一格，一切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主动地、灵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利用敌方的一切矛盾，孤立和打击敌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敌变我变。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人民军队自觉地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要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方拥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战略上必须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则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战略防御阶段必须遵循的原则。通过战役、战斗的进攻战，转变敌优势、己劣势的力量对比，适时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进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粹军事性考虑力基础来进行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正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28）。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及时转换和采用恰当的作战形式。就战争全过程而言，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解决战争命运的基本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其中，阵地防御战主要是执行阻击和钳制敌人的任务，以配合和辅助运动战；阵地进攻战则执行攻歼据守城市之敌和夺取地方的重要任务。游击战以分散流动的作战，从战略、战

役、战术上配合正规战，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根据战争各时期、各阶段、各地区的具体任务和实际情况，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协同，是战略指导的重要任务。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要求每战均解除一部分敌人的武装，剥夺其抵抗力，俘虏或毙伤其全部或大部人员，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力求避免消耗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胆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力求全歼和速决，不使敌人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即歼灭敌人一部兵力，击溃敌人另一部兵力。为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歼击目标，拣弱的打，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对于初战持慎重态度，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决战问题上，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进攻时防止冒险主义，防御时防止保守主义，退却时防止逃跑主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还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重视后勤保障和军队的适时休整。毛泽东指出，这些战略战术都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够有效地运用它。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而形成的战争观和方法论，阐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客观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揭示了对革命战争本质的认识和战争诸因素的运动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最稳定的部分。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首次提出“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并就此题目发表讲演。军事辩证法研究军事领域最一般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里的特殊表现。日本学者矢吹晋指出，“在把辩证法‘作为方法’来阐述方面，毛花了最大的力量。毛正是运用哲学这一武器，写出了军事论，战略战术论，组织论，文化论等极其广泛领域的重要论文”。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现代战争根源，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走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所以战争必然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然而，战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前进了，于是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推动社会发展的正义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力量的竞争，战争力量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结合物。军事家不可能超越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去企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在使客观物质基础所提供的胜利可能，转变为胜利的现实的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在认识战争制胜因素的问题上，要重视人和物的正确结合，防止过分夸大物质作用的机械论，也要防止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毛泽东指出，从本质上和从长远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无

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反动势力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的条件下，革命人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是能够逐渐转变双方力量对比，最后获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带所谓“盖然性”，然而，战争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也是可以认识和驾驭的。战争规律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敌我、进退、攻防、胜败等矛盾现象，存在于一切战争之中，是一般的战争规律；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各有其特殊的战争规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的基本方法。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指导战争，不但要求熟识和运用一般的战争规律，尤其要求熟识和运用特殊的战争规律，着眼特点和着眼发展，善于按照运动着发展着的战争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法，防止作战指导上不区分时间、地域、性质差别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一再表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要能巧妙地运用兵力，以打击敌人的弱点，力求陷敌于不利的地位。”(29)作战指导要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念，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以局部服从全局。战争是敌对双方武装着的活人之间的生死斗争，而且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不择手段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对方，这就使得战争行动较之其它事物更为困难。战争中，要在周密组织侦察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建立合理的部署，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实际变化，及时修正决心，积极机断行事，实现作战指导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作战指导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毛泽东不是一般地沿袭前人的现成经验和理论来指导战争，而是以回答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实际情况出发，去揭示规律和解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从而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战争指导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以脱离实际为特点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品格，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突出特征。如果说有什么“秘诀”存在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国情的最大限度的适应性，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秘诀”所在。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否适应战争的客观实际，这是判断和评价任何军事理论的基本标准。有一种意见认为，用实事求是来概括缺乏军事色彩，不如用“人民战争”来概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其实，人民战争理论正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敌对双方的特点和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行动的集中表现。这就是说，“人民战争”也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因此，用实事求是来表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仍然是准确的和科学的。

#### 四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是与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同时形成的，并在党的决议和其它

文件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刘少奇在 1945 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37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决议》还多处使用了“领袖们”这个词，足见领袖不只是一个，而是有一批。在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坐在房子里思辨出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只能在军事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参加的武装斗争实践。党和人民在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可宝贵的源泉和最为深厚的基础。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集体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的智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直接的和主要的来源。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于若干块互不相连的地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这种独特的斗争环境，造就了一大批能够独挡一面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必须具有战略头脑，善于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全局上和发展上观察与思考问题。他们都面临着同毛泽东一样的进行理论思维以总结经验和指导实践的严重任务。因此，在各自的长时间的军事实践中，也都形成了适应本地域革命斗争特点的军事理论。而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集大成者。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进行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很早就开始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的比毛泽东还要早一些。蔡和森在 1922 年就提出：“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30）。不久，他进一步指出“心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决旧支配阶段——军阀的武装”（31）。周恩来也在 1922 年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32）。1924 年夏，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统治”的口号，并指出“只有学习苏联暴力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有光明的前景”。在 1924 年秋至 1926 年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担任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主持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即广东革命政府）的铁甲车队，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军队——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参与领导和指挥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先后发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队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著述，对革命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1926 年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提出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

1927 年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1927 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

的关头，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毅然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如何将农民起义军建设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之后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方面，最早举行武装起义的各支工农革命军都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然而，直到1929年春，各地红军包括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在内，认识仍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听取陈毅关于红4军情况的口头汇报后，委托陈毅按照中共中央讨论的精神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内容，代中央起草一封指示信，该信由周恩来最后审定。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这封信就当时形势，红军任务和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和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军目前行动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指示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33)指示信统一了红4军前委的思想，指导红4军成功地举行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从而产生了毛泽东起草的被称为“红军建设纲领性文献”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此可见，一些卓越领导人先于毛泽东所进行的军事实践和理论探索，必然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

共同进行理论概括。就总体而言，长达22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以及建国以后时间更长的军事实践，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同领导与集体指挥的。他们共同分析国内外形势，进行战略判断，作出战略决策；他们共同起草指挥文电，运筹全局发展，指导战略进程；他们共同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作出理论概括。早在井冈山时期，担任红军第4军军长的朱德和担任党代表的毛泽东，共同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和“会剿”，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作战的胜利。他们在游击作战的共同实践中，丰富了对游击战争作战原则的认识，最终共同提出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1937年8月于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任务。这个方针和任务完全符合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相继发表许多演说、论文和专著，从不同层次和侧面对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充分地阐述己见。大约一年之后，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对这一时期所讨论的基本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把全党全军的认识统一起来。因而这两篇重要著述一经发表，便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纲领和代表之作。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于1947年12月，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18个月，毛泽东集中了各战略区的实践经验，作了理论概括的工作，对尔后的战争指导发生极其重要作用。“十大军事原则”的丰富内容，几乎都可以从各战略区的文电中找到其“原型”。

还有一种情况。尽管各战略区被敌分割，彼此难以联系，却进行着不约而同的理论创造。例如1929年11月，鄂豫边红军领导人徐向前、戴克敏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规定红军的任务是：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

的各种斗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夺取反动武装；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个决议案还对军队政治工作，军队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明细规定，其内容与一个月之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活动的红4军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几无二致。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的红7军，于1929年12月所发的《红7军前委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1、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2、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3、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4、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这与在此之前不久由毛泽东概括的井冈山斗争经验，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作战理论方面，彭德怀在1929年4月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弱小的红军必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34)贺龙于1929年8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就把游击战术概括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朴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35)。这个被称为“53字口诀”的游击作战原则，与红4军活动地区的“十六字诀”的精神又是一致的。鄂豫边根据地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也提到游击战争七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作战原则，与“十六字诀”还是一致的。在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它的客观真理性。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严格的报告制度，使各战略区的情况能及时地汇拢到中央，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集体智慧得以形成并发挥其作用。当时担任晋冀鲁豫军区（以后依次改称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从1948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起，直到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在此期间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大体上两个月一次，亲自动手向中央写书面报告。毛泽东表扬邓小平能按时写报告，并且写得很好。毛泽东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段君毅回忆说，毛泽东曾说过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36)在已经公布的军事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数可观的作战指挥文电。其中，既有毛泽东起草的，也有别人起草的。在同一份原稿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笔迹，也可以看到他的战友们的笔迹。有一些是毛泽东起草后别人修改的，电有一些是别人起草后毛泽东修改的。这些军事文献，生动地记录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伟绩，也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军事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性认识。战争问题一经决策，便立即成为千军万马的作战行动。战争决策者的每一个想法，都要在战争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军委和战略区的关系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军委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十分注意倾听和采纳战略区的意见，及时修正既定决策，使之更趋正确；战略区领导人则敢于直言，使军委的决策更加符合战场实际，在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方面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沿津浦、平汉、同蒲、平绥四条铁路对华北解放区发动进攻。毛泽

东原来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寻歼南下之敌。但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坦陈己见，实际上是集中兵力歼击了北进之敌于晋东南地区，取得上党、邯郸战役的重大胜利。

1947年著名的陕北三战三捷（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期间，歼击目标、打法和部署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彭德怀等在战略意图之下，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断决定的。1948年7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攻克兖州后，毛泽东曾下令该野战军不惜疲劳与减员，争取在十天内外攻克济南，不要马上进行休整。粟裕等则鉴于济南守敌多达11万人，工事坚固，徐州还可能出动援敌达17万之众，需要考虑攻城和打援两个方面的作战，而华东野战军兵力并非绝对优势，又值雨季，部队行动不便，故建议推迟攻济时间，准备好了再打。这一建议无疑是符合战场实际情况和全局利益的。毛泽东欣然同意，遂改变原决定，将攻打济南时间推迟到9月中旬。结果是由于准备充分，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慑于被歼，未敢出援。后来，毛泽东把这个成功经验概括为“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初衷是粟裕最早提出的。毛泽东认为“甚力必要”（37）。当战役顺利展开后，毛泽东曾提出战役第二阶段将以华东野战军兵力连续作战，歼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相机夺取徐州。当时领导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应以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兵团为上策，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应休整十天半月，监视徐州之敌。毛泽东果断采纳了这个正确建议，取得淮海全役的圆满成功，创造了大兵团作战轮番使用兵力，“吃一个，困一个”的成功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央军委原定出动两个军。但前线指挥员彭德怀为使初战有必胜把握，建议4个军同时出动作战。此议被中央采纳，结果是一举取得渡过鸭绿江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对稳定朝鲜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此类事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阐述、补充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十分重视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活动。在已经面世的《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里，选收了著作者为数可观的军事著作；有的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著作的专集，如已经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集》等。这些军事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各个不同侧面研究军事问题，与毛泽东军事著作交相辉映，从而构成一座宏伟的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大厦。

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群众（包括武装的群众——军队在内）在革命战争中显现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最为深厚的实践基础。应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战争实践，就不会有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时起，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体，不惜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实现战争目标而英勇奋战。经历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消灭敌军总数达到1千万人以上，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又进行了包括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保卫了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革命进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主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

别的科学归纳和演绎，把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提炼和概括成为军事理论，又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战争实践。如此循环反复、螺旋上升，毛泽东军事思想才得以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众所周知，毛泽东本人历来反对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作他个人的产品，而总是强调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记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960年，他在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在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亲笔加上“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句关键的话，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全党、毛泽东思想与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与集体奋斗、毛泽东思想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1964年，他再一次说“《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先哲们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地汲取了中外军事遗产的精华，尤其是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成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这一锐利武器，精心解剖中国革命的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提出的问题。所以，人们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作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原话。更多的是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加以解释和发挥，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相当重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优秀军事理论。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公开发行的毛泽东著作中引用“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历史资料共218处，其中引文94处，涉及中国历代人物和典籍的64处，涉及中国历史事件和战例的60处(38)。如毛泽东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作为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提出。他告诫人们“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39)。毛泽东还引用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来说明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战略退却的必要性；引用孙子的“示形”，来说明造成敌人过失和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也引用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等外国军事家的观点和论述，加以改造，赋予新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定义，并把它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40)毛泽东在承认克劳塞维茨指出的战争具有“盖然性”的基础上，辩证地指出“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41)，从而把战争的不确实性和战争的规律性统一起来，使之具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理论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在笼统地承认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同时，也就应该具体地承认在“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特定概念里，既包含着占主要地位的毛泽东本人的军事思想、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其他杰出领导人的军事思想，诸如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朱德的军事思想，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刘伯承的军事思想，贺龙的军事思想，陈毅的军事思想……等等。这种理解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许多本原构成的。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都有类似

的看法。这种具有朴素性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世界是多元的。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时，有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眼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42)毛泽东军事思想来自物质的运动（战争），来自群众的实践，来自历史的继承，来自集体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概念，与“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朱德的军事思想”、“邓小平的军事思想”等等概念，具有显著的统一性和相容性，而不存在对立性和排斥性。

有些人把“思想”一词看得高大而神圣，以为只能把它安在宝塔之顶、高山之巅，甚至把它看作是一种什么待遇，主张按“主义”、“思想”、“理论”、“论述”进行等级排列。其实，按照我国辞书的解释，“思想”亦作“观念”、“念头”、“想法”，“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毛泽东本人对“思想”下了一个通俗而精确的定义。他说：“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因此，“思想”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极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标题：《学习董必武同志的政治法律思想》(43)，《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44)，《孙中山晚年建军思想略论》(45)，《略论孔子的军事思想》(46)，《邓小平的国防经济思想初探》(47)，《学习陈云的决策思想》(48)，《邓小平领导体制思想的新发展》(49)，《朱德的经济建设思想》(50)，《简论邓小平的文艺思想》(51)，《董必武的法治思想》(52)，《学习邓小平的改革思想》(53)，《张闻天建党思想的转变初探》(54)，《谈周恩来的领导思想》(55)，《略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56)，等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这说明“思想”一词既不神秘，也不高贵，是一个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常用词，实在没有必要进行等级排列。

总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依据和丰富内容的科学结论，它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洞的词藻。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放开手让人们研究探索，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军事思想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 五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进行的长达 20 多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又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保卫和巩固了政权，使国家有可能在和平与安定的条件下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这个事实本身，已经雄辩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它作为一种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是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它在中国和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精华，用以指导一场现代的新型的战争而取得成功，把中国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广泛地汲取外域的军事理论成就，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原理，成功地结合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使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作出独创性的贡献。事实已经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已经超越毛泽东本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度，而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轨迹，就是明证。

前面已经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包含着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两种成份。前者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后者具有更大的针对性。不应把两者等同起来或混淆起来。我们讲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无疑是指它的基本原理而言的。必须指出，在研究现实指导意义这个问题上，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不幸的是这两种“主义”，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反复地犯过。从“活学活用”，到“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它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着全局。虚无主义的倾向虽然不曾在全局上发生，却也有局部的或暂时的表现，也是值得我们正视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历史是在无穷无尽地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都在产生和消失。任何军事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作战能力水平之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军事思想当然也不能例外。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一个历史范畴之所以必要，其目的在于应当以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理论，防止把它看成是“顶峰”或“终极真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历史经过40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情况都已有了重大变化。军事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作战的对象变了，使用的武器变了，时间地点也变了。一句话，战争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战争性质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局部战争，倒是第三世界国家战事频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爆发了几次军事冲突。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套用原有理论就难以解释清楚。从战争样式来看，有使用一般常规武器的战争，有使用高技术武器的战争，还可能有使用核武器的战争；有高强度、中等强度和低强度的战争；还有大规模、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战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很难从原有理论中得到相应的现成的答案了。

凡此种都说明，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变化下去。作为上层建筑的军事思想，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既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为原有理论所包容不下，那么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造，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了。企图从经典著作中得到现代战争的现成答案，是苛求前人，也是荒唐的。因此，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发展。重点在于发展。这正是当代人在新的军事实践中，所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

注释：(1)叶剑英署名释文“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2卷第748页。

(2)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1页。

(3)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4—90页。

(4)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页。

(5)1926年1月《中国农民》杂志第1期。

(6)1925年12月—1926年3月，在《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等杂志上多次发表，每次发表均有修改。建国后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 (7)1926年9月《农民运动》第8册。
- (8)1926年10月《向导》杂志第179期。
- (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4页。
- (10)《中国文化》杂志第5期，1940年7月25日延安出版。
- (11)《解放》杂志第127期，1941年4月延安出版。
- (12)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
- (13)《毛泽东选集》第9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合订本。
- (14)《朱德选集》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15)《人民日报》，1958年8月1日。
- (16)《人民日报》，1977年8月1日。
- (17)《毛泽东的战略》，美《陆军》杂志，1963年4月出版。
- (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40~4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19)(20)(21)《毛泽东选集》第975、512、84页。1966年版合订本。
- (22)《人民日报》，1949年3月27日。
-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
- (25)《人民日报》，1950年9月27日。
- (26)《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8、359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出版。
- (27)[美]萨莫尔·格里菲斯《论游击战》。
- (28)(29)[美]基辛格《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 (30)《先驱》杂志第10期、1982年8月10日出版。
- (31)《向导》杂志第18期，1923年1月31日出版。
- (32)《评胡适的实力》，1922年12月，转引自《历史知识》，1983年第1期。
- (33)《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页。
- (34)《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页。
- (35)邵式平、汪金祥：《闽皖赣（赣东北）党史》。
- (36)《党的文献》杂志，1990年第3期第82页。
- (37)《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17页。
- (38)《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编著。
- (39)(40)(41)《毛泽东选集》第458、447、458页，1966年版合订本。
-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 (43)《红旗》杂志，1985年第11期第9页。
- (44)《浙江师院学报（哲社）》，1985年第1期第59页。
- (45)《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第4期第89页。
- (46)《河南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第4期第31页。
- (47)《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3期第63页。
- (48)《决策与信息》，1986年第7期第4页。
- (49)《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第29页。
- (50)《瞭望》杂志，1986年第4期第16页。
- (51)《文艺理论家》，1986年创刊号第9页。
- (52)《湖北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第26页。

- (53) 《红旗》杂志，1987 年第 11 期第 2 页。
- (54) 《理论月刊》，1987 年第 5 期第 28 页。
- (55) 《探索》（四川），1987 年第 2 期第 74 页。
- (56) 《社会主义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41 页。

**作者** 潘石英本书主编。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一室原主任，55 岁。70 年代起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已撰写和发表军事思想学科与战略学科的研究成果约 200 万字，是我国第一批被授予“军事科学研究员”学术职称的军队高级专家。

## 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研究

张作文

周恩来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军事运动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并兼军事部长，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党代表，第1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参与领导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和毛泽东曾主张给予反击。这个时期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等演讲中，对军队的性质、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1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规定，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sup>(1)</sup>在这个时期，他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1方面军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协助毛泽东领导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除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有力地指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直接参与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实施。1954年9月以后，虽未再担任军委的领导职务，但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仍然参与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有些还具体组织领导实施。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和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对发动、组织、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运动，对创建人民军队，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对组织指挥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对推动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最先觉悟并付诸实践的少数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一段时间里，全党直至中央对军事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足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纲里，提出了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的奋斗目标；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军事的重要性也曾论及，但他们有的未及实践就被敌人杀害了；有的只是提出了这一思想，并未实践。陈独秀在

为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还对农民的武装规定了种种限制，规定农民武装“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因此，这个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民众运动方面。如 1921 年第四季度到 1923 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一百多次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人数达 30 多万人。

在这个问题上，据笔者能够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觉悟并付诸实践的少数领导人之一。早在 20 年代初，他在旅欧期间一方面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中国近百年来农民运动屡遭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地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情况，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经过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进行反复比较，他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造中国的出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用暴力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也为自己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暴力革命思想最早见诸于 1922 年 12 月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他针对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的错误观点，鲜明地指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2)1923 年春在致邓颖超的信中，他引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莎·卢森堡的话“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赞赏这是“见到之语”。(3)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一个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造成他本身的武力，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因此，“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4)

认识了真理就全力为之奋斗。周恩来认识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就积极投入和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

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在广州黄埔成立一所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并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批优秀党员到学校担任军事、政治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 1924 年 12 月初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与周恩来一起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还有恽代英、肖楚女、熊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样，周恩来就以黄埔军校作基地，开始了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和创建革命军队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他根据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首先着手加强军校政治部的各项建设工作。一是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对军校的领导。二是建立健全政治部的各级组织，设立了指导、秘书和编纂三个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连选共产党员担任各股主任。三是改革了教学内容，规定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并重。除军事课程外，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增加的政治教育内容有《社会进化史》、《苏联研究》、《三民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各国革命史》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等。主要是使学员明了“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5)还建立了周会制度，每周邀请党政要人和知名学者到校演讲。毛泽东、廖仲凯、

张太雷、苏兆征、吴王章、宋庆龄、汪精卫等，都曾到学校作过专题报告。周恩来更是常常向学员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主要有：《军队中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对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划清新旧军队的界限起了很大作用。第一期在军校学习的学生共 645 人，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动员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仅第一期就有 80 多名共产党员，第四期政治班有 99 名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 1927 年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举行闻名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骨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他在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作战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改造国民革命军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一是结合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对部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二是给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三是打破旧军队的传统观念，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四是组织战地宣传队；五是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各种组织。这套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对取得两次东征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而且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制定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后来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6)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自己的人民军队之前，率先创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大革命初期，由于全党对军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去武装群众，不主张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只帮助别人做政治工作，所以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就全力帮助国民党发展国民革命军。当时国民党共有 6 个军，周恩来任 1 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 2、3、4、6 军的政治部主任，负责政治工作。这种情况，直到 1925 年蒋介石开始限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军队时，共产党人才开始抓自己的武装。1925 年 11 月在第二次东征的途中，蒋介石公开要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他。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洞察力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识破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以事关重大需请示党中央为由，严正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并积极倡导和亲自组织成立了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其余各级干部也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十分关心，除在独立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团有支部，连有小组）和亲自过问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外，并亲自制定干部和士兵的训练计划，编写政治教育提纲。他还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

给予具体指导。这个团名义上属国民革命军第4军建制，实际上受广东区委直接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创建军队之前，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 二 周恩来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革命党人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确定革命的奋斗目标之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前，就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进行了大胆认真地探索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后，他又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各地红军特别是他自己领导武装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一）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春，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湘、鄂、赣、闽、皖、浙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的主力，前锋已从南、西两面进入江苏南部，对盘踞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形成了很大压力。为配合北伐军，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周恩来在组织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对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发动一次成功的起义，首要的是切实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群众的发动和必要的武器准备。起义前，他认真分析研究了前二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对第二次武装起义各项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第一，建立各级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第二，制定了闸北、南市、沪东和沪西区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的方式、时间，通讯联络及注意事项等；第三，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训练，讲授巷战的打法等；第四，加强敌军工作；第五，准备了必要的武器；第六，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起义发起后，周恩来始终亲临现场指挥战斗，掌握战斗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制定新的作战方案和作战原则。起义从3月21日开始，经连续三十小时的激战，便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领导武装斗争之前，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创举，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原则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 （二）领导南昌起义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镇压消灭革命。面对这一严重形势，为了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等的协助下，在1927年8月1日又组织领导了闻名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对此，毛泽东和朱德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谕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放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今日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7)朱德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8)

### (三)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南昌、上海两次武装起义,还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武装斗争形式。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地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9)广州起义的教训,也是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后的革命斗争方针,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党中央首先派毛泽东回湖南发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全国各地在二百余处相继爆发了起义,主要有:广州起义,海南岛农民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河南确山农民起义,湖北黄安、麻城起义,赣西、赣南农民起义,鄂北地区农民起义,赣东北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地区农民起义,陕西渭华起义,江苏通海如泰农民起义,湖南平江起义,闽北崇安农民起义,川东农民起义,商南农民起义,六霍农民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对于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动员与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全党这时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困扰,还没有形成以“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各地起义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又缺乏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因而这些起义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也没有完全解决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党的“六大”前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认真总结了各地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毛泽东在湘赣秋收起义受挫后,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建立

农村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中国革命不能走苏联十月革命组织城市工人起义，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而只能采取毛泽东、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首先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几省交界的山区举行武装起义，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再逐步向外发展，最后夺取城市政权，这才是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现有史料看，对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始进行认真的思索，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思想，并为贯彻这些思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8年3月，他受党中央委托到香港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左”的错误。他在分析广州起义为什么失败时指出，“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10)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谈到土地革命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由此发生一个不平衡的发展问题。”(11)看来这时周恩来已初步认识到了过去只注重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到了6月份，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摆脱城市中心论，实行农村割据的思想。他在讨论六大政治报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个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12)随后又根据各地的经验，特别是听取了陈毅关于红4军关于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情况汇报后，正式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的这一重要思想，先是在1929年3月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来的。他全面地分析了湘鄂西一带党和群众的情况后指出：目前虽然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正在加紧准备战争“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13)到同年9月，在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表述的就更加明确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4)就是说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当时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等人却仍然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提出组织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省必须在各重要城市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要以总罢工为前提。对抵制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斥责为右倾。对周恩来提出的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斥责为“割据观念”，并决定将周恩来调离中央，去北方局工作。这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1930年8月，周恩来一回到上海，李立三等人就向他发难，周恩来态度鲜明地指出，发展农村“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根，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

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15)这个时期，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但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困扰，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创造的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力推广红4军的经验，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领导中央军委于1930年1月15日创办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4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并在《报告》前加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4军的经验。

### 三 周恩来在缔造新型人民军队上的杰出贡献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一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武装。这支部队的干部多数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还是用旧的一套带兵方法管理部队，严重的军阀作风、农民意识和城市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侵蚀着这支部队。如何把这样一支部队从政治上加以彻底改造，使其成为一支能够执行革命任务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各地红军急需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的革命事业就无法前进，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之前，就开始了伟大的创造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行者。在大革命时期帮助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军的伟大实践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结合当时的实际对军队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和方针原则，诸如军队的宗旨任务、建军方针原则和政治工作等，作了创造性的精辟论述和明确规定。后来他又根据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加以补充发展，为制定一套完整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就是为人民利益冲锋陷阵

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许多著述和演说中反复明确指出：“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16)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要打倒“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17)1926年7月，他在总结两次东征作战的实践经验时把军队的宗旨任务归纳为二点。第一，这个军队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主义的先锋；第二，这个军队的宗旨，就是为革命而奋斗，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这个军队就是要在党的指挥之下，守严格的纪律。这就从本质上划清了革命军队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后，他又结合红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补充完善了这一建军思想，特别是1928年8月下旬听取了陈毅关于红4军的情况汇报后，针对红4军存在的问题，联系各地红军的建设经验，对红军的任务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18)把军队的任务科学地概括为除了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就将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表述的更全面

了。周恩来的这一思想被毛泽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把红军的宗旨任务明确的规定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这个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任务，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等。这样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就由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固定下来了，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已经形成，解决了如何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仅在红 4 军实行了，其他各地红军也都照此做了，实际上成了全军的建军纲领。

### （二）革命军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必须把这支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周恩来的又一重要建军思想。从现有史料看，他在 1925 年给黄埔军校学生讲课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说：“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20）北伐战争时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在部队出发前他给连以上干部讲话时，再次明确指出：我们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的区别。我们一定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在叶挺独立团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以后又在国民革命军第 1 军的连排班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后，他又针对有些部队不注意维护党的领导的情况，强调提出“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这种权威要用集体指导的原则来建立。这就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但党如何正确实施时军队的领导，各部队在思想认识和领导体制上并未很好解决，有的部队事无大小都交党委讨论决定。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 4 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但“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21）周恩来在这里突出地强调了：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在军队各级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和制定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如何正确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革命军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周恩来历来认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为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曾把政治工作比做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他要求在对军队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他认为政治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形势、任务和部队的实际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大革命时期，他针对国民革命军大都“系前清遗留而来”、“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的实际，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启蒙教育，使广大官兵懂得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他明确提出应当“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

告以解除痛苦与压迫的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22)“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的军队确实有革命的观念”，“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革命军的行动“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23)为了提高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他特别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比士兵更要勤苦。这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第二次东征时，在他的倡导下就组织了一个160多人的宣传队，随部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对鼓舞部队斗志，取得东征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到了农村。为适应这一转变，他认为更需要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以引起各级指挥员对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提高两种不同性质军队的抗战热情，他适时地提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并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了具体措施，第一，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并重，必须有经常的政治教育时间，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第二，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第三，努力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增强官兵团结，提高士兵的战斗积极性。第四，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全体官兵，去团结全体官兵。

#### (四) 革命军队必须紧密地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一贯认为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是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力，革命军只有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这一思想在他早期的著述和演讲中反映得十分突出。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明确指出：要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因为单靠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以负重大责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长，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24)因此，两次东征每到一地他总是要求革命军要与人尺搞好团结，要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并号召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人早日打倒。为此，他为东征军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对群众不许蛮横无理，不拉夫，不筹饷；保护人民的利益，宿营不住民房；讨价购物，不用军用票；爱护公物、缴获归公；部队离开驻地时，要把驻地打扫干净，借的东西要还等。对违犯纪律的官兵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根据情节严肃处理。由于革命军纪律严明，“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复东江。”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的经验时也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的势力，打倒刘、杨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25)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红军创建了若干个革命根据地后，他提出不但要相信依靠群众，而且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红军一定要与工农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26)“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

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27)他还提出，“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28)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分析了华北的抗战形势后指出：“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29)“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30)“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31)因此，要“无丝毫迟疑的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32)怎样才能使革命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周恩来认为：一是，革命军必须全心全意为他们谋利益；二是，要使人民群众从自己实际生活中认识革命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

#### (五) 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军事训练

利用战斗间隙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这也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为学习争斗，应学习争斗技术。”(33)的思想。红军创建后他又针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得军事的状况，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34)并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办法和多次主持举办军事训练班，教授军事课程，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

### 四 周恩来在创造和运用人民战争战略策略上的光辉业绩

周恩来是伟大的战略家。“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宜”是周恩来的重要特色。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表现了他驾驭全局的卓越才能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他不仅善于根据不同时期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而且善于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得心应手地结合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 (一) 实行武装割据，消耗敌人，壮大自己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解决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开辟革命根据地，能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六大”后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进行了大胆认真富有成效的探索。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针对红军还十分弱小、物资补给又很困难、又处在四面被强大敌人包围，不断受到敌人“围剿”和工农群众运动在大革命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等情况，指出红军应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几个省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求站住脚根，再行发展。他在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信中指出：“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35)总之这时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

群众斗争。”(36)关于游击战争发展的区域问题，他指出：原则上讲“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37)“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38)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倾向，今后应特别注意克服。第一，脱离群众；第二，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第三，散漫缺乏组织。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时机和作战原则是：“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的等待倾向。固然亦绝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绝不能动摇围剿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39)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原则，对力量比较薄弱的敌人取攻势；对力量比较强大的敌人取守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的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这样，经过三年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红军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3月，红军已发展到13个军，62730人，2982支枪，打破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共消灭敌人7000余人，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然，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也就加紧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红军再完全沿用游击战的一套作战原则就很难打破敌人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适时地提出，应把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加以发展，应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以打破敌人的大规模“围剿”。为准备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他在1932年3月2日给1、3军团总前委规定的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40)攻打江西省南城的战斗，就是运动战的一个范例。在1932年8月，乐安、宜黄战役取得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胜利后，本想乘胜攻取南城。周恩来发现南城守敌已有准备，不易取胜，遂改变原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意在调动敌人，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12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重提攻打南城，周恩来仍坚持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他说由于国民党军目前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的策略，“我乃须另变战略”，“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41)周恩来在这里特别强调在运动中歼敌。他认为从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因为在运动中容易发现和抓住敌之弱点，便于我集中兵力予以歼灭。当然，“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兵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42)他还提出，运动战要有游击战的配合，特别是对优势敌人作战，应在农

民游击战的配合下，用各种方法“疲敝敌人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43)游击战如何配合运动战？他在和朱德、王稼祥给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并转湘赣省委的电报中指出：地方武装应依托现有阵地，采取强有力地出击防御，不断主动地到敌人侧翼、后方去行动，尽可能的牵制、阻碍、麻痹和疲劳更多的敌军，在各方面组织战斗消灭敌人，以便利我主力军选择一点，给敌以各个击破。他认为这时的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围剿”，不在占领地方多少，占城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44)他在指挥反四次“围剿”的作战中，就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的作战方针，他向临时中央提出：攻城有五不利，即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45)这些作战方针原则，不仅有利于保存红军的主力，待机破敌；而且有利于分散敌人的兵力，削弱敌人的优势，发挥我之特长，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效战法。1933年春，周恩来和朱德在组织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就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运动战的战法，粉碎了蒋介石四、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共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支的重大胜利。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他还提出“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46)和“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翼侧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最好是用优势兵力找敌弱点，迅速扑灭其一部”(47)的重要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也极力主张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934年初，他就针对博古、李德推行堡垒战、阵地战的错误作战方针，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48)

1936年1月，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周恩来和博古提出：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49)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一切军事行动都要立足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和有利于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红军应首先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

2. 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实际出发，要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群众扩大组织、开展斗争。

3.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好打的敌人，能够做到打则必

歼；二是有利的地形，便于发挥游击队的特长；三是作战地区的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的基础，便于群众的密切配合；四是便于部队给养的补充。

4.红军应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5.要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确定作战方针原则，绝不能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

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7.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 （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消灭入侵之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为促成全民抗战，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表现了驾驭全局的卓越才能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迫使蒋介石承认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区和我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大部分时间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外，还参与八路军、新四军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这个时期，他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也给予了有力地指导。

在国共合作前夕，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就红军参战的作战方针，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50）上海、太原失守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准备放弃华北与日本妥协，而党内有些人却盲目乐观，认为很快可以取得抗战的胜利。周恩来为了驳斥民族投降主义情绪和速胜论的观点，提高全民抗战的信心和树立持久胜敌的思想，在1937年11月先后发表了《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和《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全面地分析了华北战场敌我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后提出：我国的抗战将是持久的，战争的结局必然是日本必败，中国人民心胜。为此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抗战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坚持华北抗战”应“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去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这样才能“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51）他还提出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利，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52）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他主张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1939年春，他到安徽云岭新4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对新4军到达皖南后的发展方向、活动方针和作战方针，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新4军今后的发展方向，他根据皖南的敌情、地形情况提

出了三条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53)关于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54)这里所说的“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指的是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的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指的是巩固皖南的军部所在地和苏南的茅山根据地。关于新4军的作战方针，他明确指出：“游击战仍是我们新4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55)新4军江南和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方针，并正确地选择了发展方向，从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40年底，对日伪军作战2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万1千余人，缴获长短枪1万4千余支，轻重机枪540余挺，各种炮30余门，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区、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新4军也由2万余人发展到9万余人。

周恩来不仅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了每个时期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各项保障措施，而且还对国民党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对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就是因为采纳了周恩来以少数兵力置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主力置于敌人翼侧，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歼灭了进犯之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1938年3月，日寇在津浦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攻占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李宗仁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沿津浦路组织防御。白崇禧行前就第5战区的对日作战，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他对白崇禧提出：在津浦路南段，李品仙、廖磊两个兵团在新4军的配合下，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法，运动于淮河流域，使津浦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和守点打援的战法，以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白崇禧、李宗仁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取得了台儿庄战役毙伤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抗战初期，阎锡山担任娘子关经尤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的防御任务，构筑绵长的国防工事，企图把主力部署在正面依托这些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周恩来看了雁门关的防御工事后，建议阎锡山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平型关战役后的忻口会战，阎锡山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也是以主力部署在敌进攻之正面，组织防御。周恩来认为从战区的地形情况和日军的作战特点看，这样部署不妥，正面硬堵不加以少数兵力箝制敌人，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止敌军突入。具体打法是：在中地区，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当面之敌，用主力把敌人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歼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箝制敌人；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人的进攻计划。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

1. 军事斗争要服务于政治斗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存在，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要适时地把军事战略的指导重心转到解决民族矛盾方面上来。

2. 同民族敌人特别是同军事力量暂时强大的敌人作战，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战和采取持久胜敌的战略方针。

3. 在同各派政治力量联合抗击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必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对顽固势力又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和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

4. 弱军对强军作战应避免正面阻击，应多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敌之翼侧，务求每战必歼。

5. 作战应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 （三）根据战局发展，适时组织战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参与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领导总参谋部对全国各战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承担着极其繁重的组织工作。除亲自起草许多重要文电外，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由周恩来签发，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起草或经他签发的文电达 561 份，最多时一昼夜达 22 份。据现有资料，周恩来对巨（野）金（乡）鱼（台）城（武）战役，第一次攻打榆林、沙家店战役、进军豫西、延清黄尤战役、进军豫皖苏、张家店战役、解放运城、胶济线作战、宛东战役、襄樊战役、宜川战役、临汾战役、洛阳战役、出击冀热察战役、晋中战役、津浦路中段（兖州）战役、豫东战役、涟城战役、济南战役、察绥战役、太原战役、郑州战役、西北冬季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宜沙战役、长山列岛登陆作战等等，都有电报指示。对这些战役的组织实施给予了适时有力的指导。

周恩来历来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和实现这一决策的作战方针、原则。这一点他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解放战争从爆发到 1947 年 2 月，敌共占解放区城市 105 座，但被我歼灭 71 万余人。我军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发展到 137 万人，并缴获敌人大量武器。这就是说，敌人虽然占了 105 座城市，但执行机动作战的兵力减少了，因为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担负城市的守备任务。我军则由于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战线缩短了，兵力集中了，武器装备改善了，这就为出击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根据这一敌我态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去年的作战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战略上防御，用空城来换取实力。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下一步就可以采取打出去的方针了。只有打出去，全国大反攻，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认为：实现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是有把握的，有根据的。从敌人方面看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是打出去的好条件。从解放区方面看，首先是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第二是土地改革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而且蒋管区的人民听了也喜欢；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再从国际形势看，也是有把握的。战争的进程完全像周恩来所预见的，

经过一年的作战，解放军已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争取早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第三年的战略方针和各战区的作战任务。周恩来根据解放战争前两年的作战，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军已基本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情况，在会上提出第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56)他提出的“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的建议受到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书记处立即连续开会研究打大仗的问题。不久他就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开始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决战。战役发起后，周恩来密切掌握战役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适时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文电。辽沈战役发起后，原定方针是首先攻取锦州，切断敌人由陆上撤往关内的通路，将东北之敌在东北予以歼灭。这是关系到辽沈战役能否获得全胜的至关重要的一着，对下一步平津战役的实施也有重要意义。而林彪却因位于葫芦岛之敌有增援锦州的可能而动摇了决心，于10月2日致电军委。周恩来当日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严肃指出：决不能因敌情的某些变化而动摇决心，“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57)锦州、长春解放后，周恩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提醒他们“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长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58)但这一重要指示并未引起林彪的重视，以致少数国民党军队经营口从海路逃走。毛泽东曾批评林彪：这件事“是一个不小的失着。”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发起前为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津、张、保地区，以便东北野战军入关协同华北部队将其彻底歼灭。周恩来对此作了周密地部署。

11月9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华北局并告东北局，指出：傅作义“正徘徊于平津张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匪桌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59)因此，为了拖住傅军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60)特部署华北第2兵团一部分兵力向太原移动，第3兵团停止执行攻打归绥的计划，并令程子华、黄克诚部担任监视北平傅军的任务。他17日再次致电东北、华北两野战军领导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涂淮地区歼敌，也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61)“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62)要他们郑重考虑东北野战军应提前于11月25日左右向关内开进。电报中还提到：“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现正与徐周电商是否可以暂时停攻，就地休整，待你们攻平津时再打太原。”(63)19日，就程子华、黄克诚请求占领滦河铁桥问题，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此举将会有惊动榆关滦洲之敌，使其过早退缩唐山津沽、从海上

撤退的危险。东北野战军正提早入关，派队占桥问题应在林、罗整个作战计划之内。”(64)这一系列指示，对抑留傅军主力于平津地区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提出的作战思想和指导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并随时做好进行军事反击的各项准备。

2. 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进攻必须进行坚决反击，以有力地配合谈判斗争。

3. 作战应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保守地方只能在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前提下进行。

4. 要善于调动敌人，力争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

5. 集中优势兵力先打诸路敌军中较弱的一路，或敌军诸阵地中较弱的一点，以求各个歼灭敌人。

6. 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把握战略决战时机，在对我有利的战场上及时组织战略反攻。

7. 一个战役指挥员应把自己的注意力始终放在那些对战役进程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上，战役计划一经决定只要敌情无大变化，即应坚决按既定计划实施，决不要轻易改变决心。

8. 全局在胸，为了夺取全局的胜利，宁可牺牲局部的利益。

#### (四) 切实作好战役的各项保障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这场战争，参与制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外交斗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保障中央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的有：

在通过外交途径同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霸占我国台湾和破坏停战谈判的罪行，进行有理有节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还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对保卫我国东北的安全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首先，主持讨论部署了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组织了将东北地区南部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向北迁移的工作。其次，志愿军出国后，他提出了“边打边建，齐头并进。以后面的建，支援前面的战，以前面的战，促进后面的建”的方针，他还提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然要经过一个持久的复杂的和艰巨的过程。因此，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要把运输线建设成“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以保障作战物资的及时前运和伤病员的后送。在作战指导上，他特别强调提出，必须力争保注“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在兵力运用和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分割的敌人。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然后各个歼灭之。他还强调指出，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是说，和拥有高度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作战，特别是初期作战，应先选择强敌中的弱敌，集中优势兵力打些小歼灭战，摸清敌人的“脾气”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打较强之敌和较大的歼灭战。

## 五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上组织者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主体，它的任务由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为主，进入了以防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为主的新时期，主要作战对象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势力。为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以很大精力组织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过渡和军事院校的组建以及部队教育训练的决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主要的有：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必须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军需民用结合；军队现代化建设，首要的是改变常规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和大力加强尖端核武器的研制；国防现代化需要一大批德才兼优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人才，等等

### （一）培养德才兼优的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和加强部队训练。

早在1950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65），“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6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用很大精力抓了军事院校的筹建工作。到1957年底全军已形成了具有初级、中级、高级相衔接和诸军兵种齐全的院校体系。先后成立的院校有：南京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和5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以及一大批专业技术学校。关于这些院校的训练方针和训练任务，在周恩来审定的报告中规定：仍然是抗大的教育方针。课程主要是讲授毛泽东思想、战略战术、中央军委的文件，其次是学点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还要学一点现代战争的理论 and 诸兵种协同作战与指挥的内容，也可学点战术概则。在教学方法上，军队干部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要叫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要多采用启发式、讲座式，不要灌注式。就是在解放军现有素质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他还提出要在5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1965年初他深入部队视察时针对部队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要“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这就是说，部队的训练不能搞“花架子”，要根据战时的需要和未来战争的特点，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着重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针对部队只搞文，不搞武，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并明确提出：“全训部队除野营拉练外，全年步兵军事训练90天，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的要求。从而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拨正了军队建设的方向。

### （二）狠抓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

他在主持政府工作中总是把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放在重要地位。他除在建国初期，组织领导了从苏联进口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和部分舰艇、飞机、坦克等重武器外，还以很大的精力主持领导研究、试验导弹和核武器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亲自主持召开了近百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制定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他主持制定的发展我国尖端核武器的方针原则主要的有：

第一，我国研制尖端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同核大国进行核竞赛。他在一次研究部署核武器研制会议上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靠什么去戳穿？一是政治上揭露它；二是我们要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因为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核大国使用导弹核武器。他还明确指出，我们的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规划不宜过大。这是周恩来为我国制定的研制核武器的一个根本思想。1964年10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他即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致电各国首脑表明了这一原则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67）

第二，进行核试验要注意综合利用、军民结合。“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68）

第三，要注意原子能的和平利用。1970年他曾三次提出要搞核电站并提出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第四，从事国防尖端技术工作，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五，研究试验工作，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周恩来还提出，国防工业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69）的战略思想。这对于合理安排各项战备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由于认真贯彻这些思想，不但使我国的常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核技术的研究应用、空间技术的发展和运载火箭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提高了国防现代化的水平，增强了国防实力。

### （三）积极倡导和推进军队体制改革和规章制度的建设

他认为只有把德才兼优的人才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实现这一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组织体制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早在1951年，他就组织领导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全军的整编计划和具体组织领导了全军的整编和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为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整体威力，他又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把各种条令、条例制定出来，以统一全军指挥，加强协同和统一全军的工作、生活秩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到1955年就先后颁布了暂行步兵操典、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和兵役法。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和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提供了依据。

### （四）教育广大指战员要居安思危

周恩来认为这是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57年他在视察部队时，针对一些干部的敌情观念不强，工作有些松懈和组织纪律观念差的情况，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一是必须加强敌情观念，

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平时就应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能放松。二是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党一定要管军队，当然是管大事，不是管小事。三是必须加强军政联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应关心。当然，加强军政联系不只这一项。其他的如征集兵员、复员转业、工程建设、义务劳动等，许多事情都要双方协作。四是改进军内关系。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五是要密切军民关系。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之后，军民关系比过去疏远了。必须注意改进。军队要永远保持与人民的血肉关系。

1971年夏，他还针对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级领导人会谈，部队可能产生和平麻痹思想的情况，提出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的精辟论断。教育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各部队认真贯彻这些指示，各项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和参与领导武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这些宝贵经验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军事思想，是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人民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历次革命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像任何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一样，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周恩来在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也有失误。尽管造成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从不文过饰非，总是本着严于律己的原则，主动承担责任，多做自我批评，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这种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改正失误的科学态度，是他的思想永远活跃、不断作出新的创造的重要条件。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对于全面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搞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研究制定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 注释：

-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2页。
- (2)《评胡适的“努力”》，载《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 (3)《德法问题与革命》，载《觉邮》第1期，1923年4月6日。
- (4)《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1925年6月2日。
- (5)《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2月6日。
- (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5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 (8)《朱德选集》第126页。
- (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
- (10)(11)(12)《周恩来传》（1898—1949），第164、165、173页。
- (13)(1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2页。
- (15)《周恩来传》（1898—1949）、第219页。

- (16)《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2月。
- (17)给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的题词，1926年初。
-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页。
-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 (20)《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926年7月。
- (2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0、41页。
- (22)《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2月。
- (23)《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926年7月。
- (24)《在广州市第一公园举行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1924年10月。
- (25)《工人之路》特刊第37期。
- (26)《周恩来传》（1898—1949），第175页。
- (27)(28)(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2、32、85页。
- (30)(31)(3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3、82、87页。
- (33)(3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16、154页。
- (35)(36)(37)(38)(3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4—35、18、15、34页。
- (40)《周恩来传》（1898—1949），第235页。
- (4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36页。
- (42)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376页。
- (43)周恩来：《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1931年2月19日。
- (44)周恩来：《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
- (4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2页。
- (46)(47)(4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46、256、260页。
- (49)《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第38页。
- (5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5页。
- (51)(5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4—86页。
- (53)(54)(55)《周恩来传》（1898—1949），第441、442页。
- (56)《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728页。
- (57)(58)《周恩来传》第730、732页。
- (59)(60)(61)(62)(63)(64)《周恩来传》（1898—1949），第734、735页。
- (65)(66)(6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160、431页。
- (68)1965年2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 (6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页。

**作者** 张作文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58岁，军事科学副研究员，1981年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已发表《创建人民军队的先驱》等论著。

## 浅析朱德的军事思想

龚希光

朱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有丰富的革命军事斗争实践和大量军事著作。朱德的军事思想是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人民军队的科学理论，是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创建人民军队和指导革命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和他们的战友们，共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国情的共同认识；在这些共同经验和认识的基础上，主要由毛泽东，同时也由朱德和其他军事领导人进行理论概括，成为当代中国革命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同毛泽东一起就中国革命武装斗争进行决策，共同起草、审核文电，指挥革命战争。朱德的军事思想不但融合于毛泽东起草的军事文献之中，在朱德的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更有全面的阐发，从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 一 朱德军事实践的特点

研究朱德的军事思想，应先了解其军事实践。朱德的军事实践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朱德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长、跨度大。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三个历史阶段。

1909年，朱德23岁时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戎马生涯。辛亥革命时，参加云南昆明的“重九起义”。1916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战争。纳溪一战，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1917年，因战功升任旅长。但是，他痛惜辛亥革命的失败，厌恶旧军队的腐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外出寻找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1922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表示“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回国后，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他是无役不与。周恩来曾说，他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2)

朱德从旧军队投身于革命军事斗争。他对旧军队的腐败看得分明，深知其原因和危害，这成为他在思考人民军队建设问题时的“对照系”。他在有关人民军队建设的许多论著中，常常用新、旧两种军队作对比，说明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同时，也使他人民军队应当具有的特征特别敏感。在德国留学时，他曾参观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阅兵式和野战军事训练。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是一个由德国共产党领导的准军事组织，以工人为主体，并有一部分农民和学生参加。当他看到人民对这支队伍热烈拥护，向他们捐献了大量食品时，感到这就是人民武装。朱德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他要求党组织介绍他去德共军事组，考察、研究他们的军事活动和经验。此事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他提出的要到莫斯

科学习、研究苏联红军的经验，并接受军事训练的要求却得到了满足。回国后，在漫长而艰险的革命军事斗争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直到晚年仍不辞辛劳地参预军事活动，朱德的一生，军事活动的时间长达 67 年。

第二、他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对武装斗争的意义有正确认识

并具有丰富军事知识的少数党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从不重视武装斗争，转变到不但重视而且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转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一南昌起义前他遵照党的指示，利用滇军的关系，创办并担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在此期间，他除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外，还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积极发展共产党员；经常派李员到附近县、市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在党尚未领导武装斗争时，朱德已经在默默地进行着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了。

1933 年“八一”前夕，朱德撰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一文，其中对红军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英勇的、青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它的光荣的斗争历史如果从南昌八一暴动算起，已有六年；若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运动算起——如组织军队、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和领导各地农民或白军暴动等，则有八年光荣艰苦的经历。”可见，虽然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尚不重视武装斗争，但在党内杰出人物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仍为领导武装斗争作了不少准备工作。朱德在南昌军官教育团以及其他一些军事活动，亦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后来，这个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地方，成了党的地方工作的骨干；一部分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成了红军的骨干。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维持着一支革命军队，保存了一批革命火种，坚持武装斗争。在赣南，他对部队进行了多次整顿、整编和整训：进行坚定革命意志的教育；整编部队，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加强连队政治工作；严格纪律，要求部队除打仗外，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并实现了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方向的战略转变。同时，朱德顶住了“左”倾领导人的反对和“右”倾思潮的压力，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取得了暂时的立足地，并在物资供应方面取得了范石生部的支援，使这支处在濒于覆灭险境的革命武装得以转向坦途。在这个基础上，成功地发动了有一百余万人参加的湘南起义，使武装起义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相结合，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最重要的一部分来源；朱德领导的这支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组成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红军第四军，不久发展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后称中央红军）。

1930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此后，他和毛泽东把中央红军和其它地区的红军结合在一起，统一步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

第三、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和毛泽东一直合作共事，并肩战斗。“朱毛”成了红军的旗帜，人民胜利的旗帜。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朱德起了除毛泽东以外其他任何领导人不能代替的作用。

朱德不仅参预战略决策，而且负责具体实施各项战略决策，担负大量繁重的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的组织指挥工作。他不但重视军队的政治建设，而且重视军队的军事建设；不但重视战略研究，而且重视战术研究和指导。

同时，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也作了科学的概括。在《论解放区战场》中，他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的概念，并把解放区战场的特点概括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个方面，这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中，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在建军31周年时，他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军事辩证法问题，指出：毛泽东的军事著作“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3)无疑，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朱德的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从建军和用兵两个方面来分析和介绍朱德的军事思想。

## 二 朱德的建军思想

朱德的建军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 重视军队的政治素质，也重视军事素质，主张政治和军事、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反对绝对化和片面性

重视和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显著特点之一。朱德作为军事统帅，一贯重视和支持军队的政治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在赣南领导起义部队进行的整顿、整编和整训，与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改编一样，重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他在1931年7月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对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制度、密切联系群众与提高红军战斗力，完成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批驳了取消派污蔑红军是“土匪流氓的乌合之众”的反动观点；以后，又批驳了企图把中国红军建成“象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4)的教条主义思想，坚持了正确的建军方针。他强调“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红军一切生活的保障”(5)“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6)是“军队的灵魂。”(7)同时强调政治工作要保证新的战术在平时学习好，战时能够运用，要保证命令百分之百的执行。“我们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很艺术的来打仗，将敌人消灭下去，造成铁的红军。”(8)他不赞成把政治工作绝对化，指出：“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9)

建军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在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中，曾产生过一些意见分歧。他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要求军政干部搞好团结，不能闹独立性，认为军事行政系统与党组织的正确关系应当是：“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10)他历来尊重党的领导，但不赞成党组织包办一切。

朱德主张从智力、体力、技术三个方面进行练兵。所谓智力，包括政治觉悟、军事知识和文化程度。一定的文化程度是学习政治和军事的基础，有了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作战就勇敢。同时，“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力锻炼很重要。”(11)他认为人民军队因为有共产党领导，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制度，所以从整体上说，这个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因而是勇敢的。但是，光靠勇敢还不能战胜敌人，“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12)他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勇敢加技术，(13)并指出这支军队的

弱点是技术上缺乏基础，他曾分析说：“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比政治工作要落后，所以常常与敌人作战时，胜利大，牺牲亦大。”(14)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不但装备不如敌人，而且环境也不利于进行技术训练，一部分干部主观上也不甚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朱德认为，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将愈来愈大，技术的训练也愈来愈复杂，人民军队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技术提高了，从短期说，缴获到敌人的新式武器，马上就会使用；从长远来说，“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才能战胜一直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15)同时，“技术是战术的基础”(16)，人民军队要在战术方面超过敌人，也需要不断提高技术。他曾尖锐地指出：经常不断有新的同志参加红军，干部的提拔也很快，有的干部并不具备应有的军事学术；加以参军的人大多数是农民，科学常识较欠缺，一旦要求他们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当然要做艰苦的工作。因此他强调：利用每个战斗间隙，争取很短少的时间，来加紧进行红军教育工作，以提高红军军事学术，是红军各级指挥员的战斗任务。他还针对某些人空谈政治而不重视技术的倾向指出：红军绝不惧怕敌人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大炮确有杀伤威力，是要吃肉的，口头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办法，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这是朱德长期带兵、练兵的经验之谈。但是，对于他关于“勇敢加技术”的建军思想，军内有些人并不理解。当朱德那篇强调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文章——《军事教育要从实际出发》，1943年8月1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后，林彪在一次会议上攻击这篇文章是什么“违反政治建军的原则。”后来，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17)然而，林彪没有从总司令的教诲中受到教益。后来，他那种不尊重体力与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同他逐步膨胀起来的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竟然发展成为“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等一整套所谓“政治建军”的荒谬主张，使部队建设和党的整个事业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 (二) 主张军民一致，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军民关系

建军初期，朱德就十分重视改善军民关系，指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使全体指战员“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18)他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提到建军宗旨的高度，作为区别军队性质的根本标志。剥削阶级的军队是压迫、剥削和奴役人民的军队；而人民军队的建军总原则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19)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他特别重视群众纪律，指出：“一般地说来，政治纪律就是群众纪律”，军队“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帮助，非有良好的政治纪律不可。”(20)他特别不能容忍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一旦发现，除教育外，总要视情况给以惩处，决不姑息。

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异常困难，而军队又不断扩大，如果处理不好，与民争食，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对此，朱德提出了人民军队特有的养兵方针。一方面，在精兵简政、军民兼顾的原则下，从总司令到士兵，一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方式，过着十分清苦俭朴的生活。常常在衣不暖、食不饱，没有薪水的情况下，为人民的利益去战斗。朱德说：“就是怎样困难，也宁使自己困难些，不取同胞的一针一线。”(21)在红军时期，朱德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向公家要过一分钱。(22)抗日战争开始后，

军队才开始发一点津贴，1938年底规定：师、旅级五元，团、营级四元，连级三元，排级二元，上士一元五角，战士一元。到1942年底，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效果，朱德和彭德怀下令，自1943年1月1日起，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增发食油二钱，每月增发津贴费五角，每年发洗脸毛巾两条。这种情况其他军队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组织军垦屯田，发展生产。军队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开荒生产，在南泥湾开发以前就有，但规模不大，从开发南泥湾起，军队生产的规模扩大了，不仅生产粮食、蔬菜，而且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以及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从而全面达到减轻人民负担，支持抗日战争的目的。为了实施南泥湾的开垦，朱德精心筹划，实地踏勘，宣传教育，组织劳力以至指导耕耘种植，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使南泥湾生产取得巨大的成功。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23)

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除了有正确的养兵方针以外，还要建立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这就要求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伟大气魄。由于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地的开辟，地方政府以至某些地方党组织的建立，都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帮助和指导，如果没有确立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某些军队干部很可能会产生高人一等的思想，不尊重人民和政府，这仍然不可能搞好军民和军政关系。

如果说，早年朱德在滇军中服役时，他的爱民思想中还夹杂着某种程度的救民于水火的恩赐观点的话，那么，自从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确立了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以后，已不再把人民群众当成被拯救的对象了，而是“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24)他经常教育部队：“革命是为群众的事业，又是群众自己的事业”。(25)他组织领导各项工作都强调依靠军内、外群众。他从不抹煞干部、战士的主体精神，相反，强调“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26)而不是作战的机器或工具，充分发挥其革命的积极性；但同时又强调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群体意识结合起来，提倡集体英雄主义。他向来重视领导干部必须教育与领导群众前进的责任，但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向群众学习和依靠群众这一方面，他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27)“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的支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的。”(28)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却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29)他是全军的总司令，却从不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而是朴素得像个田舍翁。他在军内外有崇高的威望，人们都乐于执行他的命令，除了他的地位和权力外，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模范行动，特别是热爱和尊重群众的真诚态度，以及杰出的指挥才能，从而赢得人们的由衷的尊敬和爱戴。

### (三) 主张官兵一致，建立民主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朱德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在国外时，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所了解，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后，又较突出地反对了蒋介石的反民主的独裁统治，所以，他的民主意识较强，对于旧军队的军阀制度深恶痛绝。“民主意味着平等”，(30)无产阶级要求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是要求消灭阶级，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以互助合作代替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

现象。正是从这个高度出发，朱德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内部，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或炊事员、马夫，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他指出：“从1927年创立人民军队以来，就废除了打骂制度。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31)他决心在人民军队中一扫军阀制度，对于任何军阀主义的残余表现，决不宽客。例如，1932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就总供给部出纳科长李景文打传令员耳光一事发布通令，指出：“查肉刑制度——打人，是军阀压迫士兵群众的一种残酷行为，红军中早已通令废止，李景文此种行为，完全是军阀残余习气，是破坏了红军制度，着予记大过一次，以示警戒”，并通令全军。

朱德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认为古之名将尚能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人民军队的干部不但不应搞特殊化，而且更应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朱德本人无疑是全党、全军的模范。他要求下级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同时，又要求他们养成机断专行的主动性。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战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又相互了解，团结一致。在这个基础上是能够将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两者统一起来的。朱德提倡士兵尊重干部，不搞极端民主化；干部爱护士兵，不能粗暴对待。尊干爱兵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之一。他善于发现指战员身上的积极因素和英雄气概。抗日战争时期，他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人人争做新的英雄，为了革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民主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重要标志。旧军队的纪律是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立的，而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32)“遵守纪律也要靠干部以身作则。”(33)军队一定要有严密的纪律，否则就带不好兵。所谓严密就是犯了纪律就要及时正确地处理，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罚的处罚，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一起算总帐。

朱德还把军内民主运用到作战方面，发展为军事民主，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由指挥部把作战意图告诉广大指战员，发动大家讨论完成任务的战术与方法。这种做法，收到了极佳的效果。1947年在首次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石家庄时，军事民主就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军事民主，只有在官兵一致、上下一心的人民军队中才能做到。这是人民军队的又一个特点。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及时提出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任务，以适应对付现代战争的需要**

朱德一贯重视在可能的条件下，使部队掌握新式武器和新的军事技术，改进部队的编制和战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就提出，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包括海军、空军等在内的国防军。(34)在1950年9月举行的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他再次提出“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的任务。

1951年，他在《八一杂志》发刊词中指出：“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军事上，必须通晓与掌握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及各种战术，并且有坚强的后方勤务工作”。直到1954年，朱德还重申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35)朱德关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理论，有以下基本内容：

#### (1) 重视新的军种、兵种建设，使人民解放军成为合成军队

建国以后，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职能。根据这个职能，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朱德指出：“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抓紧建设空军、海军以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待种兵。现存的陆军除整编一部分继续留做陆军外，大部分也可转为新式兵种”。(36)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和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朱德说：“我们建立了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工兵部队、防空部队、铁道兵部队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有了这样复杂的军兵种和大量使用复杂的战斗器材，这就是现代化的标志。”(37)

#### (2) 重视军事训练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朱德特别强调军事训练。他指出：“我们所以要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面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末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38)他说：“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39)过去打游击，强调机动灵活；打现代化战争就要强调集中统一。鉴于许多人对现代化所必须的正规化制度很不适应，他就亲自抓正规化的训练，如主持制定训练计划，出席军事训练会议，视察军事演习，主持高级干部集训等。在他的领导下，五十年代前期，人民解放军掀起了大规模练兵热潮，使军事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现代化、正规化训练中，朱德重视调整政治和技术的关系，要求“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40)他指出：“要提倡干部学习技术，尊重技术，掌握技术。”(41)“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42)“要建设好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技术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43)他还指出：“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44)这些论述与不久后发展起来的“突出政治”，否定技术的作用的极“左”思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尊重并认真贯彻朱总司令的建军思想，对于军队建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朱德认为，国防现代化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军事人才。他说：“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同样是不可能的。”(45)军队院校是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基地，他亲自抓军队院校，对办校任务、方针、训练内容以及对学员的要求等，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要求“使军校建设走在军队建设的前头。在教育计划的贯彻执行中，要注意学用一致，要适合军队建设的需要，不要军队搞一套，学校又搞一套。”(46)1954年3月下旬，他还亲自主持了对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学员的考核。

### （3）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生产

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朱德非常关心国防科技工作的发展。他要求部队干部“精心研究科学技术”（47）他指出：“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48）“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49）

朱德主张，国防工业生产只能走主要依靠自己制造的道路。为此，他多次致函毛泽东、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建议把某些兵工工程项目也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随着国际形势出现缓和，他还建议：“武器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50）朱德曾多次提出军品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建议，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但这个建议在他生前一直未被采纳，直到他逝世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我国历史的新阶段，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才得以实现。

### （4）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

朱德一贯重视后勤工作，他认为，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后勤部门“再不能只靠过去的老经验了”，（51）“交通、后勤供应也要现代化。”（52）在现代化战争中，“能否打胜仗，后勤工作起一半作用。”（53）同时强调：“军队的后勤工作要照顾大局，要根据国防经费办事。要建立强有力的财政监督制度，大公小公要划清，用款要有规定，要注意节约。”（54）朱德的亲切关怀，有力地推动了后勤建设的现代化。

## 三 朱德的用兵思想

朱德的用兵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实事求是、灵活机动

朱德在战争实践中，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不机械搬用书本或别人的经验。他说：“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55）他认为，对任何战争都可以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56）各要素在不同的战争中，其重要性是不完全相同的。如交通要素对于现代化军队来说，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但对游击队来说则并不重要。各要素之间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要素可能很薄弱，有的则有很大的优势。要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如武器落后，就应特别注意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使“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57）他认为战争是时代的产物，强调战争的阶级性，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十分重视在正义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只有对战争五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后，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

朱德用朴素的语言精辟地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58）即根据部队的装备、敌情和时间地形等各种条件来决定战略战术。他说：“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59）这种用兵新法同时也包含了极大的灵活性，因为，“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60）情况变化，

用兵方法也随之变化。他从不以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作战从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使敌军无法捉摸。许多从各种军官学校毕业的敌军高级将领，常常因此而败在他的手下，而又常常不服气。由于这种切合实际而又灵活多变的用兵原则，人民军队虽然装备比敌军差，仍能以少胜众，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壮大起来。

朱德指挥作战一般不采用死守硬顶的单纯防御，而善于运用灵活的攻势防御，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大致可以取得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时，他和毛泽东制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61)。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同时，决定先打弱敌，指挥红军横扫敌军，发展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和毛泽东率领的红1方面军，千里回师，灵活用兵，以少数部队示形于敌，牵着敌军在高山险路绕行，创造战机，主力则集结待机，伺机歼敌，表现了很高的指挥艺术。第四次反“围剿”，他和周恩来根据新的情况，采用了在根据地边缘地区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战后，他总结了红军战略战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战术的主要原则是迅速、秘密、坚决”；“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62)等等。无疑，这些用兵原则对于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敌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教条主义者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利用朱德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把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抛在一边，“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63)这就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

## （二）重视战术研究和战术指导

朱德作为全军的总司令，既要参予战略决策，更要具体组织和指挥战役、战斗。他说：“每一次战役，不是坚决的胜利，便是残酷的失败，我们要从较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64)他形象地把军队的作战经验比作一大篓子散钱，而把战术比作钱串子，可以把作战经验串起来，不再是散的了。他很重视总结实战经验，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战术；再用以指导部队的实际战斗。他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战术，还动员广大指战员一起研究。他说：“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65)他认为，高级干部要注意战略战役，一般同志要注重战术。如果部队不懂得战术，要想取得战略战役的胜利也是不实际的。1933年6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编辑出版的刊物《红色战场》上提出了关于山地战的九个问题，引导大家讨论，以提高战术水平。有的战斗没有打好，他总要在战术上寻找原因。如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第5团在屋头街战斗中，未能消灭敌人，自己略有损失，战后总结又没有抓住要害。朱德写了《对于振堂、伯钧两同志屋头街战斗论文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到战术上进行总结。此外，为了指导中初级指挥员提高指挥和掌握队伍的能力，撰写了《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怎样学习行军》、《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在每一次比较重大的战斗以后，他总要从战术上来总结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充实、验证已有的战

术，或对原有战术加以发挥和补充，这几乎已成了习惯。甚至长征期间，他在左路军受张国焘挟制的情况下，为了保存红军实力，他忍辱负重，仍不放松指挥作战并作战斗总结，对部队进行战术指导。从保存下来的他在 1935 年 10 月、11 月间写的六篇战斗总结看，大多反映了他关于山地战、隘路战、追击战、运动战、遭遇战、袭击战等战术思想，有的还对原有战术作了补充和发挥。如他在总结天芦战役的青龙场战斗时，除指出要在战略上打敌之主力，在战术上则打敌之弱点外，还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迂回、包围、截击，逼他退出阵地进行运动战，最容易消灭敌人，”等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战争诸要素发生了变化，作战方法当然也要随之变化。为了对付日军的奇袭和合击，1938 年 1 月，他和彭德怀提出了十六条战术原则，其中包括：在敌分进合击中，应在敌诸支队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应突击敌之后尾而不是先头部；对敌进攻保持高度的突然性质，迅速解决战斗，能迅速转移突击方向；行动极端秘密，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战斗过程主要是白刃战；在主要方向突击时，对次要方向以游击队袭击以迷惑之，等等。(66)充分体现了他提出的迅速、秘密、坚决这三条关于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2 月又提出指挥作战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条提出：“如遇敌人进攻，只以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这是他早期的关于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而以小部于次要方向箝制和吸引敌军的战术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1938 年 4 月，就是采用这种战法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其他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大体也是这样打的。在抗战两周年时，朱德把抗日根据地这种就利避害的机动战的原则概括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意为掌握火候），转入外线。”(67)这个机动战原则，体现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客观情况提出了两个大难题，即如何攻破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和如何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朱德亲临前线，具体指导了石家庄战役，取得了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坑道作业，炸药开路，炮、炸、步协同；集中火力，突破一点，迅速扩张等一整套攻坚战术(68)，解决了第一次难题。对于另一个难题，朱德提出了“钓大鱼”战术，把国民党主力比作大鱼，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用迂回曲折的办法与它斗争。大鱼上钩后，不能马上扯上来，先要把它弄疲劳。“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69)实践证明，这种“钓大鱼”的作战方法极其有效。

### （三）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配合作用，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

朱德不但重视人民群众的战略配合，而且重视人民群众在战役和战斗上的直接配合。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红军作战总是尽可能地把战场选在群众条件较好的地方。朱德在总结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时说：“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70)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战场在根据地边缘的新解放地区，但红军作战仍得到了群众的协力。不但地方武装、小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而且作为战场的“东陂、黄陂均为宜

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71)这种不但在平时，而且在作战中直接得到群众协力的战法，朱德称之为“群众战”，并认为这是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军队援助人民的各种斗争，另一方面人民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各种斗争去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72)“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73)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

“群众战”有巨大的威力。在前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只有五万人员、三万枪支的红军，战败了几十万装备好得多的国民党军队，这就是因为红军执行了“群众战”，无怪当时蒋介石和外国人都摸不透红军的实力。抗日战争爆发后，要战胜比国民党军队装备更好的日本侵略军，当然还要依靠“群众战”，1937年12月，朱德在回答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的问题时说：“通过发展一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抵抗形式，我们可以完全抵消日本在现代装备和组织方面的优势。”(74)这时，由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战”的基础比过去更广泛了。朱德说：“地主、资本家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奸。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大批粮食都愿供给我们。”(75)但是，“群众战”与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是矛盾的。因此，朱德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76)“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77)

朱德认为，“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78)“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79)既然国民党统治区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里实行。因此，他说：“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努力创造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是整个战略问题中的主要任务。”(80)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民主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支援军队作战的积极性。

不但要发动群众，还要组织群众。朱德指出：“如果群众只有对付日本的心思而没有组织，也就不能抗日。”(81)在各抗日根据地，不但有工、青、妇、少儿等群众组织，还有民兵、自卫军等群众武装组织。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民兵）三部分，目前以发展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同时，朱德撰文指出：“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82)要使民兵成为自卫军中的骨干，群众游击战争的主力，正规军与游击队的有力助手，规定了民兵的基本军事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进行群众的游击战争和维持后方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 （四）善于发动和组织游击战争

朱德对于游击战争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军事实践时指

出：“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83)在国外时，就认为回国后打仗的办法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84)因此，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很自然地率领起义军余部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在井冈山斗争时，他与毛泽东一起，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和“会剿”，取得了五斗江、草市、龙源口等多次重大胜利，并总结了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十六字诀”。

对游击战争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没有正确认识的问题。在创建红军初期，党内一部分人总想攻打大城市，要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在他们看来，游击战争没有什么作用，游来游去，永远搞不成全国苏维埃。朱德和毛泽东则不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抵制了“左”的错误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了游击战争。朱德认为：“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战略战术。”(85)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朱德批评一些人瞧不起小的胜利，因而否认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看法，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经过普遍的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在战争中消灭敌人以逐渐消耗敌人力量，在客观条件不可能大量地歼灭敌人情形下，求得不间断的消耗敌人，取得无数次的小的战斗的胜利，所谓集小胜而成大胜，是有重要意义的。”(86)他认为、不仅在山区，而且在平原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早在抗战开始前夕，他曾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7)并预见到华北游击战争的重心将在“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88)

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华北各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适应形势需要，1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游击队的组织方法，游击队的战术原则、活动方针等问题。他指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应具备积极、主动、集中三个条件；其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的进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迅速、秘密和坚决。经过一年奋战，华北已经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了。

毛泽东充分肯定八路军“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89)对抗战初期的华北工作作了正确的评价。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曾流传青一种见解，说这一时期华北的工作有严重错误，什么“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多了”、“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是错误的”等等。其实，运动战与游击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不过规模大小不同。前者一般由正规军执行，作战规模较大，有时还伴随着阻援所需的运动防御或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后者则规模较小，常常由小部队、游击队或民兵执行，作战更为灵活和分散。抗战初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关于游击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的提法，反映了这两种作战形式的密切关系，而不是表示两种不同的作战方针。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90)什么情况下打游击战，什么情况下打运动战，必须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抗战一周年时，朱德指出：“我们一年来的战争，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互相转易与互相并用，这是根据八路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及其活动范围的宽度并依当时实际情况而决定的。然而，游击

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在有利时机之下，并未放松运动战的争取，求得在运动战中比较大量的歼灭敌人，起着转变战役形势的决定作用。”(91)据八路军 129 师统计，从 1937 年 11 月到 1938 年 4 月，该师有步骤地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当时共 64 个连队，派出 41 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大部分兵力也被派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只留下二百人左右担任总部的警卫通讯任务。其他各师情况也大体如此。因此，说抗战初期华北的运动战打得多了，游击战打少了，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还要看到，游击战固然重要，“但是，游击战是不能解决最后胜负问题的。”(92)随着形势的发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比重。朱德指出：“我们在正规军中曾适时地调剂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分量。我们在游击队中，又曾融合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就不断地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壮大了正规军。”(93)他曾把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进程归纳为：“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现代化战争”。(94)除以游击战争为主的阶段外，其他各个阶段，也都存在着起配合作用的游击战。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懂得游击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朱德正是善于发动和组织游击战争的专家里手。

朱德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是与中國革命军事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联的。认真学习和研究朱德的军事思想，继承其革命和科学的内核，必将有助于推进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

#### 注释：

- (1)朱德致季子、莘农的信，1925 年 3 月 7 日。
- (2)周恩来对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解放日报》1946 年 11 月 30 日。
- (3)《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 日。
- (4)《朱德选集》第 132 页。
- (5)《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1933 年 7 月。
- (6)《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说》，1934 年 2 月 7 日。
- (7)《朱德选集》第 170 页。
- (8)《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致词》，1934 年 2 月 7 日。
- (9)《朱德选集》第 233 页。
- (10)《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1941 年 8 月 20 日。
- (11)(12)(13)《朱德选集》第 165、96、100 页。
- (14)《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致词》，1934 年 2 月 7 日。
- (15)《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1933 年 7 月。
- (16)《在第二次全国军训会议上的讲话》，1951 年 9 月 27 日。
- (17)(18)(19)《朱德选集》第 165、3、158 页。
- (20)《在山西西林游击干部训练队的训话》，1938 年 6 月 2 日。
- (21)《朱德选集》第 55—56 页。
- (22)《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8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 年 2 月。

- (23)《解放日报》社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1942年12月12日。
- (24)(25)(26)(27)(28)(29)《朱德选集》第56、117、163、94、332、134页。
- (30)《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页。
- (31)(32)(33)《朱德选集》第163、163、107页。
- (34)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1949年3月6日。
- (35)《朱德选集》第326页。
- (36)朱德致毛泽东函，1950年9月5日。
- (37)(38)(39)(40)(42)(43)(44)(45)《朱德选集》第303、302、304、275、275、308、306、326页。
- (41)《八一杂志》发刊词，1951年4月20日。
- (46)《在全国第二次军事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9月19日。
- (47)《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0日。
- (48)(50)《关于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情况致中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
- (49)《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9月18日。
- (51)《在全军后勤领导干部集训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53年4月18日。
- (52)《朱德选集》第303页。
- (53)《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5日。
- (54)《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2年1月2日。
- (55)《在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42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8日。
- (56)(57)(58)(59)(60)《朱德选集》第39、52、168、168、14页。
- (6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第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
- (62)(63)《朱德选集》7—16、132页。
- (64)《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1933年7月。
- (65)《朱德选集》第14页。
- (66)《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训令——关于战术原则的指示》，1938年1月25日。
- (67)(68)(69)(70)(71)(72)(73)《朱德选集》第71、222、235、131、10、168、152页。
- (74)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68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9月。
- (7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7日。
- (76)《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 (77)《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的发言》，1937年8月11日。
- (78)(79)《朱德选集》第152、70页。
- (80)《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
- (81)(82)(83)(84)《朱德选集》第56、78、126、126页。
- (85)《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 (86)《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

月 1 日。

(87)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7 年 6 月 9 日。

(88)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37 年 8 月 24 日。

(89)《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200 页。

(90)《朱德选集》第 62—63 页。

(91)《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解放》第 43、44 期合刊，1938 年 7 月 1 日。

(92)《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9 日。

(93)《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解放》第 111 期，1940 年 7 月 16 日。

(84)在各军区、军兵种首长集训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7 月 13 日。

**作者** 龚希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60 岁，《朱德传》副主编，已发表研究论著 20 多万字。

## 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初探

王长炎 崔海明

邓小平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漫长征程。60多年来，他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善于把马列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同革命斗争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的进行工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7年春，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到西北地区国民军冯玉祥部的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曾参与组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邓小平的军事活动实践及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1929年6月，在中国革命仍处于低潮时期，他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广西南宁，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他在广西错综复杂的敌我矛盾、我友矛盾和地区民族矛盾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错误路线干扰，与掌握广西省级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与张云逸等一起成功的组织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7、红8军和左右江苏维埃区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刘伯承长期合作，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八路军第129师和后来改称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建设和作战。从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胜利的举行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以及中原逐鹿、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决战、百万雄师过大江和进军西南等著名战役的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总结经验，发表了《艰苦奋斗的冀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深刻领会对敌斗争的几个原则》、《根据地的建设与群众运动》、《进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等军事著述，提出一系列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从各方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科学地论证政治与军事、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提出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要职，仍然十分关心军队建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这个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军事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亲自领导国防现代化建设。他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的实践，发表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等军事著述，确立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形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体系，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下面我们从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邓小平的军事思想进行初步研究。

### 一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

1929年5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简称俞、李）分别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绥靖司令。俞、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积蓄力量，实

现其“倒桂反蒋”大计，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并公开邀请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部队和政府中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袁任远、叶季壮等共产党员前往广西，从事共产党的兵运和统战工作。6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地下党的全盘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广西省政府担任秘书的公开身份，一面同俞、李接洽，一面和广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雷经天等会面，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确定以灵活的策略和坚持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团结、争取、教育国民党左派上层领导人，趁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 （一）重视创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

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掌握旧军队。党能否在广西站住脚跟，进而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核心问题是要掌握一支军队。兵从哪里来？枪从哪里来？这在国民党严密统治区、工农群众对共产党还不够了解的南宁，是个难度极大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长期间，阅读了毛泽东、朱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量文件，并于1927年8月7日，出席了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有深刻地理解。他到达广西后，就以极大的自觉性把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当时，中共中央指示广西党组织，要把俞、李政权“当作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反对”（1），实行破坏的工作路线。但是，邓小平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分析俞、李的历史和主政广西后对共产党的态度，认为对俞、李采取破坏的工作路线是不利的。他断然确定了与俞、李合作，稳定广西政权，孤立反蒋势力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击桂系势力，改造旧军队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争取“在短期内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2），创建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邓小平首先说服俞、李同意安排共产党的干部到政府和省警备军中任职；释放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散了原桂系军阀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并清除其安排在地方政府中的反动骨干分子；下令开放工农运动等。同时，根据俞、李极力想扩大武装力量，要求我党协助改造和组建省警备军的愿望，与张云逸等向其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争取俞、李同意任命张云逸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干部到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中任职，从而逐步掌握了李明瑞手中的部分军队。

按党的要求改造旧军队。为把共产党掌握的这几支部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张云逸等运用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军的经验，做了大量争取和改造工作。主要做法是：在部队中建立中共秘密党支部，发展党员，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分化教育和改造旧军官，采取“升迁”和教育相结合的措施，使反动军官脱离士兵，失去对部队的指挥权；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严惩罪大恶极的军官；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改变部队成份，将班、排、连长改由共产党员担任，动员地方党员和青年参军等。通过一系列教育和改造工作，使部队在思想上相信共产党，组织上接受共产党领导，行动上听从共产党指挥。

把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及时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去。1929年10月，俞、李不顾共产党劝告，仓促举兵发起反对蒋介石的战争，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堂部。俞、李的行动打乱了共产党在广西的工作部署。为保存共产

党已掌握的革命力量，在俞、李部署反蒋军事行动时，邓小平、张云逸等人以新建部队没有训练好，需要保卫后方为理由，说服俞、李把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留守南宁，并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与此同时，警备第4、第5大队各抽一个营的兵力，先期分赴左江和右江地区，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俞、李反蒋刚一出师，因部下叛变，不战自败，消息传出，南宁一片混乱。邓小平当即果断地决定并指挥共产党掌握的部队从南宁向百色、龙州地区作战略转移。当时，邓小平认为，主观上“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3），客观上，各路敌人正以重兵齐头向南宁压来，如果在南宁仓促起义，必遭各派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实践证明，主动放弃敌人重兵争夺的南宁，把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是完全正确的。

争取李明瑞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李明瑞在北伐战争中曾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感情较深。在举兵反蒋失败后，陷入极度苦闷和矛盾之中。这时，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几次深夜登门探访，好言开导，安慰鼓励，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邀请他共赴百色、龙州地区，商讨革命大计。李明瑞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将广西的金库、机械库以及军用器材等，交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警备第4大队运往右江百色。他本人随同第5大队前往龙州，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但李明瑞也还想利用龙州背靠越南、面向内地，进可攻南宁，退可走安南的地理条件，伺机集结旧部，与李宗仁等再作较量。在百色，邓小平、张云逸针对李明瑞的思想，耐心诚恳地进行劝阻，并以中共广西前委书记的身份，邀请李明瑞在日后成立红7、红8军时担任两军总指挥。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的诚恳帮助下，放弃了攻打南宁的计划，并立即返回龙州，与第5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一起平息了蒙志仁的叛乱和筹备龙州起义的各项工作。他说，“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4）争取李明瑞是与当时中共中央精神相悖的。中央多次指出，“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他斗争”，要“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5）。邓小平对中央领导人说：“对李明瑞……我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6）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中央所接受。邓小平也没按中央的意见对待李明瑞，而是从实际出发，争取李明瑞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后来，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7军前委委员、军长等职，直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建立红7、红8军。邓小平、张云逸率部到达百色后，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积极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消灭豪绅武装和警备第3大队反动武装；扩建部队、加紧训练部队，开办教导队、培训所，培训军政干部；进一步改造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大队；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整顿、补充部队，实行百兵平等，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等。在充分准备和周密计划的基础上，于1929年12月11日，张云逸等带领广西警备第4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军等部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下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当选为主席。随后，红7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和正在兴起的土地革命运动，经两个多月的奋斗，相继建立了10余县苏维埃政权，辖区人口近百万，实现了右江

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共同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俞作豫任军长，李明瑞任红7、红8军总指挥，邓小平任红7、红8军总政治委员，下辖2个纵队，共2000余人。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和10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或县革命委员会，与右江革命根据地相呼应，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百色和龙州起义，是邓小平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与掌握广西省级军政大权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掌握和改造其所属的部分部队为军事骨干力量，先后组织发动的两次武装起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

## （二）重视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重温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做政治工作的实践和发表的有关文章，鲜明的看到他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中总是围绕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围绕着党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紧密地联系部队建设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形势与任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军队宗旨、军队纪律、官兵关系、军政军民关系，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教育，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作用。邓小平在论证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时指出：“军事行动服从于政治任务”（7），“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但是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军事任务”（8）。同时还说：“把武装解释为附属物也是不对的，只是在为了完成总的政治任务上，军事是服从政治的，而在斗争形式上武装常常居于主要地位”（9）。这不仅阐明了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也指出了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早在红7军初创时期，红7军前委遵照邓小平的指示，颁发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指示的第二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右江苏区的形势和党组织的状况，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对红军与苏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要求“部队党委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10）。同时，运用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创导的政治工作原则，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在营以上部队设党委、连队设党支部，还拟定编印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人民军队宗旨和历史使命的标语，用以唤起民众，壮大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肩负战略区军队党委和地方党委主要领导的双重重要职。在实施领导工作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军委的领导与指挥，才能得到发展与胜利。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绝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及军委，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不以党力中心的倾向，都是极其危险的”（11）。“我们党要学会熟练掌握营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12）。今天的党，不只领导党，还要领导军队，帮助政府。地方党必须学会管理武装领导战争，加强对游击队、自卫队的领导。地方党政群众团体必须把爱护党军爱护武装成为自己的责任。还提出“创造模范党军”的口号。要求军队的党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要给地方党应有的帮助。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工作，邓小平强调要对所有干部加强职务技能教育，用政治工作条例重新训练所有政工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精神和内容。使每个政

工干部熟练政治工作。要高度的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威信，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从自己工作去树立自己的威信。

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他在组织发动百色起义、成立红7军时就公开宣布：这支军队是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其目的在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13），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要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使士兵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正规军做到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仅纪律好，并且真正关心民众疾苦、到一处做一处地方工作，要成为遵守政策、执行政策的模范，1946年2月，邓小平为《人民的军队》报创刊号题词时进一步指出：“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经济向上，走丰衣足食的道路”。正规军与游击队要起武装宣传作用，要爱护民众，减轻民众负担，军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群众的利益，对群众有利就做，没有利就不做。

保证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邓小平指出，战时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战斗胜利，任务完成”（14），保证部队、民兵有高度战斗情绪，团结群众，瓦解敌军。每个政治工作干部要“熟练政治工作，特别熟练战时政治工作”（15）。在部队中开展立功运动，创造模范兵团，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和模范战士。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巩固与加强正规军。在战前，进行充分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都下最大的决心具有充分的信心。在战中，教育部队对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心理，或在胜利中产生轻敌心理。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气焰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地作战。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

保证军队纪律的贯彻执行。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证明，纪律是路线的保证，是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体现。邓小平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总是把贯彻执行革命纪律，看成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指出，只要不甘心国家独立、民主、和平受到破坏，就应负起责任好好维持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反对松懈和极端民主。他教育部队，“一定要警惕到，群众不是命运注定要跟我們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如果国民党军队纪律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可以跟别人走呢？”（16）他强调“在所有的部队里，发动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要求“百分之九十七应对百分之三破坏纪律分子，发动群众性的检查”，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松懈和极端民主。各级首长负起责任来，决不能纵容，把纪律执行起来。特别是战场的纪律，严明赏罚，有功者一定要奖，有错误者必须适当的惩罚，要善于运用模范例子去压倒坏的东西。并指出，要克服无纪律状态，必须从造成干部学习理论和政策的空气着眼，从领导上贯彻到底着眼。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军队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指出，“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正确的政策策略，路线是空洞的。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就越不能粗心大意”（17）。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保证党的各种政策之执行，机关的责任是及时检

查、及时纠正错误。加强政策的研究和检查。他号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争取 90% 以上的群众赞成党的政策。军队中的党员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保证发扬积极因素，不断清除错误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建筑在阶级本质上的，所有的人，都是为着一个政治任务，都是自觉的来革命的，利害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人格上，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18）。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战士的积极性，大胆的对军队负责，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当军队的主人，要“发扬正气，克服邪气，发扬建设性的东西，克服破坏性的东西，发扬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也就是发扬革命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的因素，反对把战士降低到一个单纯的人，降低到军阀部队的一个兵的地位，单纯的使用他，当成驱使的对象”，这样就会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要教育部队自觉清除错误思想，指出：我们不要只看到外部的敌人，还要看到思想上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其表现形式是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定性，散布各种各色的谬论和毒素，以瓦解我们的斗志，削弱我们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他要求部队对于明显的敌人不要丧失警惕，而且对于腐蚀我们思想的敌人，那些隐藏在我们部队中品质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也不要丧失警惕。自由主义是有害的，时刻不要忘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个中心和出发点。

### （三）重视创立和全面建设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时期，邓小平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领导军事斗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赴广西南宁领导兵运和统战工作期间，就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雷经天等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领导开创了左右江苏区，是当时全国较大的苏区之一。在红 7 军向中央苏区的进军途中，帮助江西崇义县建立了县级、区级红色政权，同时组建地方武装，发展各级党组织，开办党员训练班，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与刘伯承一起指挥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始终把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共同领导开创太行、大岳、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初，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第 129 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与冀豫晋省委负责人共同研究了根据地建设中的武装、政权和群众工作二大问题。7 月，赴冀南指导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工作，根据当地形势，提出依靠农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用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击败敌之进攻”（19）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阵地的方针，取得了开辟、巩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在抗战艰苦的 1942 年，他南下中条山区，指示当地党政军应大胆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实行宽大政策与反汉奸反恶霸的斗争相结合，保持地方武装的纯洁，加强政治工作，使中条山根据地很快由发展走向巩固。解放战争时期，与刘伯承创建大别山、江淮河汉等解放区。

在开辟左右江苏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别山等解放区的长期斗争实践中，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总结了斗争实践经验，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根据地建设的政策和理论。他认为，建设根据地必须：

建立发展根据地的人民武装。早在开创左右江苏区时，他就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武装，要求县设赤卫大队。区设赤卫中队、村设赤卫小队、城镇设工

人赤卫队。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强调要“把扩大八路军（补充兵员），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20）。要公开组织武装，组织游击队，加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的建设，要有足够的数量，培养坚强的战斗力，要有比正规军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他特别强调地方武装成份要纯洁，组织要精干，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地方武装必须以当地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为骨干去组织。对民兵要求扩大数量，提高政治质量，保证民兵在党的领导之下，武器掌握在可靠分子手中。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区要有一个连，一个县要有一个大队。在发展地方武装时，还要学会从敌人手里夺武器，并应尽可能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派的军官参加我军，给以特殊的优待，以增加我军的军事建设，军队以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占优势、垄断一切的制度应改变，只要军队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扩张革命势力。

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21）。在组织形式上，无论是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占1/3或少于1/3，进步势力占1/3，中间势力占1/3。政权机关是民意机关，必须允许国民党员参加。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公安机关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一切不反对抗日政府的地主、资本家与工农有同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建政过程中，邓小平不断纠正以党治国的观念。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那种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政权中的干部等混乱现象，指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同时也及时纠正区村政权仍操纵于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之手，忽视改造工作的右倾思想。抗日政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要团结一切中国人共同对敌。国共两党要互助互让，求得更亲密的团结。同时，要坚持照顾基本群众利益，批评对国民党的限制不够，忽视对国民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等倾向。在除奸政策上，要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与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不要乱杀人，牵涉无辜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专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和放手提拔知识分子文化人”（22），以加速全面建设根据地的进程。

动员民众参军参战。邓小平在创建根据地，指导革命战争中，一贯重视发动民众，进行人民战争。他指出：“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如果轻视民意，压迫民众，就不可能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克服抗战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困难，也就说不上抗战的胜利，而且可以把民众逼到敌人方面去”。（23）他主张“游击队应配合正规军作战，要统一指挥，游击队、自卫队、正规军三位一体的配合作战”（24）。指出，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必须同时归功于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展开。“正规军的作战，如果没有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就等于失去耳目和手足一样”（25）。民兵“是以数量战胜质量，敌人兵力虽强，但我们民兵人数众多，到处骚扰，四面响枪，日夜不停……敌人应付不开，心慌意乱，使强的拖弱，胖者拖瘦最后便于主力去消灭他”（26）。

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日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上的进攻也是极其残酷的。一方面，日军对根据地和游击区人民所需物资实行封锁禁运，企图困饿抗日军民；另一方面，日军频繁的进行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对此，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着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个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27）。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都是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各项建设事业，都有赖于对日伪军进行坚决和正确的斗争。“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28）。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证。为此，制定了鼓励和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

正确处理武装、政权、群众团体与党四种力量的关系，巩固发展根据地。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健全，决定的因素是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是否健全。这四种力量是有机相连缺一不可的。首先是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29）。“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自己建立了党而又服从于党的领导”（30）。根据地的党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武装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31）。“政权的责任是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照顾基本群众利益与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解决军队的供给和补充。群众团体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的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32）。这样，才能把各界抗日力量统一起来，爱护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顽强的保卫根据地。

#### （四）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灵活果断地指挥作战

在战争年代里，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要从实际出发，细心研究敌人和我们对敌斗争政策乃至方式方法，正确的灵活的把上级对敌斗争的指示运用于自己的实际中，从而正确的决定自己的作战方式。

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斗争，他从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33）的方针。抗战初期，针对日军大兵团作战，铁壁合围、反复“扫荡”的战术，提出“反扫荡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腹地游击战争的有力坚持与外线游击战争的有力配合”（34）。要求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有高度的自动性、积极性与灵活性，利用运动游击战和普遍的游击战的方式，寻找日军弱点，打开局面。在日军开始进攻时，提出作战的主要方式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的寻求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歼灭日军一路，击破他路，以粉碎其进攻；同时加强活动于日军侧背，以侦察牵制与消耗其进攻部队，要不断袭扰疲惫日军，打其交通部队，要善于在每一时刻中找敌弱点，予以打击，避免敌人消耗抗日武装的企图。在论述游击战特点时指出，游击

战是没有防御的，永远是进攻的。要把游和击紧密结合起来，游而不击，击而不游，或不游不击，或不顾一切的硬拼，都是错误的。在主动作战时，应坚决勇敢不怕牺牲，以达成歼灭敌人之目的，但在不利和被动的条件下，则应大胆转移，以寻求有利机会打击日军，防止对拼消耗，轻易决战。在日军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中，邓小平针锋相对的提出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全面对敌的方针，大胆组织游击集团，发展敌后武装工作队，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向日军的“蚕食”进犯斗争。还与刘伯承共同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是日军向根据地前进，抗日武装向日军占领区前进，日军掌握其占领区、抗日武装开展敌占区工作，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中，邓小平强调要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机动歼敌相结合。他与刘伯承、徐向前等先后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等，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反动气焰，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改变了华北的战局，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9月，刘伯承赴延安学习，他主持全师党政军工作，领导部队对日伪军连续发起攻势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开展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刘伯承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十条军事原则和作战指导方针，同战区实际紧密结合，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把敌人调动起来打，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创造了许多战争史上的奇迹。

1947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与刘伯承率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6月30日起，在鲁西南战役中，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谋略，以佯攻、佯动等迷惑敌人的手段来伪装与掩护自己部队的进攻路线与突击目标，以声东击西、忽打忽离，不攻示以攻，欲攻示以不攻，形似必然而不然，形似不然而必然，似可为而不为，似可不为而为之的灵活战术，让敌人顺乎常规地推断，刘、邓却反其道而行之，造敌错觉，分割包围了国民党军3个整编师。蒋介石亲自出马，急调西安、山西等11个整编师驰援。中央军委鉴于敌我众寡悬殊，指示可视情况撤出战场休整。邓小平纵观战局，认为胜利在望，机不可失，率部奋力拼搏，歼敌9个半旅，打破了蒋介石声称的“足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他在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35）。8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与刘伯承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毛泽东部署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方针掩护下，摆脱国民党军23个旅的尾追侧击，进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他在《关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初期，作战问题要以“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采取宽大机动去寻歼弱敌，待敌情地形熟习后再进行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关于分遣与集中的运用，提出“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时，采取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遭损失。同时在有利于集中的原则下，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兵力歼其一部，打破被动局面。

11月底，蒋介石调集14个整编师共33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全面围

攻，轮番“进剿”。邓小平针对刚刚开辟的大别山区，群众尚未发动，战场狭窄，补给困难等情况，提出与刘伯承分兵对敌的决策，亲率3个纵队和当地军区部队坚持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与国民党军周旋。当国民党军围攻解放军主力时，解放军外线部队兜击敌人后路，内线部队主动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军；当国民党军主力被迫分散，解放军又适当集中，歼灭孤立之敌。这样辗转机动，保障了刘伯承率一部兵力乘虚回渡淮河，北返500里，完成战略再展开。

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促进战争胜利的重要策略方针。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指导所属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政治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他在领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指出：“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36）。在敌占区工作及伪军工作方面，我们有一些成绩，但个别区域个别同志常常忽视这些工作，忽视可能争取的人，甚至多树一些敌人，当然对抗战有损，而对敌人有益，必须纠正，必须加强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在谈到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方法时，他指出，要打拉结合，只强调争取放松打击，或只打击不争取都是不对的。“在打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打中有拉的策略指导原则。在拉的阶段中，要善于运用拉中有打的策略指导原则”（37）。军事打击是中心环节，要随时掌握好这一环节。对于敌伪，一面打入争取瓦解，一面抓准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打也是为的争取，总之，要打得恰当，拉得及时，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这是瓦解敌人的基本出发点。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到敌人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组织的基础，为我们的反攻及战后工作作准备。1945年，邓小平面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妄图大规模进攻解放区的严峻形势，向部队发出指示：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1948年10月，平汉战役中，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数个军的进攻，邓小平与刘伯承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部，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方面亲自出面或派人加紧进行争取国民党新八军起义的工作。在战役进程中，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感召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10月30日率部起义，从而促进了战役的全面胜利。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黄维兵团为摆脱解放军的围困，组织了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实施突围，在此关键时刻，参加突围的国民党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指导，克服了国民党特务和极右军官监视等障碍，率部起义成功，在精神和军事上给黄维兵团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加速了黄维兵团的覆灭，收到了仅靠军事打击所不及的良好效果。

捕捉战机，决战歼敌。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淮海战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甫线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邓小平任战役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对徐淮地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战役发起后，与陈毅率部袭取宿县城，腰斩津浦铁路，扼敌南逃北援之通道，提前达成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为战役顺利发展，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决定战役第2阶段的作战

行动中，中央军委于23日电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38）。邓小平纵观战局变化，决定在军委对淮海战役总的意图下，从战场实际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并与刘、陈当夜请示军委，现在“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果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39）。24日15时，军委、毛主席复电总前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40）。并指出在“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41）。针对这一艰巨任务，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纵队干部会上说：“我们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最大牺牲，不怕一切困难，要歼灭黄维兵团。即使中野打光了，能消灭这支工牌军也是值得的。”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指导上，总前委根据战局变化，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方针，黄维兵团未进入包围圈时，总前委制定了“欲擒故纵”的方针；针对敌人机动能力强的特点，不与其大规模的正面交锋，采用“攻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进展，对敌压缩”的方针；为削弱敌军优势火力的威胁，减少伤亡，采用“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使部队从地下隐蔽接近敌人；在围困后期，一反“网开一面，虚目生路”的传统战法。改用“围师不阙”，坚持“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困饿之”的战法，最终将黄维兵团全歼。这充分体现了军委和总前委从实际出发，把握战局发展，从而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全胜。

1949年4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根据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续指挥第2和第3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战前，总前委召开第2野战军、第3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着眼战略全局，全面分析情况，从最困难设想，研究渡江战役部署。邓小平归纳大家意见，亲自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第2、第3野战军部队组成西、中、东三个集团，第4野战军一部配合作战。战役采取全面部署，重点进攻，敌变我变，灵活用兵，声东击西，造敌错觉，创造有利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歼敌重兵集团等战法，指挥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11月，与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在第1、第4野战军配合下，采取大迂回和大包围的方针，迅猛的动作，实施战略追击，横扫湘鄂，直取两广，争取了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支持西南半壁，持久顽抗的迷梦。

纵观邓小平28年的战斗历程，在一些重大战役的指导上，提出的许多独到见解，充分反映了他善于统览全局，立足战区，以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统一整个野战军的思想，竭尽全力创造性的完成上级赋予的重任，在作战指挥上，他深思熟虑，刚强果断，不拘泥于古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洞察敌情，敢打硬仗，扬长避短，以弱击强，因敌制胜。他是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卓越领导人。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军事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及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参与领导中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从各个方面给予关怀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次伟大转折。其重要意义在于拨乱反正，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了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它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42）。与此同时，国防和军队建设也相应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这时起，特别是1981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作为党的军事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亲自领导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新时期，军事工作面临的形势，国防和军队担负的任务，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给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某些旧的军事观念与现实发生了许多矛盾，亟待新的军事理论，新的方针原则予以回答和解决，这一历史重担自然落到军委领导人邓小平的肩上。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的实践，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主要有《邓小平文选》中的“军队要整顿”、“军队整顿的任务”、“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军事著作。（4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中的“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等文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45）中的“东欧西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国方针政策两个基本点”等文章。还有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接见外宾时的多次谈话等著述。邓小平的这些著述深刻地阐述了现时代的特征、战争与和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目标、任务，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的军事理论体系，是平时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指引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程。

1989年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高度评价了邓小平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功勋。会议认为“邓小平同志虽然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但他提出的军队建设的理论和方针、原则，今后仍然是我军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的十年，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十年是军队在改革中不断前进、战斗力有了很大增强，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十年，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军建设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46）。

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思想，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以理解：

#### （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精辟概括了当今时代的新特征，指出世界进入了一个维护和平，谋求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和平与

发展的新时期。时代问题是决策的基础，是研究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等问题的前提。本世纪初，列宁就多次论述过时代问题。他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47）列宁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前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之后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48），也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本世纪20年代，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存的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的灭亡，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壮大，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强大，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两大体系。至今，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同马克思、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十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变革的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兴起壮大，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及时洞察世界风云，仔细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得出科学的结论，认为当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他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揭示了“东西南北”国际政治新格局。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

1985年3月，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邓小平的论述表明，现在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矛盾突出集中在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上。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和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为主的東西关系，是世界局势动荡恶化的主要根源，是世界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之一。世界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旧的剥削被剥削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这是南北关系的主要矛盾所在，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战争和动乱只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则是和平的基础，没有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所以，和平是发展的必要环境，发展是和平的有力保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述，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指明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如今，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本国经济，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世界各国都在为适应这

一重大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把它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一。这一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为我党制定国家战略和军事、外交战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国际依据。

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战争与和平是涉及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判断和结论，是国家进行重大决策的依据。本世界 20 年代，列宁认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49)因而，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在当时，依据国际社会的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本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论断的正确性。列宁关于战争的论述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二次大战以后，斯大林继续沿用列宁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存在，要消灭战争的必然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50)上述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成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执政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战争与和平问题摆在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曾讲过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话。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但是，在这之后的长时间内，在客观上由于国际斗争形势一度紧张，世界基本矛盾比较尖锐，在主观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不够深入，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总是把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估计得过高。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并且认为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更加严重，1969 年，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核战争”。这样就把国家战略的立足点放在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上，使国家长期处于临战状态，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在对外政策上，强调世界革命，提出彻底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影响到团结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影响到扩大反霸统一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年，世界上虽然也爆发过 100 多次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但世界大战终究没有发生，人类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际上更是呈现出一派相对和平的新的景象。

40 多年的和平生活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如果继续沿用我国对战争问题的原有判断，则无法来解释世界的现实情况。作为一个 10 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正视现实，必须重新研究世界形势，实事求是地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并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重新考察了世界战略格局，他依据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发展，依据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新特点，在全面分析了战争因素与和平因素的消长趋势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得出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險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世界和平大有希望。他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51)早在1975年，他就讲大仗五年打不起来，1980年又讲五年内打不起来；1984年再次讲到，我们还可以说十年打不起来。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他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險。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世界战争的根源在于美苏两霸的争夺。但是由于美苏军事力量处于平衡，他们的全球战略都受到挫折，加之核武器的相互制约，特别是“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2)，“如果世界和平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他在1988年4月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时更加肯定地指出，“现在我们确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不是从某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的，而是深刻揭示了20世纪末叶国际局势缓和的社会根源、历史规律的结果：

第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实际划走了东西方的势力范围，制造了以美苏对峙为基础的世界两极化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但是，战后40年世界经济、政治一系列重大变动的强烈冲击，打破了这一格局。在国际政治发展变革过程中，先后出现了5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60—70年代两大阵营的解体，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以及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的崛起。80年代后，美苏操纵世界政治的能力大大削弱，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美苏中(包括第三世界)格局和日本、西欧，以及某些地区霸权等多元互争的复杂局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甘心其霸权地位的削弱，仍在竭力维护其两极体制。邓小平还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独霸全球的目的，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它们之间的争霸仍旧是世界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扩张、渗透，是造成世界局势动荡、恶化的主要根源。尽管如此，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已是势不可挡，形成战后反霸斗争的一种新力量。邓小平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是国际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53)西欧，日本和东欧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独立自主的倾向不断发展，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更大发言权。“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54)“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55)当代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重要保证之一。一个“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56)。

邓小平指出，全球和平运动的发展，也是有效制止世界大战的重要政治力量。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各国人民对战争的祸害记忆犹新，对爆发大规模战争保持高度警惕。今天，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世界各国都日益深刻的认识到，新的

世界大战有可能使整个人类毁灭，保卫世界和平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极为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美苏关系的改善，以及中苏和解，也是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总之，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保卫世界和平政治力量的强大，使超级大国妄图操纵国际政治，企图掀起大规模战争的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当今国际形势的缓和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今天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由于日本、西德等一批国家迅速崛起而相对下降。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相对衰落，苏联经济则停滞不前。

1960年，美苏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约占到当时全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西欧、日本和中国的总和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而到1980年，却正好颠倒过来，两个超级大国只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而西欧、日本、中国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两个超级大国由于长期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了国力，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经济困难。苏联的经济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美国在西方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也不复存在，同样需要调整间歇。而与此同时，日本、西德等国的经济却奇迹般的振兴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实，促使美苏重新考虑其利害得失，不得不把竞争的重点从争夺军事优势转向争夺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优势上来。现在，不仅世界发达国家，而且世界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按照各自的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由于二次大战后旧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已经过去，实现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普遍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重任，争取早日摆脱贫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经济的更大发展也是当务之急，也都在纷纷进行改革。我国也在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方针，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总之，20世纪末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增强，扩大了世界范围的经济交流。国际经济的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加快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和调节，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又作用于政治，缓解了国家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

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57)当前，一场以信息革命为主和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在世界兴起，成为振兴经济的先导，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高技术能够获取极大的经济和军事效益，高技术是综合国力的支柱。新技术革命将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将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取得综合国力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技术和高技术的发展程度。一场激烈的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已经展开，许多国家都力争在尖端技术科学方面取得优势。美苏都把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的经济挑战视为能否保持其大国地位的首要问题。信息和科技的发展，也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化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依赖合作的新时期。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邓小平积极倡议，世界“各国共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作出努力。”(58)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这两方面在一走的条件下会向着相反方面转化。历

史上、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都是由经济动因而引起的。但当战争或战争准备严重危害到国家经济时，战争又可能向和平转化。随着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经济上的互相渗透影响的加深，使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今天人类的文明智慧认识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主要是生产，是科技，而不是战争。经济在今天已成为解决国际间冲突的一种有力的杠杆。

第三，世界军事战略形势的变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战略调整潮流的激荡，许多国家的军事战略也在逐步调整。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是军事对抗程度和军备竞赛水平在下降。其趋势是沿着防止世界大战的轨迹进行的军事缓和及军力的收缩。其目的是优先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全局的利益。首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到因国力的限度和世界新兴经济势力的挑战，双方都需要从代价高昂的军事对抗中解脱出来。这个解脱是以裁军和降低军事对抗为先导，从加强对话开始，直到某些军事缓和行动的兑现。诸如美苏裁军谈判，签署销毁中程导弹协议，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步骤。在苏军的战略思想上，一改过去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开始强调军事理论的防御性，提出军备“保持在足以防御，足以反击可能受到的侵略限度内”。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提出“有区别的威胁”，并且1988年、1989年已连续两年减少军费开支。美国还强调发挥盟国的地区性作用，促使西欧几个国家加强了联合防御，日本也为适应阻挡苏联的战略需要，增加军费，不断增强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邓小平指出，美苏核武器的发展，已经达到双方都有毁灭对方几次的力量，在核战争中双方不可能有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核武器已变成一种制约战争的手段。同时，随着世界军事战略的调整，国际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式呈现出由暴力对抗转向实力威慑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实质是一方面尽量避免使自己国家卷入一场现代化战争，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提高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在实力与态势上压倒对方，取得先胜之条件。

当今，战争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战后40年，世界没有大战，但局部战争，地区冲突连绵不断，战争呈现出局部性、分散性和局限性的规律。中小规模局部战争已成为国际间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邓小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59)今后我国战备的立足点主要是作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并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打基础。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保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维护社会的安定。

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交织在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反对霸权、反对世界大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人口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交流，促进了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和对话。与以往相比，现今世界经济地位突出，战争因素下降，大国关系普遍改善，世界和平事业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一个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60)但是也应看到，美苏争霸并未停止，美苏间新的高技术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世界和平的局面并不巩固，若使和平局面有根本保证，必须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坚决捍卫世界和平。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列为我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他说，“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

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61)他指出，“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62)中国的国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它在哪里搞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准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为维护世界和平，他还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63)他进而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以和平方式解决某些争端的新方法新措施，“一国两制”、“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复杂争端问题的一个全新的构想，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近年来，我们以此构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继续努力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赏和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稳定国际局势，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最希望和平。只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与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就大有希望。但是，邓小平也多次告诫人们，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平生活”并不是没有战乱。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绝不是说大仗的危险已经完全排除。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不能丧失必要的警惕。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长期的斗争。“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64)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的科学论断，是其军事思想的突出部分，它推进了前人的认识，突破了前人的既有结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

## （二）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任务

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关系到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乃至关系到国家的全局，只有指导思想正确，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建国后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和民兵武装，有一定规模的国防设施，并有相当规模的国防工业，可以生产所需常规武器，研制了洲际导弹、氢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发射了地球同步卫星等。这些都是国防建设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国防建设上也存在摊子铺的过大而给国家经济造成难以支撑的负担，以及国防工业生产与国民经济脱节等许多值得重视的教训。

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后，确定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总方针，在国防建设上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国防事业的发展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适时提出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任何一次军事变革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进程中，党中央依据形势和任务，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曾数次进行战略转变，从而实现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世界军事技术、现代战争的特点、

我国国防任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出了客观要求，要求国防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党内存在大战不可避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国防建设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大搞“山、散、洞”，“一、二、三线”，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65)“我们总的判断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的力量。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四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总的判断。”(66)他说，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依据这一判断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论断，为正确确定我国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它使人们认清了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所处的是一种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认识到这是一个改革国防，建设国防的良好机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断然作出了重大决策，确定我国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迅速实行战略性转变，从长期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注重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发展轨道上来。

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而且，从实际情况看，也确实具备了转变的主客观条件。首先，具备了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国内经济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对国防建设进行调整，必须尽快改变过去将国家战略立足点放在准备大打上的做法，把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树立在搞好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建设国防的思想。再者，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也需要“转”，是一种内在的要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规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急需进行全面调整改革。总之，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是使国防建设摆脱长期被动局面，走上正确稳定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措施。

确立“富国强兵”建设国防的正确道路。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多次精辟地阐明了关于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的指导原则。他指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他从分析现阶段我国基本矛盾入手，指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新时期的国防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建设适应国防战略环境，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经济是暴力的本源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的规模、速度、质量无不受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67)。“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68)。军队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都离不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69)。要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点上来运筹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建设的总战略是集中财力、物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国家的大局。他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70)。国防建设应当在国家

建设的大局下行动，通过振兴国民经济，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推进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说，通过富国来实现强兵。

邓小平在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他号召，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他说，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必须处理好国防现代化与其他三个现代化的关系，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强兵是富国的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国家要和平的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考虑，忽视和削弱国防建设必然会引起严重后果，使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一旦战争来临或有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国防实力起着实现和平与稳定的特殊作用，我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好发挥稳定世界局势的作用，国家建设也要照顾到国防的需要，在搞好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增强国防实力。总之，要富强兵于富国之中，使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两者有机协调的发展，注意防止其失衡。邓小平关于富国强兵发展国防的思想，为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确立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采取“军民兼容”发展国防工业的新方针。国防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巩固与强大。我国的国防工业，经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有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防体系。但是这个国防体系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并且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军民分割、封闭保守，效益很差。在1984年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果断地提出实行“军民兼容”建设国防的方针，他要求立即把军工体制改革问题摆到日程上来，彻底改革现行的国防工业经营管理体制。他指示：除了二、七机部外，其他几个机械部应该纳入整个国家规划，要结束另一个天地的时代。“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71)他还要求把军工生产改成订货关系，促使这些设备、技术、人才综合利用起来，效益不止成倍增加。邓小平的这些指示，阐明了寓国防科技、国防工业于国家科技和国民经济发展之中的深刻道理，进一步明确了国防工业要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方向，摆正了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克服了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自我封闭现象，变单纯为国防服务而为整个四化建设服务，从军品生产的“小天地”走上四化建设的“大疆场”。近年来，全国全军认真贯彻邓小平“军民兼容”建设国防的方针，兼顾军用与民用，兼顾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实行人才、科技、产品项目等多方位的兼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国防工业系统的改革和国防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加速武器装备的改进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指出，要“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72)，要坚持“科研先行，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73)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着力抢占高技术前沿地带，一些军事大国都在试探运用当代高技术发展武器装备，以便把攻防作战手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提高国防能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掌握新的战略主动权。虽然我国国防经费有限，不宜大面积发展高技术，但

也必须抓住重点，进行高技术追踪，“集中力量发展我们急需的防御性武器装备”（74），努力赶上世界先进军事技术水平。

作出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军队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主体，军队是从事战争，保障国家安全的支柱。建国以来，在军队建设上偏重于数量，忽视了质量。虽然军队的数量很庞大，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并不强。在和平时期，军队的职能没有变，“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如果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就麻痹松懈，放松对战争危险的警惕，忽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那是十分危险的。”（75）要使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很高的武装力量。兵贵精而不在多，军队的人员要精，武器装备要精。兵多了会吃掉大量装备经费，有碍于军队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76）邓小平自1975年以来几次提出军队要整顿和精简的重要思想，1985年又作出了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意在使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突出建设重点，优化体制结构，提高战斗能力。依据这一思想，近些年来，对军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实行科学编组，裁减人员，淘汰陈旧装备，加强军事训练，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在精兵、合成和提高效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任务，以及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根本上理顺了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促进了国防建设事业的全面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是国防建设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质的飞跃。

### （三）重新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军队改革建设的实践中，以他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和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从我军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进行宏观科学的指导，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制定了一套治军原则，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纲领，即新时期的建军思想，为我军的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大决策和主要论述有：

重申建军目标。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并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果。但是，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先是50年代末期，反对正规化，反对“教条主义”，延误了军队建设。到60年代，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后，搞突出政治，取消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军队建设遭到更大的破坏。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和新的历史条件，重新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为新时期的建军目标。

1981年9月，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作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77）的重要讲话。他提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78）他要求全军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光荣传统，改善武器装备，加强组织纪律，加强军政训练，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成作战能力，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79）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

目标，标志着军队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高度概括了军队的宗旨、性质、军队建设的方向和根本途径。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是世界第一流的，是巨大优势。但是现代化程度较低。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80)这就是说，当前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矛盾。武器装备虽有一些先进的东西，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与技术先进国家军队相比，有较大差距。现代化水平比较低，还表现在人员素质、训练水平、编制体制，以及军事学术理论等方面。

1986年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全部工作的中心”，从而确立了军队新时期建设的重点。革命化建设，是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灵魂，是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正规化则是军队的组织、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者有机联系，构成了我军新时期建设的目标和整体。

改革整顿军队，改革整顿军队是邓小平一贯的治军思想。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工作的干扰破坏，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遭受重大损失。就在军队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时刻，被毛泽东誉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于1975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上任之后，不顾当时的“四人帮”的政治压力和干扰破坏，首先抓了军队的整顿工作。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和7月4日军委扩大会上分别作了《军队要整顿》和《军队整顿的任务》两次重要讲话。两次讲话，充分表明了他对军队工作进行整顿改革的决心，指出了当时军队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如部分领导班子“软、散、懒”，体制臃肿，组织纪律松弛，部队中程度不同的存在“肿、散、骄、奢、情”现象等，他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整顿的要求和措施。要求全军认真肃清林彪等反革命集团的恶劣影响，强调整顿工作要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入手，使军队各级领导掌握在党性强、作风正，团结好的人的手中。他还强调通过整顿，加强部队的纪律性，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81)他要求在整顿部队的同时加强教育训练，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重要位置上，努力提高干部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受到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各级纷纷传达贯彻，狠抓落实，军队面貌明显改观，在增强党性，加强纪律，重视训练，发扬传统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效。虽然1976年因邓小平曾一度失去领导职务，军队整顿工作受到影响，但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领导工作之后，军队整顿工作又得以继续进行，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时间里，军队工作基本上是按照邓小平以改革整顿为中心的思想，狠抓了部队的基础建设，从而为军队的深入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加速军队建设，全面提高战斗力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军队的改革也更加深入。军队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肩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无

产阶级专政的特殊使命，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高度的稳定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军队的改革采取既大胆又慎重的方针，军队的改革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部队高度稳定的情况下由中央军委统一组织实施的。近年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军事训练、部队管理、后勤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制度等作了有效的改革，都有重大改进和突破，达到了自我完善的目的。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自 60 年代开始，在时刻准备大打的思想指导下，军队按临战状态编组，搞得很庞大。从 1975 年起，邓小平就多次指出，军队很臃肿，既不适应国际国内形势，也不适应现代战争，这样庞杂的军队，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指出，不论搞四化建设也好，提高军队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军队必须贯彻精兵的原则，保持一个适当的规模，不宜过多。他要求有计划地改革军队的编制体制，结合精简整编，把部队合成起来，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同时提出，要建立军官服役制度，将部分军官改成文职。1985 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减少军队员额 100 万的重大决策。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全军本着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截止 1986 年，减员 100 万的任务基本完成。全军整编后，基本改变了以往那种臃肿庞杂的状况，军队的战斗力从质量上大大加强。

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自 1975 年起，邓小平就针对林彪“突出政治”，取消军事训练“左”的做法，提出军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82)1977 年，又重申“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3)1980 年，又进一步强调教育训练放在战略地位“应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邓小平阐明了教育训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规定了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教育训练，依靠训练来提高战斗力。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干部训练，“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84)。他的这些要求，极大地推动了全军训练工作的蓬勃开展，部队中掀起了新的军政训练热潮。恢复和创办了各种军事院校，全军的训练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训练水平和战斗能力明显提高。

军队干部实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对军队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85)，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86)他针对军队干部普遍老化的现象，明确地提出要把干部的年轻化当作体制改革的中心目标。强调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说，“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87)邓小平要求全军加强对干部的培养训练。要“把更多的干部送到学校去训练”，“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强，比较年轻化，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使我们的干部能够掌握一些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有好的作风。”(88)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

发展军事科学。军事科学理论，历来对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中，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理论工作，把

现代军事科学理论作为军队现代化的先导,要求大力发展我国军事科学。1978年3月邓小平为军事科学院成立20周年作了“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重要题词。战争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反映战争规律的理论,也应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目前世界各国都极其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关怀下,全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研究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原则为指导,并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了对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现代战争特点以及战略、战役的研究。注重了对当今军事改革实践的理论概括,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采用接近战争实际的科学手段探索现代战争的规律,以及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形式、新特点、新战法。

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指出,新时期“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89)并且“要特别注意加强连队政治工作。”(90)军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号召部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91)中央军委1986年作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端正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摆正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保证”和“服务”作用。从而保证了广大指战员与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落实,保证充分发挥军队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作用,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前进。

#### 注释:

(1)《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信》,1929年10月8日。

(2)(3)《邓小平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会上的补充报告》,1929年12月。

(4)《解放军将领传》第6集第256页。

(5)(6)邓小平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会上的讨论》发言,1930年3月15日,中央军委编《军事通信》第2期。

(7)(8)(9)邓小平讲话:《深刻领会对敌斗争的几个原则》,1943年6月27日。

(10)中共红7军《前委通告》第二号,1929年12月20日。

(11)《刘邓在中原前线》第4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2)邓小平讲话:《深刻领会对敌斗争的几个原则》,1943年6月27日。

(13)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30年。

(14)《邓政委在第二次民兵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44年12月。

(15)邓小平讲话:《迎接1941年》,1940年12月。

(16)《邓政委号召发动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1946年8月25日。

(17)邓小平关于《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的讲话,1948年4月。

- (18)《邓政委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1948年3月23日。
- (19)邓小平讲话：《艰苦奋斗中的冀南》，1939年3月。
- (20)邓小平：《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问题》，1939年1月27日。
- (21)邓小平讲话：《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5月。
- (22)邓小平讲话：《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1941年3月。
- (23)邓小平讲话：《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939年5月。
- (24)《邓政委关于在新的环境下我们的工作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
- (25)邓小平讲话：《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1939年5月。
- (26)《邓政委在第二次民兵工作会议总结报告》，1944年12月。
- (27)(28)《太行区的经济建设》，1943年7月2日。
- (29)(30)(31)(32)《建设根据地的规律》，1943年2月20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结论之一段。
- (33)(34)邓小平讲话：《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1943年1月26日。
- (35)《邓政委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47年6月21日。
- (36)邓小平讲话：《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1941年4月28日。
- (37)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
- (38)《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指示》，1948年11月23日。
- (39)关于《先歼灭黄维之作战部署的请示》，1948年11月23日。
- (40)(41)军委《关于先打黄维之部署的批示》，1948年11月24日。
- (42)《邓小平文选》第180页。
- (43)《邓小平文选》，第1、15、25、56、69、108、175、248、349、363页。
- (4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38、43、46、86、94、112页。
- (45)《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至7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0、12页。
- (46)《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1989年11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11月14日《解放军报》。
- (47)《列宁全集》第21卷123页。
- (48)《列宁选集》第2卷5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
- (48)《列宁军事文集》第28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 (50)《斯大林文选》（下册），第399页。
- (51)《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30页。
- (5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2页。
- (53)(5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5页。
- (55)《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30、31页。
- (56)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的谈话，1988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 (57)《邓小平文选》第83页。
- (58)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 (59)《邓小平文选》第74页。

(60)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的谈话，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61)(62)(6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112、38页。

(64)邓小平1988年3月1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1988年3月2日《人民日报》。

(65)《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版。

(66)邓小平会见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的谈话，1988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67)《邓小平文选》第75页。

(68)(70)《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8页。

(69)(71)《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45、44页。

(72)(73)《邓小平文选》第75、20页。

(74)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红旗》杂志1984年第15期文章。

(75)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57页。

(76)(77)《邓小平文选》第249、349页。

(78)(79)《邓小平文选》第350页。

(80)(81)《邓小平文选》第78、80、58页。

(82)(83)(84)(85)《邓小平文选》第21、57、75、175页。

(86)(87)(88)《邓小平文选》第177、286、60页。

(89)(90)(91)《邓小平文选》第254、22、350页。

**作者** 王长炎 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研究员，53岁，1987年起从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条目撰写工作，着重研究邓小平的军事思想。

崔海明 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研究员，53岁，1981年起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研究工作，撰写和发表研究成果约70余万字。

## 彭德怀的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浅谈

王承光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经历旧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各种苦难磨炼，做过牧童、矿工、堤工，1916年投身到湖南军阀部队湖南陆军2师3旅6团当兵，由士兵、班长、排长逐级升至团长。1927年，他在参加北伐战争中，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朴素的立志救贫、报效人民的观念，转变为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此，他以新的革命思想为指针，孜孜探求真理，在湘军中利用合法身分，多方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夏，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他同滕代远、邓萍、黄公略等一起，毅然率部举行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开辟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旋即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湘赣敌军的“会剿”、堵截，于同年12月，实现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在井冈山会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指挥红军3军团，同1军团一起，并肩奋战，屡建奇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彭德怀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同朱德、左权等指挥八路军英勇战斗在华北敌后战场。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又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英雄的中华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彭德怀从18岁进入湘军当兵至54岁离开朝鲜战场，36个春秋，始终是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度过的。战争实践极其丰富。

1952年夏至1959年秋，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出任我国第一、二届国防部长，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彭德怀的军事思想，来源于他自己长期革命战争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运用，是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决策和在战争指导过程中不断总结、发展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他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增添了大量生动的内容，对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依据现有资料作一点粗浅的介绍，供读者研究。对彭德怀这位著名军事家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有待于军事科学研究者作更为全面的深层研究。

### （一）

彭德怀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感受至深。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刻认识到，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进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一开始就会遇到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因此，工农武装斗争必然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建立一支为工农眼务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是遂行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他在旧军队数年间，就以纯真的阶级感情和赤诚的爱国爱民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在湘军部队组织救贫会、士兵会，启迪群众觉悟，争取士兵自治，提出了鲜明的为工农服

务的政治教育口号：“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1)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1928年2月，他在同黄公略促膝密议革命形势时，即明确认识“‘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2)5个月之后举行的平江起义，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彻底粉碎反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实践。

彭德怀从亲身参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他指出：“历史证明，我军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离开了党，我们就必然遭受失败。”(3)早在平江起义之前，彭德怀就在湘军部队中，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展革命力量，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形成了领导起义的核心。在起义部队撤出平江后不久的龙门休整中，他及时吸取起义初期斗争的经验，在红5军建立了军政治部；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上到下健全党代表制，发展党的组织，连上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4)他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着手整顿部队，很快将这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起义部队巩固下来，不断提高战斗力，成为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经受住了一系列艰苦战斗的考验。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相互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彭德怀的这种建军思想和作法，同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三湾改编的方针是基本一致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出现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坚决抵制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八路军绝对不能被国民党同化掉”，必须“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等。(5)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阶段，彭德怀一再告诫全军，要认真记取历史经验，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军队要成为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要求全军“必须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哪怕是微小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6)

彭德怀历来重视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认为保持军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指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军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兵。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优秀儿女源源补充到军队来。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充分保障军队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这种关系是人民军队独有的优势，是任何剥削阶级军队都无法比拟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总结平江起义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懂得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形成单纯军事暴动，孤军少援，处境十分艰险。必须争取群众，使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提出红军指战员“不单是武装斗争员，有时要担负着宣传组织的责任”。(7)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彭德怀针对某些国民党军队不体恤人民痛苦、纪律松弛的腐败现象，告诫全国抗日军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要重视军队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状况，指出“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相互影响，相互合作，是保证战争胜

利的重要因素。”而“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之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8)并指出：“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部队纪律的严明，是保持部队和民众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9)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多次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整训）活动，军队同群众关系状况列为整军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以后军队陆续进驻营房，军队同人民群众的接触较之战争年代有了很大变化。彭德怀适时抓住了这个转变，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听取地方工作同志反映，严格从军队方面进行检查。他针对个别部队专于军队自身建设，对于地方情况了解不够；某些国防建设对群众利益照顾不够，对依靠人民群众建设国防缺乏足够认识；以及个别干部违犯群众利益等问题，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拥政爱民教育，从各方面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向国家和人民群众索取特殊的荣誉和待遇。他指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军同志要牢牢记住这个真理，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10)

彭德怀认为，人民解放军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指战员，坚持和发扬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传统，以提高全军成员的政治觉悟。他总结建军经验时指出，在长期战争考验中，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政治工作人员和全军同志的努力，政治工作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巩固内部团结，提高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政治工作已经成为我军的生命线”。(11)越是在斗争艰苦的条件下，越是要发挥党的政治工作威力。1929年10月，他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的艰苦战斗经历时，认为红5军能够克服艰险越战越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一批为革命的“勇敢积极分子”，“他们对革命人生观的确定，对艰苦斗争中的精神，可说百折不回，无意气、无条件的努力。”(12)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他多次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顿，如1947年榆林战役后的整训，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等，使军队政治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经过这次整军，“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3)彭德怀在论及抗美援朝战争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而产生的高度政治觉悟极表赞许，称颂“他们的士气非常旺盛，战斗意志非常昂扬，每个战士在战场上都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坚强和主动机敏，表现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14)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后，彭德怀就明确强调，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体军人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不容许有轻视或削弱政治工作的倾向发生。针对新历史时期的特点，他指出政治工作除了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以外，“还必须深入到各种军事活动中去，具体了解所在单位的业务技术情况，虚心学习为自己工作所必需的业务技术知识，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使军队政治工作在新的情况下，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15)

彭德怀认为，人民解放军建军伊始，就彻底摒弃了剥削阶级军队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和专横统治制度，形成了崭新的、富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队内部

官兵平等关系和民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在军队内部始终能够团结一致，战胜强敌，没有互相倾轧，没有争权夺利，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他把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内容概括为：“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15)这既是人民解放军内部关系的特征，也是正确处理我军各种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这种同志式的内部关系，是建立在革命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并经过严峻战争考验的，应予坚持和发扬。这种民主制度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军队能够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内部团结不断巩固。我军的民主制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在战斗中也要充分体现民主原则，因而能够显示异乎寻常的威力。他常以 1947 年 5 月陕北蟠龙战役为例来说明军事民主。当时西北野战军围攻蟠龙两天两夜未克，敌数旅援兵第二天即将赶到形成夹击之势。在此紧急时刻，部队发扬军事民主，采纳战士提出的战法，一举攻克，取得全胜。这种战斗中的民主，在各部队都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彭德怀认为，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应只强调现代战争要求高度集中指挥而忽视民主，真正的高度集中只能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强制办法建立起来的集中只是一种虚假的、经不起考验的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会更有利于正确的集中，更能够发挥各级指挥员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各军种、兵种、各部门之间的良好协同，更坚实地保障指挥员的各项命令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 (二)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彭德怀长期是毛泽东、朱德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他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过许多关乎全局安危的重大战役，特别是苦仗、硬仗、险仗打得多，他经历了从指挥弱小红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初级阶段，到指挥百万雄师进行抗美援朝大兵团合成军队作战的高级阶段。他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认真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技术，严肃总结剖析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驾驭战争、指导战争的艺术，成为一名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

彭德怀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个显著特征，是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这一特征决定了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它要求革命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发挥善于集中，善于机动的特长，求得在战役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才能生存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红军力量还很弱小，革命根据地还处在流动状态的形势下，游击战争成为红军作战的主要形式。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唯一正确的作战形式。

1928 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成功后，立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形势十分危急，他立即摒弃旧军队作战的一切陈规，指挥红 5 军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1929 年 4 月彭德怀率部转战赣南进占瑞金时《给党中央的信》和 1929 年 10 月重返湘鄂赣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中，回顾一年多的斗争经历指出，弱小的红军欲战胜强大敌人并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切忌分兵，“分则气虚胆小”。(16)认为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就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击

虚，专击小敌为上策”。(17)谈到红5军的游击战术，他指出，“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18)彭德怀的这种游击战术思想，同毛泽东、朱德总结红4军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并且指出，“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19)这种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不仅是当时保存自己、消灭敌军的正确原则，而且是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游击战到运动战，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长期战略方针。”(20)土地革命战争后期，1936年8、9月间，彭德怀在西征途中接受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结合自己实践认为，中国的游击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革命的红军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实现群众的要求，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才能胜利。他应斯诺要求，就红军游击战术的具体运用进行了系统概括，其要点有十：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否则不与敌人交战；二、游击队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三、游击队在同敌人交战前，要制订缜密的、详细的计划，要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运动能力，否则就意味着灭亡；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解决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或军事消灭，或政治争取，否则发动不了群众；五、游击队在与敌正常交战时，兵力必须形成优势，行动要迅速坚决；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战斗中必须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的随机应变能力；七、游击队必须充分运用声东击西战术；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打击敌人最薄弱、最致命的环节；九、游击队在进攻前要经常变换集中位置，神出鬼没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十、游击队必须同地方群众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获得最有利的情报优势。无畏、迅速、周密、机动、保密、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是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基本要求。他特别强调指出，战术很重要，但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22)

彭德怀认为，在革命根据地比较稳固、红军的统一指挥和相应条件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军事战略应适时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体。他一向强调，在执行运动战方针上，必须明确树立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指导思想，只有在运动战中消灭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成战略目标的最好手段。战争指导者必须用心研究敌人，能够在战争进程中操纵敌人，调动敌人，以求得有利战机。“领导者的妙诀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慎重选择第一仗，务求必胜。这两条原则看来很简单很容易，但在实际上运用时，则很复杂很不容易。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顺施诱惑而纵其错，尽力隐蔽自己企图，勿为敌察。如此，才能经常保持主动，克敌致胜。”(2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扩编不久的红军第3军团8千余人，在鄂东南攻打鄂城、嘉鱼、通山、通城后，乘胜攻占岳阳，再下平江，歼灭大量反动地方武装。他适时窥破湖南军阀何键分兵作战的弱点，果断向敌发起突然进攻，以运动战击败3万余优势

之敌，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市，创造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作战史上的一次辉煌战例。对于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他强调，红军指挥员在军事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上和战术运用上，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转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必须把分散游击作战的小部队改建成为主力兵团；必须建设和扩大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使我军作战有所依托；必须学会运用新的战略战术，打破强敌的进攻和“围剿”。当红军处于内线作战时，必须坚定执行“诱敌深入”的方针。要敢于把敌人放进来打，以充分发挥红军高度机动的优势，发挥革命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地形条件，“以很小的兵力牵制对方很大的兵力，迷惑、疲劳和窥察敌军弱点，集中一倍至数倍于敌之兵力，适时转入外线，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股，再歼另一股。”(24)执行运动战方针，还必须善于集中主力，坚决反对分兵作战和不顾形势一味进行短促突击、死打硬拚的蛮干思想，这种思想每每导致失败。执行运动战方针，战术必须灵活、果敢，敢于运用分割、包围、穿插战法，断敌退路。在战局发展不利于内线作战时，必须适时转移到外线，跳到敌翼侧或后方，调动敌人，打击敌人。1933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彭德怀针对敌军采用堡垒主义新战略的形势，同滕代远联名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战略建议，认为在敌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以部分兵力分散活动于中央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坚持已有阵地；集中红军大部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转移到战略外线，向赣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出击，首先消灭敌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敌人心脏地区，以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离开中央苏区，粉碎敌第五次“围剿”的阴谋。建议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25)很显然，这个建议审时度势，深具远见，但被当时中革军委领导所拒绝。不久，彭、滕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说：“由于军委轻视敌人，只重视在敌人堡垒间隙中的运动，以及待机位置不当，也给了敌人以打击我军的机会，希望军委速将我军调离敌人堡垒地区，抓住敌人向无堡垒地区延伸的部队，待其立足未固时加以打击。”(26)后来，国民党第19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出现了红军打破敌第五次“围剿”新的有利形势，彭德怀又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第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1、3军团和第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第19路军，推动抗日运动，以打破敌军的第五次“围剿”。(27)这一建议又遭临时中央负责人的拒绝，并被批评为冒险主义。

1934年4月，彭德怀在广昌保卫战中，不顾李德等错误领导的专横反对，当敌集中11个师兵力大举进攻广昌时，他一面根据战场敌我态势，力陈不能固守的主张，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一面果断地以一部兵力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控制于广昌城西南山地，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以求歼敌一部。由于彭德怀的正确指挥，终于避免了固守广昌的严重后果。广昌战役后，李德仍无视教训，依然坚持其短促突击战术，彭德怀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得到成功”。并怒斥李德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即兵力不集中”，“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28)

1931年9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红军领导权，推行错误的军事战略。

1932年1月，彭德怀执行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南重镇赣州的决定，任主作战军指挥，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红军又缺乏攻坚手段，攻城月余未克，未能及时撤围，遭援敌袭击，使红军付出重大代价。3月，在赣县江口圩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对红军行动方向产生尖锐分歧。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统治比较薄弱，地形、群众条件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张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长达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错误路线领导青令1、3军团分兵作战，使红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彭德怀多次谈及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挫折，使他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彭德怀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把它看作同开展武装斗争同等重要的问题。早在1927年他在旧军队谋划武装起义时，就注意研究历次革命起义的经验，认为“在现代技术发展情况下，根据地是重要的，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29)1929年秋，他率红5军从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开展斗争，深切体会“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30)1930年春，他回顾平汉起义后一年余艰苦斗争的主要经验，即是武装斗争必须同根据地建设结合，“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鞍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31)他并且认为在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和地方主义，才能把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开始后，彭德怀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胜利实施战略展开。当时的华北战场，日军不断增兵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局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陕北洛川会议上，对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完整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德怀对抗日战争形势和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了不少重要论文。如《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1937年11月)、《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1939年10月)、《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41年3月)、《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11月)、《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1942年7月)、《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年12月)等，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32)关于持久战，彭德怀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必须是持久战和怎样实行持久战的问题。他在文中对中日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和国际关系环境以及历史原因等方面，作了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指出中国在对日持久战中，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逐渐地由弱变强，日本侵略者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逐渐地由强变弱。中国在持久战中将会由劣势地位转变为优势地位，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关于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转化的论断，以后在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给予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彭德怀指出，由于抗日军队是为自卫而战，因而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役战术上，绝不能采取专守防御，必须尽可能是进攻的，即积极防御（或称攻势防御）的方针。在战略上以弱抗强，但在战役或战术上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力量仍然小于敌人，也须力求在战术上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要在持久的消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其目的在于消耗敌人力量，改变敌我优劣形势。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灵活机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战术胜利的发展，求得战役胜利的展开，绝不能同强敌拚消耗。在战术运用上，基于我军力量弱于敌人这个客观条件，“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33)为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他提出指挥员必须明确解决战略的防御和战术的进攻的关系，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斗中以多胜少的关系，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和战役战术上的灵活机动的关系，以及战役战斗如何争取主动、如何节约兵力、如何解决统一指挥等这样几个重大问题。

彭德怀认为，必须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它较之红军时期的游击战争具有更高更新的性质，这就是开展全民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他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34)游击战争就是群众战争，是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否则，就很难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关于在敌后作战的军事指导原则，他提出：一是要确立积极作战、打击敌人的思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军事指导上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原则，“有人想保存自己，却不去想法子消灭敌人，结果连自己也保存不了。在敌人后方，想不打敌人而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35)二是要确立党中央规定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指导原则。要“以消耗敌人为主，但不放弃一切可能消灭敌人的机会，在敌后进行长期无后方的战争，物质补充异常困难，再加上技术不如人，是不能采用以运动战为主的指导原则的。”(36)否则，则恰给敌人以消灭我们的条件。三是要切实掌握“力争主动、避免被动的原则。”“分兵把口子以拒敌，这就是被动，这是在敌后进行战争所最忌的。”要求指挥员“必须能指挥自己，操纵敌人，善于脱离被动，转入主动”。(37)四是对付敌军的围攻、“扫荡”，宜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原则。“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要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38)五是要求指挥员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六是上级指挥员应当给下级以较大的机动权力。

彭德怀协助朱德在指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作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同侵华日军和一些反共的反动势力，胜利地进行了各种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犬牙交错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政策。如针对日军对我采取以分区反复“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的特点，八路军则以“围攻与反围攻合一”的对策，利用敌军不能同时向我们所有根据地“扫荡”的弱点，“当一区举行反敌人围攻时，四周各区就可以追随敌后，围攻敌人”(39)，使其腹背受敌。在粉碎日军分路围攻斗争中，八路军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的对策，以班、排、连为单位，

组织战斗小组，配合当地民兵、游击队进行袭扰，以“麻雀战”疲惫、削弱敌人。“集中主力，采取敌进我进，从敌间隙转换阵地，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弱小部分”。(40)为有效地对付日军的频繁进攻、扫荡，领导华北敌后军民掀起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沟网。针对日军“梳篦战术、铁壁合围”战术，适时改变对策，由地面交通壕沟战发展为地下坑道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地雷战，坚持对敌斗争。关于敌后作战的战术，他提出要以袭击力为主要手段，行动必须秘密隐蔽，一经接触，就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使敌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要求指挥员必须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巧妙地组织火力，准确地选择攻击点，以消灭敌人。

1940年8月，彭德怀在华北敌后战场组织指挥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性破袭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参战兵力之众多，作战地区之广阔，协同配合之密切，组织指挥之灵活，对侵华日军打击之沉重，堪称是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这段历史虽曾几度遭到一些非议，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百团大战的决策是正确的，战果是辉煌的，其意义是深远的。百团大战不仅反映了彭德怀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等杰出军事家的集体智慧和亲密团结。

百团大战的史绩应当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经验应当认真总结。百团大战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形势下组织的，八路军总部根据对抗战局的分析和对当时敌情的判断，经过酝酿磋商、深思熟虑而定下的战略决策。战役进程中，华北敌后战场几十万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愧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到更新的发展，迅速而突然的破袭，使敌猝不及防。战役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在各破击线总长达五千华里的战线上，部队、民兵在八路军总部统一号令下协同行动，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战术运用上，把攻克据点与破坏交通紧密结合，设伏与围点打援交替运用，创造许多新战法。百团大战成功地运用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也是极为宝贵的。彭德怀1963年身处逆境时，针对当时某些人对百团大战所做的“批判”写道：“实际经验证明，没有有力量的行动表现，不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要想打开当时困难的局面，争取这些伟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伟大胜利，是维护和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日战争，建设强大八路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在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扩大八路军在国际国内声威方面，则意义更大。”(41)

对于百团大战不足之处，彭德怀曾实事求是地作过分析。一是他当时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判断不准确，没有看出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在于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图，而过早地发起了战役，如待日军进攻长沙等地，其兵力更为分散时发起大规模的破袭战，其作用将会更大。二是百团大战后期，他主观上急于扩大战果，在指挥节奏上掌握得不够稳妥，使部队在过分疲劳时，打了一些可以避免的硬仗，伤亡过大。

随着华北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问题日益重要，这关系着能否粉碎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能否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彭德怀适时提出要把巩固根据地作为我军坚持敌后抗战，争取全国抗日战局得到转机的重要任务来看待，要以巩固根据地的积极行

动，粉碎日军的围攻与扫荡；要在反围攻和反扫荡的胜利战斗中，求得根据地的巩固。为此，提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主政治、改善行政机构，进一步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巩固经济基础，以及严整部队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等问题。

1941年至1942年，由于侵华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及国民党顽军的封锁、包围，加上华北地区连年灾荒，抗日根据地军民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彭德怀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同志一起，领导华北根据地军民，为战胜这黎明前的黑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对敌斗争方面，他“根据新的作战环境，广泛地发展了民兵和地方武装，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并“同各游击根据地领导同志一起决定，组织精悍的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这是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一个重大创造。”(42)武工队在敌占区分合自如，来去无定，用武的、文的、明的、暗的各种方法同敌人斗争，使敌伪军心动摇，组织瓦解，提高了人民胜利信心。他在领导八路军的敌后斗争中，特别是军区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使根据地分散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统一的战争指导结合起来，使敌后我主力军和地方军、民兵，能够在统一领导下灵活作战，在华北敌后军事斗争日趋紧张、艰苦的形势下，针对日军对我根据地实施残酷的经济榨取而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发动群众，结合武装斗争，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巩固民主政权、发展生产，开展敌后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使人民战争得到新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防御阶段作战。1947年3月，敌为摆脱被动失败局面，纠集重兵于陕北、山东两解放区战场，实施重点进攻。敌用于西北战场兵力达25万人之众，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兵力仅2万余人，且装备远远不如敌人。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战局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彭德怀和习仲勋统一指挥西北战场作战。彭德怀按照中共中央意图和作战方针，在战场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将敌胡宗南部主力部队吸引在陕甘宁地区而给予有力打击，为其它解放区战场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又采取周密措施保障党中央在陕北的绝对安全。在党中央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延安以后，彭德怀针对敌军骄横急躁、急于同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提出“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的作战指导思想。(43)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高度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点，在运动中消耗敌人，歼灭敌人。在作战部署上他先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地区，运用待伏战术，取得青化砭战斗的首战胜利。继又针对敌军重兵集团“小米碾子”式的战术，组织小部队分散对敌军四面围扰，断其交通，牵着敌人鼻子大游行，在敌军被拖得十分疲惫、分散之际，又以“虎口夺食”战术，取得羊马河全歼敌一个旅的再战胜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青化砭、羊马河的作战经验，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文件，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44)并据此提出了“蘑菇”战术。对如何继续贯彻“蘑菇”战术，彭德怀要求部队“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根据敌我双方方针，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45)更有效地打击敌

人。同时提出立即把陕北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军民共同对敌，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西北战场战争进程中，彭德怀针对战斗中的问题，不断总结成败经验，要求指挥员在作战指导思想和指挥艺术上要有一个新的提高，“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敌迷惑之中歼灭敌人。”“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46)不但要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还要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在敌大我小的形势下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求得每个战斗的迅速解决。为达成歼敌目的，他要求指挥员在战斗组织、部署中，用心研究如何隐蔽自己，给敌人制造错觉，“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47)在连续频繁作战中，彭德怀十分重视战役战斗的组织准备，认为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常常被忽视而不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他要求指挥员在重视提高部队素质、士气的同时，还必须认真重视具体的战役战斗准备，完善计划、部署及战术、技术的缜密配合，要把它当作战斗成败的重要关键看待，特别要重视对局部问题的过细检查，切戒在士气高、形势好的情况下产生的疏忽思想。他指出，“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是全局的，都要先从消灭敌人一个地碉及一个排一个连开始。接近了前沿才能发展到纵深”。“只有有计划地突破点，突破局部，然后才能扩大到面，到取得全局的胜利。”(48)他要求指挥员组织战斗要很好地认识快和慢的辩证关系，掌握好节拍。比如“挖坑道要快，但到装药时就不要着急，就要慢一些，要检查距离及装药的情况，才能炸中。”“进攻出发要快一些，但到冲锋出发地以前就要慢一点，要先看地形，选择道路，检查武器。否则，象攻梁周村时部队到冲锋出发地停留很久，伤亡很大，要快反而慢了。”(49)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要运用得当。作战时，指挥员必须抓紧时机。“指挥是高度的艺术，要看出现在的慢就是将来的快，在快时更要有适当的停顿以保持将来再快。”只要有一个时机，就绝不能放弃，要不顾疲劳，尽一切可能抓住它。“特别在追击敌人时，我们更要不顾疲劳。被迫击的敌人，他是失败的，我是胜利的，敌人企图摆脱包围，企图摆脱追击，以图转入防御和反攻。我军使敌不能转入防御而歼灭之，则将使我军少付若干代价，故应尽一切力量追击。我平行追击敌人，我疲劳，敌人则更疲劳。我放弃辎重，我可收回：敌丢弃辎重，则成为我的胜利品。故追击中的时机更为重要。”(50)在战斗作风上，他特别强调各级指挥要切戒急躁情绪而影响战斗，尤其在发起每一战斗时，必须细心研究取得战斗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扎扎实实解决好各种环节问题。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在战斗中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和战斗意志薄弱、贻误军机的作风。

彭德怀剖析他在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失误和教训，仍然是求之过急，而且“屡戒屡犯，不易改正。”(51)一次是1947年10月，打下清涧后，应该让部队休整一段时间，当时主要考虑到中央机关在米脂、绥德地区的安全问题，因而过急地攻打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克。再次是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进占陇东，截断西(安)兰(州)公路之后，急于乘胜进攻宝鸡，破坏敌军后方，缩短西北战争进程，结果遭敌夹击，而招致损失。彭德怀自省，急于求成，思想上是主观主义的，往往发生于连续胜利之后，教训十分深刻。

抗美援朝战争无论是战争规模，还是作战方式和战争进程，都和国内战争迥然不同。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缜密地研究朝鲜战局的

发展形势、战场条件，认真地估量敌我军事力量，解决了战略指导和战争准备、作战部署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部队入朝的前夕，他首先明确提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指出在敌军技术装备处于绝对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适用于朝鲜战场，而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的方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他顶住，不使他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个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个阵地。我们不是单纯防御，要不失有利时机，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巩固阵地、守得住土地。”(52)彭德怀在分析朝鲜战场发展形势后，在即将挥师入朝之际，果断地向中央军委提出，为集中优势兵力，争取战机，必须改变军委原定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的决定，建议四个军同时渡过鸭绿江，集结于江界、熙川、云山、德川、孟山地区，从而使战争一开始志愿军兵力就能够处于优势地位，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对稳定朝鲜战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及时总结经验，要求指挥员坚定诱敌深入的思想，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53)的作战方针。担任进攻的部队要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敢于实施迂回、包围、穿插；担任防御的部队不仅要坚决阻击，还必须灵活地进行反突击，吸引更多的敌人，使进攻部队易于奏效。彭德怀在作战指导上，充分利用了敌人恃强骄横的心理，有计划地将主力隐蔽后撤，故意示弱，给敌人制造错觉，诱敌进至预期的战场上，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第三次战役，是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彭德怀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局，中朝军队虽然已经取得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并未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战争还将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需采取稳进的方针，确定第三次战役以歼灭临津江至北汉江段的第一线南朝鲜军队为目的，越过“三八线”后不作过远南进。在中朝军队解放汉城后，彭德怀发现敌军未作有力抵抗即迅速后撤，显然是有计划的退却，意在诱我南进，伺机向我反扑，如以我疲惫之师碰在敌人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那是十分危险的，据此，断然决定收兵。经过三次战役的实践，彭德怀认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予以各个歼灭”(54)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他指出“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只要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胜利的。”“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力求大胆的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必须“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求得逐股歼灭敌军”。(55)第四次战役是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历时87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使中朝军队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彭德怀指出，这次战役证明，“我军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坚持固守防御是困难的，积极的运动防御是必需的，而且可以取得一比二甚至更多的代价。”(56)为抗击敌人猛烈的火力突击，在兵力配置上要采取“前轻后重”(57)的原则，尽可能多控制机动力量，较好地把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有效地统一起来。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反击战役，粉碎了敌军企图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使中朝军队摆脱被动局面。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不能速胜，必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我军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不被歼灭，朝鲜

战争的结束是很困难的。为此，他把阵地战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适时组织我军转入“持”作战，积极防御”阶段。他提出防御阶段的主要作战原则是：有阵地地稳步前进；不断轮番，各个歼敌；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做好心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的仗；由小敲小打，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机动灵活，量力而行；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斗上的速决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大力开展敌军工作，切实作好瓦解美伪军的政治工作。(58)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始终掌握着战场制空权。我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行动自由，成为关系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课题。彭德怀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利用现有条件，开展积极的对空防御和采取各种防护措施，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连续五次战役后，双方投入兵力均达百万以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阵地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在 1951 年粉碎敌夏秋攻势的防御作战中，彭德怀坚定地组织志愿军采取坚守性的阵地防御作战。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为适应阵地防御作战，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坑道工事相继出现，彭德怀认为坑道工事对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意义很大，随即在全军推广。以后逐渐发展成以坑道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防御阵地，在前线筑成巨大规模的、交织连贯的地下长城，胜利进行了一系列阵地战，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59)形成一套攻守自如的新战术。彭德怀还认为，抗美援朝战争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60)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指挥战争一年半时间里，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最严峻、最激烈、最艰苦的阶段。他创造性的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战争实际出发，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因势利导，克服了各种困难，出色地解决了战争进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取得了战胜高度现代化敌人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 (三)

1952 年春，朝鲜战场形势趋于稳定后，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后七年，彭德怀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倾注全力转向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上来。

彭德怀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首先着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一年多充分准备，于 1953 年底至 1954 年初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通过了一系列军事建设的重大决策，成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开始了军事建设的新局面。彭德怀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建国后新的国际环境和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转变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强调指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方针，全军干部的思想转变是最重要的一环。要求思想必须明确，态度必须坚定，绝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不能盲目骄傲，墨守成规，要刻苦学习，胜利实现军事建设的重大历史变革。

建国初期，党中央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丝毫不能放松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和平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据此，彭德怀提出，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族的国防建设观念，一定要“把旧中国没有防御设施的情况，逐渐改变成为一个具有充分防御设施的国家”。(61)

彭德怀提出必须首先研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他认为，规定明确的军事战略，关系着整个国家战备、军队建设进程，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规划、布局的问题。

1956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军事建设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军事战略的提出，“必须根据军事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必须从我国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策来考虑”。(62)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军事战略上不能采取发动战略进攻的方针，而必须是积极防御的。实施这一军事战略，在战争爆发之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63)当敌人一旦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64)为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必须在我国重要防御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制定出必要的作战计划和反敌战略空降计划，加强战略侦察手段，争取及时发现敌人发动战争的征候，保证第一线部队和纵深部队能够适时投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状态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在战略部署上，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上适时地组织反攻和进攻。彭德怀提出，如果“在战争开始时期的三至六个月内，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能够将敌人的进攻限制在预定地区，把战局稳定下来，迫使敌人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我们进行持久作战，我们就可以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65)

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形式，彭德怀认为，在使用常规武器条件下进行的战略防御作战形式，将既不单纯是运动战，也不单纯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即是以阵地的防御和运动的进攻相结合。有的地方要顶，有的地方要放。他特别重视加强沿海地区防御能力，花了三、四年时间，亲自勘察了万里海疆和重要方向的战略战役纵深，了解有关情况，听取各方意见，为制定沿海设防规划取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彭德怀认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从我国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全局。“我们的国防建设，既不能停步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那种要求过高过急的倾向，是既不利于国家的工业建设，也不利于国家的军事建设的。”(66)他反复强调，建国初始，国家工农业生产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只有这个根本问题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才有牢固的基础。国防建设应当采取适当步骤和分期实施的办法进行，“首先搞一些迫切需要的建设，然后有条件时搞那些比较需要的建设，发现帝国主义完成战争准备确有征候向我国进攻的时候，再适时地集中力量，扩大军事建设”。(67)这样，既可保证国家拥有一定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又可不影响国家建设的正常发展。他还提出，在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武装力量应该限定在适当数额之内，要采取“裁减数量、加强质量”(68)的

方针，以节减军费开支，发展国家建设。

在国防工业建设上，他历来主张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尽可能争取外援，使国防现代化牢固建立在自己国家工业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研制自己的战略武器，增强防御能力，为此，他从1954年开始，多方了解情况，同国务院领导交换意见，研究可行方案。他提出要根据国家军事工业的发展状况，按照重点加强的方针，逐步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在陆、海、空三军的发展顺序上，他主张应首先加强和改善空军的装备，使其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有效地配合陆、海军作战。

在国家已经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条件下，他认为要尽快改革兵役制度，废除过去战争年代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役制，改行义务兵役制，建立相应的预备役制度，以增强国防后备力量。要实行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才能较好地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他指出“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依靠在平时保持过分庞大的现役军队的人数，这不但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国家的建设，而且在军事上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主要地依靠强大的现役兵员和强大的预备役兵员相结合”。“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6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新任务，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以担当起保卫国家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面对这个新的建军任务，彭德怀进行了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集中军委各位领导同志的智慧，组织全军高级干部充分讨论，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提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由诸军种、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目标。他要求全军指战员充分认识“从单一的步兵到各兵种的协同，从落后的装备到近代装备，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的正规作战，在军事上说是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带有本质性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因此要引起一系列的变革”。(70)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全军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

彭德怀关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化建设，应当着眼于提高军队质量。他指出，“现代化军队的要求，决不是单纯增加数量，首先是在于提高部队的质量”。(71)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顽强的战斗意志，优良的技术装备，熟练的指挥艺术，精干灵活的指挥机构，充分的物资供应，大量而熟悉技术的兵员的补充。”(72)为达到这些要求，必须认真加强军队的正规训练，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必需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能掌握现代军事业务的干部，培养一定数量的技术兵员。现代战争不仅要求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还要求有战役上的、战术上的、战斗中的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绝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现代化建设，必须着力研究解决好军队组组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军队新的组织编制，应当根据国家的经济条件和作战对象为依据，决定组织编制的主要因素是：作战对象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需要；国家的经济状况，主要是工业生产的能力和现有的军事技术水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兵种；武装力量的组织系统及其指挥关系的规定；对军队各种装备、物资的供应补充的规定；过去的战争经验和我国具体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等，(73)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不同的编制。各级机构的编制，必须符合工作需要和精减的原则。

“编制是军队中的法律，编制确定以后，任何人都要遵守”。(74)。一些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新制度，应当尽快建立起来。如在改行义务兵役制的同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将军队干部长期实行的供给制改变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度；颁发勋章、奖章等。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认真抓好军事训练。他反复强调要把军事训练作为全军工作的中心，要求全军官兵充分认识现代战争的特征，改变军事训练的旧观念，“今后考核哪个军队有无战斗力，应以那个军队的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考核哪个干部有无指挥能力，应以那个干部对军事学习与指挥实兵演习成绩的优劣为基本标准”。(75)现代战争比之过去的战争，无论兵员、兵种、装备技术等，都已发生根本变化，需要具备复杂的现代战争意识、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不进行严格训练，战时就会完全无能为力。过去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转变为主要依靠正规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他认为，过去的战争经验确很宝贵，在将来的战争中仍有极大用处，但必须看到，我们过去的经验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经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不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的规律，不认真学习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并熟练地掌握起来，是不能打胜仗的。应当自觉地总结经验，正确地认识自己，放下包袱，兢兢业业地学习。进行军事训练，要把“训”和“练”密切结合起来，把平时训练与战时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把军事训练与部队平时担负的任务结合起来，把军事训练与军事指挥结合起来。还要求在军事训练中加强纪律教育，按条令要求进行，养成军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习惯，克服某些部队军事纪律松弛的现象。

抓好干部训练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彭德怀指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具有现代战争知识和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干部，这是不可能的。”(76)办好学校是培养训练干部的主要方法，要把办好学校作为全军的共同任务。他指出，“要把我们现有的干部变成坚强的、能够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的干部，比之解决装备、组织编制、工程建设、建立制度等，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77)因此，必须明确认识，训练干部的工作，是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要求各部队选调优秀的战士、干部到院校学习；抽调一批具有战斗经验、又有教育能力或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充实各院校的领导，有步骤地做到使指挥人员和军教人员的轮换和合一，以弥补部队的教育和作战不能密切结合的缺陷。要求各院校毕业生应分配到与其所学专业相应的工作岗位，学用结合，以逐步改善干部队伍素质。

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加强各级司令机关建设。他认为组织现代战争，指挥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战役、战斗，如果没有健全的、有能力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司令机关，是不可能的。加强各级司令机关，特别是加强各级司令机关的业务建设，在今后的现代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使各级司令机关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各级司令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使之十分熟悉和熟练地掌握本身业务，并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必须“经常地注意挑选有才干的、能够把业务推向前进的、优秀的干部，来充实司令机关”；必须“逐步做到使我军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以提高我军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78)

认真加强军队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建设工作，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彭德怀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的任务将是非常复杂而繁

重的，地位十分重要。“后勤工作将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如果不从现在着手，建设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与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79)在后勤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有一批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否则，是不可能担负这种指挥战斗和保障供应的任务的。为此，他要求全军从思想上提高对后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调配和动员一批精干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到各级后勤部门加强领导工作，调配年轻的、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军政干部进后勤学校学习，认真总结后勤工作经验，研究前后方及与后勤有关的其它部门的协同动作，提高后勤业务和后勤战术；建立各种必需的规章制度。

必须积极开展军事学术和技术研究，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彭德怀认为，现代化建设，不仅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还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军事科学武装起来。“现代军事科学是各种科学的集中表现”，(80)各级干部除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外，必须加紧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现代战争规律和知识，学习现代化军队的作战指挥和新的军事制度。他提出必须积极开展军事学术和军事科学技术研究，主要是系统地总结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研究和编写自己的战史；编写自己的军事教范和条令；也要认真研究外国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科学技术成就，研究其战争潜力、备战措施、战略战术新特点。知己又知彼。在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中，首先要有虚心的态度，不虚心就学不到东西。其次，必须采取分析批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迷信，不盲从，不机械搬用，使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卓有成效。他并且指出，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提倡自由讨论，活跃学术研究气氛，以“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军情况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学术”。(81)

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彭德怀指出：“我军历史上虽然番号、任务、作战对象等有过多次的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改变过和动摇过”，(82)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然必须坚持这个根本宗旨，才不会迷失方向。他提醒全军同志明确认识，要重视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也要重视人的政治因素。现代化建设，必须同人民军队的政治内容相结合，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军队民主等优良传统相结合，才能健康发展。彭德怀还强调指出：“团结是全党全军的生命，是党的最高利益。”(83)全军牢固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新的军队建设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克服因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产生的各种弊端。他严肃地指出，建国初期几年，一些领导机关和部门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诸如有些决议、指示从主观愿望出发，同部队实际脱节，造成不良后果；文牍主义泛滥，文件、表报繁多，领导机关忙于批办公文，下面忙于应付差事，使工作陷于混乱状态；有些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点，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利益，使上下间出现不正常现象等，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切实解决，他要求从进一步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做起，对一切重大问题要“通过集体讨论，集体研究，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定”，要“进行全面规划，统一安排，达到认识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84)，防止政出多门的分散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必须有计划地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克服领导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工作一般化的陋习。要认真执行规章制度，

建立正规的工作作风和生活秩序，有效地提高领导工作的方法和效率。在执行新的制度时，他提出必须注意防止形式主义，“我们不应该撇开我军具体的历史特点，机械搬用那些不符合我国和我军实际情况的形式，我们绝不需要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分追求形式的结果，会助长某些人的骄傲虚夸和军阀习气，助长铺张浪费的风气”。(85)

彭德怀深入探索在新形势下的领导制度问题。他认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必须认真克服党委包办过多的日常事务，代替首长的日常工作；克服由于分工不明确，首长没有认真担负职责的弊端。“因为我军是执行战斗任务的革命武装组织，如果没有首长坚决负责的态度和强有力的及时指挥，复杂的合成军队在紧急的战斗情况中，就会引起行动的混乱，甚至招致战斗的不利；在工作中，也会造成迟缓和无人负责的现象”。(86)对党委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要有统一的、全面的理解，一方面要搞好党委的集体领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首长负责的作用，不可偏重偏废。建国初期几年，他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制度的变化沿革，研究了列宁关于一长制的论述和苏联军队领导制度的经验，收集了许多部队干部的反映，曾设想过应否试行单一首长制的可行性问题，试图更有力地解决党委领导同军事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问题。他为此曾同军委各位领导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在军事条令、条例的草稿中亲笔作过一些修改，并曾组织总部领导作过多次专题讨论。为稳妥起见，也曾设想先选择部分营、连搞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再作更全面的研究。但由于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只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从严治军是彭德怀几十年治军的一个突出特征，为老一代革命家所交口称道。勤劳之事，将必先己。他一向严于律己。在战争年代，他对干部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求十分严格，特别重视表率作用。他对干部公正无私，赏罚严明，环境越是艰苦，他越是要求干部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度过难关。“他常说：不严格要求高级干部，就不能抓好部队，就无法带领千军万马去进行严酷的斗争”。(87)在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从严治军依然是他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对军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上，必须态度坚定，排除各种干扰，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在执行规章制度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带头执行，做好样子。在工作作风上，要求重实际，重效率，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不许弄虚作假，不许摆花架子。在生活作风上，要求清明廉洁，艰苦朴素，坚决制止在一些干部中发生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认为这种腐败现象如不坚决制止，必将败坏军队风气，严重影响军队建设大业，务必严格警惕和防范。

彭德怀丰富的军事实践和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彭德怀过早地离开军队领导岗位继而含冤逝世，但他留下了数十万言的军事著述，这是人民军队流血奋斗的光辉结晶，是当代军事武库中的瑰宝之一。认真研究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对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军队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释：

(1)(2)《彭德怀自述》第46、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3)《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60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 (4)《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纪事》第 19 页，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 (5)《彭德怀自述》第 226 页。
- (6)(7)(8)(9)(10)(11)(12)《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608、17、50、64、613、562、14 页。
-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292 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第 1 版。
- (14)(15)(16)(17)(18)(19)(20)(21)《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52、563、613、3、14、15、16、629 页。
- (22)斯诺：《西行漫记》第 249—252 页，三联书店出版，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 (23)(24)《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633、632 页。
- (25)(26)(27)(28)《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纪事》第 153、154、157、170、171 页。
- (29)(30)(31)《彭德怀自述》第 74、136、138 页。
- (32)(33)(34)(35)(36)(37)(38)(39)(40)(41)《彭德怀军事文选》34、42、44、71、72、73、68、636、644 页。
- (42)杨尚昆：《我所知道的彭老总》，湖南人民出版社《怀念彭德怀同志》197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6 页。
- (43)《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27 页。
- (4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第 104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 (45)《彭德怀自述》第 247、249 页。
- (46)(47)(48)(49)(50)《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37、241、288、289 页。
- (51)《彭德怀自述》第 256 页。
- (52)(53)(54)(55)(56)(57)(58)《彭德怀军事文选》324、337、365~366、367、384、378、405 页。
- (59)《彭德怀自述》第 263 页。
- (60)(61)(62)(63)(64)(65)《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92、585、587、589、590 页。
- (66)(67)(68)(69)《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78、586、592、519、520 页。
- (70)(71)(72)(73)(74)《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70、479、480、482 页。
- (75)(76)(77)(78)《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512、486~487、499、490 页。
- (79)(80)(81)(82)(83)《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493、566、619、553、502 页。
- (84)(85)(86)《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535、544、545、561 页。
- (87)黄克诚：《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人民出版社《横刀立马彭将军》197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9 页。

**作者** 王承光 原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66 岁，50 年代末任彭德怀办公室参谋，1987 年离休后参与彭德怀传记的研究工作。



##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撮要

薛洪兴

刘伯承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毕生从事军事斗争和军事教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博采中国传统的和外国先进的军事典籍的精华，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善于结合的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炼和升华。他的富有特色的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全面、系统的见解，最具独创性的是关于军队政治方向、作战指导和军事教育的论述。

刘伯承从辛亥革命起就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对军事的挚爱和对战争规律的执着探求，深思断行的性格以及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锻炼造就了他非凡的军事素养，使他走上了一条军事专门家的道路，在旧军队里曾有过“川中名将”的称誉。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领导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

1927年参予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接受、掌握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1930年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工作。

1932年转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训练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参予指挥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显示出卓越的作战指挥和军事教育才能。抗日战争时期，与邓小平一起正确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对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及战法多有发挥和创造。解放战争时期，与邓小平一起率部转战江淮河汉和大西南，成功地运用运动战等形式，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总结和概括出以大兵团作战为核心的作战指导方针和原则。建国后，在创办和领导军事学院的过程中，形成一整套军事教育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基础。

根据刘伯承半个多世纪治军治校的论述和实践，他的军事思想主要可概括如下：

### 一 军队的政治方向

刘伯承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长于运筹帷幄，折冲疆场，但他一贯重视军队的政治方向，认为这是军队巩固发展和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四川泸顺起义和南昌起义的相继失败，使他痛切感到军队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底，他写了《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在讨论起义失败原因时，总结出了“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无政治认识的部队”和“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从军队的政治方向上一下子抓住了党的领导、政治觉悟、人民群众支持这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以后长期领导军队建设和作战的过程中，他的这种认识不断得到增强和深化。

（一）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 进和发展

刘伯承是从旧式军队转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新旧两种不同制度和经历的鲜明对比，使他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军队与别的队伍有什么不同？就是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中国的人民军队有两种创建、发展形式，一种是在革命群众武装如赤卫队等的基础上提高而来，一种是由旧式的资产阶级军队改造而成。前者刘伯承称之为“中心部队”，后者称之为“基础部队”。无论那种形式，他都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党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实现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新生的革命武装，必须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牢固的政治基础，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大革命失败就是吃了党没有及时抓武装的亏。于是，他明确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要求，由此实现党对武装的掌握。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军事化的党员成为一颗颗种子，在群众斗争的土壤中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组织起一批又一批忠实可靠的革命武装，去完成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豪迈地宣言：“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胜利”。刘伯承参加革命后曾被党委派去做兵运工作，策划军阀军队的暴动和改造。这种改造，他主张在军阀军队里“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他又认为，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发展，必须普遍注重于质量，这既是兵运工作特定环境的需要，更是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的需要。为此，他提出了“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措施。这些工农分子，有些是党员作为骨干派进去的；更多的是入伍后被培养、发展为党员，成为军阀军队暴动、改造的中坚力量和组织领导力量。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战争的鲜明目的性和无比的艰巨性、残酷性，要求人民军队比以往任何类型的军队具有高得多的坚定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只有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刘伯承历来强调党在战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针对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派出很坚强的党员，在实际中去领导这一斗争，才能完满实现给予的任务”。(1)并特别指出：这在军阀制度法西斯化的中国更有严重的意义。因为只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使人民军队摆脱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保持无产阶级的正确方向。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干部的军政素养，使他们能领导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他坚决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针，号召军队“以党为核心团结奋斗”，去夺取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在论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时，他说，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军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军队。无产阶级领导的，指的是司令官；人民大众的，指的是队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指的是任务。以军队为主体的军事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系统一样，只是整个革命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决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在党这个司令官的指挥下，积极

作战，为完成党的任务而英勇奋斗。在谈到军人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时，他严肃地指出：“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你因此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那你就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2)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在建设、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对此，刘伯承提出了“工具论”，指出军队是“执行和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而军队每个成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要“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要有真减、急迫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成为党和人民有用的工具。党和人民需要我们保卫祖国，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那我们就要去保卫，并且保卫得好，保卫得住，尤其是无代价地去完成保卫任务。

## (二) 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作为军事指挥员，刘伯承一贯十分重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并把它当作军人的政治素质的主要表现来对待。他认为组成军队战斗力有四个条件：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物质保证和严格纪律。四者缺一不可，而政治素质是先决条件。“无论现代化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的运输队”。(3)政治觉悟与军事素养等条件比较起来，作用更为突出：“部队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饱满的战斗精神，就是启发和保证我们打胜仗的一个基本条件。有了这个基本条件，才算有根据的讲求战术。”军人必须有压倒敌人、不怕牺牲的气概和战胜敌人的自信心。他对自己和部属这样警策：“自信心是军人的魂魄”。这个魂魄并不是军人天生的，而是要经过战斗的磨炼、自身的修养和党组织的教育，才能逐步形成。刘伯承历来认为政治教育是提高军人政治觉悟必不可少的途径，他把士气和打法列为打胜仗的两个基本因素，并强调部队高昂的士气，要通过“鼓励所有的指战员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来实现。政治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深入教育就是政治工作提高一步”，这是人民军队的优势所在。强有力的政治教育使军队“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4)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培养每个成员自觉自动地来实现革命的行动大纲，使他们明白了解斗争的前途。

1941年以后，他领导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针对有些人在日军“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面前畏惧退缩，右倾避战，他发动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进行政治动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讲明日军亡我中华的狠毒阴谋和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的结局，使大家认清了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明白了最后胜利是属于抗日军民的，从而克服了右倾麻木的倾向，坚定了全体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对敌斗争出现了新的转机。

1947年9月，他在大别山对刚刚完成千里跃进任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部分干部作报告，要求大家从纠正形势认识上的偏差来进行提高信心加强斗

志的教育。他指出当前斗争的主要障碍是畏敌避敌的右倾思想，而这种右倾思想来源于对当前有利形势的“四个不认识”：不认识我军千里跃进标志着国民党军的战略大退却；不认识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驰骋策应，陷敌被动，与其他解放区战场组成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不认识人民解放军已经彻底粉碎敌军进攻，进一步向前发展巩固，而蒋介石政府正处于民怨沸腾、财政极端困难的危机之中；不认识中原人民正热烈渴望解放军支持他们起来斗争翻身，地主阶级则极度恐慌动摇、丧胆落魄。这些思想障碍一经扫除，我们就能提高信心，加强斗志，毫不动摇地去夺取和迎接胜利。他要求“必须明确地把上述基本形势向全军每一个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而又重复地指明，务使每一个战士都清清楚楚地懂得；不断地根据干部战士的认识情绪变化，具体深入地解答他们的疑难，使他们对前途有光明、愉快的感觉。”(5)经过层层反复认真的动员教育，整个部队士气大振，信心提高，斗志增强，并且造成了反对伯死鬼、积极打敌人的强大舆论。大别山的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刘伯承曾深有体会地说：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创造，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 (三) 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是军队生存发展的命脉

刘伯承对人民军队的宗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从中国工农红军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之日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军队与人民对立的现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军队，使军队与人民的利益趋于完全一致，军队为人民服务，也就从此确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抗日游击战争，党是以发动和组织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战为基点的。他曾说过，动员全民族一致抗战，这是保证八路军打胜仗的条件之一。他反复强调129师等八路军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再指出，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而是“别动队”；军队没有人民的支持是“裸体”跳舞，很困难，离开人民是不行的；军民结合斗争，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解放战争中，他号召全体指战员都要牢固树立“人民的军队”的思想。

1948年4月，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到战争致胜因素时，非常透彻地解释了战争的结局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指出，把我们人民军队进行战争和建设的历史认真回忆一番，不难看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什么。世界上有枪的和没有枪的打，没有枪的胜。枪好的和枪坏的打，枪坏的胜。枪多的和枪少的打，枪少的胜。有飞机大炮的和没有飞机大炮的打，没有飞机大炮的胜。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毛主席指出的：人心向背。这是决定的因素。哪一个反动统治集团在垮台之前，它的力量不是貌似强大的？辛亥革命前的满清政府是这样，大革命前北洋军阀也是这样，抗日战争中，日军看起来很厉害，拥有大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八路军只有几百条烂枪，1937年说我们一定胜利，谁相信？解放战争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其势汹汹，不可一世，1946年说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谁相信？我们从转入战略进攻到现在，一共才7个月，形势就根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为此，他坚持在作战中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威力，配合军队取得最大的战果。他指出“爱人民大众要爱到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的程度。”(6)他认为红军战士要成为武装的政治宣传员和组织员，因为争取战地的居民都加入到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方面来，以配合政治坚定、战斗果决的红军作战，是胜利的主要条件。他要求所有军队成员，应在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使民众了解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自己利益的一致，经常保持军民血肉的结合。

他还告诫“ 无论任何部队都有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因此必须将敌人的到来与退走情形及其动向，适时通知民众，并指示以安全地带。” (7) 通过这些宣传、爱护、帮助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真正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 人民子弟兵” 和“ 人民的军队” 的形象，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战争中来，成为军队可靠的基础和得力的助手。抗日战争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为发动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参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刘伯承曾正确地指出，只有团结各阶层抗日人民一致对敌，才能照敌人的痛处打得有力。在根据地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充分发动广大民众，组织人民武装等，正是打稳统一战线的基础，发挥有力的群众游击战争。在敌战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国人共同对敌，一切从保护民众利益出发，实行革命两面派政策，秘密繁殖游击战争，也正是从敌人后方来巩固根据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为了始终坚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保持军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刘伯承还特别注意加强部队的群众纪律，严格防止和制止军队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在处理部属过多征用地方群众的大车时，严厉批评说：“ 我们的军队叫做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服务是特色。但少数人员有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如果我们还不自觉，虽然群众是拥护和同情我们的，但如果我们太过分了，必然要脱离群众。” 他特别批评负责这件事的干部说：“ 干部是骨干，一定要与群众结合，不然就是骷髅，骷髅是死的，没法与血肉相结合。我们究竟愿意当骨干，还是当骷髅？” (8)

## 二 作战指导思想

刘伯承熟读和通晓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理论造诣深厚，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作战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系列简练、精到、实效的作战原则和方式方法。

### （一）面对点线的战略

刘伯承从战略的高度，把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之间的抗争归结为面对点线的战争。他指出，敌人本质上的虚弱、孤立和数量上、装备上的优势，决定了它必然采用点线战略，据守城镇要点，控制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依仗现代化的战争条件向革命力量实施进攻。人民军队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性质和力量上的劣势决定了必然采用面对点线的战略，占领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不断壮大人民力量，进行积极防御的作战，逐步达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敌人，他提出这“ 是在人民本质上发挥一切力量的战略”。

他反复谈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都是“ 面对点线的战争”。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 围剿”，红军依靠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实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以此打破“ 围剿”，获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利。第五次反“ 围剿”，政治上贯彻“ 左” 的一套路线和政策，搞乱了阶级阵线，拒绝对敌人营垒进行可能的分化，孤立了自己；军事上实行消极防御，放弃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推行单纯军事观点，主力盲目出击，企图“ 御敌于国门之外”，迷恋于“ 战术致胜论”，搞“ 短促突击”，结果遭到失败，造成战略大转移的被动局面。抗日战争中面与点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交通斗争。他指出，日军驱策其不足的兵力围攻和“ 扫荡” 地域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全力强化交

通和基地，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把根据地划为一个个“口”字型、“田”字型的格子网，好装进它的“囚笼”。一方面把根据地军民割裂开来，以便任其奴役和宰割；一方面便于及时运送人马及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出动飞机、装甲车等现代化装备，使大军能深入根据地腹地灵敏移动；企图由点的占领，到线到面的占领。抗日军民则把交通斗争作为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以面包围敌人的点线，进行以军事为轴心配合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全力的抵抗。政治上唤起并组织抗战区和敌占区的广大民众，粉碎敌人利用交通维护“治安”的阴谋；经济上切断敌人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的运送渠道；文化思想上阻绝奴化、毒化中国民众的宣传品、读物的输入；军事上直接破坏敌人的运兵线和兵站。交通破击采取战斗力与劳动力相结合，大众与技术相结合，经常性与突击性相结合的办法，不断打通自己的交通，打断敌人的交通，使敌人孤立与僵卧于点线之上，进而缩小其点线，扩大根据地的控制，直到把侵略军赶出中国去。解放战争时期面与点线的斗争，他指出人民军队所依靠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国民党蒋介石所依靠的是铁路，公路和碉堡。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来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人们的斗争，也是军队结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围国民党蒋介石孤立的点线的斗争。他认为“这是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并深刻地总结为“这就是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胜利进程，人民解放军面对点线的斗争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内线作战阶段实行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不以保守根据地的城镇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外线进攻采取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不断扩大人民军队的基础和力量，陷敌于点线的占领而无利于面的控制，尔后又迫敌放弃一般点线，死守战略要点，形成“线线切断，点点包围”，一直被动挨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千里追击和向全国大进军，摧毁了敌人残存的一切点线，实现了全国性面的占领，解放了全国大陆。面对点线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 （二）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是人民战争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对“敌进我进”作了透辟的解释：“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合作斗争的行动。”(9)因为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进行解放斗争的原则，只能为植根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人民军队所特有，而为一切与民为敌的剥削阶级军队或任何脱离民众的旧式军队所不可能具有。他以抗日战争中敌己友三方为例，深刻分析了这个作战原则特有的阶级性：敌进我进，对于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实成为舍己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原非那些脱离民众、空谈爱国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国民党军队曾有不少部队也进入到敌人后方，结果未能立足，或被敌人驱逐、消灭，甚至变节投降，这是由于维护阶级私利、凌驾于民众头上，甚至压迫民众的缘故；日军的作战见解是建立在“敌退我进”上面的，根本不屑把“敌进我进”列入它的作战条令。刘伯承认为，“敌进我进”既适用于战略范围，也适用于战术范围。1934年5月，他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有战略上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敌人调集重兵“围剿”根据地和红军时，红军派出小部分兵力透过敌人的碉堡封锁线，穿袭于其后方交通线上，不但可以

切断或停滞敌人粮弹的供应，吸引和耗散敌人“围剿”的兵力，支援根据地和红军的反“围剿”；而且可以利用敌人后方守备薄弱，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最先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并逐步加以补充和完善。1940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要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10）即是认为一味坚持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已不适合抗日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了，必须采用敌进我进的新方针。同年12月，他主持编写的《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中，再次提到：“敌进我进：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之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这是作为一种具体战法来讲的。

1942年3月，在部署晋冀豫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时，他把“敌进我进”提高到战略高度，提出组织和派遣大量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铲除顽固的特务、汉奸，瓦解和掌握伪军伪组织，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逐步建立游击根据地，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个创见和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肯定与赞赏，很快成为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方针。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它总结为指导全国敌后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有力地扼制了日军的攻势，推动了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加速了战略反攻的到来。

1947年6月底，他与邓小平一起，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执行战略进攻的任务，一举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连闯九道难关，千里跃进大别山。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战略性的敌进我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这就粉碎了敌人要把人民解放军堵在解放区打的阴谋，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破坏了敌人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斗争态势，革命战争的车轮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而当晋冀鲁豫南进野战军在大别山遭到国民党军33个旅的重点围攻后，刘伯承与邓小平又两度实行战略展开，先是以主力兵分三路，进入皖西、鄂东和大别山北麓，寻歼弱敌和国民党地方团队，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后又分遣三个纵队挺进到江汉、桐柏和淮西地区，突入敌人后方，蔓延和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与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部队互相策应。这两次战略展开，刘伯承曾比喻为“新的跃进”，是“扩大战场”，“我们的面越宽越好，越能包围敌人的点线”，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方针的新演进。

### （三）作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刘伯承历来强调作战要有“秘密而周到的准备”，“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加强计划性、组织性，才能预见和掌握作战的进程，操胜算于自己之手。他认为，作战的准备，不是临时性的，而是经常的；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或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包括思想、物质、训练、战场、群众等综合的、全面的；不是依赖和委托别人做的，而是必须由指挥员亲自动手负责的。准备的经常性，是紧张、艰险、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所决定的。各方面应有带目标性的初步工作，一旦作战任务明确，短期内即可完善，不致临渴掘井，贻误战机。准备的经常性，还表现在不只是战前要这样，而且要贯穿到战中和战后，战争一刻也不能放

松准备。准备的对象，不只是自身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包括了解自己和了解敌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指挥员一方面对自己的各个部队要了如指掌，“得之于部队情况”，素质怎样，特长如何，需要时可以分派合适的任务，有效地发挥战斗力。这种了解又必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主力军队的情况，也包括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情况，做到同时并举，协调使用。另一方面要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着重研究、掌握敌人行动的规律和特点，如敌人通常采用的队形、战术等，这是敌情的一般准备，另外还需要具体的准备，如敌人的位置与企图，进攻或防御的重点、兵力部署、火力配置以及侦察、谍报等有关情况。

就作战准备的思想、物质、训练、战场、群众等诸多项目来说，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要着眼于发挥战争的综合力量，又有主次之分，必须科学地加以区分安排。作战准备，思想政治动员，军事训练和发动群众是主要的准备，其中训练又是军队主要的准备。思想政治动员，着重说明敌人反动残忍的本性，说明我军必然胜利的趋势，以及取胜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暂时困难，以鼓舞士气，树立信心，克服悲观失望情绪。训练，根据作战需要和部队的素质、装备，着重于现实的战术与技术。战士和基层干部，必须熟练使用手中武器和装备，掌握射击、投弹、刺杀和利用地形地物、土工作业等基本技术。在技术熟练的基础上，战术才能得到合理发挥。逐级进行有针对性的战术训练。达到“准确使用自己的武器乃至敌人的技术兵器，以及对这些武器的战斗方式”。临战前“想定情况，实地演习”尤为重要，既可巩固训练成果，又使作战中有所遵循。发动群众参战，是我军的特点和优点，兵民结合是胜利之本。可以布置群众在一切可能的环节和场合支援军队作战，尤其在后方戒严、空舍清野、组织支前和打扫战场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外，物质准备和战场准备也是必要的。粮食、弹药和医药等的携行和补充都应有充分的筹措和供给。战场准备，根据作战任务及敌我双方作战的条件和特点，选择利我而不利敌的一定地域作为作战场所。依托根据地作战，或破路拆寨、肃清障碍，预设情报点线，控制周围要点和通道，把敌人引进来予以合围歼灭；或在预定敌人进攻的地区，改造地形，埋设地雷，封锁消息，转移粮食资财，让敌人围攻根据地军民和劫夺根据地资财的计划破产。

#### （四）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主动权是关系到军队存亡和胜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行动原则。掌握了主动权，军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可能组织和进行胜利的作战，失去了主动权，军队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随时可能遭到失败的厄运。因此，主动权是军队敌对双方所要拼命争夺的。主动权是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相联系着的。一般说来，主动权的天平总是向着实力强大的一方倾斜，实力偏弱的一方争取主动权的斗争则更为困难一些。战争的奥妙就在于军事指挥员能够在客观物质基础提供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导演出一幕幕超出常规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刘伯承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他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紧紧把握作战主动权的理论和实践，堪称指挥艺术中的杰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完全处在劣势条件下的作战。就战争的根本性质与人心的向背而言，人民军队在广大民众及自卫队组织的掩护之中作游击战争，可以机动自如，是具有主动的基本条件的。但主动的条件并不是主动权的本身。主动权是通过指挥员的指挥活动而争取和把握到的。因此，刘伯承认为牢牢掌握主动权是关于“指挥艺术的问题”，

是作战趋胜避败的要着。他总结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敌我技术不平衡的条件下，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之弱点，经常保持主动权”。(11)这种主动权的保持，是指挥员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结果，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由被动转化来的。他曾全面深入地考察、研究了主动权在整个反“扫荡”中的种种演变。“扫荡”开始，敌人是抓着主动权来的。它预先对根据地军民的行动规律，作了周密的侦察研究，假定好合击的目标，以这一点为中心，根据任务和参战兵力，再确定一个行动半径，然后划出合击的圆圈，等于数学上的“圆规划法”。行动时，敌人抓住根据地军民行动的规律实施“铁环合围”的各个步骤。如果根据地军民的行动及规律被敌人抓住，陷入敌人的合围圈，则主动权丧失，招致被动挨打。

因此，刘伯承提出，根据地军民的真实行动，要不使敌人知道，或它知道也是过时了的。更主要的就是根据地军民“进攻与撤退的行动，都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12)主力适时转到外线作战，避免在内线作无谓的抗击。内外线部队都必须“机警地推行侦察警戒，严守军事秘密，实行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走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这就是说，一方面，根据地军民通过戒严、防谍除奸，封锁消息，行止飘忽无定，曲折多变，多方佯动，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一旦与敌接触也不作无把握的开战与恋战。另一方面，对敌情与“扫荡”规律经常作深刻的侦察研究，做到先知敌“意”敌“备”，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把主动权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直接联系起来。日军是异族入侵的正规军，社会基础小，企图隐蔽不易，其布防有一定的系统，“扫荡”的出巢、归巢、补给线与奔袭目标，都有一定的路线，其战斗动作也基本遵循捕捉奇袭、铁环合围、抉剔“扫荡”、反转电击、夜行晓袭等一套规律和程序。掌握了这些，就算初步抓住了主动权。敌人在根据地里乱碰乱撞，再经过根据地军民又“游”又“击”的打击和消耗，通常从抉剔“扫荡”起阵势就出现错乱，翼侧暴露，兵力分散，交通延伸，特别在归巢时队形和士气更为杂乱无章，萎靡不振，敌人的弱点终于显现出来了。根据地军队的指挥员应把握先机、专断行事和顽强紧张，尽可能地集结兵力，抓住敌人孤立突出的一部，或抓住敌人薄弱的一路，或抓住敌人纵长队形中的薄弱部位、进行迎击，侧击和尾击，以“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的战斗动作，“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作战的主动权就完全抓住并发挥出来了。

敌人“扫荡”是强敌压境，根据地军民处于内线作战，主动权暂时和局部的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事，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善于窥破敌我行动的契机，防止和避免敌人突击己方的弱点，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或“由被动转为主动”或“使主动权从最后的胜利中显示出来。”刘伯承认为这样的行为“尤属贵重”。这是充分估计了敌强己弱的形势而作出的切合实际的结论。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很快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更多地处在外线作战的条件之下。刘伯承提出的新原则是：“抓紧主动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3)内线作战实行的是各个击破，避开敌人的合击；外线作战则是分进合击，采取进攻的速决战，以避免敌人的增援，求得迅速解决战斗。这种情况下要争取和保持作战的主动权，仍然离不开寻找和创造敌

人的弱点，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在敌人的错觉与不意中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打则罢，一打必歼”。越打自己力量越强，敌人力量越弱，最后从全局上彻底打败敌人。

外线作战战场广阔，作战规模扩大，部队活动余地增加，寻求与创造敌人的弱点有了与内线作战时不同的特点。刘伯承要求指挥员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机敏的处置，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动敌人，在更多的环节上窥破敌人的弱点，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掌握主动权。1947年8月1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刚刚率部胜利地实施了鲁西南战役，闯过了战略进攻的第一关，他就及时提出了在新形势下部队如何把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他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敌我态势和战法将有新的变化。不管它怎样变化，只要我们自己不骄不躁，兢兢业业，随时尽一切侦察研究以及相关行动之力，把注意力放在敌人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是在它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都可以寻求与创造它的弱点。而且我们又坚决遵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的原则，善于运用优势兵力作大踏步的进退，捕捉敌人弱点，突然出现，攻其不备，歼灭一点再及其他，实现各个击破，那我们将节节胜利，敌人的任何新花样皆归无用。“我之争取主动，保持主动，皆须如此。”(14)以后的战争实践完全证实了他的指导是正确的。他与邓小平率部到达大别山后，受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他们巧妙地进行了分遣和集结，主力分三部分向大别山的北、西、东南二个方向实行战略展开。东南方向的部队又作适当分散，连克长江北岸重要城镇，造成大军渡江之势，使敌发生错觉，急调一部兵力长驱直追，以阻截解放军过江。刘伯承和邓小平紧紧抓住这股孤军冒进的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秘密、迅速、干脆的动作向敌开展猛攻，在高山铺地区一举歼敌万余人。这是一个创造弱点使敌人处于“错觉与不意而失去主动权之中”的成功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晋冀鲁豫南进野战军初进中原时的不利态势，夺取了在新区生根立足，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动权。

敌强己弱条件下争取与保持作战主动权是关系到军队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那么，当形势转变到敌弱己强时，还要不要关注主动权问题呢？刘伯承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作了出色的实践。渡江战役是在人民解放军占有战略战役优势条件下的作战。战前，刘伯承正确地估计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指出无论是它的直接配备、前进配备，还是后退配备、纵深配备，都因兵力不足、士气低落而无法实现或不起作用了。但他仍告诫部属：“我们决不可轻敌松懈，而应上下一致，兢兢业业地部署渡江作战。”(15)目的就是争取和保持部队在优势条件下的主动权。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渡江后“主力尤应乘破竹之势，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施行迂回，截敌退路而兜歼之，切不可为中途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在他看来，既然作战主动权是与战争目的相关联的，那么，战略、战役的目的实现与否就成了衡量主动权得失的标准。渡江战役追击阶段的目标是围歼尽可能多的敌人，隔断敌人各集团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各个歼敌、向全国进军创造条件。围绕这个目标，刘伯承指示各部队采用跟踪追击、并行追击、超越追击等多种手段，按时甚至提前插到指定地点，共同完成战役任务。正是因为站在战略战役总目标的高度来看待主动权问题，刘伯承曾在渡江战役中果断地建议扩大战役范围，促成了战役计划和部署的部分更新。渡江战役的目标是解放京（南京）沪杭地区，所以又称京沪杭会战，原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与

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占领南京，芜湖地区。刘伯承根据敌人在江防突破后业已溃乱，南京、芜湖已被三野解放的新情况，认为四兵团已无必要远道迂回。经报总前委批准。决定四兵团不东进，转而南下，与三、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和徽杭公路，集中二野全力迂回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侧背，隔断汤恩伯与国民党桂系部队的联系，并乘势进入福建、江西。由此可见争取和保持主动权最可贵的是要由指挥员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 （五）机动灵活，寻机歼敌

机动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最主要的途径，是指挥艺术的重要体现，早在1934年5月，刘伯承就引用苏军有关条令的条文对“机动”这一概念作了界定：“机动是火力与运动相配合”，“是对于敌人采取很便于战斗的部署，是迫使敌人部队处于不利于战斗的地位”，“机动的目的在于包围或迂回敌人的翼侧”。他还曾批评有人把“机动”误解为“临机应变”，作了超出指挥范围的过于宽泛的理解。可见他很早就对机动的涵义和作用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机动的意义，刘伯承认为它是弱军战胜强敌必不可少的办法。他说，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学说”。这个军事学说，“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更需要机动”。他论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成长壮大、所向无敌的原因时，把机动列为其中重要的一项：“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16）

机动的本质，刘伯承把它归结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他指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17）

机动是对敌我双方部队的调动和限制，“要靠指挥员切台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机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活动，主动性、创造性、灵活性、巧妙性是它显著的特点。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刘伯承十分重视对指挥员进行机动作风和能力的培养。他曾说：“干部决定一切，故教育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面，无论在军事上或在政治上，都应经常注意培养其战斗的组织性、主动性、泼辣性与顽强性，发扬我军的良好作风”。他不断通过训练与实战总结促使干部“熟练一切战术原则”，“学习针对敌人优越兵器的新战术”，“提高战术素养”，克服“指挥上缺乏独立机动性”的弱点，使干部的指挥“切合于机动的要求”。懂得了战术，还要会合理运用战术，“所谓合理，即合于进攻或防御之理，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更要会灵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18）通过这些，“把所属全部力量有组织而有艺术地适时发扬出来，以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且这一最大的胜利，是以最小的牺牲取得的”。他特别要求独立带领部队行动的干部应“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

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19)他曾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英勇的机动”。总之，指挥员要学会和运用一切必要的战术原则，并善于根据新的情况变换战术，这才具备了实施机动的基本素养，才有了实施机动的条件和可能。

机动在作战中的实施，刘伯承是通过多种机动形式来达到的。

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之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机动方针；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要避免敌人的合击。”(20)大踏步的进退。才能调动和耗散敌人，迫使敌人暴露弱点，便于人民军队乘隙予以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在内线作战的条件下，大踏步进退更是避免与敌进行战略决战，创造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而予敌以歼灭性打击的好办法。1946年8月至、1947年6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部辗转机动于冀鲁豫战场，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出许多有利的战机，并毫不放松地捕捉住这些战机，打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定陶战役是以运动防御引诱敌两路夹击中的1个整编师孤军冒进，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予以包围歼灭。儿战被毛泽东称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鄆城战役是撇开敌7个旅组成的强兵集团，从纵深里实行了大踏步的宽大机动，一面分遣小部队，迷惑抑留强敌；一面以主力秘密突然出现于战场，抓住孤立无援的敌1个多旅，一举全歼。滑县战役又是撇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管，从3股敌人的结合部突入其纵深配备，对准首脑机关猛击，迅速粉碎敌人的抵抗，歼敌2个多旅。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是运用“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的战法，三战三胜，连续歼敌3个半旅。刘伯承曾总结说：“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

大踏步进退“包括有适应战机的强力行军不怕疲劳的一项”。(21)刘伯承十分重视这个“走路问题”。他总是把走路跟实现战略任务联系在一起，以此教育指战员。进出大别山的战略大机动，一些人认识不清，有抱怨情绪。他说，千里跃进的伟大任务是在中原歼敌，建设新解放区成为继续前进的基地。不停地走路把脚走坏了，是为了这一任务，吃大米吃不惯是为了这一任务，走山路跌骑马跤是为了这一任务，自己做衣服制鞋子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转来转去还是为了这一任务。他又把走路列为战术的范畴：“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并指示部队“在战斗间隙中就要预先锻炼”，以适应大踏步机动的需要。

围歼敌军的机动。刘伯承认为，由于人民军队善于宽大的机动，捕击敌人弱点，所以战役的围攻较易完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围攻战斗，以较小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他的结论是：钳形攻势，合围割裂。他指出，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己方的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

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

割裂的动作，应“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队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22)担任辅助进攻任务的部队，也都应从各方向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使敌人四面受敌，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根据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

这一整套围歼敌军的机动战术，是他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中外进攻战术的理论，结合自己的战斗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他的进攻战术原则的精华。

粉碎敌人围攻的机动。刘伯承提出的原则是腹地坚持与外线突击相结合。这是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作战中总结出来的。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扫荡”，为了摧毁 129 师师部等首脑机关和部队主力，主要是采用各方面且进且击地各向腹地作大合击，组成“铁壁”、“铁桶”、“铁环”等样式的合围圈。各方面敌人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合击。后一个大合击（合围）圈，刘伯承把它称作是根据地军民的“利害变换线”，入即有被捕捉的危险，出则获得了机动的自由。

根据地军民的反围攻作战，以全面的（到处都有）全力的（以军事为轴心，结合政治、经济、文化、防谍）游击战争为主，基干军队与人民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协调一致地行动。基干军队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集中，在内线与外线上夹敌活动，并适时把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扼其补给咽喉，断其交通，袭击要点，基干军队主力适时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以有力的接敌侦察，指挥员准确审核敌人行进的路程和时间，进行果断机动为前提的。一旦须作战斗突围时，或按当时敌我态势，以一路或数路从敌接合部、薄弱部突围；或乘敌人尚未构成合击圈之前，以小部队作掩护，以突然的痛击造成敌人局部的混乱，然后就势分道撤出转至外线；或从敌人突然构成的合击圈里，坚决分遣撤出合击圈外。切不可在敌合击圈里畏缩徘徊，这只能徒增损失。转至外线的主力，应组织相当的突击力量，猛烈突击敌占区或补给线上的重要目标，尾击合击之敌，迫敌回顾，这是粉碎敌人围攻最有效的手段。外线主力的突击，又必须有腹地坚持的小部队进行呼应。因为小部队与合击者的接战可以掩护主力真实行动的所在，尤其是在敌人闻枪声而集结的规律的情况下必须如此。否则，敌人可以及早转移围攻目标，合围圈外的基干军队主力也就失去了机动的自由，反围攻战斗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

撤退的机动。机动作为趋利避害、趋胜避败的行动，不但有主动突击敌人弱点的一面，还有避免敌人突击自己弱点的一面。因此，当处于不利态势时，撤退是机动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有些指挥员把撤退看成是纯粹被动的行为，不懂得撤退的真正作用，更不愿去通晓撤退的动作；不了解撤退也是一种机动，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必要环节。刘伯承指出：“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所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是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那么，怎样把握撤退的时机，适时定下撤退的决心呢？刘伯承认为：（1）当战斗没有胜利希望时，“估计能够胜利就打，不能胜利就撤走。或正在打，一见得不到胜利时，也要撤走”，“即使是战斗开始才发现无胜利把

握时也应撤退”。因为面对优势而有准备的敌人还留恋于无把握的胜利，那是有害的。（2）保障、巩固胜利的撤退。战斗虽已取得胜利，但由于敌方增援、本方后续兵力不足等原因，再打下去将会陷入被动，那就应毫不犹豫地撤退。抗日战争中的长乐村急袭战，刘伯承指挥 129 师主力及兄弟部队激战竟日，获得歼敌 2,000 余人的辉煌胜利。黄昏时敌援兵赶到，刘伯承权衡战场形势，觉得打退敌人增援部队的先头虽有余，消灭敌人全部则不足，于是决心巩固已得胜利，将主力撤退到山地待机。战后他总结说：“我们善于采用退出战斗的战术，乘敌不觉，运用少数兵力，积极游击在宽大正面上，把主力突然隐蔽迅速撤退脱离敌人。但是我们的撤退是击退了敌人，为了保障胜利而撤退，并不是被敌打败而撤退。”（23）（3）局部受挫影响全局时的撤退。某一战斗或战线重要环节失利危及战役全局，尤其应当机立断，指挥整个部队撤退，否则必将招致更大的损失。这也是一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处置。

夜间战斗的机动。刘伯承指出：“机动的形式，表现于夜间的进攻战斗。”（24）战争年代，他曾多次陈述过这样的理由：从敌我力量对比上来看，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所以敌人力求昼战，我们则宜于夜战、近战。夜战能避敌之长，就敌之短，发扬我们的长处，避开自己的短处；能更好地隐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抗日战争时期，他主张夜间战斗以伏击、袭击为主。日军惯用夜行晓宿的战术，根据地军民则扼据要处，预先埋好地雷，而后设伏于日军行进道路的侧背，待其触发地雷时，从侧背攻击，往往收效很大，夜间袭击可利用敌占区敌人的松懈自大与深入根据地腹地敌人的疲乏不堪，突然、果断地乘隙向敌人密集射击、投手榴弹、引发地雷和展开白刃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自己却能从容安全地转移。解放战争时期夜间战斗的机会和规模得到扩大。他要求战斗发起前要精密地实际侦察和周到地计划。接敌运动，分担不同任务的部队尽可能采用共同队形，以使行动迅速，不失联络和避免误会；指挥部则应明确区分各部队运动道路，以免混乱。战斗不依靠火力，而应以突然动作短兵相接，与手榴弹相结合，注意部队后续与先头相接，扩张战果或巩固已得阵地。战斗结束后立即整顿部队。各部队间要规定好联络记号，这些记号要利于自己联络识别，敌人不易发觉。

#### （六）重点主义

刘伯承指出：“按着战争来说，作战只有一个重点，而不应有两个或几个以上的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25）这是把唯物辩证法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观点引入了战争领域。他认为作战要采取重点主义的理论根据是：主要方面、主要问题一经解决，次要方面、次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又从重点主义的历史发展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比较：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军事学说无不主张重点主义。清代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说到，处处顾全，处处不能顾全。德国和日本从传统的重点攻击发展到超重点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的两位总参谋长施利芬和小毛奇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施利芬计划置重点于右翼，速战速决，连续攻击法国、俄国，而忽视正面和左翼的牵制和防守。小毛奇却重左翼轻右翼，将兵力集中到左翼。结果他们两人的超重点主义都招致了失败。苏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不能平均使用兵力，要抓住重点。毛泽东历来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反对全线出击，指出寸土必争的结果是全土丧失。一切剥削阶级的军事理论从武力至上的观点出发，把重点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采取唯重点主义，根本不顾与重点相

联系的其他方面，而且重点定了的就永远是重点，不可能再转为非重点。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作战问题上的反映。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仅承认重点主义，而且认为重点使用在什么地方是更重要的问题，重点不等于唯一点，还有其他方面，例如主要方面是攻击，其他方面还有防御；重点有时也会变动，如助攻转为主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反一至四次“围剿”，都是按毛泽东重点主义的打法，所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指导下来了个五个指头按跳蚤的办法，寸土不肯失反闹了个全土皆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指出日军和国民党军占有战略优势时都曾采用重点主义的进攻手段。日军对某一地区实行“扫荡”，兵力由邻区抽来本区，由纵深抽到前沿，形成包围的重点。敌人首先是以面的姿态的合击求得摧毁根据地军民的战斗能力，然后追求分散小部队随地消灭，同时要摧毁根据地，劫夺资财。因此敌人在大合击之后，就不能不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这时敌人的整个进攻重点就开始暴露出弱点。根据地军民适时集结一定的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在敌人的后方，由于兵被抽空，造成敌后区空虚、交通补给线延长，守备困难，造成外强中干、前硬后软的窘境。由根据地转到外线的部队正好乘虚渗入敌人后方，猛烈突击，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结合作战，敌人的重点围攻也就粉碎了。刘伯承指出，在敌人来说，这是守备兵力与机动兵力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结果。一般的军事学说，都主张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两者比较，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才是重点。但日军是法西斯侵略者，要变中国的土地为它的殖民地，变中国人民为它的奴隶，它要统治，要控制，要压迫，要掠夺，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机动兵力则必然削弱。尽管它频繁地调动兵力，组成一次次的所谓超重点，企图以一时的重兵合击取胜。这不过是捉襟见肘、割肉补疮的窘迫办法，结果是兵力不敷，此集彼虚，恰恰造成了它的超重点主义的破产。

国民党军同样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可解脱。解放战争中无论是它的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都力图控制和运用尽可能多的机动部队，形成进攻的重点。但因为兵力不足，战线过长，实际上一一直处于外强中干、上强下干、前强后干的窘态。刘伯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国民党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各个歼灭的危险就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作战。这个矛盾，国民党军是难以解决的。它“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26)就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形成进攻重点，不得不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这正是国民党军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战略上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打弱的，造成局部的优势各个歼灭敌人，这恰恰是以自己重点主义挫败了敌人的重点主义。

重点通常就是强点、集结点，与弱点、分散点相联系相对立地组成一个统一体。刘伯承战术的要诀之一就是“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他对此并作了具体的阐述：“这就是说：拿我们的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27)这是他对重点主义的卓越发挥。

为了达成“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而各个消灭”的目的，他还仔细考察了国民党军的重点是怎样转化为弱点的：敌人在全面进攻不断被歼灭之后，从其次要方向拼命抽出兵力和兵器结成重点，用来互相支援，以直撞对方或坐镇一地而避免继续被歼。事实上这里兵强就成了重点，那里兵弱就成了弱点。这里打阵地战就成了重点，那里打运动战就成了弱点，这里阵地有备就成了重点，那里阵地无备就成了弱点。一个部队一个阵地也各有它的重点和弱点，决没有处处是重点的。即使一个敌人今日成为重点，因对方歼灭其相依相存的弱邻，明日也就变为弱点。这就是人民解放军变敌人的重点为弱点，而用自己的重点加以突击的基础和条件。

即使是造成了重点对弱点的有利局势，刘伯承仍然反对乱打一气，坚决主张展开有重点的攻击。他指出，无论是运动战中的进攻，还是阵地战中的进攻，都要有重点地部署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其一点、两点，努力冲破、截断其阵线，打乱其组织序列，击灭其指挥中枢，割碎其防御配备，以求各个消灭，切不可平分兵力，造成啃大核桃的被动局面。他强调“这是我们成功的要诀”。就主攻、助攻来说，他认为对一个大的目标，各应有突击重点，总合则有二、三个突击点，上级指挥员应进行协调。这样，一则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火力，使其不易彼此策应堵塞攻击的突破口，同时又可展开攻击兵力；二则求得最少有两处突破，以便对纵深钳击和尔后攻击重点的操纵自如。助攻方向的动作要积极主动，用真面目的攻击迷惑敌人，掩护主攻方向成功。如助攻方向识破战机，突击胜利，应立即向这个胜利方向发展，变为主攻方向。如平汉战役从钳制敌主力40军，106师就势发展为攻击该部，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 （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伯承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列为作战的五个要素，反复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他借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五行”，根据孙子“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的思想，来简明、通俗、形象地表示五个作战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他军事上求实精神的反映。他曾对高级指挥员们说过：“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28）

任务为“五行”之首。任务是作战的目标和要求，实现了预计的目标和要求，作战才算取得了胜利；否则，预期的胜利是不能达到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任务又是“五行”的中心环节。任务不明确，敌情就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无从分析和研究作为特定作战对象的敌人，更无法把握敌人的具体企图和行动。同样，任务不明确，己方的情况难以作出恰切的估计，兵力兵器的数量、质量失去了计算和部署的依据。时间和地点，更是以任务为前提的。离开了任务，就失去了考察它们的量度和角度。因此，刘伯承对任务予以特别的重视。任务通常是以计划、命令的形式出现的。他要求计划、命令要以现实情况为基础，也就是说任务的确定要符合实际，充分估量它实现的可靠性和可能性，通盘考虑敌情、我情、时间、地点等综合因素和条件。他要求上级指挥员给下级下达或部署战斗任务时“要具体明确”。他指出：“给予部属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指挥员为了多给部属争取行动的时间，尽可能及早明了任务，早下决心，早发命令。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他专门规定

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基本命令是战役的，战斗命令是战术的。训令是给予目的而不给予手段，命令是同时给予目的和手段。情况清楚，部队靠近，适用命令；情况不清楚，离开部队远，适用训令。

对下级指挥员，他要求接受命令要研究“具体情况，坚持执行”。并指出这种研究不是看小说，要看要想要深刻，要有组织计划、检查总结那样的精神，当作政治责任心来看待。不研究命令也是犯罪。他提倡执行任务中的积极机断作风，发现情况变化时要果断采取应变措施，达成预定的目标。担任助攻或钳制任务时要主动支援主要方向，保障战斗的胜利。他反对对待任务和命令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马虎草率，对任务和命令不研究、不领会，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一种是顽固不化，不理睬全局利益和需要，不是无条件执行，而是意气用事或只顾局部利益，叫困难，讲价钱，甚至隔岸观火和拒不服从。

敌情是“五行”的重点。战争或战斗是敌对的双方所进行的生死争斗。本着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的目的，各方都竭力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千方百计刺探对方的情报。所以，敌情的了解和掌握既是极其重要的，又是十分复杂、困难的。刘伯承把敌情作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拟定计划、变更部署等的主要依据之一。他要求指挥员尽一切可能予以弄清，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有数。他指出：必须依据自己的任务，正确决定主要的侦察方向，集中力量实行不断的侦察，尤其是以搜罗手段捕捉俘虏与指挥员在战场亲身的侦察，以期获得真实的敌情。对得来的敌情材料必须进行研究，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然后综合之，加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定下决心的需要。他还指示部属估计、判断敌情时要注意它的常态如何，变态又如何，适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敌人经常处于移动中，不断演变着它的企图和战术。

作为获得敌情的最主要手段——侦察，刘伯承是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的。他往往把侦察与防谍并提，认为侦察使我们明了敌情，防谍是塞蔽敌人耳目，加强侦察使自己耳聪目明，保守秘密使敌人耳聋目瞎。侦察情况是进攻的，除奸防谍是防御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但重点在前一点，没有侦察就不能除奸防谍。他认为侦察要建立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上，在这一基础上又建立自己的军机侦察。有了众多的群众情报网，就可以广泛及时地了解敌人的动向和发现间谍特务。但群众性的侦察工作必须与专业的军机侦察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威力。

我情是“五行”中的应有之义。战争和战斗是力量的竞赛。力量使用是否得当，能否发挥出最充分的效应，是指挥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刘伯承曾把我情即自己部队的情况列为作战指挥的三个关节之一。指出：不得于部队的情况，就不能取胜。并具体解释说：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因此，他非常重视对部队的了解和掌握。他指示各级指挥员必须深入所属部队，查看和询问部队的各种情况，从伤亡到补充，从情绪到各部分、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团结，从训练水平到战斗力现状，甚至对部队穿鞋、走路、睡觉以及行军负荷等生活琐事，都要摸熟摸透。他尤其注重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了解和掌握。他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好坏立即见效。”(29) 强调对干部的“知人善任”是掌握部队的关键。他认为了解干部不是一种容易的事，要经

过“大大努力”，“在战场上去看战将，在政治斗争中去看干部的坚定”，(30)日常的观察加上实践的考验，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他反复告诫部属，凡是所辖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以及素质、作风、特长，特别是负责干部的秉性脾气，都应烂熟于胸中，能够随口说出。一旦部署或指挥作战，这些组成“我情”的因素，全部可以恰当地得到运用。

作战中，他对部队情况的掌握要求得更加具体，他规定各级司令部必须逐日绘出所属部队位置、进出路线等的“标示图”，让指挥员能一目了然。指挥所处于移动状态中，他要求随时架好电台，开通通信网路，与所属各部队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以切实掌握部队情况，实施正确的指挥。

时间和地点，也是“五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也是战争运动的形式。刘伯承把时间和地点列为作战指挥除部队情况而外的另两个关节。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就不能取胜。他举例说明：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是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

就一般而论，地形对于作战的意义，“河川、山地、道路、城寨与地形的平坦、起伏、开阔、隐蔽等之影响于敌我的行动者，就不外乎是观测或是遮蔽，是射界或是掩护，是交通或是障碍；从作战方向去看河流、山脉、公路、森林等态势延长的地带是直幅的或是横幅的。若是直幅地带（或叫直走廊）则多利于进攻，若是横幅地带（或叫横走廊）则多利于防御。当然这要从敌我现有装备的优劣与进攻防御的不同去判断。但是我们却不要只限于这样一般的军事观点去判断，就要从我们的任务，在此时此地围歼某一具体的敌人，如何便于使用现有的兵力、火力的观点去判断，就要从被围的敌人将如何利用这一带地形来抵抗我之围歼去判断。”(31)平汉战役就是抓住国民党正规军大规模行动离不开铁路的弱点，事先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地带，组织军民大举破路、平沟和拆毁日伪遗留的城墙、围寨、碉堡、工事、以肃清障碍，便于进行运动战，同时派遣干部布置情报点线和侦察地形，准备了战场有利的条件，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抗日游击战争敌我力量对比很悬殊，地形的选择和利用在战斗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刘伯承考虑和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伏击和袭击这两种在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作战方式中的地形处理问题。对伏击战，他指出：伏击目标的地形，要便于我们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同时能限制敌人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而且使敌无法躲避。如在两山林中间而又缺少房屋、窑洞供敌躲避的地带就很好，或一面山一面河的隘路也很好。就敌兵种特性来选定地形，如伏击汽车则要选在上下坡或转弯处，以使其不能预先发现我而容易中伏。如伏击骑兵或驮载，则要选在沼泽而不易奔驰之处。如目的是在消灭敌人，选定地形不仅要注意便于组织火网，实行纵射交叉射，而且要在突然杀奔敌身实行肉搏之时不受地形限制。如目的只是在消耗敌人，则着重于选定适于火力袭击的地形，对袭击战，他认为，我们所袭击的驻止之敌是驻在房屋和堡垒的据点内者较多，而刚才立足休息驻在帐篷内者却少。我们必须在战前察明周围的地形，敌人所驻房屋、堡垒、铁丝网、鹿砦等构筑形式如何，何处便于隐蔽接近，何处便于冲锋，何处便于撤退，从而作出确当的部署和处置。

他还特别注意根据地内的地形改造和进行据险机动的战斗。他号召军民

“对敌人交通不断的破击，护路沟的填平，山地隐蔽小路的构筑，平原沟道的发展，这应成为抗战军民经常的职责。如果能把敌人的交通破毁，使得敌人与我们一样，都是步行走小路、沟道的话，则其快速部队、装甲车队、骑兵、空军等就要失其效能，接济也少来源，那我们就容易消灭它了。”(32)1939年4月进行的长乐村急袭战，敌被歼旅团主力原拟由榆社到辽县，因榆辽公路被根据地军民破坏，使它不能不折转武乡，受到129师预伏痛击。他指示“在敌人必通过的险要地形，特别在其奔袭势猛之时，我们应该据此使它碰壁，给以有力的杀伤。”(33)为此，“要在山梁上、峭壁处后面，构筑隐蔽战壕，或在宿营地要点构筑隐蔽战壕（构筑的地点与样式都使敌人不能使用），或在墙上挖枪眼，以便杀伤敌人，机动撤退。”(34)作为这种战壕的一种，他提出了挖掩袭洞，并亲自写出了《打掩袭洞的办法》一文。这种掩袭洞是合攻防为一体的工事，选择敌人不易接近攀登的断岩峭壁、地隙河沟等险要处或村庄隐蔽处挖成，使敌不易侦察，而我能够抵近敌人射击，易于准确命中。如将土枪、土炮、地雷（铁石）等连续设置，再与山头民兵麻雀战的火力配合起来，更可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力战斗。

#### （八）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的转换与运用

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三种基本的作战形式。在三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和运用上，刘伯承科学地阐明了三者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具体战术。

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人，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开展袭击敌人的作战活动。这些队伍的组成，无论是正规军派出的，或者是由民众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这两种混合组成的，通常是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其动作方式，是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尤其表现于小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紧张情况之下，要求游击队长机断专行，独立自主，决定行动的独立指挥，并没有战线和后方的组成。

所谓“运动战”，就它在军事上的精义说来，应该是叫“机动战”。一般是使用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队来进行的。因为军队的数量比较大，就必须有协调各部在单一意志之下行动的统一指挥。正规军队进行的机动战，就是指挥军队在战斗之前、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后的移动，求得造成便于使用武器的地位，并且利用已得的战果，发展到完全消灭敌人。假使敌人在动作上造成不利于我们的战斗的条件时，那我们就引退到适当的地点，以求避免其突击，并从中取得有利的条件。

对于阵地战，他认为在进攻中应尽量争取用压迫和引诱敌人的方法动摇其固守的决心，使其脱离筑城地带，而在运动中消灭之为有利。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数路突破向心会合乃是取胜的关键，防御中应采取积极防御（攻势防御）之方针，目的在于利用坚固筑城，迫使进攻之敌展开遭到大量消耗，然后抓住弱点突然给以有重点的大小不同的反击，获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待主力前来合击。他强调指出：“防御是被动的，不管采取什么样积极的手段，防御总是被动的，单纯依靠工事来防御是不能持久的，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时间长了，攻击的办法也就多了，终究是要被突破的。不管什么样的防御工事，都只能在敌人炮火准备和远距离时起作用，真正的决战是在外边打，不是在工事里面打。防御应有预备队，要是没有预备队，防御是不能持久的。”(35)

游击战与运动战在战术上是不同的，他指出二者的分界是：游击队的兵力小（通常千人以下），军实缺乏，灵动性大，隐蔽容易，突击力小，顽强性弱，因此，它应特别掌握着主动地位，发扬宽大的灵动性，以突击敌人、消灭敌人作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游击队只有胜利的进攻，绝少防御，从不挡仗，行动通常急转直下，也难以集中指挥。战术通常是突然袭击运动或驻止之敌，特别是袭击运动之敌，所谓伏击与袭击者是，伏击又是其中最好的手段，对优势的敌人也可采用。破坏敌人的军事资源，尤其是交通，在游击队一切动作中，都是很重要的。包括运动战在内的正规战的特点是：正规军的兵力大，军实充足，隐蔽较难，突击力大，顽强性强。因此，它通常发扬运动战的威力，以主动的进攻与消灭敌人作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防御退却为避害。且其侦察警戒也较游击队为有规律。无论是战斗或行军、宿营，都着重于协同动作，也多采用集中指挥。这种划分，他认为是为了便于研究战术的运用起见，正如地图上划分的经纬线，以便于研究地理一样。同时他又指出：二者之间并无一条隔绝的鸿沟，而是互相连贯的。就游击战向正规的运动战发展的过程及其连贯性来看，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于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干队与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军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钳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军的进攻战斗发展；伏击运动之敌，是向其预期遭遇战斗发展；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这些发展的连贯性，在大部队作游击时，越发融台一体分解不开。如敌人大军云集，不利于我集结大的兵力行动时，则我正规军可以减弱集结的主力，而分遣其部队于各区去领导、强化各区的游击战；而一见敌人布兵稀薄或有隙可乘之时，则集结附近区域的部队作运动战。但正规军一般是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作为经常，因为要发扬其消灭敌军的威力，才能制止敌人进攻，这也是正规军的任务。就运动战与阵地战而论，二者也“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时，又变为运动战了。无论运动战或阵地战，都是具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来进行的”。

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刘伯承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分量，那一种占多少，就需要严格综合、估计和对比当时敌我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军队数量，质量及其技术条件的优劣，以至地理、经济条件，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条件来决定。这是就战役情况来调剂二者配合的分量的。但就抗战的战略阶段来说，则是游击战的分量占主要地位，运动战的分量是占辅助地位。一旦在我力变强，敌力变弱的局面下，不但运动战的分量要升到主要地位，游击战的分量要转到辅助地位，而阵地战也将出现。

三种作战形式在战术上的运用，刘伯承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出色的实践，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打法，都是用袭击。”“无论敌人大小部队都可用突然的袭击，无论是消灭或消耗敌人，也都可用突然的袭击，不过在部署与指挥之中，要根据预定消灭或消耗敌人之不同目的来决定各种袭击手段”。(36)他把袭击分为三种基本手段：袭击（及反袭击）、伏击（及反伏击）、急袭。他又把伏击分成一般伏击、待伏和诱伏三种。待伏，就是预先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埋伏好，待它通过而袭击之。还可根据敌军突进的特点，设置“重叠的待伏”。诱伏，就是在主力埋伏以后，再以小部队故意示弱，以引诱敌人

到伏击圈内，然后袭击之。就敌我动静的形态上来说，袭击是敌处于静，我处于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游击队对驻止之敌“偷偷地接近”，“给以不意的打击。”如其发展成为大兵团的正规作战，那就是对防御之敌的进攻。伏击是敌处于动、我处于静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对运动之敌的攻击。急袭是敌我双方都处于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敌我双方都不预期的遭遇战斗，因为双方都是采用急迫的袭击，所以简称“急袭”。还有一种吸打敌援，是敌静我动、敌动我静的混合动作。刘伯承特别提示部属：“袭击驻止之敌是手段，伏击运动之敌才是目的，所以我取名叫‘吸打敌援’，使人一见就知道重心是在打援。”(37)

这四种游击战术，刘伯承认为如果结合交通斗争，在敌人的运输和补给线上经常反复地使用，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应和威力。他把这种手段称之为“扼敌交通”。

运动战战术，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运动战的要诀是运用各种手段多方调动敌人，寻找或创造出敌人的弱点，尔后抓住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他指出，运动战“在战术上通常是，‘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得手后而以破竹之势扩张战果。扩张战果的方向，就是努力继续发展胜利的方向。”(38)为了把敌人放到运动的条件下来打，他发展了游击战吸打敌援的战术，提出了“围城打援、夺城打援”和“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的战法。围城打援，他提出：围城要先以压倒的优势兵力迫临城下，扫除外围据点，作真实攻城之处置，则可促使被围之敌紧急求援，以达打援之目的；打援最好先以伏击式的预期遭遇战形式捕击援敌。在敌人收缩已有半日以上时，则应按阵地攻击之原则进攻之，从敌弱点割裂敌之防御体系，各个消灭。野战阵地防御之敌比坚固筑城防御之敌还是要好打得多。夺城打援，他认为最好利用夜暗隐蔽接近，以突然动作登城，也可先行占领城关，或拔除外围据点，作交通壕接近城墙，实行攻城；打援部队要极端耐心隐蔽，待援敌通过后，再行动作，一切焦急和过早被敌发觉，都会丧失打援的良机。他一再强调：“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39)

阵地进攻战，他指出：就一般战术说来，敌人依托城墙、壕沟、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御等组织火网，成为步兵突击的障碍物。进攻的炮兵主要对这些障碍物实施近距离点射，如敌人缩到狭小地域组成环阵防御时，则应组成交叉火力，支援步兵从四面向心突击。工兵应对步兵预定突破口的障碍物进行连续爆炸。步兵在突击时，应有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结合，编为小型的突击队而梯次配备，以便轮番突击。这些突击队在炮兵、支援火力与爆炸掩护之下，或作连续突击，或作跃进突击。造成了割裂线后，须构筑有射击设备的交通壕。对于某些夺取困难的据点，在不妨碍主要突击进展之时，只取监视行动，以待后续部队夺取，或留待后一步解决，以免迟滞攻击速度。其实这样的据点通常在敌人主力被歼灭后即行投降。阵地防御战，尤其是坚固阵地防御战，他认为要有纵深配置，不是单线长蛇阵，一斩即断，可以互相支援，增加弹性，前沿一旦被突破能以纵深阵地钳敌侧击，以恢复原状；要成错综集团点式，不是一线走廊横贯全线，以便互为犄角之势，火力与突破互相策应，不怕敌人迂回侧击；要使每一集团形成既有周围又有

复廊的环状阵地，不怕合击，即使前沿据点被突破，还有复廊支撑反击敌人；要以地下和地上火力与凹凸的障碍物（包括防坦克陷阱和大量地雷等）相配合，以消除火力死角，乘敌徘徊于防御障碍物前时发扬侧射火力，特别是炮兵火力，实施反冲击，最终转守为攻，打败敌人。

为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的关联性，他在渡江战役前夕曾对刘邓大军协同华东野战军经略中原这一过程做了作战形式运用的划分：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主要是繁殖游击战争，扩展战地面积，而配合以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4月至7月，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不断地歼灭敌人，而以开封、睢杞之捷为甚；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主要是作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从秋季攻势攻克济南、郑州直到完成整个淮海战役的大歼灭战，遂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这是对三种作战形式的转换与运用所作的一个极其精彩的总结。

### （九）运用游击集团，发挥人民战争的固有战力

以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与正规军相结合，发扬武装起来了的人民的群体威力，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所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种结合？在实际斗争中又如何有效地发挥这种结合的力量？这是战争给革命的人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刘伯承的回答是：创立和运用游击集团的基本形式，使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与正规军队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发挥人民战争的固有战力。

关于游击集团的思想，刘伯承萌发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5月，他提出了组织游击集团的设想，他说：“一般说来，最好是以一个百支枪编成的基干游击队，领导三个由三十支枪编成的小游击队活动。各小游击队各在指定地域不停滞地活动，而这一基干游击队则在他们各个活动的便利条件之下，辗转联合某个或某些小游击队，去奔袭敌人，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可以使敌人感觉我们有很多很大的游击队，并且很容易把这一块地方赤化起来。如这种游击队集团有几个时，并应准照上述意旨，组成一个约五百支枪大的基于游击队，领导并配合几个集团活动。”（40）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全民性的游击战争。刘伯承及时地指导129师和晋冀豫根据地组建游击集团。他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干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来说，好象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41）他解释这三个成分的不同组织范围和层次：我们有普遍建立的自卫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一个因素；在自卫队中成立的村游击组，区和县游击干队以及其他游击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二个因素；除诸自卫队诸游击队，又有地方性的军区基干的纵队与支队，特别又有全国的野战军队，这些统称为“基干军队”或“正规军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三个因素。以这三个成分来组织游击集团，他规定：区属各村自卫队是就地配合各村游击组侦察及游击敌人，区游击干队则辗转行动于各村，成为各村游击组的突击队，这些统称为区游击集团。县属各区游击集团就地侦察、游击敌人，县游击队也辗转行动于各区，成为各区游击集团的突击队，这就是县游击集团。以上递次类推，使军分区的基于支队成为所属各县游击集团的突击队，军区基干纵队成为全军区的突击队。他指出组织游击集团的意义在于：这样组成游击集团，可以发展

全面的游击战争。一则使日军组织的汉奸政权难以立足生根，而我们的县长，区、村长都兼任各游击队首长，军政合一，更有利巩固抗日政权。二则各游击干队得着所属游击集团就地的侦察、游击和掩护，更便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突击，以扩大游击战争的威力。他号召“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并使这样的抗战成为世界被压迫者创造的精彩的作品。”（42）

为了使基干军队、游击队、自卫队三部分力量“有机地配合作战”，刘伯承规定了各自的一般任务，又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规定了各自的具体任务及配合方法，自卫队担任的一般抗战勤务是：第一，警卫战地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巩固后方。这一任务主要通过抗日戒严来实现。自卫队在根据地内肃清日军的特务机关，铲除敌探、汉奸，布置秘密侦察网、通信网，清查户口，派出巡查队，在要道口设卡检查行人路条，消灭混入的敌探、汉奸，封锁消息，预告来犯敌人的动向，消灭敌人的便衣队和扰乱敌人大部队，使民众生活安定，抗日政权巩固发展起来。第二，积蓄和发扬抗日力量。自卫队是由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所组成的，是动员城镇乡村 16 岁至 40 岁的男女群众按其住在地区有指挥系统地编组起来的。在自卫队中选出优秀分子组成各村游击组。依这些游击组为基础，来扩大基干游击队的组织。他是一切游击队及一切基干队扩充的源泉，还是动员供给抗战资财的源泉。第三，配合基干军队作战。自卫队在敌人可能来犯前，实行空舍清野，转移老弱群众，破坏通路大道，在要隘处理地雷、安土炮，同时插旗子，造谣言、设疑兵，迷惑、疲惫、分散敌军。在敌人入侵时，使用本身的游击队和配合其他地方游击队，不断地到处伏击、袭击敌人，使敌军无路可走，无饭可吃，无人可见，无物可用，处于四面受敌的环境。如有基干军队在自卫队地域作战，则自卫队用这些动作积极予以配合，在战斗结束时，自卫队帮助基干军队打扫战场，救护伤员，搬运胜利品，解送俘虏等。游击队，在村级来说，是自卫队的骨干，1940 年改称民兵后它更侧重于担任战斗任务，此外担任的一般抗战勤务与自卫队相同。县区基干游击队，担任战斗的分量更多一些，担任一般抗战勤务更少一些。

基干军队或正规军队在游击队和自卫队的掩护下，加强整训。担负起消灭敌人的任务。相对而言，游击队、自卫队是担任消耗敌人的任务的。上述自卫队、游击队一般抗战勤务中的阻敌和伏敌活动，主要是给敌人以精神上的打击，引起敌人“草木皆兵”之感，增加其疲劳厌战心理。这种消耗，正是协助基干军队消灭敌人，消灭与消耗敌人，也不能机械割裂实行。如基干军队或大部队预定是消灭敌人，忽然情况变为不利时，也可以派出适当部队给敌人以消耗。又如游击队、自卫队或小部队预定是消耗敌人，忽然遇有可能消灭少数敌人时，则即抓紧消灭之。

游击集团中基干军队与游击队、自卫队的配合，组织上是通过县、区、村各级指挥部来实现的。县、区、村指挥部是在军分区直接的军事指挥系统之下，组织和指挥所属地方武装、人民武装进行民众性游击战争的机关，同时也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而成立的党、政、军、民联合办事处。县、区、村长和党委书记兼任县、区、村指挥部的指挥和政治主任，既履行各级党组织、抗日政权的职责，又统一指挥各该级的游击集团，切实形成了全面全力的游击战争的一元化领导。

县、区、村指挥部对民众游击战争的指挥，一方面经过同级人民武装委

员会，按系统实施；一方面直接指导所属武装的活动。由于所属武装，特别是区村级武装，散布在宽大的面独立游击，所以指挥是分割的，而且只能用训令的方式，即不是实行不间断的指挥，而是发出只指明首长的目的和一般意图的号令。县、区指挥与主任必须亲率自己的基干队辗转到各区各村作突击的游击，同时指导他们作军事、政治的斗争。县指挥部与基干军队的关系，军分区基于团长与野战军营长以上的干部，率部来县境活动时，县指挥部应主动配合作战，并派出代表随正规军队行动，以便保障配合作战和正规军队生活问题。各处分遣到县的干部，或略等于一连以下的部队和机关，则要接受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其能力强的干部参加县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县、区指挥部同基干军队要有一定的联系制度。还应以必要的兵力和干部，散布注入到县、区游击干队和民兵中去，与民众血肉结合，共同生死，强化游击集团，来配合本身的作战，创造基干军队机动自如的局面。在一般情况下，基干军队也应随时随地指导游击集团，派出小部队领导它们游击，帮助训练和培养干部。

反“扫荡”是抗日游击战争中最频繁的作战样式。刘伯承详尽地规定了游击集团在反“扫荡”中的战斗动作。他按战斗位置和作用把游击集团分成两部，一部是在敌人背后进行游击的，另一部是在根据地对“扫荡”的敌人进行游击的。游击集团在敌人背后活动的，应抓紧敌人交通线，在其基本段上进行破袭，夺取敌人补给线的资材与文件，特别要察明敌人调动情形及其动态，发现其弱点，经常及时地报告正规军。这种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的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的动作，是具有战役意义的。“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游击集团在根据地与敌人作战，自己全面独立的积极动作，实际就是配合野战军队作战。它应该做到：在敌人必经之路，安置地雷，伏击敌人；与友邻地区、友邻部队联防互助，尤应在战斗中自动策应，当发现敌人袭击友邻时，应立即飞报，特别要扭击该敌，甚至吸引该敌往错误方向去，使敌人的突袭落空；经常积极袭击敌人，劫夺粮秣辎重，打击敌人便衣队，捕捉通信兵，使敌人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失去耳目手足，饥寒交迫，惶惶不安；在敌人身边接触游击，了解它的一切动静，从根本上剥夺敌人突然出动的权利；随时侦察敌情，防止敌人佯动欺骗，所得情报立刻报告正规军队；指定民兵或游击队掩护民众及其财产，使军民结合，防止日军组织汉奸暴动与间谍网。

解放战争时期，在实行由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的过程中，刘伯承仍然十分重视游击集团的运用。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之初，他指示所属各军区必须有计划地健全县、区、村指挥部，及其所属自卫队、民兵与适当数目的县区干队，这样才可以使游击面积宽大而有力，也才可以由此增强军分区以上的野战军的兵力，及时集结遂行宽大的机动，求得抓住与突击敌人弱点。否则县区游击集团不健全，反而将军分区以上基干部队平均分配于各县，以行分散游击，指挥不一致，策应不灵，甚至胶着于狭小地区，则无所谓机动，将暴露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严重弱点。他要求各县区指挥部应指导所属游击集团，进行道沟、地道、掩袭洞、隐蔽洞、据险机动作战工事等的构筑，以便于坚持游击，奇袭敌人，以结合、支持群众斗争。特别要开展普遍群众性的爆炸运动，地雷封锁与配合伏击，尤其是炸药爆破去破坏铁路与公路及据点堡垒，以断敌人之后方补给，同时空舍清野，断其就地补给，如此足以限制敌人现代装备的大军辗转作战，足以消磨、摧毁其活

动能力，再加上政治上的瓦解争取，以配合野战军机动作战。1948年2月，他根据大别山斗争的需要，提出强化游击战争，结合运动战，不断调动和分散敌人，歼灭敌人，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大别山阵地。强化游击战争的主要办法是健全各区、各级党政军民一元化游击集团的组成，首先是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组成。号召一切干部，结合群众，运用此组成，实行以歼敌、土改为核心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反特务的对敌斗争。各级游击集团，要规定诸分队的活动范围，使之成为手足耳目，干队则辗转突击，造成党、政、军、民各部门的密切协同。

#### （十）协同动作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协同动作是部队各部分之间，为执行共同的作战任务，按照战斗的目标、时间和地点协调一致地行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通常是指的各军兵种、专业兵和专业部队之间的协调行动。目的在于恰当地使用兵力，发扬兵器、装备的效能，充分发挥作战中的整体威力。它主要属于军队组织指挥的范畴。刘伯承一再指出：协同动作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协同动作是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其重要性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过程中，刘伯承一贯注重协同的作用，身体力行地进行协同的训练和实战运用，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精到的总论。刘伯承认为，协同动作适用于一切形式的作战，包括游击战和正规战在内，不过由于军队数量的大小，兵器、装备的多寡，技术状况的优劣，而有复杂与简单之分罢了。一般说来，游击战这种非正规的形式，组织指挥比较分散便易，协同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运动战、阵地战等正规的作战，组织指挥比较集中困难，协同也就复杂一些。他并没有因为游击战中协同的简单而予以忽视。抗日战争初期，他就提出正规军要与游击队、自卫队密切协同，抓着敌人的弱点，予以坚决的打击和歼灭。就对付日军的围攻来说，基于军队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在敌人分进还没有合击之前，采用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这种条件的达成，需要正规军与游击队、自卫队的密切协同。游击队乘敌人进攻的势头，秘密转到它侧背去袭击它、伏击它、扰乱它，断其交通，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迟缓行动，暴露弱点。自卫队察报敌情，空舍清野，挖毁道路，埋放地雷，阻滞敌人，设疑兵扰乱疲惫敌人，造成敌人被动挨打的态势。他还指出：这种协同主要是靠基于军队对游击队、自卫队的具体指挥，要抓住指挥系统，建立通信联络，指挥他们适合于作战部署的行动，最好是派出小部队领导它们去游击，以造成窥破敌人的弱点的条件，站在主动地位。当条件成熟，决定击破敌人某一路时，正规军则令游击队、自卫队积极活动，虚张声势，以麻痹吸引敌人其他几路。他强调指出：“这种麻痹几路毒打一路的办法，要靠各部队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又要靠各部队依据总的企图，各向当前之敌积极行动，切不可彼此等待误事。”（43）

刘伯承在指挥和总结抗战初期一系列重大的战斗时，都把协同动作列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他曾以1938年3月的神头岭吸敌打援和1939年1月的香城固诱伏战为例，分析、评估协同动作的优劣对战斗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神头岭战斗中进入伏击位置、出击、转移三个方面的动作是协同的，保障了指挥的顺利和战局的推进。凌晨4时30分整个部队完成伏击动作，伪装、隐蔽良好，全线一片静肃。敌人骑兵沿路搜索未发现破绽。保证了伏击战斗的突然性。发起冲击后，各部队一齐飞跑出来，猛扑敌人，远在纵深的部队也

全速赶来投入战斗。敌人正摆着正规的队列，还来不及展开，就一下子被解决了。黄昏，当面之敌被歼殆尽，敌人援兵临近，部队趁暗转移。敌人第二天的飞机大炮，只能打在战场上它自己的死人死马身上。

香城固战斗诱敌部队和伏击部队的协同很成功，刘伯承称赞这是“善于协同动作”，“善于示弱诱敌，造成敌人轻视骄纵的心理；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特别是把附近的房屋适时占领，使敌人无法固守与逃脱”。

这时间，由于八路军及根据地抗日军队的装备很差，兵器种类极少，刘伯承只能主要考虑和布置部队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对兵种之间的协同还无条件作周密部署。即使这样，他已尽可能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1938年3月的响堂铺战斗结束后，他直接提到了步炮协同问题。指出炮兵观察员应随步兵先头部队前进，在战斗中把步兵要求射击的目标用信号报告炮兵阵地，这是一般的协同规则。响堂铺战斗进展很快，炮兵本应在开始向预定目标猛烈射击之后，即前移阵地进行抵近射击。由于129师方面的炮兵刚刚建立，缺乏与步兵协同的知识和经验，未能适时应变，误打了已突入敌阵的自己的步兵，他称这“确成了全胜战斗中的一个缺点”，要求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求得迅速改进。

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属于战术协同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刘伯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战略协同。1942年以后，日军用重兵“扫荡”和蚕食华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豫根据地处于战略要冲，首当其害。刘伯承及时提出“每一区域的本身与友邻区域都要把反蚕食与反‘扫荡’密切协同起来。”(44)他指出：敌人以蚕食推广其占领面，企图隔绝我与友邻区域的配合行动，使我回旋余地缩小；以“扫荡”辗转进攻各区域，企图各个击破，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这样一来，抗战区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根据地每一区域与友邻区域斗争的联系性更加密切。一方面，各区域要把本身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反蚕食到敌人后方繁殖游击战争，扩大反“扫荡”的回旋余地，取得敌人“扫荡”基地的情报，使敌人无法进行远距离的奔袭“扫荡”。又以反“扫荡”来强固反蚕食的支援基地，打击敌人蚕食的主力。另一方面，各区域要与邻近区域相辅相助，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密切协同，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一边是在蚕食和集结“扫荡”中被我消耗，一边是在分散配置中被我消灭，而我却获得了空间与时间的自由。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壮大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战争越来越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出现，协同动作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摆到了各级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面前，全面内战爆发的当年，1946年12月，刘伯承校译了《合同战术》第二部，并写了译版再序。指出：“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防御”和“使用”的办法，并不是纯粹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包括了战术方面的问题，其中突出的又是协同动作的实行。1948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夕，他又重校《合同战术》，付之再版发给营级以上干部自修，再次强调“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指出“我们夺自敌手的装备日益强化，善于有效在使用之并善于组织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已成为上级干部当前的严重任务”。

与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相比，解放战争发展到了以运动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军队的组织指挥变得复杂起来，协同动作也跟着有了新的内容。首先是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刘伯承着重提出了主攻与助攻的协同。他指出：主攻、助攻各部队，各应有突出重点，总合则有二、三个突击点，上级指挥员应使之协调。攻击时几个突击箭头突入敌阵，能互相策应，将敌阵戳穿、撕破、切碎。钳制方向的动作要积极主动，用真面目的攻击来迷惑敌人，使主攻容易奏效。绝不能以为自己不是主攻方面而消极从事。如钳制方向识破战机，突击胜利，应立即向此胜利方向发展，变为主攻方向。其次是各兵种的协同。他指出，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必须熟悉它们的性能，分配以明确的任务，定出合同行动的计划，强化其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以使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地通报战斗进程与敌情变化。炮兵、工兵与步兵的突击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某一战斗任务。炮兵必须根据其本能作有组织的、有重点的、有观察的、有电话通信的、适合任务的射击，才能发挥火力的权威，掩护步兵突击成功。工兵进行坑道作业及连续爆破，创造步兵攻击的条件和扫清攻击的障碍。比如攻城，敌人依托城墙、壕沟、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御等组织抵抗，炮兵火力主要对这些障碍物实施近距离的点射，掩护、支援步兵突击。当敌人缩到狭小地域组成环阵防御时，炮兵应组成交叉火力，支援步兵从四面向心突击。工兵应在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下，对步兵预定突破口的某一障碍物进行连续爆炸。步兵则乘势发起突击，编成由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结合的小型突击队梯次前进，或作连续突击，或作跃进突击，直透敌人纵深，割袭敌人防御体系，逐个击破。

要实现这样准确、有效的协同，刘伯承认为通信联络的作用极为重要。他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战斗指挥，谈不上协同动作，对此每个指挥员必须有警党的认识。

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走上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轨道，军队的协同指挥更加变得重要。刘伯承在创办军事学院和组织领导教学的过程中，把协同问题放到了突出的地位上。1950年11月，他提出的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赫然写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协同动作是一门主要的课题。他一再提出，各技术兵种与步兵协同动作密切一致以战胜敌人，是最重要的学术。我们所称的机械化，就是自行火炮加上摩托化步兵再加上坦克，它是最新的快速军队，能够独立解决战斗。于此可见步、炮、装甲兵协同之重要。再加上各种飞行部队协同地面军队（或海军）作战，这就组成了现代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合同战斗。现代化的诸兵种已在具有良好传统步兵的基础上装备起来了，这是对现代化敌人作战的好条件。有此好条件，就要步兵与其他兵种协同动作。协同动作作得好，就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从而也就是保障了胜利。如协同不好，则会自己打自己的飞机，自己打自己的坦克。

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刘伯承指导学员把协同动作的原则与朝鲜战争、实兵演习结合起来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通过入朝作战的学员的来信，总结了协同动作在新的条件下的地位与作用。他肯定了志愿军一些指挥员协同意识的进步，感觉炮兵配属太少，在步炮协同及炮火运用上，组织协调严密，发挥了整体歼敌的威力。他认为朝鲜战争提出了前方与后方大规模协同的新问题。因此必须切实解决好兵器物资送得上、用得上的矛盾，这就要了解、掌握飞行队与防空兵器如何使用，以打破敌人的制空权，如何组织

前送、后运，如何构筑道路，如何设置仓库等等。为此军事学院必须加强后勤的教学。还需要学会现代技术与战术，学会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这也是军事学院十分紧迫的任务。

为了加速提高学员的协同指挥能力，他又亲自组织了临淮关步兵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演习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在总结中专门讲到了协同问题。他说，这次演习有步兵、炮兵，有坦克、水陆两用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渡河器材、通信工具等。我们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诸兵种在一个共同国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它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这次演习是在渡过河川障碍中协同动作遂行进攻任务，比一般的协同指挥难度更大。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样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特别重要。

在他的指导下，军事学院的教学坚持不懈地贯彻了协同的内容，有力地提高了学员乃至部队指挥员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大大促进了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素质的提高。

### 三 军事教育思想

刘伯承在创办和领导军事院校工作中，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第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特别是 50 年代较长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主持制定教学方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定教学内容，开展学术研究，提出教学原则，摸索和完善教学方法，培养教员队伍，编写教材并形成体系，树立校风，始终接触和参加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和创造出全面、系统的军事教育理论。

#### （一）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培养目标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治校的根本问题。早在 1932 年初刘伯承到中央苏区主掌红军学校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军必有校的道理，蒋介石就靠‘黄埔’起家。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1950 年 11 月，他在《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这个方针，其实也就是规定的培养目标。这里所说的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前者是指的军队总体的军政素质，胜利之师那种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无比高昂的战斗情绪，坚决保卫、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热忱和愿望，构成了压倒一切困难的大无畏气概，满怀信心地迈向新的征途；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作战经验。具有进一步掌握新技术、新学术的条件。后者指的是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武装。这是人民解放军攀登新

的高峰的坚实基础。但面对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由“小米加步枪”向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转变的新形势、新任务，军队必须加速训练，从政治、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去驾驭打败美国侵略军的新的战争。办校搞训练，着眼于提高和发展，立足于运用，这就是刘伯承在训练方针中体现出来的培养目标。

在军事学校首次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再次提到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与任务，除重申了上述的内容外，还加上了“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忠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的指挥人员。也就是要求受训学员必须成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人民政权的指挥员。他认为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中流砥柱，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他们的培养、训练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他指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掌握指挥。培养、训练高级干部太重要了。”(45)并诚恳地向中央军委提出：“现代国防准备以培养将领为最费时，请注意。”为此，他要求把学员培养成有坚强的党性观念，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政治修养，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符合党和人民事业需要的领导人才。他一再强调，这是军事学院必须始终坚持的训练方向，不可稍有松懈和偏离。不过，这只是政治方面的目标，还有业务方面的目标。完整的提法是：“培养有德有才的，有文化知识、政治修养、军事学术的，有思考能力，组织能力适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

军事学院是同时训练军事、政治干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刘伯承从实际出发，分别规定了两种各有侧重的培养目标。对军事干部，是以培养现代诸兵种合成的军队的德才兼备的指挥军官为目的的。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其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和高等军事知识，并善于运用于实际，能胜任部队、兵团的指挥员职务或相关的司令部工作。对政治工作干部，是训练和培养团、师以上的现代国防军的政治干部，以建设现代化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求通过系统的理论训练，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以及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还要学习一定的军事学术。军事学院按照这样的训练目标，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精通本职业务的优秀指挥员、政治工作干部，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促进了国防事业和军队的蓬勃发展。

## （二）建设正规制度

制度是院校训练工作的规范和依据。刘伯承从一开始就狠抓军事学院各项制度的建立，并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完善。军事学院是与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步前进的。因此，刘伯承提出的口号是：“建立正规制度”。他进一步解释说，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有了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学制。学制是院校教育工作的基本制度，规定着院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及修业期限等。1950年底军事学院准备正式开课时，国家新的教育制

度尚未颁布，军队系统也没有现成的规章可以遵循。刘伯承根据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目标，根据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困难的状况，继承各战略区军政大学的优良传统，适当参考苏联军事教育的经验，提出了新的学制。军事学院的性质、任务，在训练方针中已得到明确体现。入学条件和修业期限，刘伯承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军事学院初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六个科或班。对象：陆军本科选调团、营级及部分优秀连级干部，或申请愿入本科的军、师级干部。陆军速成科选调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情报参谋训练班选调相应的业务干部。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编译局负责选调，要有相当于大学的文化程度，有相当的俄文基础，经短期训练后，能充任教材翻译和俄文教员。学习期限：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考虑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抗美援朝需要加速培养干部，另设陆军函授科，训练在职的有自学能力的团职以上干部。海军、空军两个速成科，因当时两大军种成立不久，学员还难以抽调，推迟到1952年才设海军系、空军系招生开课，学习四年。以后，随着各项条件的改善和训练经验的积累，这些班、科逐步升改为系，并陆续增添了系的数量。至1956年8月，军事学院已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学习期限也适当延长，基本系一般四年，速成系为二年，函授力四年。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最高军事学府。并为后来分别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

训练制度。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作了科学、合理的安排。他主持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严格规定了训练部门及其人员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教员在编写讲义、想定、组织课堂教学、课题讨论和作业讲评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规定了学员在课堂、現地作业和野外演习中应该遵守的各项要求和纪律。学员的学习时间，参照苏联军事院校的做法，规定每天上课6小时，即连续上六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另外，还要进行3小时自学。共为9小时。关于考试问题，规定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进行考试，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由军委、总部领导人为主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主持。

行政工作、生活制度。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内务、纪律，队列等条令，他主持制定了《暂行行政规章制度》、《十项暂行规则》和《内务值班制度》等。强调“执事者各执其事”，明确规定各级领导机关及其人员的职责，要求充分发挥机关的职能，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他提倡“集中统一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做到机构精简，职责分明，业务精通。他强调军事学院的教职学员一定要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提出的队列生活原则是：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服装整齐清洁，军人仪表良好。

体制、编制。他主张横宽纵短，一竿到底，减少层次，专事专办，分工合作，上下联系，指挥灵便，讲究效率。领导机关直接面对基层，不经中间层次，减少了机关人员，提高了办事效率。经过不断调整，军事学院学员与工作人员的人数比例基本达到了中央军委关于精兵简政和整编军队的要求。

### （三）学习新兵种学术

这是刘伯承规定的教学内容。他指出：“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术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协同动作。”（46）具体的课程设置，根据军事、政治两大系统及各系训练对象的不同，分别做了有同有异、各有侧重的安排。他还针对当时各级干部文化程度都较低，相当人员达不到招生要求，为了给工农干部提供深造的机会，又不致因文化低而影响学习效果，专为各系设立了半年至一年的预科，用于提高文化。他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接受学术的工具”。“现代战争由国内型发展到国际型，要有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才能学好现代的军事科学——喷气武器、原子武器、氢弹。”并比喻为“没脚蟹不好走”，号召大家把文化这只“脚”接起来。这一措施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

根据培养目标“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要求，刘伯承十分重视学员的德行教育，并具体规定了军人的德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朴实顽强，细心大胆，忠诚遵行任务，个体服从整体，亲密团结，遵守纪律，钻研客观的具体条件，发挥主观的自觉能动性，揭开困难，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机断行事，强化组织工作，贯彻定下决心，熟练指导技能，争取斗争胜利。”（47）他要求以此作为学员评定德行的标准。他指出：这是根据人民军队历来对干部进行鉴定和地方学校给学生评定操行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它原是党领导的通过群众路线的一场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非斗争，即在群众中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德行评议。德行主要是根据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衡量学员对党的号召、指示、方针、政策的认识，衡量学员自我批评和批评精神的程度，是思想品德的大标准，绝不渗入个人生活琐事。对学员德行的培养，一方面要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另一方面要在军事课中首先是战役战术的训练中相应地注重培养军人在战斗中的德行，把德行教育与课业训练密切结合起来，做到同时并举，双重提高。

### （四）经纬交织，螺旋上升的教学方法

刘伯承把教学看成是教员“教”和学员“学”的双边活动过程，提出院校训练包括施训和受训两个方面。他一贯致力于教授法和学习法的总结和研究，用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归纳的教学方式有四步：一是教员讲课、学员听课；二是课题讨论；三是室内作业和现地作业；四是学员自习与教员辅导。教员讲课，规定课前要作充分准备，熟读讲义，写出讲授提纲，制好图表，准备教案，经过试教，最后才上讲台。要求讲解时先要明确目的，提出问题，分段讲解，分段小结，连贯而有条理，系统而有重点，既抽象概括，又生动具体，便于学员听、记和理解、接受。学员上课时只拿讲授纲目，不带讲义，主要集中精力听，作重点笔记，到自习时再看讲义，检查听的效果，不懂的再重点补上。课题讨论是通过学员个别准备与集体讨论，来达到督促复习、检查学习效果的目的。某一课题讲完后，教员对学员进行必要的辅导，让学员每人写出发言提纲，既使学员获得复习消化的机会，又锻炼了分析问题，归纳问题以及写作的能力。讨论时采取指定发言与自由发言相结合，既能有目的地检查发言者的了解程度，又能使讨论热烈开展。教员一般不作全面总结，着重讲评学员对课业理解的对错，并作必要的补漏。作业，包括进行室内图上作业和野外现地作业两类。基本方式采用集团作业与军事导演两种。所有学员同时充当同一职务，根据教员所列的想定情况来遂行一系列的

训练任务。作业让学员单独完成，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教员在作业前要认真辅导，作业后进行小结，使学员明白作业的对错。自习与辅导，自习又分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预习是为下面的课业作准备，复习是反刍消化，巩固知识、技能。自习时间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一般在作业前有复习，讲课前只进行预习。预习和复习均有教员作辅导。

与室内图上作业与野外现地作业相配套，刘伯承主持建立了各类课业的专修室和野外作业基地，并适时组织不同规模的实兵演习。专修室基本上分技术、战术两类。技术专修室设置兵器装备实物、模型、图片等，让学员在学习军兵种知识时使用，增加感性认识。战术专修室配置有沙盘、图表等，有的还有电动装置，供学员进行室内图上作业，尤其是演示诸兵种的协同动作。野外的实习和演习根据课业进度组织。

在教和学双边活动的过程中，刘伯承倡导“确实地交付和接收”的方法。教的一方根据训练计划、课业内容与教授法，编写讲义与想定，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教的东西与学员的接收能力作一个打算，使学术内容切合学员在今后的战场的需要，“唱戏的人要注意听戏的人”，交付出去的东西要有针对性、可接受性。学的一方要循序渐进，预习、听课、讨论、听辅导、复习、作业，一个一个环节接收好。他还想出了检验这一付一收效果的办法，取其名为“结疙瘩”和“打收条”，即是通过辅导时的问答与测验考试，有阶段性地检验学员，问和考是“结疙瘩”，口头或书面回答是“打收条”。这样，教和学得到辩证的统一，发挥出应有的良好效果。

整个教学方法综合起来，刘伯承概括为“反对单打一，学会弹钢琴”，“以战术为经，以技术为纬，经纬交织，螺旋上升”。即先理论概则，再各兵种应用技术战术，尔后编写想定进行图上作业，最后由课堂到野外现地作业，以至实施实兵示范演习的一整套科学的方法。(48)

#### (五) 学术研究要“博而约”

刘伯承把军事学术作为军事科学的要素之一。他认为教学水平要提高，必须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甚至学术研究要先行一步。他提倡“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要博而约”(49)，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学说；要“有的放矢”，矢之于抵抗和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研究学术要确立正确的政治目标，坚持无产阶级军事学术的党性原则，坚定地为人民工农兵服务。他列举国民党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杨杰的事例。他们尽管在军事理论研究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对社会历史的前进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他要求军事学院的学术研究，首先要确定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于人民解放事业。他指出研究学术应有两条准则：一条是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条是在学术上必须尽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尽量发扬民主，展开讨论。学术问题应当百家争鸣。他还强调研究学术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学术理论心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因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上开篇之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正是说的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为此，他具体规定了研究军事学术的工作方向：一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先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二是以毛泽东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

作出经验总结；三是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经验以及美军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为了保证军事学术研究切实开展起来，并能指导教学，他在军事学院设立了学术研究室，后又扩展为军事科学研究部，负责计划并组织军事学院的军事科学研究及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其职责是领导研究和审核全院的训练计划、学制的执行、训练实施、考试成绩及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他还倡导成立了群众性的军事学术研究协会，吸收在学和毕业的学员参加，组织编写总结经验体会性质的学术论文，有选择地登载到院刊“军学”杂志上，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举行专题研究和学术报告会，也是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举行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只有大会报告不作讨论，即行总结；二是大会报告，大会讨论，最后大会总结；三是大会报告、讨论、总结和分组座谈研究相结合。从1952年至1955年，军事学院结合教学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专题研究和学术报告会，经过专题研究和学术报告，解决了教学中的难点，统一了学术思想，促进了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 （六）建设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和科学、适用的教材体系

刘伯承指出：教员的培养是办好院校的中心问题，正如开医院要有高明的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剧团要有名演员一样，办院校最要紧的要有好教员。他时时注意选调各方面的人才到军事学院任教。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培养当教员，或从毕业学员中选留，逐步把他们锻炼成为教学第一线的骨干力量。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或临时邀请这些院校的学者、教师来院讲课。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选拔政治表现好，有较高军事学术素养与专业知识的留用任教。

刘伯承重视选调使用教员，更重视培养、关心、爱护教员，充分调动教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他提出必须抓紧师资训练，而训练又必须从政治思想和业务两方面同时并进，他的口号是：“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政治思想训练主要是通过经常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通过实际参加抗美援朝、土改、镇反、整党、三反等政治运动，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做到原则立场坚定，政策界限分明，政治上不迷失方向。业务训练主要是提高学术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育学的理论。业务训练的方法主要采用了五种：利用教学间隙，组织专门训练班；通过教材、教案的编写与经验总结，组织教学组专门研究讨论；举行经常性的教学准备会、试教、范教和课堂互相观摩；在教学过程中，及时组织专门问题的研究讨论；各级领导及时深入检查教学效果，提出问题，作出专门总结，组织研究。为了迅速提高教员的文化外语水平，还采取离职住学、参加军官业余夜校、在职自修等措施，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培养、尊重的同时，对教，研人员的工作、生活也作了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刘伯承曾直接上书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专门提出解决院校教学人员的待遇和建立奖励制度。指出：凡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等一切待遇（其中包括编制军衔、职务薪金和晋级等）应完全与部队（除作战者外）一致，以适应军委关于“以训练工作为中心，

以训练干部为中心之中心”的要求，“在院校中应奖励那些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工作成绩良好者，以推广先进经验，提高科学文化水准”……使院校教员、学员和在职干部定下心来，努力学习，努力教授，努力工作，也就解决了若干年来不愿做学校工作的基本问题。”(50)此后他还下达了《关于发给教员补助费的指示》。

刘伯承认为，办好院校的关键，除了有坚强的领导外，一在教员，二在教材。教材是教员水准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在治校中一贯狠抓教材的编写与翻译工作，形象地称教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为了适应立即招生开课的需要，当时从苏联引进了一些现成的条令和教材，所以翻译工作被摆到了较高的位置。他亲自制定军事术语，校正条例条令，组织教员认真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指导翻译工作吸收与借鉴苏军等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出适合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类教材上千种。他为教材编写规定了五个原则：从学员实际情况出发；密切联系军事实际：既照顾速成的要求，又照顾到科学的系统；强调教材学术内容的准确性，思想性和原则性；强调教材文字表达要清通。军事学院教材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军事方面：从团到集团军，再到方西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总共有三百五十余种。形成了分类确当、层次适宜、配套成龙的科学的教材体系，为搞好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七）鲜明、实效的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是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根据教育目的和教学规律得出的科学的结论，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刘伯承总结和提出的教育原则主要的有三项：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刘伯承一贯认为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因而它的作风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51)他常用列宁的两句话：“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为指导，不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来告诫大家，要勉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聪明贤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要成为教条主义式的空头理论家和经验主义式的盲目的实践家。他辩证地说明了理论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结合实际的理由：实际有过去的实际，有现在的实际，有将来的实际。实际是运动的，并须经常以理论为指导。我们不能只看以前的实际，而不把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伟大的尤其有理论指导的实际看成是现在的实际，而成为落伍的、保守的人物。相反，我们在学习中要善于把以前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军事科学的理论，并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他举实例来说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危害：“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臆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52)他还提出了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具体办法：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必须使有工作经验的与有书本知识的结合补课，各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发展，首先就要使文化与武备结合才便于理论与实际结合；必须使院校与部队密切结合，我们为战争所需要的东西而训练干部，

又为军队所需要的干部而训练学员，那只有打通院校课业与部队实践相联结的道路，才能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尽可能与实际战争相联系，如组织训练干部到朝鲜前线参观见习以汲取现代化战争经验，请志愿军回国代表来院作报告，在训练工作上对理论结合实际有很大作用。

(2)“练多于训”的原则。军队指挥院校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员对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能力除了靠通过“训”教给一定的理论概则外，主要靠“练”来提高。刘伯承在训练中大力倡导“练多于训”的原则。强调要使教员明白，不仅要把学员教懂、教通，而且更重要的要能用，因而必须加强学员的思考训练、作业训练。同时要使学员明白，教员讲得最好，你听得最有趣，只是教员的东西，要把教员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只有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勤学苦练，反复练习，求得融会贯通。指出：这主要是用想定作业的方法。想定作业就是想定各不相同的任务，在各不相同的敌人、我军、居民、地点、时间去遂行这一任务，以使学员将所学的理论如何灵活恰当而具体地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想定作业的准备、实施以至作业讲评，就可以把演出的实例，检验理论的运用是否恰当。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要结合各门课程的基本教学方法进行，如语文的“多写”、数学的“练习”、理论的“实验”、地理的“用图”等。要体现到每节课预习、听课、复习、讨论、作业等五个教学环节中，特别是复习和作业两个环节中。要反映到讲究技能的课业中，如基本系的战术课，大致上课时间占五分之一，作业时间占五分之四。贯彻这个原则，还必须有组织保证，严格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各科不得互争自习时间，每门课程不得随意调整各教学环节的时间，教员不得多布置作业、多安排测验等。要上下一致，相互配合，求得“练多于训”原则的真正贯彻落实。

(3)“教学相长”的原则。刘伯承认为，所谓“教学相长”，就是教授力与学力两方互为因果和互相增长的意思。古人说过：“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其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53)我们的教员中缺乏门门都通的专门人才，所以更要提倡集体工作，大家实行互助合作，提高学术水平，然后去教好学员。教员与译员之间要互相学习，学员与学员之间要互相学习，教员、译员与学员之间也要互相学习，这样相互为助才能弥补各自的不足，发挥集体的力量，提高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军事学院组织学员根据自身的战争经历编写了两册战例，就是“教学相长”原则的具体体现。学员以战斗经验供给教员，使教员所教理论不脱离实际，同时教员根据军事科学思想帮助学员整理战斗经验，又使学员经验上升为理论。

以上所列三方面的内容，只是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粗略的介绍，刘伯承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决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包容的。希望熟悉、了解刘伯承的老首长、老同志以及有志于研究刘伯承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共同把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来。

#### 注释

(1)(40)(41)《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47、77页。

(2)转引自张际春1948年5月31日在中原野战军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 (3)(23)(36)(37)(42)(43)《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104、173—174、135、175、127、129 页。
- (4)《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289 页。
- (5)刘伯承 1947 年 9 月 24 日关于提高信心加强斗志的损告。
- (6)刘伯承 1948 年 4 月 17 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三、六纵队干部会上的讲话。
- (7)(11)(20)(27)(32)《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219、213—214、215、216、217 页。
- (8)转引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 年 8 月 25 日《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亲自整顿直属队群众纪律》一文。
- (9)《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372 页。
- (10)(29)(30)刘伯承：《党军建设问题》，1940 年 4 月 21 日。
- (12)(19)(33)(34)《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272、276 页。
- (13)(14)(15)(18)《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447、508、586、509 页。
- (16)(22)(31)《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558、561、559—560 页。
- (17)《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537~538 页。
- (21)《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出版第 27 页。
- (24)(25)(26)(28)《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461、445、473、547 页。
- (35)1965 年 1 月 5 日与皮定均的谈话。
- (38)(39)《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404、482 页。
- (44)《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340 页。
- (45)刘伯承 1954 年 1 月 15 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 (46)刘伯承 1951 年 1 月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 (47)刘伯承 1951 年 3 月 22 日在军事学院党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 (48)刘伯承关于 1952 年 7、8 两月工作向毛泽东主席的综合报告。
- (49)(50)(51)《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618、675、644 页。
- (52)转引自张震、李德生：《我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解放军报》1986 年 10 月 12 日专版副刊。
- (53)见《礼记·学记》

**作者** 薛洪兴 46 岁，国防大学科研部第一编研室副师职研究员，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已发表《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概述》和人物传记《刘伯承》等著作 30 余万字。

## 贺龙的军事思想浅析

顾永忠

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和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贺龙在长达 50 多年的军事实践中，非常重视总结建军治军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撰写了不少军事论著，其中一部分已收集在《贺龙军事文选》一书中。贺龙的军事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建设人民军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 贺龙的军事实践

贺龙的军事实践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几起几落，历尽坎坷，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位著名的军事统帅；从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不平凡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贺龙于 1896 年 3 月 22 日出生在湖南桑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14 年，在他 18 岁的时候，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复辟称帝，全国民众愤起讨袁，贺龙积极响应，于 1916 年 1 月，领导了一一湘西万人暴动；3 月中旬，举行著名的“两把菜刀起义”，在桑植县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从此，他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武装斗争。贺龙这支队伍先后被编入护国军和靖国军，参加了护国战争与护法战争。袁世凯死后，国内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贺龙说：“军阀混战，老百姓遭殃。”<sup>(1)</sup>他坚决反对。1922 年，贺龙率部入川，编入四川讨贼军（后改名为建国川军），被孙中山任命为旅长。在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指挥下与四川军阀杨森作战。1924 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准备北伐，贺龙奉命率部由川返湘。1925 年 3 月，贺龙被广州大元帅府任命为建国川军第 1 师中将师长（后又兼任澧州镇守使）。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从 1926 年 5 月起开始北伐。贺龙认为：“北伐战争是打土豪劣绅，打军阀，打外国强盗，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伐的战争。”<sup>(2)</sup>他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贺龙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8 军第 6 师和第 9 军第 1 师师长，他率部从湖南常德北上，在友军配合下，首先在长江一线与吴佩孚的北洋军作战，肃清了江南之敌；而后渡过长江、收复宜昌。是役取得了重大战果。贺龙因“两次攻击鄂西颇著成绩”，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15 师师长，并于 1927 年 1 月，率部进入武汉。5 月，他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从武汉北上，直捣开封，再次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独立 15 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贺龙任军长。

在北伐战争中，贺龙结识了共产党人周逸群，并听了他所讲的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后，觉得符合他为穷人谋利益的一贯思想。说“共产党的主张

好，有办法，能救中国。”(3)并向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还让周逸群当他的政治部主任，帮他开办政治讲习所，把他的部队改造好。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处境极端艰险的情况下，贺龙不仅让他的部队吸收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且不顾蒋、汪的威胁利诱，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坚决站到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一边，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了起义军总指挥。不久，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主动向党要求回湖南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2月底，他与周逸群等十余人由上海回到桑植，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工农革命军。贺龙指挥这支新生幼小的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几起几落，由小到大，创建了红2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

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3军(即红2军团)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后，他们指挥2、6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吸引并歼灭了大量敌人，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敌人转而集中兵力，加紧了对红2、6军团的“围剿”。11月中旬，贺龙和任弼时等率领红2、6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开始长征。他们采用声东击西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打破了敌130多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于1936年7月到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师。随后，按中央军委命令，将2、6军团编成第2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并迫使张国焘一起北上。贺龙指挥红2方面军参加了甘南战役、山城堡战斗。10月中旬，贺龙率2军团在甘肃的将台堡与红1方面军会师，至此，红2方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红2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编为八路军120师，贺龙任师长。他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抗战期间，贺龙历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司令员、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总指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在政治上，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进行建党建政和一一建军；军事上，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挥120师主力，转战陕、甘、宁、晋、绥、冀、察等省，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帮助巩固了冀中根据地；开辟和发展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它起到了屏障大西北，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沟通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等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期间，贺龙任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司令员，直接指挥晋绥野战军，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他积极协助彭德怀加强西北野战军(后改为第1野战军)的建设，并参与了对西北战场重大战役的决策；他奔走于黄河两岸，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后方工作，加强经济建设，维持后方治安，发展后备兵团，筹措粮秣弹药，补充武器装备，动员民夫民工，全力以赴地组织陕甘宁晋绥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战场，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和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华北野战军的第18兵团和第1野战军的一部，由甘、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军队，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随后，他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改造90万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指挥部队进行剿匪斗争，在一年多时间内，剿匪85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指挥部队解放西康，进军西藏，加强西南地区的边防建设，保卫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1954年9月起，贺龙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他经常深入到部队、工厂、农村作调查研究。在军事工作上，他提出了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建设；搞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搞好民兵建设；坚持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为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 二 贺龙的军事思想

贺龙是一位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军事家。他在军事实践中，对于建军治军问题，逐步形成了他自己比较系统的见解。由于贺龙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时期，所以，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穷人要翻身，必须抓枪杆子

贺龙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中国的老百姓，面临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贺龙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很早就认识到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但他这个认识，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发展过程。

为了穷人拉队伍，劫富济贫。这是贺龙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他认为，广大穷苦百姓要过上好日子，只有起来造反，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赶走帝国主义，否则就没有穷人的活路。要造反，就一定要抓枪杆子，拉自己的队伍。还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向伙伴们提出：“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sup>(4)</sup>后来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于18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6年初和3月，他组织湘西万人暴动和“两把菜刀起义”，拉起了一支讨袁民军。他专门反对帝国主义，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地主，保护穷人。他说：“以前我是一把菜刀起家的。是为穷人打不平，我专于劫富济贫的事，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sup>(5)</sup>所以，他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他根据老百姓要求，杀了桑植县的大恶霸朱海珊。他任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兼澧州镇守使时，充分利用他掌握的军政大权，废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污吏，打击不法奸商，限制物价，修筑道路，开办学校，恢复“九澧贫民工厂”，解决失业问题等，为百姓办了大量好事。上海“五一卅”惨案发生后，他亲自致电声援上海和长沙的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捐款三千大洋资助受伤工人。他直接支持津市澧州商民，抵制日货、日商的义举，严词驳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关于澧州驻军违反“通商条约”，不“保护外侨”的指责。驳回了赵恒惕要求迅速查处的“训令”。由于贺龙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穷人办事，所以他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部队也从“两把菜刀起义”时的二十几个人，

发展到北伐战争时的一个军，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的重要力量。贺龙作为著名的左派将领而闻名于世。所以，大小军阀怀着不同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贺龙和他的部队。湖南军阀赵恒惕攻击他“无法无天”，曾派大军围攻，企图消灭他；汪精卫既想利用他，又想伺机除掉他；蒋介石企图以高官厚禄利诱他。贺龙不怕威胁，不受利诱，注意斗争策略，善于利用矛盾，巧妙机智地与他们周旋，躲过了赵恒惕、汪精卫和蒋介石等对他的明枪暗箭，为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准备了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建立人民的武装，为穷人打天下。这是贺龙加入共产党后，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对抓枪杆子，建立人民武装之目的和重要意义，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飞跃。1927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不久，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派周逸群率宣传队到贺龙部队，开展宣传工作。贺龙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员，就主动接近他；周也知道贺龙是革命军中的左派将领，也积极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贺龙听后，觉得还是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好”，他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6)真正认识到过去的劫富济贫不等于革命，要想大家富裕，“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7)从此，贺龙认定只有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办，才能真正实现穷苦百姓的彻底解放，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坚决跟共产党走，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使贺龙进一步认清了蒋、汪等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毅然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无条件地把他的20军交给共产党指挥，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8)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贺龙主动向党请命，回湘西拉队伍。他说“还是枪杆子重要”，有了枪杆子，“少数可以变成多数”。(9)为此，他与周逸群等十多个人回到湘西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一往无前的气概，克服了各种艰难和挫折，终于创建了红2军团。后来与红6军团会合，发展成为红2方面军，成了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被编为八路军120师，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第一野战军，为中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 (二) 革命军队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兵平等的新型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后，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从此，他对建立革命武装的性质、宗旨有了新的认识。

### (1) 强调革命军队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党的“党军”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10)贺龙十分厌恶军阀拥兵自重，鱼肉百姓，“把军队当作为剥削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军阀们升官发财的资本。”(11)他为了保护百姓，为穷人做点好事，自己必须要牢牢地握有军权。南昌起义后，他认识到革命军队与一切旧军队有本质区别，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自己的队伍。因此，他不争个人的兵权，只争党的兵权。他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属于哪个人，归个人私有的，而是属于党的，是党的军队。”“我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时，我带的军队是我的，

今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也是党的，党要我怎样作我就怎样作。军队也是属于党的。”(12)因此，他教育部队“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13)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1942年整军时，他严厉的批评了部队某些领导干部存在“军权高于一切”，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指出：“党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是领导一切的，要领导政权、军队和民众团体。军队不能闹独立性”。

“我当师长带120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有没有党性呢？没有；是不是一个好的干部呢？也不是。”(14)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把他指挥的晋绥部队编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而他负责后方工作，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西北战场。充分表现了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崇高品质。贺龙强调：

(1)革命的军队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夏曦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在抗日战争刚开始，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毛泽东提出留下一部分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林彪不同意留，贺龙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把120师的部分部队留下，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贺龙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

(2)必须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和党委的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倾向。

1933年1月，夏曦等提出要撤销红3军的政治机关，解散党团组织。贺龙坚决反对。他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没有各级党组织行吗？‘支部建在连上’，实践证明是成功的。”(15)要解散党组织，取消政治机关，他坚决不同意。由于他同关向应等同志坚持斗争，终于在1934年6月，在红3军中重新建立了党团组织。建国后，尤其是他任军委副主席时，非常关心加强部队党委和支部的建设。下部队视察时，每到一单位，总是首先了解党委的状况，支部的领导作用。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拚死活的。所以军队工作就要过得硬”。“要想使军队工作能够过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所以在考察一个部队的工作时，也应首先要看一看他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如何？支部工作如何？……因为这是我们部队领导的核心”。(16)“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任何的困难都不怕，都可以克服。”(17)

(3)必须摆正党委和首长的关系。他说：“党委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团结的核心；首长是在党委领导之下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会民主讨论后，交由各个首长分工负责”。“首长不能代替党委的工作，更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个人轻易不执行甚至改变党委的决定。”(17)他身体力行，从不个人说了算。他非常尊重党委的决定，尊重部队的政治委员，他对任弼时、关向应、邓小平等都很尊重，关系十分融洽。他积极支持政委的

工作，号召军事指挥员和大家都作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他自己以身作则，走到哪里，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

### （2）强调革命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军队

贺龙十分注意加强对军队指战员的政治教育，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是为人民的军队。我们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群众要处处爱护。”（18）“紧密地联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决不脱离群众，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19）“失去了民心，部队就站不住脚。”旧军队“把人民当成奴隶，把政府看作是办差机关，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都是如此。”“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军队。老百姓是我们的‘老板’，向我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运输补给，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则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也是我们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20）所以“要教育军队真正的爱护老百姓，军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不能责备老百姓落后，而应该积极的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老百姓。哪个地方军民关系不好，哪个地方的军队要负主要责任，不能只怪老百姓。”（22）

### （3）强调在人民军队内部建立官兵平等的新型关系

贺龙经常教育干部，在人民军队内部，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干部必须关心爱护士兵。指出：要用兵，就要爱兵，不爱兵，怎么打仗呢？尤其在战场上，要十分爱护士兵的生命。因为“战士是革命的本钱，在战斗中应该尽量减少战士不必要的伤亡。”（23）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贺龙时刻把战士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要深入部队，查看战士们吃住情况，看望伤病员；在行军途中，他的骡子经常成了伤病员的坐骑，他的大衣也成了伤病员御寒的衣服。他说“关心下级，关心战士，关心人民利益是群众观点问题，也是阶级观点和党性问题。”（24）他严肃批评并及时纠正极少数干部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压制批评，打骂体罚战士，甚至枪毙逃兵等恶劣的军阀主义作风。强调要认真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西北的条件非常艰苦，他亲自交代后勤部门，要千方百计保证部队吃饱穿暖。指出：“要照顾大多数战士的生活，因为受苦的是他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是他们。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解决这个问题。”（25）建国后，贺龙同志每次下部队视察，总要深入连队，到战士的伙房和宿舍，向战士们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学习、训练和生活情况。同时，贺龙指出，搞好官兵关系，不仅干部要爱护士兵，而且士兵也要尊重干部，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绝对平均主义，以及自由散漫的游击习气。提倡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贺龙认为，实现官兵平等，关键在军官。所以，他特别强调要选好干部。他主张选拔大公无私，对党忠诚，革命坚决，正派能干，能打仗会带兵的人当干部，只有这种人带出来的部队，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因此，贺龙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2、6军团会师后，6军团的许多政治干部到2军团担任了主要领导：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军的不少干部到120师担任了旅、团的领导职务；贺龙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放手大胆地使用，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我们革命军队在过去艰苦的战争年代，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去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 (4) 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1) 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要使他们明确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巩固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6)使部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无此保证，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是不可能的。”(27)政治工作还保证党各个时期在部队的中心工作和其他任务的完成。

(2) 做政治工作要抓紧一切时机，渗透到各个方面。做到“无孔不入，不停留一分。”(28)同时，要“改进政治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使政治工作保持紧张的、踏实的、生动活跃的作风。”(29)

(3) 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在红军时期，贺龙坚决反对夏曦取消红3军的政治机关。2、6军团会师后，他为恢复和加强2军团的政治机关与政治工作，从6军团调了一大批政治干部，担任2军团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领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强调要“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注意提高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的威信，不容许有丝毫削弱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威信的现象。”(30)他还指出，加强政治机关，主要是加强党对政治工作的领导，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质量，而不是增加人员的数量。相反，政治机关亦要精简，要提高工作效能。

#### (三) 人民武装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贺龙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比较系统的见解，主要观点是：

##### (1) 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1) 根据地是人民武装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之所以主动向党请求回湘西去搞武装斗争，一是他从这次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党抓枪杆子的重要性；二是因为那里是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对各方情况比较熟悉，地理环境好，有不少社会关系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对贺龙回去开展革命斗争都比较有利。他回到桑植后，很快组织起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但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打就垮，一垮就散。经过几次失败，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来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以及暴动工作中，坚持做到：第一、纯洁工农革命军的内部，加强党的建设与领导；第二、搞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深入广大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没有立足之地。为此，他同夏曦的流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31)在2、6军团会师后，他同任弼时等领导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在长征途中，他也积极创造条件，曾准备在黔西、大定、毕节创建根据地，坚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同关向应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贺龙常说：“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的依托，才能坚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只有建立根据地，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配合起来，以收指臂之效”。(32)

(2) “根据地建设，是我军建设的人力、物力与政治力量的源泉。”(33)贺龙指出，有了根据地，才能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

力来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补充和扩大，物资的供应主要是靠根据地的百姓。根据地的“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依靠群众来建党、建政、建军，来战胜一切敌人。没有阶级性、群众性的单纯建设军队，是不行的。”(34)所以，贺龙一再强调说，根据地也是我们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基地。

(3)根据地是开展人民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有利战场。贺龙认为，在根据地内作战，我军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对地形道路熟悉，群众条件好，可以采用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战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到处打击敌人。而敌人则成了聋子、瞎子，只能到处被动挨打。所以，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指挥的许多胜仗，多是在根据地内打的。

## (2) 如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1)要搞好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贺龙认为，建设根据地以及“一个根据地的好坏，军队要负很大的责任。”(35)所以，他从1928年7月任中共湘西（后改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一面指挥红军打仗，一面领导红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搞武装暴动，打倒地主土豪，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为创建湘鄂西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初期，贺龙率120师东渡黄河，深入敌后，一面打击日本侵略者，一面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原来晋西北没有党，也没有我们的政权。我们120师来了，才建立起党和政权。”(36)并创建了巩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2)要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中国的革命是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办法。因此，各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这就必须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要发动农民，首先要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所以，贺龙在湘鄂西时，领导农民“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实行耕地归农。”(37)把他们的钱粮税契一律焚毁，浮财和生产工具分给贫苦农民。在晋绥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搞土地改革。贺龙号召晋绥部队的指战员，要站稳立场，坚决拥护土改。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他们在革命中得到实际的利益，他们才会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起来斗争，这样根据地才能巩固。军队才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建军才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红军和八路军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家里都分到了土地，战士“知道自己服务，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不怕流血牺牲”。(38)

(3)要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贺龙认为，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把根据地的经济搞上去，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要比过去好，比敌占区人民的生活好，这样群众的心才能向着我们。为此他提出：

军队自己要搞好生产，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贺龙坚决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陕甘宁晋绥的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给或部分自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贺龙不仅组织部队“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不取报酬，帮助人民春耕、夏耘和秋收”。(39)而且还从部队挤出部分经费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他还要求地方政府增加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贷款，减免部分税收。他说：“我们首先要根据地把根据地建设好，解决土地问题，发展生产，军队的人力补充和物资供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打好仗。”(40)

(4)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搞军政民的团结。贺龙认为，搞好党政军民的团结，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非常重要。而搞好团结的关键是军队。所以，他号召部队要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自觉的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自觉地执行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以实际行动搞好军政民关系。同时，地方也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因为我们的“军队、政府和人民是三位一体的。军队是保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军队，政府是爱护军队和人民的政府，人民是爱护政府和军队的人民。军政民的紧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41)这就铸成了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5)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为了开展人民战争，贺龙不但重视扩大主力部队，而且也非常注意发展民兵游击队。他指出，在敌人力量超过我军几倍、几十倍的情况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要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在湘鄂西十分重视发展“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后合编为“工农赤卫队”），由他们“担负后方防守，红军担任前方作战，这样分工，就是有敌人进攻我们，也决不至受大的损失。”(42)我们就是依靠“主力军、游击队、赤卫队的二结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43)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贺龙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更加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从正规部队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和战士加强游击队、武工队等地方武装。他说：民兵是我们农村中的人民军队，这支队伍在抗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配合正规部队，支持了战争，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战胜了敌人。搞好民兵建设，“农村党的建设才能有巩固的基础，政权才有保障，兵源才能雄厚，干部才可以不断的涌现。……我们将成为铜墙铁壁。”(44)建国后，他对民兵建设也非常关心，有不少重要论述。他指出：“从现代战争观点来看，离开民兵是绝对不行的。”(45)现代战争中，民兵的地位并没有减低，更加重了民兵的责任。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出了人民的天下，“今后的战争还要靠民兵。”(46)为此，他要求大军区要用相当大的精力，省军区、军分区要用主要精力去做民兵工作，把民兵组织整顿好、建设好，作为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

(6)搞好对敌斗争，保卫根据地。敌人为了消灭革命力量，总是要集中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的围攻、“清剿”和“扫荡”。贺龙指出：我军要保卫根据地，只有采用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积极防御方针，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

#### （四）是从严治军，提高军政素质

贺龙认为，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过硬的杀敌本领，顽强的战斗作风，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一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作风良好，军政素质高的队伍，只有靠平时加强管理、严格要求去培养。所以，他一贯主张治军要严。

##### （1）严格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技能

贺龙认为，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不但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勇敢不怕死的精神，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战术技术素养、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目的。为此，他强调：

(1)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杀敌本领。贺龙经常教育部队：只有“平时操练多吃点苦，打起仗来就可以少流血，为了人民群众早解放，越是条件艰苦，我们越要抓紧操练。”(47)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斗是那样

的频繁，条件是那样的艰苦，他仍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战斗间隙，加强对部队的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亲自抓大练兵运动。战斗员主要是练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包括土工作业）等“四大技术”。指挥员主要是练如何组织袭击战、伏击战和近战夜战等战术。贺龙强调在训练中要“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48）战斗员要提高已有的技术，并掌握新的技术。知道怎样对付飞机、坦克、大炮等新式武器。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各部门工作人员都要以提高自己业务为中心进行训练，在解放战争初期，贺龙亲自抓新式整军运动，再次掀起练兵热潮。他要求：“练兵必须注意实战需要，不要搞那些不练技术的形式主义。”（49）所以，他要求干部深入部队，言传身教，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经过这些群众性的大练兵活动，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建国后，为全面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贺龙对军事训练一直非常重视。1964年，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推动了全军性的大练兵运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的经验。亲自深入部队训练现场，检阅了一些军区和军兵种组织的军事表演。他要求部队苦练巧练，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熟练掌握新式武器装备和技术，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使全军在训练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战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加强干部培训，培养大批合格的军事、政治、后勤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是部队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所以，贺龙从带兵开始，特别是南昌起义后，反复强调要加紧培训各类干部。

一是办好军事学校，大量培养干部。从部队中选拔优秀的指战员，并吸收地方进步的知识分子，送到军事学校培训。在土地革命时期，贺龙在湘鄂西办了“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晋绥军区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7分校”，由军区参谋长周士第任校长；解放战争初期，原抗大7分校改为“军政于校”，贺龙亲自兼任校长。后来，又新成立了“军政大学”。建国后，他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政委邓小平联名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建设，大量培养干部的指示”。（50）贺龙强调，要通过学校的培训，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理论水平，以及文化水平。”（51）要使他们养成“不计名利，艰苦奋斗、廉洁正派的思想作风。”（52）二是开办教导团（队）。“在各部队设立各种训练班和轮训班，对不同技能的干部进行短期的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53）三是“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利用各种会议，通过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使干部逐渐精通业务。”（54）四是按照干部标准，“把下面的优秀干部提拔起来，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55）

（3）必须十分重视对司令部机关的建设。贺龙认为司令部工作非常重要。他指出：“司令部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机关，随着现代技术发展，军队的发展，司令部工作也要随着发展，如果没有健全的司令部，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56）假如这个机关不健全，那就要打瞎仗走瞎路，“对于部队的发展，部队的正规化都会受到阻碍。”（57）早在1940年，他就预见到，随着部队的发展，武器和技术装备的日趋现代化，战争规模的扩大，对加强司令部建设更为迫切。因此，他提醒各级指挥员：“我们要有远见。我们的军队是要发展的”，（58）“我们要进步到能组织很多兵种的联合大规模战斗，如坦克车、装甲车、骑兵、工兵、炮兵、化学兵、空军等。就是说，各级司令部要进步到能组织阵地战和现代化军队的战斗。”（59）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120师、晋西北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曾多次专门召开参谋工作会议，贺龙每

次都到会作重要讲话。他于1940年3月，在晋西北各军参谋会议上，对司令部工作的重要性，工作职责，关于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对参谋人员的选拔培养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建国后，贺龙担任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他指出司令部建设必须适应能组织指挥诸军兵种联合的、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强调各级首长“对司令部要很好的抓，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司令部，成为自己强有力的助手。通过司令部指挥作战，领导训练。司令部要战斗化，要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60)司令部还要革命化，不能成为官僚机构。

怎样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建设？贺龙认为：第一、要尊重并充分发挥参谋长的作用。把参谋长看作军事首长的得力助手。贺龙对他的历任参谋长如李达、周士第、陈漫远、张经武等十分尊重，放心大胆的使用他们，与他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他认为司令部是非常重要的机关，把它看作是“军队行动的指南。”(61)第二、要培养大批合格的参谋人员。贺龙认为，培养一个参谋人员不容易。他们“要有很好的战术素养、操场动作和教育能力，要懂得新式的技术和武器，能练兵、能打仗，能向首长提供作战意见。”(62)高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还应有战略眼光。所以要有计划地培养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贺龙就亲自抓这件事。他说：“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即着手办参训班，培养参谋人员，到现在（1940年3月）师部已开办了四期参训班，……同时，在工作中又培养了一批参谋人员。”(63)在解放战争后期，贺龙又提出培训“武参谋和文参谋”问题。他让军政干校培养“文参谋”——党政干部，由军政大学培养武参谋。他提出，参谋人员不仅要学会写战斗详报、命令、通报、统计、绘图等参谋业务。还要学习军事理论；不但要学习战术，而且要学习战略。只有“懂得战略战术，才能订出兵团作战与行动的计划。”(64)参谋人员不仅要学习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因为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是做不好参谋工作的。第三，健全司令部工作，还要加强司令部与政治机关、后勤机关的密切协同，这三个机关虽然是单独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比如“司令部与政治部无论在扩大建设部队，整理训练部队，组织行动都是有联系的，如果协同的不好，司令部工作是不能健全的。”(65)

### (2) 严格要求，使部队养成顽强的战斗作风

贺龙非常重视培养部队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特别强调部队要有顽强的战斗作风。指出：“部队的顽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消灭了敌人可以得到补充，也可以得到休息。但顽强也不应当理解为死打硬仗，而是机动的不屈不挠地消灭敌人。”(66)由于他对部队的严格要求，使红2、6军团和120师，以及后来以他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北野战军，都具有能吃苦耐劳，连续作战，敢于打硬仗、恶仗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样的部队在任何艰难困苦前面都无所畏惧，拖不垮，打不烂，攻得上，守得住，无往而不胜。

### (3) 严格纪律，赏罚分明，使部队养成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贺龙指出，部队必须要有铁的纪律，如果组织纪律松弛，就会一盘散沙，根本不能打仗。

(1) 军事纪律严，做到令行禁止，服从命令听指挥。违者不论亲疏，一律严惩不殆。在北伐战争时期，贺龙的一个亲属，已当了旅长，“因为搞钱”，贺龙坚决将他撤职，遣送回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4军刚成立，

有一个师长因发表违反党的政策的意见，公开撕毁红军张贴的标语和布告。他虽然也是贺龙的宗亲，而且经批评教育已承认了错误，但贺龙仍给予他撤销党内职务和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对“一部分军官只愿拖队捉肥猪、称土大王，不愿下去暴动，遂蓄意拖枪潜逃”（67）或有叛变行为的人，包括贺龙的个别亲属，他一律从严惩治，决不徇私。

（2）群众纪律严，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贺龙要求部队热爱人民，保护人民。如他发现有违反群众纪律，侵犯百姓的利益的现象，一定严肃处理。北伐战争时期，他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6师——一一打进了澧州，其中有些收编的队伍纪律较差，骚扰百姓。为此，贺龙下令解散了三个团。对少数不听劝阻者，派部队强行缴械，并枪毙了为首的两个团长和部分军官。在后来的历次革命战争中，他指挥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转战南北。每到一地，他总是教育部队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不能拿百姓的一针一线。部队宿营时，他总是组织部队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行军打仗时，他要部队“脚板要长眼睛”，不能踩坏群众一棵禾苗，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劳动生产时，不与民争利。1940年，晋西北搞“四大动员”时，出现了部队挖老百姓的地窖，逼死人等“左”的倾向，贺龙发现后，迅速加以纠正。这样，“虽然部队自己吃野菜，饿坏了一些同志，但却救了多数群众。”（68）当他发现有的部队在生产时，占用老百姓的好地；开办商店搞“好汉股子”等侵犯群众利益，剥削老百姓的现象，都进行严肃处理，迅速纠正。1953年，他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得知有的部队在修建军事设施中，占用大量可耕地，群众意见很大。他立即指示西南地区各省委、省军区派出得力干部，对本地区、本单位进行切实检查处理，如有类似情况，要及时处理，“将过多的占用了群众的耕地，坚决退回群众耕种，并赔赏群众损失；已经圈了但暂不使用的土地，应尽量让群众耕种，绝不能让它荒了；购买价钱太低的应补足，免使农民吃亏。”（69）由于贺龙对这件事严肃认真的处理，维护了群众利益，从而挽回了军队的影响，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 （五）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密切结合

中国的革命斗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必须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但红军和八路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战略上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和包围的状态。贺龙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个战略区的指挥员，要能独立地领导好本地区、本部队的革命斗争，除了要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外，还必须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本地区、本部队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与此相

——适应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同时，还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砍脑壳”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并且还必须注意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讲究斗争艺术，采用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

#### （1）善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矛盾

贺龙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在敌人的营垒中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他们为了各自的私利，在大军阀之间，大军阀与地方小军阀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中央军与地方军、嫡系和杂牌之间，日本侵略军与伪军之间等等，由于他们的利害关系不同，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极其

尖锐的斗争，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贺龙指出，敌人的这些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也必须利用。我们就是要根据敌人这些内部的矛盾，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或运用谋略，制造和加深敌人的矛盾，通过不流血的秘密斗争，达到自己之目的。

### （2）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

贺龙一贯强调，为了实现党的革命的目标，必须把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主张对敌人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量扩大团结面，努力争取利用中间力量，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他坚决抵制说什么“中间力量最危险”，那种四面出击，自我孤立的左倾路线。贺龙说：“把敌人搞得很多，自己没有力量对付，这样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对能争取的就争取，能改造的就改造，如果要那么纯，对井冈山王佐的部队就不该争取了。”（70）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湘西。当时那里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许多地方的团防和地主武装，而且到处有“神兵”。他面对这样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对各种敌对势力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神兵”，基本是采取团结争取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政策。贺龙认为：“‘神兵’虽然都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地还不欺压群众。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但对于为非作歹的，则坚决给予打击，”（71）于是，一部分“神兵”被分化瓦解，有数百名基本群众参加了红军；一部分则成了红军的同盟军。同时，贺龙对地方武装，除对最反动的团防，比如石门县的罗效之，桑植县的陈策勋，而且都是叛徒，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外，对其他的则尽量争取或让他们保持中立。”桑植县八个区的八大诸侯，他争取了七个。”（72）由于贺龙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仅使红4军在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面前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壮大。

### （3）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充分调动和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贺龙认为，既然敌人之间存在矛盾，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去扩大和利用它。在大革命时期，贺龙提出要“拉关系”，他广泛开展社交活动，不仅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广交朋友，而且在敌人营垒中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所以，当军阀想把他的部队吃掉时，他巧妙地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借助在军阀中某些“私人关系”，多次转危为安。

1925年4月，贺龙率建国川军第1师驻防湖南澧州，并兼任澧州镇守使。湖南军阀赵恒惕因贺龙不听他的招唤，于10月下令湘军对贺部发起进攻，欲将其消灭。因赵恒惕的参谋长提前向贺龙透露了消息，预先作了防范，使赵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2月底，贺龙回到桑植开展武装斗争，但经费和供给非常困难。当时，鹤峰县的团防头目王文轩是他的“旧友”，贺龙通过他，筹集到了几千元钱和一些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同志率领120师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地区，他更自觉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与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在晋绥地区，贺龙团结争取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傅作义。他说，我们对友军、友党、政权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我们不但曾多次协同友军作战，并在工作中帮助友军，而且在困难危险的时候，曾不惜一切牺牲，

救援友军。”(73)同时，还帮助他们补充兵员。“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74)“傅作义将军要去收复绥远，我们当时派一部分力量切断平绥路，箝制敌人，并派整个的358旅协同傅作义将军向绥远进攻。后来傅将军部队撤退，敌人追击，反攻占偏关，我358旅、警6团又掩护其撤退，并积极进攻收复偏关，将敌打退。”(75)骑2军要退过黄河，贺龙派“警6团掩护他们撤退，打了两大，并把他们丢掉的枪炮，溃散的人马全部送回他们。”(76)在冀中，贺龙把高士毅、魏大光等开明士绅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都团结争取过来。同时，他与国民党中的投降反共逆流，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并坚决打击像张荫梧、白志沂等一小撮假抗日，真反共，专门制造摩擦的顽固派，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对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巩固冀中起了重要作用。贺龙在革命斗争中注意运用政策策略的成功经验，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正确论断。

#### (六) 建设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发展。贺龙指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必须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我军武器装备的来源，主要由国内制造供应，象过去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和今后我军的武器来源，既不靠战场缴获，也不能靠从外国买，唯一的只有靠国产。这就要建设我们自己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为国防提供现代化的装备。”(77)所以，国防工业，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要服从建军方针。服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特种兵，没有诸兵种的合同行动，单靠步兵是不能保证战争胜利的。”(78)国防工业就要为军队提供飞机、导弹、舰艇、坦克和大炮等。国防工业“为祖国的国防事业服务，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79)

1959年9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主管国防工业。他表示：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不图虚名，要干实事，要扎扎实实把工作抓起来。一定要把国防工业搞上去。他上任后，首先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然后他深入到重要的国防工业企业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用了一年(1960年)的时间，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尔后，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方针政策，其基本思想是：

(1)“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80)

贺龙指出：现代军事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们必须迎头赶上。早日建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攀登军事科学技术的高峰，早日制成导弹、核武器、新式飞机、舰艇、坦克、大炮，使人民解放军成为用导弹、核武器装备起来的，无敌于天下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此，他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提出要在若干年开始突破尖端，若干年大体形成体系，若干年基本达到独立完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就要实行少买、少产、多建的方针。而在建设上，……必须大搞尖端。”(81)只有这样，才能腾出人力财力进行基本建设，尽早实现自力更生；才能集中力量突破尖端，带动一般；才能既集中力量加强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制造，又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

的发展。

#### (2)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的道路

贺龙主管国防工业后不久，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给我国国防工业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他立即召开会议，号召大家振奋革命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从产品的设计、试制、试验和生产，到原材料供应，都要立足于国内。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当前要突破材料、技术和设备这三个关。突破这三关，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应该大力加强培训工作，迅速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82)

#### (3) 倡导独创精神，努力发展新产品

贺龙强调，我们不但要生产常规武器，而且还要研究、试验突破原子武器等尖端技术；我们不但要学会仿制外国的某些武器，而且还要创新，发展自己的新产品。他说，目前对某些产品仿制的目的；是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以便为独立设计和制造创造条件。一切依赖洋人，只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产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在独立设计和制造的过程中，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应该积极的帮助支持，绝不能泼水。

#### (4) 国防工业的发展要服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贺龙指出：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决定因素。没有现代化基础的工业提供原材料，发展国防工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积极发展国家经济是第一位的，发展国防工业是第二位的。国防工业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了，国防建设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

#### (5) 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

贺龙要求把产品质量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他说：“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在经济上造成重大的损失，并直接影响了我军的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的需要。”(83)由于“军事装备是直接用于战争的东西，质量的好坏和战斗的胜败，战士的生命，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关系。”(84)所以，军用品必须精良。“因为军用产品都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消灭敌人的武器。在战场上，你消灭不了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产品质量不好，在战场上出了故障，不能消灭敌人，实际上就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85)因此，他要求广大军工战线上的干部和职工，都要像爱护生命那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坚决同一切忽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斗争。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努力增加产品数量。

#### (6) 国防工业要军民结合

贺龙指出：在和平时期，常规武器只应作小量的制造和储备。——这样“军用产品生产任务不能饱满，工厂利用余力积极生产民用产品，增强国民经济力量。”(86)贺龙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肯定，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加快发展速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此外，贺龙还一贯重视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认为，搞好部队的后勤保障，是巩固和发展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障。

### 三 贺龙用兵的特点

贺龙长期担负一个战略区的领导工作，他智勇兼备，有胆有识，善于用

兵，不仅有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而且有运筹帷幄，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卓越才能。他参加并组织指挥过许许多多的战役和战斗，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其中有些战役战斗，创造了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他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纵观他从大革命时期到全国解放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他在用兵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 （一）胸怀全局，深谋远虑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武装斗争，这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认识到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方针和一系列战略战术。贺龙对上述特点和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认识和掌握得比较早。所以，贺龙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全局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因而在处理问题时，总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全局利益。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有些人只看到反革命势力暂时的强大，因而心灰意冷，脱离了革命队伍。而贺龙则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要垮台。当时，党中央决定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但他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此时党最需要的是抓枪杆子，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因此，他毅然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不顾个人安危，向党请求回湘西去搞武装斗争。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嘱咐他：“一、听党的话；二、干革命；三、找穷人。”（87）贺龙肩负着党的重托，与周逸群等十余人回到了桑植。他在远离党中央，联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牢记党的三条指示，不怕艰难困苦，几经挫折，终于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红4军，后来与洪湖地区周逸群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成了红2军团，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样就同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一起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4年10月，红2、6军团在贵州会师。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军委，并不了解2、6军团和湘西的实际情况，却命令两军团分开行动，让6军团单独到凤凰、乾城等地活动，贺龙从全局上考虑到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并根据两军团和湘西、鄂东的实际情况，提出：2、6军团的总兵力不足8千，而黔东地区的敌人有30个团，如果两军团分开行动，兵力分散，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当时凤凰、乾城、永绥地区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老巢，其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又是苗族聚居区，与汉族隔阂很深，必将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立足。因此，他建议：只有两军一起向位于湘鄂川黔交界的桑植、永顺、龙山地区发展比较有利。一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空虚，地理条件便于红军的发展；二是两军团的力量集中，可以进行较大的战斗。歼灭和箝制更多敌人，能从战略上配合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行动。任弼时等两军团的领导一致赞成贺龙的意见，并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但军委回电说：两个军团“在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6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活动区域发展”。（88）贺龙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被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抓住有利时机，机断专行，坚持按两军团领导一致同意的方案，边行动，边向中央军委报告。并于10月底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之敌主动出击，两个月内，歼敌近两万人，占领七座县城，吸引和箝制了敌人6个纵队共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威胁‘追剿’

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给我中央野战军以有力的配合。”(89)恢复和创建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军发展到1.5万人，比会师时扩大了一倍。事实证明贺龙决策的正确性，后来中央也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命令，贺龙和关向应等率120师主力坚持晋西北的斗争。晋西北人口稀少（不足300万），贫穷落后，条件艰苦，党的力量弱，群众基础差。与其他地区相比，120师在这里生活艰苦，部队扩大难，干部发展慢，所以有部分同志不太安心。贺龙则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指出：“晋西北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它是支持华北抗战主要堡垒之一，是大西北的屏障。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铁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箝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90)他教育广大指战员要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扎根晋西北，他带领120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在军事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粉碎了日寇的反复“围攻”和“扫荡”，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磨擦，开辟和巩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晋绥根据地在经济上向延安提供了大量支援；在军事上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国民党。真正起到了屏障大西北的作用，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成为联系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起到了战略基地的作用。

## （二）审时度势，随机应变

贺龙认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不仅在战略上要有全局观念，而且在战役战斗中要有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要随时注意时局的发展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并根据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针，修改作战计划，调整作战部署。这样，在战争的全局上，才能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在每一个具体的战役战斗中，才能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歼灭敌人。

1935年2月开始，敌人集中了10余万兵力，分6路向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大规模“围剿”。当时，2、6军团仅1.5万余人。贺龙认为，面对近十倍于己的敌人，应采用避实击虚，积极防御的方针，把红军主力伸到敌人侧翼和后方，与敌人旋磨子，转圈子，伺机歼灭其一、两个师，这样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由于认识不一致，贺龙的意见未被采纳。至4月初，反“围剿”失败，2、6军团被迫退出根据地，准备北渡长江，到湖北的南漳、兴山和安远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转移途中，与孤军深入之敌58师遭遇，贺龙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于4月9日至13日，连打两个胜仗，歼灭该师师部和两个旅，在敌人的战役布局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其余前来“围剿”之敌纷纷撤退和转入防御，形势急转直下，贺龙和任弼时抓住这个契机，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坚持斗争。同时，认真总结了过去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当时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根据当时湖南的敌人比较难打，湖北的敌人好打等敌我情况的变化，贺龙及时改变了作战方针，对鄂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将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深入到鄂敌的战役纵深，在忠堡和板栗园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围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扩大解放区。奉中央军委命令，贺龙指挥晋绥野战军和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主力一起，发起了绥远战役。按战役总的意图，贺龙指挥晋绥野战军从

南向北进攻，先占领凉城、新堂、天成村一线，尔后配合晋察冀部队将敌歼灭在丰镇、集宁地区。但在战役发起后，敌人望风披靡，迅速收拢后撤。其中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第67军所属第26师，由集宁地区撤到卓资山地区组织防御。贺龙很快发觉了敌人想收拢兵力，形成拳头，伺机反击的企图。并考虑到如让敌人逃掉，把兵力收拢到归绥（现呼和浩特），将会给战役的下一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他当机立断，及时改变原来准备攻打丰镇、集宁的计划，出敌不意地挥师北上，乘敌立足未稳，首先歼灭卓资山之敌。并切断敌人的退路，直接配合晋察冀部队歼敌于丰镇、集宁一线。这次战斗，只用了一夜和一个上午，速战速决，干脆利索地将敌第26师全部歼灭，创造了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的范例。

### （三）讲究战术，掌握主动

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贺龙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在战略上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无论它暂时多么强大、要敢于和它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关向应在讲述贺龙英雄事迹时曾讲过：“贺者总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两个字——不怕”。他不怕敌人，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与挫折，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无论是对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日本侵略者都不示弱，英勇顽强地跟他们斗争到底。同时，贺龙认识到，战争是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的规律。他说，打仗大有学问。我们不但要敢打，还要会打，要让自己在战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我们要吃掉敌人，不能让敌人吃掉我们。为此，他指出：第一、不能轻敌，对每个战役战斗都要非常认真的对待；第二、要讲究战术。打仗不仅要同敌人比勇敢，还要比智慧，不盲目蛮干，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第三，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不墨守成规，要随着时间、地理条件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及时改变战略战术。所以，战术上的机动灵活性，是贺龙指挥打仗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表现是：

#### （1）根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战术

在湘鄂西和晋西北地区，他主要是依托山区的有利地形同敌人旋磨子，转圈子，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作战形式，不断打击歼灭敌人。在洪湖水网地区，他利用河湖港汊同敌人打游击。在冀中的大平原上，他利用稠密的村庄、坚固的房屋、良好的群众条件，以夜间作战为主，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

（2）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他们的作战特点，采用不同的战术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同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作战时，一般是在一定的战线上，摆开阵势进行比较正规的进攻战或防御战。而贺龙在逍遥镇战斗中，他避开奉军防御较强的正面，从敌人防御薄弱的侧翼偷渡沙河，击敌之侧背，收到了出奇制胜之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指挥红军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军队打仗，当时，敌强我弱，情况同北伐战争已有很大不同。贺龙及时地总结了反敌围攻战斗中的经验教训，认为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须改变以往战争中与敌正面较量的打法，采用避强击弱的战术，与敌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游击性运动战和游击战。他常用的战术手段有：（1）伏击战：一是预伏战。即根据我们事先了解到的敌人行动计划，在其必经之地，选择有利地形，设下伏兵，对前进或撤退之敌实施突然袭击。二是诱伏战。利用敌人的骄傲轻敌，采用围城（点）打援等战术，把敌人引诱到我预设战场，将其歼灭。贺龙很善于组织伏击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部队，采用伏击战术，打了很多胜仗，并总结出了一套经

验，主要是：

第一，要严格保密，无论是预伏还是诱伏，事先不能泄漏任何消息；第二，部队机动要快，要迅速前进，迅速撤退；第三，要以突然、迅速、勇猛的战斗动作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2)奔袭战。主要是利用不良气候，出敌不意，攻其无备，对运动中和立足未稳之敌进行突然袭击。(3)遭遇战。部队在行动中与敌人突然遭遇，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争取先机之利，先发制人，取得胜利。此外，还有麻雀战等多种战术。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日军武器精良，战术技术等军事素质比较好，战斗力强。贺龙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除把部队分散为团、营、连的规模，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敌人外，同时，根据形势需要或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打较大规模的伏击战和运动战，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蒋介石挑起内战，贺龙及时教育部队，要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提出“过去同日本侵略者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91)他指挥晋绥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开展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战。

(3)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根据形势和战局的发展变化，采用不同的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1944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侵略军在战略上已处于守势。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贺龙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主动进攻。实行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民兵和游击队密切配合，采用袭击、伏击、围困等战术手段，于1944年8月底至1945年9月中旬，先后对日军发动了“秋季”、“春季”和“夏季”三次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夺取了敌占点线，扩大了解放区。

#### (四)周密侦察 慎重决断

贺龙一贯强调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每次组织战斗，都非常慎重，首先要把情况弄清。他说：有人跟我说，打网球要“一准、二稳、三狠”。打仗也是这个道理，首先情况要弄准，下决心不能随随便便，各方面要考虑周到，处理得比较稳妥。定下消灭敌人的决心后，就要全力以赴。因此，他一贯重视情报工作，强调要搞好对敌人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侦察。在战前总要通过各种途径，采用一切手段，组织周密的侦察，把作战的各种有关情况搞清楚，做到知己知彼。不仅要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活动规律、作战特点、指挥员的脾气特点等。而且还要把作战地区的地形道路、社情民情都搞得一清二楚。他指示：“把敌情搞清楚，对于我们组织战役、配备兵力等是很重要的。如果情报不准确，则会浪费我们的兵力”，(92)甚至打败仗。为此，他经常亲自审讯俘虏，到战区勘察地形，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出判断，经过深思熟虑，再定下决心。由于他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所以能做到“料敌如神”，决心果断正确。他决心打的仗，就一定要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冀中平原地区进行较大的运动战很不容易。1939年4月，华北日军精锐第三联队吉田大队800多人，从河间县城向齐会地区进犯，寻找我120师作战。由于贺龙事先布置了周密的侦察，他决心抓住敌人孤军冒进，周围援兵不多的有利战机，集中了七个多团的绝对优势兵力，采用速决的进攻战，在运动中将敌人连续包围，经过三昼夜激战，将吉田大队基本歼灭，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范例。

#### (五)量敌用兵打歼灭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力量的对比，长期处于敌

强我弱的状况，我军要粉碎强大敌人不断的进攻，站稳脚跟，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必须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因此，贺龙强调在组织战役战斗时，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根据敌我力量决定进退；对决定要打的仗，必须集中兵力，英勇顽强地去歼灭敌人。

#### （1）量敌用兵，视情进退

贺龙指挥作战，胆大心细，不打无把握之仗。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湘鄂西率领幼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作战时，总是千方百计的趋利避害，采用“旋磨子，转圈子”的战术，先把敌人转得昏头转向，磨得精疲力竭，尔后伺机将其歼灭。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93)决不冒险。由此可见。贺龙虽然当时远离党中央，联系困难，但他采用的军事原则，与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一致的。

#### （2）英勇顽强，灵活机动

贺龙反复教育部队指战员，打仗是与敌人进行的生死搏斗，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所以，在打仗时，为了消灭敌人，必须要有顽强的战斗作风。“但顽强也不应当理解为死打硬仗，而是机动的不屈不挠的消灭敌人。”(94)就“象下象棋，卒子过了河，总要想办法啃掉几个敌人，不能叫敌人吃掉我们”。(95)必须要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就是说，在战斗中，要用灵活的战术，顽强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96)在首长总的意图下灵活的完成任务。

#### （3）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贺龙常说，对敌人要狠，不能客气，对他们就是要“野蛮”才好。(97)对敌人狠，就是要用拳头去打，打下去要使敌人抬不起头来，要砸碎它。贺龙讲的要“砸碎敌人”，就是要打歼灭战的思想。他讲的“拳头”，就是强调必须集中兵力：一要善于把自己分散的兵力迅速收拢，握成强有力的拳头，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对敌人的优势，这是打歼灭战的前提。二要在兵力部署上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和连续包围的态势，使其无法突围逃跑；如一次包围不能消灭时，可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将敌放到我预设战场，再次将其包围歼灭。在陈家河战斗中，我2、6军团以11个团对付敌人1个旅；齐会和甄家庄战斗中，我军都是集中了七个多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对付日军的一个大队，采用四面包围和连续包围的方法将敌人歼灭的。三要善于使用主力部队。贺龙对部队情况、指挥员的特点等都十分清楚，能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部队。他总是把能打硬仗、恶仗、作风好，战斗力强的主力部队掌握在手中，用在对战局起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和关键方向上，有时在战斗开始就投入战斗，用以打开局面；有时作预备队，在适当时机再参加战斗，以稳定战局或解决战斗。贺龙还十分注意通过实战锻炼，以老部队带新部队等方法，不断扩大和建设新的主力部队，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 （六）运用谋略 调动敌人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贺龙非常重视学习古代兵法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论著，不仅能深刻的理解，而且能在实践中运用自如。他常教育部队指战员：“对敌人就是要鬼一点，你不鬼一点，他就会把你除掉。”(98)贺龙说的“鬼”，就是要部队指挥员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同敌人斗智。他说：“指挥员打仗，不但要勇敢，还要

会巧干。”(99)贺龙在用兵时，总是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手段去欺骗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使它对我军的行动捉摸不定，从而听我调动，受我指挥，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歼敌战机。他经常采用的谋略是：

#### (1) “卑而骄之”，示弱诱敌

1934年10月，2、6军团会师后，为配合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长征，贺龙和任弼时随即指挥部队对湘西之敌发起攻势。湘西军阀陈渠珍命周燮卿率万余众进行围堵追击。贺尤与周燮卿是老对手，对他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便利用他刚愎自用，骄横轻敌等弱点，主动放弃永顺县城，装作溃逃的样子，一退再退，故意向敌人示弱，把敌人引诱到龙家寨的十万坪谷地，设下伏兵，待敌钻进口袋后，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歼灭了敌人的两个旅大部，击溃了1个旅又1个团，取得了2、6军团会师后的首次大捷。

#### (2) 声东击西，攻敌不备

1935年6月的忠堡战斗中，贺龙首先采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方法，以一部兵力突然围困宣恩县城，迫使敌人前来增援，把敌人从比较难打的城市和堡垒阵地中调动出来，使它失去依托，为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然后，集中主力打击增援之敌。由于事先掌握了敌人的增援计划，除决定留一部分兵力继续佯攻宣恩，迷惑敌人外，迅速集中主力，一昼夜行军130里，出敌不意地前出到忠堡地区，将敌41师师部和121旅全歼，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

#### (3) 制造假象，欺骗敌人

忠堡战斗后不久，贺龙运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计谋，制造我军要远攻的假象，从而调动了敌85师孤军深入。尔后，我军出其不意地进至敌人必经之地板栗园利夫田谷地，以伏击战的形式一举将其全部歼灭。

#### (七) 利用自然条件克敌制胜

天候和地理等自然条件，对敌对我的军事行动影响都很大。孙子兵法把“天”(即“阴阳、寒暑、时制”)“地”(即“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作为权衡能否打仗的重要条件。由于我军是革命的队伍，来自人民，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指战员在战场上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在生活上吃苦耐劳，不怕艰难险阻。所以有些天候地理上的阻碍，敌人不能克服的，我军可以克服，不仅可以克服，而且有些还能加以利用，变不利为有利。贺龙在利用天候和地理条件，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一向做得十分出色。

#### (1) 善于利用天候，特别是利用阴雨天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指挥的红军，经常在雨天与敌人作战，打了许多胜仗。1932年3月上旬的文家墩战斗就是一例。当时，敌第10军军长徐源泉奉命抽调了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我洪湖根据地大举“清剿”。其中敌144旅由皂市向天门开进，因天下大雨，被迫滞留在文家墩，李家场等地。贺龙抓住敌人北方兵不善南方作战等弱点，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人，指挥红3军主力冒雨连夜奔袭文家墩，全歼敌人一个旅，俘其旅长韩昌俊以下两千余人。由于红军常常利用雨天袭击敌人，出奇制胜，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贺龙是活龙，天一下雨就要打仗，就能打胜仗”的说法。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群众对贺龙的敬仰之情，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贺龙用兵之妙。

#### (2) 善于利用地理条件

贺龙经常教育部队的指挥员，要熟悉地形，在战斗中要会选择和利用有

利的地形去战胜敌人。他说：地形是进行战争的大舞台，敌人的情况经常要变，而地形不容易变，哪里对我有利，对敌人不利，都要了解得很清楚。他又说：如果对不同的地形特点不加区别对待。就不能趋利避害，就不能打胜仗，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贺龙在行军打仗中，非常注意观察地形、利用地形。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的脑子就像是一本活地图，每次打仗，总是把地理条件作为选择歼敌战场、确定使用战术手段的重要依据。

### （3）善于利用江河湖汉，迫敌背水作战

1929年7月初，湘西军阀陈渠珍所属湖南警备第1军步兵第3团副团长周寒之率部进犯桑植，企图将我幼小的红军一举消灭。贺龙指挥红4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人，主力埋伏在澧水以东山上，待把敌人诱过澧水之后，趁敌立足未稳发起迅猛反击，在南岔渡口将敌大部歼灭，周寒之也被击毙。7月中旬，敌第3团团长江子云亲自率所部，以及地主武装等再犯桑植，企图进行报复。贺龙抓住江子云骄做轻敌，报复心切的弱点，主动撤出桑植县城，摆下了“空城计”，先把敌人放过澧水，再诱其进城。尔后，指挥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敌人慌忙向赤溪渡口逃窜，使江子云陷入了前有澧水后有追兵的绝境而被歼灭。贺龙还在洪湖地区利用河湖港汊坚持革命斗争，后来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100）

### （4）善于利用山川谷地，将敌包围歼灭。

在山川谷地作战，敌人的重装备不便机动和展开，因得不到技术兵器和强大的火力支援，就更丧失了优势。相反，我军由于熟悉山区的地形道路，便于机动和隐蔽接敌，有利于发挥轻武器的威力和近战夜战等长处。在湘鄂西和晋西北地区，贺龙指挥红军和八路军依托山区，利用山川谷地的有利地形，打了许多胜仗，有时，他把敌人调动到群山之间的狭小谷地，将其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有时，在敌人必须经过的两山之间的狭长山川中摆下“口袋阵”，采用预伏或诱伏的战术手段将敌歼灭。这是贺龙作战指挥上很高明的一着。

### （5）善于组织夜间战斗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我军为了很好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经常采用夜战。贺龙认为，进行夜间战斗，敌人防御，我军进攻，敌是被动，我是主动。夜间便于我军机动，可以隐蔽接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能直插敌人的心脏，先把敌人搞乱、打散，再将其分割歼灭。夜间有利于我军与敌近战，充分发扬我轻武器、刺刀、手榴弹的威力，使敌人的重武器装备失去作用。总之，夜间作战可以充分地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收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所以，贺龙特别强调要进行夜间作战，他组织指挥的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战斗，都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先将敌人打乱，使其指挥失灵，再将其歼灭。善于组织夜间战斗，既是我军作战中共同采用的战术，也是贺龙作战指挥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 （八）沉着指挥临危不惊

贺龙作战指挥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无论遇到什么危急的情况，始终头脑冷静，沉着镇定。他亲自观察战场情况，能根据战斗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战斗部署，作出新的决策。他总是尽量把指挥部放在前面，哪里有枪声，哪里战斗最激烈、最危险，他就在哪里出现。他行军走在前面，撤退走在后面。在战斗中不论出现多么复杂的局面，他总是胸

有成竹。有时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而他却照样看球赛，看演戏。在齐会战斗中，他的指挥部所在地大朱村距前线只有四公里，敌人的炮弹和毒气弹在他的指挥部附近爆炸，他也中了毒气，在作了简单的防毒处理后仍坚持指挥，直到战斗结束。贺龙常讲，在战场上，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指挥员的决心坚定，临危不惊，就是对部队士气的巨大鼓舞。他说：“只要你负责指挥的人一挺、一硬，士兵作起战来勇敢得很。”所以，部队指挥员说，打仗时只要贺老总在，我们就有信心，就一定能打胜仗。

在一些大的战役战斗中，贺龙有时不能直接到前线指挥。他除了亲自组织部署和掌握全局情况外，总要派出得力干部，率领精干的班子，组成前线指挥部，进行现场指挥。他授权前线指挥员可以在总的作战意图下，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只要不延误战机，可以机断专行地处置情况。实践证明，这种上下结合的指挥方法，能够确保对部队进行正确的、不间断的指挥。

#### 注释：

- (1)1983年7月10日薛明的谈话。
- (2)《回忆贺龙》第117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3)《回忆贺龙》第125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4)据湖南省桑植县燕乐介当年贺龙的邻居徐胜洪回忆。
- (5)《回忆贺龙》第117—118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6)《回忆贺龙》第98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7)《回忆贺龙》第117—118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8页，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 (9)《回忆贺龙》第20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1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1页，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
- (11)《贺龙军事文选》第242页，1989年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12)《贺龙军事文选》第160页。
- (13)《回忆贺龙》第126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14)《贺龙军事文选》第136—137页。
- (15)《回忆贺龙》第48、103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16)《贺龙军事文选》第610—611页。
- (17)(18)《贺龙军事文选》第88、491页。
- (19)《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2月发表。
- (20)《回忆贺龙》第517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21)(22)《贺龙军事文选》第242—243、164页。
- (23)《回忆贺龙》第196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24)(25)《贺龙军事文选》第538，306页。
- (26)(27)(28)《贺龙军事文选》第547、89、455页。
- (29)(30)《贺龙军事文选》第146页。
- (31)《回忆贺龙》第147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32)(33)(34)《贺龙军事文选》第120、298、303页。
- (35)(36)《贺龙军事文选》第298、298—299页。
- (37)(38)(39)《贺龙军事文选》第23、303、200页。

- (40)(41)(42)《贺龙军事文选》第304、121、27页。
- (43)(44)《贺龙军事文选》第567、277页。
- (45)(46)《贺龙军事文选》第568、569页。
- (47)《回忆贺龙》第196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48)(49)(50)《贺龙军事文选》第205、244、500页。
- (51)(52)(53)《贺龙军事文选》第270、271、404页。
- (54)(55)(56)《贺龙军事文选》第404、270、97页。
- (57)(58)(59)《贺龙军事文选》第99、102、66页。
- (60)(61)(62)《贺龙军事文选》第614、98、313页。
- (63)(64)(65)《贺龙军事文选》第100、第105页。
- (66)(67)(68)(69)《贺龙军事文选》第92、8、288、535页。
- (70)1984年4月25日军事科学院战理部部长张静波的谈话。
- (70)《贺龙军事文选》第604—605页。
- (72)1982年10月22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谷志标的谈话。
- (73)(74)(75)(76)《贺龙军事文选》第121、262、84—85页。
- (77)1960年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78)(79)(80)《贺龙军事文选》第584、593、586页。
- (81)(82)(83)《贺龙军事文选》第587、593、577—578页。
- (84)(85)(86)(87)《贺龙军事文选》，第594、579、594、599页。
- (88)《贺龙年谱》第169页，1988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89)《任弼时文选》第98页，1987年9月人民出版社。
- (90)《贺龙军事文选》第74页。
- (91)《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197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 (92)(93)(94)《贺龙军事文选》第106页、39—40、92页。
- (95)《回忆贺龙》第395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 (96)《贺龙军事文选》第97页。
- (97)沙汀著《忆贺龙》第110页、第115页。1958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98)1983年7月10日薛明的谈话。
- (99)1982年10月26日，采访向轩的谈话。
- (10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90页，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 顾永忠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组长，1982年起从事贺龙军事活动研究工作，撰写了《贺龙军事活动大事记》、《贺龙用兵》以及主编《贺龙军事文选》等，已发表著作和研究成果80余万字。

## 陈毅的军事思想初探

吴克斌

陈毅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 1901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少年时期曾经投考过军事学校，但当时的目的并非立志献身于军事工作，而在于军校免交学费，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遗憾的是他并未被军校录取。他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时，也读过《孙子》、《三略》、《六韬》等中国古代兵书。但他读这些书也并不是为了将来带兵打仗，而是希望从中学得一些知识。他在 1942 年 3 月 8 日写给罗生特的信中说：“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1)不过，大量的政治、文学书籍向他传输了许多有益的教诲，其中包括历史人物故事，如巴曼子为国献首(2)，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高歌正气，洪秀全金田起义等等，就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献身精神，而辛亥革命中群众表现的异常坚决和英勇，在他“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3)。这一切对铸成一位革命军事家的优秀品格，无疑也是一种重要因素。

陈毅在政治上的探求，使自己逐步“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4)。既而，外寇的凌辱，内政的腐败，经济的凋零，人民的苦难，尤其是大革命在 1927 年的失败，遍及全国各地的白色恐怖，又把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逼上梁山”，使他投笔从戎，在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旗帜下向军事领域迈进，终于成为当代中国卓越的军事家。

陈毅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是在亲身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武装压迫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 1911 年 5 月四川的“保路风潮”(5)中，反动军警开枪驱杀在成都集会的市民。当时亲临其境、未满 10 岁的陈毅，愤然铰掉自己头上的辫子，以示对清政府武装镇压的抗议。1921 年秋天，他在巴黎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扣上“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遭拘捕，以后被武装押上轮船，遣送回国。1926 年 3 月 18 日，陈毅参加领导北京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略而举行的游行、请愿，又遭政府卫队枪击，死伤 250 余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系列的血的教训使陈毅省悟到：国内、外反动派这样胡作非为，主要是他们手里有枪，而广大革命群众则是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要翻身解放，必须掌握枪杆子。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北伐军正在胜利推进。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告诉陈毅：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响应北伐，掌握枪杆子。陈毅欣然接受任务，到川军中去从事兵运工作。

陈毅到达万县，被川军将领杨森邀请到他的军部去“参赞军务”。不过 10 天，英国军舰制造了“万县惨案”。陈毅与当时也在杨森军部的朱德一同策动杨部开枪还击。中国人第一次在长江上游击伤帝国主义兵舰两艘，使得万县军民士气大振。但杨森却屈从于大军阀吴佩孚的压力而妥协了。不久，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告急，杨森公然发兵“援鄂”，牵制北伐军。陈毅在杨部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遂转赴重庆。后经中共重庆地委的派遣，前往合川，就任川军第 28 军第 3 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并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的“顺泸起义”(6)的组织工作。

1927年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反动面目加速暴露，大革命的形势已明显逆转。3月24日，美、英兵舰制造了南京下关惨案，蒋介石却妥协求和，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英、美暴行的大示威。重庆人民也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抗议大会。四川军阀刘湘遵奉蒋介石的意旨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镇压，制造了死伤近千人的“3.31惨案”，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重庆地委兼军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陈毅被迫向武汉转移。1927年5月他被分配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中共党委书记，并以“准尉文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7月，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4.12叛变之后也宣布“分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东进讨蒋”途中于九江被缴械。一年来“寄人篱下”的经历使陈毅进一步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是难以承担人民革命斗争的重任的。于是，他在采取了紧急的应变措施之后，和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起奔赴南昌，参加起义。

陈毅来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以后，担任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随军南下。进入广东后，奉命留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叶、贺主力南进，失败于潮汕。朱德率部前往接应，收拾余部，向赣粤边转进。10月底到达信丰时。原有的20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800多人。团级以上的政治工作干部只留下了陈毅一人。于是，他协助朱德整顿部队，并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使这支有着革命传统的部队得以保存。

1928年初，朱、陈成功地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将部队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所部及湘南农军万余人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并在宁冈砦市与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会合，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

从1927年10月初撤出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的半年中，斗争极其复杂尖锐，丰富的实践对于陈毅的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于：

第一，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他同朱德等带领起义军一部，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千里转战，这对于投笔从戎的一介书生陈毅来说，其考验特别严峻，其经验也特别可贵。

第二，他和朱德等人领导的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组建的独立团的后身。它是北伐先锋，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但它也有旧军队的影响，这是需要在斗争中改造的。在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中取得的经验，对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这期间，陈毅同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直接参加者广泛接触，对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和总结三大起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湘南起义及接踵而来的湘南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成功的尝试，使陈毅跨进中国革命军事之门。由此开始，陈毅得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为中国人民武装革命而共同奋斗，并有可能直接探索到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精华。

陈毅自1927年8月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之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22年，长期担任高级指挥员，独当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2年间，他虽然将自己的精力逐渐转移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方面，但他仍然长期兼任军职。他在4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从基层指挥员直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阅历极深，经验丰富；他又文武兼

资，博学多才，对古今中外军事名著，无不涉猎，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军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陈毅的军事思想的坚实基础。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陈毅的军事思想作初步探讨：

## 一 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理论

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目的何在？对于这个问题，1929年9月在中央三人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由周恩来召集）的授意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7）中，曾经有明确的表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表明建军为了夺取政权，后来，陈毅于1945年春在延安起草的《建军报告》中又作了精辟的归纳：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陈毅回顾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注意军事工作的问题被逐渐地提了出来。

1923年的《向导》周刊上便有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任务的论述，还有改造旧军队的口号。

1924年，党派了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又派叶挺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第4军独立团。军校和独立团的工作对于创造军事干部、影响国民革命军军制、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建立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对于国民革命都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然而这只是党注意军事工作的开始，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了解仍是不够的。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是把中心任务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而党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则倾心于西欧的革命方式，企图以片面的群众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其严重危害之一便是不用大力去作争取军队的工作，即使在部分军事工作上，也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不愿党员任军事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资产阶级野心家们却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中共掌握中的弱点，指挥军队进行反革命政变。

由于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曾经是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变质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省区人民遭受屠杀的悲惨情景，逼着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进行武装自卫。这就造成了以后的伟大进步，进入了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进行武装自卫的同时，一部分国民革命军进行革命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使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加强有力地发动起来。陈毅特地指出：这种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基础，也造成了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在这里，陈毅要求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要承认旧的正式军队（正规军）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一个是要承认有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

的旧军官在武装起义中的作用。1945年5月1日，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梁山泊请林冲，汉高祖请韩信，才能打仗。韩信是一个正规军，林冲也是一个正规军。农民暴动没有正规军，不吸收他们的经验，打一辈子也打不好的，”（8）“暴动过来的国民革命军那种革命传统，带到我们队伍里来，对于我们有大的贡献，奠定了者将领在我们部队中的地位。”（9）但是，陈毅说，还要注意：“他们带来了好的东西，也带来了坏的东西。”“不能拿他们当老板”，“不能以他们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队伍，不然将使我们得不偿失。”因此，陈毅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军开始便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保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方面必须抛弃其腐恶部分，提出健全的军事方针，以建立一支能担负民族与民主双重革命任务的人民军队。

陈毅回忆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和毛泽东，朱德等研究关于建军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

1. 铲除旧军队长期脱离人民和生产劳动而养成的雇佣性质。这是旧军官利用军队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只有铲除这个基础，才能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

2. 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以改造军队的成份。同时施行政治教育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

3. 建立军队的民主制度，提倡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与打骂，不枪毙逃兵，从根本上破坏军阀部队的压迫制度，使官兵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一致。

4. 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事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但同时，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由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党权与军权的对立，使党与军队不能分离。

5. 在军队内部的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革命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以保证军队完满地去执行政治任务和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6. 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方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崭新的游击战术。

7. 建立群众纪律制度，以正确解决军民关系，团结人民，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为八项注意）养成军队全体官兵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箸之微，必须不可侵犯，把英勇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

8. 建立优（宽）待俘虏的制度，使这个政策在战争中收到瓦解敌方意志的效果。

9. 充分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废除薪饷制，建立战费自给的供给制度。

10. 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革命运动，须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是融合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发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坚持、建设和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

陈毅将以上十个问题列为最初建军的纲领，依据这个纲领精神，就把中

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对立的腐恶痕迹彻底扫除，并且明确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是：用党以建军，再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再转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体现了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陈毅在建军问题上，始终强调军队建设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部队必须保持阶级本色这一条。不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民族革命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比如1941年代理新4军军长时，他便提出要将新4军由游击兵团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坚强党性的正规兵团的任务。为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他提出的5项要求中，第一条便是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军中的绝对领导权，养成全军服从党的领导的“天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完整性，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巩固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向华东全军提出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任务，对军队建设一些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作了强调。其要点包括：1.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工作制度，保证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指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制度，建立野战军的整体观念是保证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2.为要建立整体观念，就要打破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主义。3.提高群众观念，遵守群众纪律，提倡群众工作，配合地方进行土地改革。他特别指出：“使全体同志懂得保证农民获得土地是我们作战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这种土地改革在部队动员，对于教育和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政治认识有极大作用，更要懂得我军（因）实行土地改革以取得数万万农民的援助，这便是战争胜利的保证。”4.服从党的领导，提高政治认识，尊重政治工作制度，学习政治工作，提倡各部门工作的密切配合。5.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6.实行以战养战，反对“破坏专家”，等等。他的这个报告不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而且在华东全军建设、作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陈毅历来强调军队的全面建设。对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以及其它各方面各部门的工作从来不放松。他在新4军时期说过：“强有力的政治是要强有力的军事来保证的。”他常常在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第二条便强调新4军要具备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其中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参谋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是指挥作战的枢纽，以求把军事首脑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利于从宏观上考虑作战。而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上，要力求超过同时期中国军队的水平。1947年初，他对干部们说：“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整个政治建设的一部分。”1948年春他又说：“军事是一个政策问题，政治问题，不是单纯技术问题。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党为什么要军队？就是为了推行党的政策，军队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工具，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打仗的。这样说，并没有轻视军事，相反是把军事提到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政治问题要靠军事最后解决问题。”“军事胜利是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因而他一再要求全体指挥员要不断从战斗中学习，以增加新知识、新技术，以便我军能掌握各种新兵器，能进行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战斗和夺取更伟大的胜利。

陈毅把培养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放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上。红4军一成立，他就担任过教导队长；新4军时期，他兼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校长；解放战争他到中原后，也兼中原大学校长，1948年初，他到陕北杨家

沟向中央军委建议成立军事大学校以统一培养军队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常说：“我们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能指挥各种兵团在各种情况下作战，应付各种情况的军事家。二十余年来，我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材，也有一批军事干部，但仍差得很。要好好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史，并使之与实践结合，培养成全面的军事人材。”“我党能有这样的人材百把十个就差不多了。”（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主持在南京建立军事学院，陈毅与华东军区竭力支持。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时，他代表中央军委向刘伯承院长授旗并致祝词。他说：“军事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军事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将能充分利用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并取得伟大苏联的援助，把中国人民的军事建设，提高到近代化的阶段。”“必须在我军现有的优良基础上争取提高一步。我们要学习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日法西斯的宝贵经验；要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经验；要总结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军队自身在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宝贵经验；要学习近代化联合兵种的作战与指挥；要通晓各兵种的性能，学会掌握与指挥；要求我军指战员能依照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进一步吸收与增进近代化作战的知识。”曾有人认为我军过去以劣势装备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因而学习外国现代化军事经验和技术的无甚必要。在1953年冬举行的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上，陈毅发言驳斥了这种说法，不仅讲到要积极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还强调学习苏军必须结合实际，逐步地学。他还指出，我军多年来以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故能达到与敌装备接近或悬殊不大，同时由于指挥英明，战役战术上形成以多胜少，以优胜劣局面，才将敌人打倒，而世界自然科学每进一步，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军队武器与战术上的改变。和平时期无法缴获外国新式武器，而某些远程武器根本无法缴获。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学习现代化作战的理论和战术技术。

1956年，作为副总理的陈毅兼任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领导编制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我国科研工作绘制了蓝图。后因中央要他倾力外交工作，陈毅才逐步退出科研领导工作。其后，当我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导弹、原子弹等尖端科研项目面临着上马还是下马的抉择时，陈毅力主攻关，要把“两弹”拿下来。他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对当时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11）表达了他从国际政治大局出发要求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 二 创建革命根据地

（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

陈毅常以西南民间谚语“叫化子打狗靠一面墙”来比喻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依存关系。对于根据地问题，他发现外国的军事著作很少提到。他认为根据地思想是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我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

发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革命思想。”（12）

陈毅的这种认识早在 1929 年就已初见端倪。他在与周恩来、李立三反复商议后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总结了罗霄山脉的经验指出，“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进一步强调“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

革命指导中心是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这是一个革命道路的大问题。南昌、广州等一系列城市起义的失败，已经表明“城市中心”的指导并不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对此进行着潜心探索，陈毅是其中的一位。陈毅探索这个问题具有下述有利条件：一、他先后分别了解过南昌起义——潮汕失败、秋收起义及井冈山初期的斗争和广州起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三大起义作过综合研究；二、有协助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千里转战中探寻武装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践经验；三、成功地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湘南起义转而实行湘南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建立地区级以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创建和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等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初步经验；四、特别是有了朱毛会师之后近一年半的农村游击战争经验；五、到达中央后将近一个月对全国局势和各地斗争经验的综合了解及在中央及三人委员会指导下的专门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1951 年纪念建军节 24 周年时，陈毅在《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的过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首先暴动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复，而是采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使中国革命在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陈毅往往是将它放在人民军队的创造与建设之前来叙述的，而且是以毛泽东为代表来阐明这个问题的。陈毅说：根据地斗争思想，毛泽东认为“是根据下述条件而产生的：第一、中国是被各帝国主义侵略与分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内部不统一，存在着长期混战；第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几种经济并存，并未形成支配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地区经济上保存自给自足状态，使根据地斗争在经济上的坚持虽然十分困苦但成为可能；第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第五、中国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个思想的表述是异常简约的。如何将它演进为带领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之路的呢？陈毅写道：“先建立各种小块大块农村根据地，通过正确的土地政策与广大工农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使各项政策取得大小规模的试验；在于让军事上作各种准备与进行长期的锻炼；在于组织问题上、干部问题上作各种准备；在于向全国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动员和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斗争，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在于使党取得经验以增强党的主观掌握能力，以便能顺利地应付和领导全国的大小事变。”（13）陈毅指出：以上这五个方面，也就是科学的根据地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 （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建设、坚持和发展

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贯穿在陈毅 22 年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从

1928年1月湘南起义开始直到取得全国政权的三个历史时期中，他都为其努力奋斗，并依靠根据地的支持从事对敌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是与朱德等在湘南地区经历了3个月的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会师后，先是坚持了9个月的边界割据，以后又选定赣西南9个县区作为第二个根据地。以后又汇合闽、赣、粤三省边区建立中央红军根据地，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地方范围提到全国的规模。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又被留下来和项英等一起，在赣、粤、湘边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先是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渡江北上，举行了著名的“黄桥决战”之后，实现了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从而开始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把共产党控制的范围扩大到江、淮、河、汉敌后的广大地域，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为以后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基地和战场。而陈毅本人则从坚持华东解放区到战略进攻后的开辟豫皖苏新解放区、并进而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直到中原、华中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胜利完成战略决战在南线歼敌任务，进而解放宁、沪、杭，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22年间，革命根据地数易其名：武装割据——苏维埃区域——游击根据地——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这就是从农村红军到城市政权的整个演进过程。

在武装割据时，曾分为红军武装割据和工农武装割据（即群众割据）两种。陈毅认为：“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这两者的区别何在呢？陈毅回答：“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14）

对于这两种割据，当时许多人都是承认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特别提到“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的问题。还记述了“八月失败”后边界山区群众坚持割据的情景：“……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的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因为这些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区乡政权普遍建立”，“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创有赤卫队”。但从湘赣边界的总体来看，陈毅认为：“边界的割据在初期的发展（四月起）至后期失败（彭德怀退出井冈山）大半都是红军的割据，以实力造成。红军大半用的是染红的政策，而不是用说服宣传的态度使他们自己红起来的。因此在边界的赤白斗争中农民反水常常见到的。”（15）而在1929年春他们在吉安东固地区与江西独立第2、4团会师之后，对当地群众割据的局面和经验甚为欣赏。

围绕根据地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陈毅指出：“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他指出：“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限度的坚持根据地。”“党的主张是艰苦做群众工作，艰苦做游击战争，从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16）

根据地的选择是有条件的。陈毅以亲历者的身份这样写道：“在选择根

根据地时，毛主席每每着重当地受盲动主义影响较小，党与群众的基础保留尚多，而地势又很好，以及离大城市较远而统治阶级力量较薄弱的地方。”（17）陈毅作为战略区的领导人，选择根据地还要着重考虑它的战略意义。如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2年以后，既要反对敌伪的残酷“扫荡”，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军东逼，这一切都决定于根据地之巩固。陈毅认为，巩固工作的中心应首先摆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才能削弱封建势力，动摇顽固派的社会基础，消除敌、伪、顽的内应而造成我在农村中之优势。把这第一步弄好才能根深蒂固，使党植根于华中地区，使党在农村中有不可动摇的堡垒。地方党的基点解决了，才能顺次去解决基层政权，而过渡到上层政权的比较民主的改造。同时也在有了有组织的广大群众和农村党以后而顺利地解决人民武装（兵民与自卫军）问题，这样就使地方建设与军事建设是分不开的而达到最终的结合。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四大建设都比较平均而坚定的发展起来。这是华中根据地建设的完整步骤。

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个边缘区工作问题。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必须做好边缘区工作，在各个革命时期中，以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区情况和工作最为复杂：敌、伪、顽、匪、帮会、会门和我方人员进出，各种势力并存。其中以敌、顽、我三大势力为主流，其余力量则穿插依附于其间。自我方在敌后占优势后，敌、我矛盾为主流，顽方成为敌、我之间的重要挑拨者。内战时期，赤、白对立，是国民党方面主动造成的；而我方的过左政策亦有相反相成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敌方亦屡屡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来阻止我之发展，但被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隐蔽的游击政策所击破。

边缘区工作长期处在炮火连天的战线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轮番交替，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其斗争方式有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流血的与和平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妥协的与革命的等等，流动性、变化性非常之大，陈毅把它比作“抗战中国的全国性斗争的一幅缩影”，“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观”（18），欲在斗争中取胜，决定关键在于采取的政策是否适当。

陈毅是谋略高手，策略手段切实、灵活并且富于创造性，因而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区工作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陈毅认为：

第一，要懂得必要的妥协和运用两面派；承认两面派或主动去组织两面派，是运用暂时妥协的正确策略的具体表现。对于两面派也要区别对待。两面派分几种：第一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是为敌伪服务而向我敷衍的。第二种是革命的两面派，是向敌人应付而替我服务的。第三种是应付各方面为了保全他们自己的产业和权利的，这种实际上是三面派。我们应多多争取替我服务的两面派，进而派自己的同志去充当“两面派”。使敌我接壤地带出现缓冲地带，这对于坚持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作用极大。运用两面派和三面派的问题，实质上是掌握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单面与多面的矛盾问题。两面派的人选最好是帮会首领人物。

第二，要懂得镇压反水分子（叛徒）的巧妙办法。我们派人打入敌伪营垒充当两面派，由于斗争复杂尖锐，有时也会“弄假成真”，变成叛徒，出现了这类情况，我可派出新的内线去对付他；或在敌人营垒内搞假情报，制造疑惧，借刀除患；或派人狙击，镇压一、二个反水分子，以慑服他人。对党外两面派分子不能要求过高，要尊重他的本身利益，并帮他策划最后安全。

第三，边缘区条件不成熟的不宜变为中心区。边缘区有四种：第一种是我政权占优势的，第二种是敌政权占优势的，第三种是敌、顽、我三种政权并存的，第四种是三不管的。对于以上各种类型地区的工作，一般是先做好当地头面人物的工作，取得其同情，允许我方工作人员驻脚，造成同情区，再以便衣武装队、短枪队前往逐渐争取人心，改变态势，提高斗争方式而达到我方军事力量逐渐加强，最终剪除敌对势力。

第四，充分发挥边缘区民兵的作用。党对边缘区民兵应加以领导，根据情况，有时以民兵与小股伪军战斗；有时筑围寨固守，相持紧急时，我主力及地方武装增援，击退敌伪。每一农村的胜利，必提高邻村民兵看家自卫的热情。在敌伪凶狠逼粮时，也可多少给点，否则一味硬拼，民兵会失败。但如一味向敌伪赔小心，刺激其贪欲，亦必致失败，沦为伪区。民兵工作部门应与伪军工作部门密切配合，使伪军不敢轻易侵犯我区。为便于开展边缘区斗争，华中地区一般是从敌伪据点算起，2里以内称伪化区，我方难以插足；2—5里之内称两面负担区，通常是敌我争夺或缓冲地带；5里以外通常为我区，每年需要多少给敌伪一点维持费用；7里以外则称抗日民主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已扭转了历史车轮，使之加速地推向全国胜利。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顾后瞻前，20年前以农村作为胜利起点的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新阶段，陈毅要求部队要善于抓住时间学会攻坚。他说：“共、国两党二十年来在各方面的论争，思想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的论争，主要是土围子不能解决，敌人在土围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不学会攻坚，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学会了，革命就快成功了！”

(19)

### 三 战略战术思想

陈毅对于战略问题的研究是颇费心力而且造诣甚深的，归纳起来可以着重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 （一）军事战略对于政治路线的依存关系

陈毅认为，正确的军事战略是在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才得以产生并加以推行的。相反，在错误的政治路线之下，必然产生错误的军事战略。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作了深刻的历史回顾：陈毅指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从而正确掌握了创造革命军队、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方针。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地方党部均从实际出发，创造了分散游击的游击战略，以打游击为中心发展了自己，积小成大，创造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区域。这一伟大的成就，解除了由右倾机会主义转化而来的取消主义的武装，也彻底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复仇情绪的盲动主义残余。这种优异的游击战略是在反右、反“左”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正确路线。1930年以后，党更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间隙，全国各地均大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时，国民党采取了大“围剿”战略，各地的红军又从游击战略转到以运动战为中心的反“围剿”战略。一面克服立三主义的冒险主义，一面克服张惶失措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划地自守的保守主义，执行了巩固向前发展的“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正确路线。

陈毅指出，从创造红军和苏区至反对第三次“围剿”为止，党的正确路

线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一切从估计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出发，一切从承认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各地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一切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民权革命性质出发，一切从农村特点经过根据地斗争向全国推进出发，一切从红军弱小、敌人强大，必须在长期斗争中改变敌我形势以争取最后胜利出发。这就构成了一条反对党内“左”、右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根据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其根本精神在于将红军与苏区数百万人民的力量相加去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苏区有形的（如地形、物质等力量）、无形的（人民、红军的政治和精神力量）力量均适当的动员起来，去制造敌人的错误，去混乱其部署，去达到干脆消灭敌人的目的。”（20）

然而，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后便逐步取代了上述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其实质便是，“拿几个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主观愿望代替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正确观点；拿冒险夺取城市为中心的观点，代替了从农村和根据地出发的观点；拿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代替了中国革命尚处于民权革命阶段的正确观点；拿中国革命的速胜论代替了中国革命应该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否认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拿指责党的工作不平衡的官僚主义态度来抹煞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幻想以红军的一击和党员的冲锋即可在明天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承认红军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天天叫喊“敌我优劣形势业已起了根本的或极其有利”的变化的过分估计的行动，因而制定了冒险进攻的决战策略，在军事上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进攻战略代替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把外国国家规模的战略机械地移用在当时还在发展、而发展尚不充分的苏区和红军的作战上，这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陈毅的结论是，正确的军事战略是在党内激烈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其正确的军事战略的代表是毛泽东。

## （二）准确判断时局发展，是制定与执行正确的军事战略的首要条件

陈毅认为，正确的军事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依赖于对整个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局势的发展的论断的准确性，是取得领导群众的首要条件。”（21）因而他一贯地重视对政治形势的分析。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

1927年10月，他协同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由闽粤赣边境向湘南挺进时，孤军转战，长途跋涉，敌军紧追不舍，部队得不到休息和补充，减员日众，已临最后溃散的绝境，朱德及时向大家指出：只要坚持斗争，革命是有希望的。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陈毅十分赞成这个分析，号召大家拥护朱军长的领导，果然一个月后，湘、桂战争爆发，追兵没有了。部队得到休整，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1928年冬至1929年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4军前委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预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可是，那时国民党军阀围攻井冈山正在加紧，看不出有因内哄而退兵的痕迹，红4军出击赣南又连连失利，因而党内有些人则认为国民党军阀混战不会爆发，意欲将红4军化为若干游击队分散活动，甚至主张朱德、毛泽东也应离队到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以缩小和

隐蔽目标。对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4军前委指出：这对形势的分析太悲观了，4军还应集中行动，如果分散游击难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久，果然蒋桂战争爆发了，证实了4军前委判断的正确。对此，后来“九月来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话；认为把红4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或者把红军4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系，“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子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己(22)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害。”由于对政治局势有着正确分析，红4军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略，辗转游击于闽粤赣边境。几个月后，乘国民党军阀混战之机，打开了一个大的局面，把红军与根据地的影响推进到了全国意义的范围。

当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之后，中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便开始了，对于红军长征后的政治形势应如何估价，身负重伤的陈毅是倾注全力的。当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敢承认失败，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转移后的打胜仗上，认为只要他们在湘桂边打几个大胜仗，敌人就会撤退，中央苏区又会恢复那轰轰烈烈的局面，因而不肯作适应新形势的转变。陈毅则认为，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最后作了逃跑主义的退出，断送了经过辛勤缔造的中央苏区，敌人大军压境，一场反革命的大风暴随时可以袭来，在此革命低潮时节，应该承认失败，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退却，实行彻底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反革命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过去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根据这些分析，经过了四、五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完成了转变，最后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从抗日战争开始，经过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胜利，都有着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切实地指引着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陈毅依然重视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对军事战略的钻研，从而在实践中多所创造，使华中、华东的斗争成为全国全军有力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三）对各个历史时期战略战术的认识

陈毅在红4军初创时期，便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所创造的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注意研究和运用。他认为这是在中国这个国度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的军事创造。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以农村条件对新式武装的城市敌人作战，就出现了这个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这是中国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唯一办法。”这种战略战术以后不断发展。“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江西苏区，大规模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使这一战略内容更丰富了，原则更扩大了，那时提出‘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不怕苏区被敌人占领，不怕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使敌人深入以后，再聚歼他一部分……因敌强我弱的条件未变，我们唯一的长处是政治条件，即群众条件，将敌人引入我熟悉的地方，敌人的长处变为短处，才易最后将他消灭。”“抗战八年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强，我们的战略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利用我们的长处和农村环境，以疲惫敌人，进

而消灭敌人，求得敌我形势逐渐改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上是运动战的方针，其原则不变”，“是综合了苏维埃内战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就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不得不停止了，我们跳过来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进入反攻，敌人是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让出地区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3)陈毅这些意见，都是围绕着敌强我弱来考虑的，他颇通俗地说：“若是我为绝对优势、敌为绝对劣势，就不用这个战略方针，就象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下把他抱起摔到地下就对了，用不着先退两步再去打他。”陈毅指出：“我们与国民党比，军事上相对的弱，政治上绝对强；国民党在技术上、财政经济上是相对的强，政治上却是绝对的弱，因为他卖国独裁内战，他不可能采取这个战略，若采取了失败更快。”(24)

从1930年到1932年的历次的胜利的反“围剿”斗争中如何执行这一战略方针而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的呢？首先就是发挥红军的政治优长，尽量取得人民的援助，诱使敌人进入苏区腹地后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对此当时有两个方面的创造：一是创造了苏区根据地在反“围剿”中一整套的作战经验，地方党部、政府、群众团体均各在自己的战争岗位上共同努力，达成战胜敌人的任务。人们完全信任红军，并能统一在红军总的战略意志之下，分散进行各种参战工作，如筹粮、扩军、送信、侦察、封锁消息、救护伤员等等，各司其事，形成了苏区与红军不可战胜的力量。二是红军主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赤卫队、少先队等）三者密切结合，红军主力作为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后盾，而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转过来作为红军的外围，诸如牵制敌人、疲困敌人、阻止敌人、迷惑敌人等，均由地方武装负责，让红军养精蓄锐争取胜利的一击。

其次，把地形条件提高到战略部分作充分利用，自由选择战场和预先准备战场，利用崎岖山路，道路阻梗，疲困敌人，分割与肢解敌人。

第三，将每一次反“围剿”全过程作系统研究，将每一阶段、两个阶段之间的任务，以及全过程中每一关键，关键相互之间的联系均作精审的打算，也就是将战略、战役、战术、战斗四者之间由大及小、由小及大作全盘准备，有胜利的准备，也有失败的准备，力求改变敌我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变内线为外线，变防御为进攻，变劣势为优势。

如果说反“围剿”的斗争是当时全军都经历过的事，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仅仅是一部分红军所经历的事了。陈毅深深感到三年游击战争的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统一的方针、统一的意志和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而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失败和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迟或早是一定要爆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而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陈毅说：“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受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走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25)

陈毅认为，这三年游击战争，“较之前此的游击战有了新的创获。”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巧妙地把武装游击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把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相结合，战局变化能适时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这样便达到坚持游击战争的目的。”(26)这把严重的敌情，高度的分散，长期的坚持，多变的斗争方式都集中起来了，这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打仗，陈毅说：“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西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27)为了把游击队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都教会打游击，便编了歌谣让大家学习背诵，以便运用：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军的战略战术水平又有新的提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空前发展，而陈毅自己，不仅阅历更多，地位也更高，由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江南、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进而代理新四军军长，他的战略战术的造诣也随着斗争经验的积累而愈加成熟。1942年春，他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建军报告时指出：

“我们的战略总方针，是统一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目前我们组织战役和部署战斗的指导原则，仍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之下的运动战。”

“我们的战斗方式则强调近战、夜间战、白刃战、袭击战、埋伏战等。这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手段，一切战斗动作，均围绕着此一中心。”

由此可见，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异。作战的一切要求便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改变。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中敌后战场是十分复杂的，它完全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各种势力并存，我们的战法势必因作战对象的不同而各异。对此，陈毅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

“打击敌寇的胜利，均依靠广泛的游击战辅以必要的运动战。”

“对克服反共逆流的进攻，均依靠强有力的运动战，辅以广泛的游击战及必要的阵地战。对匪伪交通实行破坏战。对敌伪推进据点实施阻击争夺战。对潜伏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土匪和危害分子施行清剿战。”这就要求我军对

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均应学习和研究。在主力部队应该全盘掌握，地方部队与民兵，应该特别强调游击战。陈毅从我军担当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出发，他强调说：“我军不拒绝采用任何战斗方式，而且应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战斗方式。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团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到持久的城寨战，均应列在我军研究、训练和试用的范围内。”至于武器装备。陈毅指出：“对近代新式的高、重、热诸种兵器应努力研究，设法逐渐添加，以改良自己的装备。对旧式的短、轻、冷诸种近平原始的兵器，则仍不拒绝采用。”他特别提醒人们：“敌后的复杂的战局，使我们不能不采取又简单又复杂的战法。”并且指出在灵活用兵、积极歼敌的前提下，“积蓄力量，强大自己，经常保持自己编制和装备，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积蓄有生力量以侍有利时机”进行反攻，这就“是我们应采取的整套的军事方针”。(28)

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扫荡”。陈毅曾说：“几年抗战史是一部反‘扫荡’的历史”。因而他对反“扫荡”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总结，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对比出发，作出了如下的论述：

“反‘扫荡’的具体形势是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破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29)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规律。

对于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他十分辩证地作了如下阐述：“发展广泛游击战，但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拼。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要学会隐蔽埋伏，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侧翼，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妨碍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30)陈毅特地指出，这是以我军的兵种对付强大敌人，在敌后农村环境里，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它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不能以一个取消另一个，而要统一去理解它，运用它。

解放战争开始，陈毅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是“爱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中国之命运是走向自由和光明或是走向黑暗专政，这要由这次战争的胜败来决定。”(31)这就要求部队打运动战歼灭战，要高度机动，趋利避害。那时陈毅满怀诗人的激情对部队动员说：“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均是顽敌就歼的场所，也是我们机动的范围。一个奔袭

打了胜仗在华中吃早饭，回头一仗歼灭了山东境内的敌人再宿营，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要求。千里奔袭，灭此朝食，就是我们的战斗。”(32)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华东野战军南北驱驰，打了一系列的大歼灭战，常常使中央军委感到“甚好，甚慰”。但究竟如何组织这样的战役和战斗呢？陈毅归纳了以下几条经验：

(1) 开好战役准备会。如以消灭敌人一两个军为目的，必然是数天数夜的一场恶战。往往包含连续几次战斗。因此，战役前商定作战计划是首要之着。务使各兵团首长到齐，经过会议，了解全部作战企图及各兵团在总企图下的本身任务，估计和预见到战斗发起后的复杂过程，对各种意外的不利情况应有预见和各种准备。这是全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主要在能造成各兵团协同，上下一致。会开得不齐心，宁可再议，甚至放弃战役之进行，另寻新的战机。

(2) 战役战术的准备：作战计划制定后，立即草就作战命令，召集各兵团首长，共同作地图研究。同时协商各种技术准备。如弹药准备，通信手段检查、粮秣，医药、保管、打扫战场等项的专门会议和计划等。野战军司令部应派前方指挥所到主攻方面，主持战场指挥。

(3) 战役兵力部署和动作：一是选择战场，我军宜隐蔽集结距敌二天路程，预定敌我对进各一天，其遭遇地点，一般是最利歼敌的预选战场，而以易攻难守的地形为最好。二是兵力使用，总兵力在我军超过敌军三分之一的优势下即可部署机动。兵力配备，应力求分割敌军部署，如敌军是两个军以上，我以一部担任一翼或两翼的钳制，而集中三个纵队左右的兵力，首先歼击敌一个旅或两个旅，求得以多打少，各个击破，切忌“一杯干”。三是大胆使用钻隙挖心的突击方法。一般是使用一个或两个坚强纵队，施行锥形突击，楔入敌军纵深，大胆从两部敌军之间（两个师或旅之间）钻隙透入。不被两边敌军的夹击所抑留。要乘其夹击未组织前，即已透入其纵深。我军宜将三个至四个旅重叠起来，象利刃插入敌心脏，然后分割、肢解。这支突入部队从敌接合部钻入敌之纵深时，宜专寻敌之指挥机关和直属部队猛攻，使敌神经中枢首先受到突然打击，造成阵势混乱，前卫后退，后卫不前，左右翼各自就地自守，给我以各个歼敌的良机。陈毅根据华东野战军在 1946 年 12 月至 1947 年 5 月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胜利的大歼灭战的实践，充分认识到这种战法的以下依据：第一，敌军的接合部在通常情况下是两不管地区，空隙似小而实大。我军夜间钻入，压垮其警戒或联络部队，容易得手。第二，敌之第二梯队纵深，是敌指挥机关及直属队分布地区，战斗力最弱，行李马匹最多，防御能力亦最弱。第三，当敌之指挥机关挨打后，其前后联系将受阻，其归路易被我切断，敌将更恐慌。第四，敌之友邻兵团，一面为我侧击部队所钳制，一面受我突入部队的威胁，必以自保固守为先着。在我军突入一两日内来不及改变部署，也难于组织有力的应援。第五，我军突入敌之纵深后，应先打垮敌人，夺取敌人的驻地为我之立脚点，这是敌军难于防御与意料不及的。陈毅强调说：“我军对敌几个军靠拢使用推进战术时，不用此钻隙挖心的办法，只从正面或侧翼进攻，皆无法达到歼敌目的。此种战法，形式上突入敌之包围是冒险的，实际上是一种集团兵力的奇袭，乃是奏效最易的。”四是强有力的正面攻击和两翼钳制。我军举行钻心突击之前，必须先正面作有力的攻击与在侧翼作有力的钳制。正面有力的攻击迫使敌人专注意前线 and 正面，不及顾虑其后方和腹部，两翼钳制则遮断或麻

痹其增援，便利我先歼敌军之一部。没有这两方面的积极动作相配合，贸然楔入敌阵是危险的。五是注意扩大战果，克服战场在胜利后之混乱。战役进行的第一晚，每需24小时左右才能与敌接触。当夜仅能驱逐外围之敌即已天亮。第二天天亮后除继续进展外，宜以组织当夜第一次总攻为指导中心。第二晚，力求歼灭敌一个团或一个旅。第三天白天继续战斗。第三夜是带决定性的一夜，必须保证敌之大部被歼。但也不可性急，能给部下以时间组织一两次强有力的攻击更好。当第三、四夜可判定敌之大部被歼时，则第一个战役之目的大体已达到，即应作扩大战果之部署。如不能奏效，则应考虑主动撤退，不可恋战。但也不可为左右和部下片面意见及局部情况动摇，因敌军此时亦更困难。统帅的明智和独断，恰恰需要在此时表现和受考验。(33)

#### 四 军事哲学思想

这是一个涉及陈毅的军事思想的哲学形态的问题，是体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的问题。

##### (一) 中国革命军事学的形成及其特质

陈毅认为，中国在近六千年的历史中，战争频繁，将星辈出，但自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民族伟大的军事传统被淹没搁置，让位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说。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近数十年德国军事学经过日本的改装传入禹域，于是开始了中国军界的“洋泾浜”式的买办军事学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实质，造成了强固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恶劣军事传统。从小站练兵起，中国废除绿营和游勇，采围资本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创造了所谓的“新军”。这个“新军”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他们造成了军阀主义。对外敌屈服献媚，对人民横蛮镇压，祸国殃民乃是其基本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伟大的北伐战争击破了北洋军阀，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大革命的失败使这一点革命影响败坏，封建买办的奴性气息又统治着中国军界。事实证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担负起建设中国军事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不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将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于军事领域，又正确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便又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完整的革命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学，真正代表中国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独立的革命军事学。

陈毅指出中国革命军事学与历来的军事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假如历来的军事学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胜负问题；假如历来军事学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的革命本质。

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认为应该否定和排斥一般的军事原理和战争原则

呢？陈毅断然认为是不可以的。他于1942年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军事报告中说：“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世界革命战争原则，但不能拿来同中国革命战争原则等量齐观；我们应该承认和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原则，但不能对敌后战争的环境毫无研究、毫无出入去照搬老套。一般战争与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共同为战争的同一性，可也有其差别性。一般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在原则上具有共同为革命战争的同一性，可也具有其本身特点的差别性。一般中国革命战争的原则，无疑义的是我们今天抗战军事原则的指导理论，可是运用到当前的敌后环境，又要因我、敌、地形、任务之不同，要求灵活变动，不能划地以自限。”（34）陈毅对战争原则的同一性与差别性是有分析的，对整个军事学问题也是作同样的分析的，这反映了他在研究军事学和军事问题上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 （二）军事是社会现象总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陈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军事问题，驳斥了从来各种剥削阶级所谓军队超政治、超国家、超阶级等反动思想，而认为军事是政治的继续。”（35）他认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军事问题，而应把军事问题当作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尽可能完整的中国革命的军事政策。其中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

但从社会现象总体中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来看，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必须承认军享受政治的支配，必须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必须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是陈毅在理论上对军事与政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本阐述。这一重要论点，其基本精神当然是符合马列主义关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特殊的政治的基本原则的。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便提出了以下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要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要善于使两者密切配合；不仅要善于指挥军队作战，还要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要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要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要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要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要善于使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这样去打击敌人并最后战胜敌人。（36）对于以上各项要求，陈毅始终是勤于实践并且善于总结经验，而且愈做愈活，愈做愈精，愈做愈收到更大的效果。这同他从来不孤立地看待任何事物的哲学思想有关。

###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大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

对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优点的论断，历史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对中国革命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和手段才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作出了正确的指导，但是仅仅承认与坚持这个优点和特点，还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然取得胜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城市中心论”成了失败的代词。陈毅分析了历史的经验，认为要对中国革命作出更正确的指导，不仅要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还要了解农民革命战争是这个武装斗争的特点中的特点，而这个农民革命战争必须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发展达到成功，这又是特点中更大的特点。因此，懂得打仗和训练军队，并不等于懂得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懂得作农民运动和地方工作，只是农民工作的起点，并不是中国农民斗争的全部；农民与革命与战争相加，再加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是全面的东西。

1945年3月，陈毅在延安作了这样的论述和推断：“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建设党是我党进行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而这三大法宝，无一不以农民革命战争为中心。掌握这一点，我们进行了伟大的内战，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战。我们因之以创造游击队，更要因之以掌握正规军。我们因之以掌握了乡村，更要因之以掌握城市。我们因之以掌握农业、手工业，更要因之以进到掌握工业和进到掌握现代化工业的水平。我们因之以掌握农村根据地，更要因之以掌握全国政权。”（37）

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和阶级力量的对比，陈毅十分注重研究中国农民暴动的经验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农民暴动的反复，是千余年来中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其斗争形式是农民革命战争，其战略战术是在广大地域上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其力量构成，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干，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其基本政策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常常着手土地制度的改革，从而造就伟大革故鼎新的规模。其锋芒所向，一面打击了旧的封建统治，一面是多少变动了社会生产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因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但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优良传统是应该继承的。这种认识，对于他在加强军队与根据地建设方面颇有影响。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说过，我们的根据地和军队是一个农民集团。因而在加强党对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十分注意照顾农民利益与帮助其改造，强调部队与地方的兼顾与相互支援。1948年夏，他在中原局高干会议上指出：这次战争就是为了土地而战，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民主自由是上层建筑，土地则是基础，前线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与后方土地运动相结合就是胜利。战争的内容如果只有前方的解放战争，没有后方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战争的内容是不充分的。前方的战争掩护土改，后方的土改支援战争，这样造成我们的胜利。

#### （四）以对立统一的规律指导军事斗争

早在1927年冬，他与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抵达赣粤湘边境时，便运用国民革命军第16军范石生部畏惧遭蒋、桂吞并的求助心理，成功地建立了统战关系，以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为掩护，求得整训与补充，并准备湘南起义。抗日战争时期，首先在苏南大力开展统战工作，迅速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10月，由于统战工作的大力开展，保障了黄桥决战的辉煌胜利。陈毅所总结的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被中央军委通报全军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参考材料。以后在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均多所创造。

陈毅说过，统一战线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战略战术。所以马克思主义完全用军事上的原字，我们党译成策略方针，策略在军事上就是战术：谁是敌人，谁是同盟军，谁是领导者，谁是朋友？战术步骤先打哪一个，再打哪一个；先中立哪一个，再中立哪一个；哪个作第一梯队，哪个作第二梯队；哪个防御，哪个进攻，政治上与军事上是相同的。近百年来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是得到军事学的启发和借助的。所以统一战线思想就是无产阶

级阶级斗争的正确思想，统一战线要与阶级斗争统一地去了解。最懂得阶级斗争的人也最懂得运用统一战线；最会运用统一战线的人一定懂阶级的利益。陈毅十分尊重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他懂得事物均由矛盾各方组成，矛盾各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可以相对地统一的，因而事物的统一体又是可以分析的。根据这些哲学原理，他对于“团结（争取）多数，反对（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是精心研究而不断在实践中创新的。

1944年春，他在延安向党中央所作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华中地区是处在敌伪与顽固派两大力量对峙之间，处在敌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派遣军之间，处在华中汪伪与华北王伪(38)之间，同时敌伪内部矛盾，伪军与伪府矛盾，伪府本身矛盾和伪军内部矛盾，以及顽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矛盾，顽方内部派系矛盾，敌伪与当地人民的广大矛盾以及其他矛盾等等，极为复杂错综。以上种种矛盾虽然以民族矛盾为主潮，但每一次要矛盾虽小，在地区斗争和策略上有极重要意义。”这意义当然就是可资利用而达到对敌手的各个击破，从而加强自己，发展自己。

在这里，陈毅列举了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

一是对付敌顽夹击的经验：要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作战。我沉着应付，打破危局。

二是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是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是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的方策是：予敌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顽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矛盾，而最终达到制服伪军的目的，使伪军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在华中敌后，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扼我。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在策略上战术上仍区别其问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确定对策。

三是对付反共顽固派的经验。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的分析，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到的效果。当陈果夫在江苏当政时，顾祝同、韩德勤及“复兴社”受CC的打击(39)；以后韩系当政，CC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CC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北地方CC对我帮助甚大。后来韩德勤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40)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企图中立霍守义以打击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依违两可之间，以求生存。由此可见，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满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战略目标。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学问题，陈毅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为旗帜的。他在1945年春为准备中共“七大”的建军报告时，曾经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他说：长期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

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他已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的精神武器，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又在军事领域创造出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完整的军事理论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学派，即毛泽东军事学派。这里的“中国革命军事学派”和“毛泽东军事学派”实际上就是指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军事学。陈毅的军事思想的许多方面，便是从他精辟论述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军事学中反映出来。

**注释：**

(1)(3)(4)《陈毅诗词选集》附录《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62页。

(2)巴曼子其人，见《辞海》巴曼子条目。1919年陈毅由成都赴法国勤工俭学途经重庆时，遵照他的父亲的嘱咐，曾到通远门外的巴曼子墓前凭吊。

(5)“保路风潮”：参见《辞海》第254页“保路同志会”条目。

(6)“顺泸起义”：1926年冬，以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委军委策划的为响应北伐而准备在四川的顺庆（今南充）和泸州等地发动川军的起义。后失败。

(7)刊载于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此件并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8)(9)见《党支资料通讯》1987年5、6期（纪念全民抗战50周年专辑）。

(10)(19)(23)(24)陈毅：《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1947.12.30——1948.1.1在晋冀鲁豫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1)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12)(16)(20)(36)(37)见陈毅：《建军报告》（初稿）1945年3月1日。

(13)(17)(35)陈毅：《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1951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

(14)陈毅：《关于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报告》（1929年9月1日）。

(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18)(21)(28)陈毅：《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1944年春）。

(22)一些文件或印刷品写成“自了自己”，笔者认为有损原意，故将“己”字改为“死而后已”的“已”字，是完结的意思。

(25)(26)(27)陈毅：《回忆三年游击战争》（1959年）。

(29)(30)陈毅：《论军事建设》（1942年7月15日《真理》第8期）。

(31)(32)陈毅：《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1946年7月14日在前指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33)陈毅：《组织战役和战斗的经验》（1948年1月）。

(34)陈毅：《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1942年7月《军事建设》创刊号）。

(38)分别指汉奸汪精卫和王辑唐。

(39)由陈果夫领导的国民党中的一个派系。

(40)国民党东北军系统的第112师师长。

**作者** 吴克斌 1927年生。南京军区政治部专业文学创作员、《陈毅传》编写组副组长（离休后回聘继续任职）。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党史、军史：发表过《当战略决战形势来

到的时候》、《总前委书记在大江南北》等论著数十篇；参加过《星火燎原》、《陈毅传》等书的编写工作；担任过《让历史告诉未来》电视系列片等作品的军史顾问。现正从事《陈毅》文学传记、《陈毅军事文选》等的编写和选辑工作。

##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初步研究

李维民

罗荣桓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斗争中，他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以及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重要贡献，从而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罗荣桓对丰富和发展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贡献

罗荣桓从 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开始，即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是三湾改编时 7 个红军连队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红 4 军政治委员、红 1 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 115 师政治委员、第 4 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毕生致力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一系列重要理论。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和部队基层建设

1929 年举行的中共红 4 军第 9 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罗荣桓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他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性质、任务和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等重要意见。会前，他参与毛泽东主持的为起草决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会上，他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sup>(1)</sup>，被选为红 4 军前委委员。建国后，罗荣桓在回忆这段重要历史时曾经深刻指出：“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sup>(2)</sup>在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为在红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倾注了主要的精力。他曾坚决抵制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无纪律状况，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他以关心和爱护士兵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其他干部，反对官长打士兵的军阀主义作风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树立和维护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积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危害党的统一领导，同党争兵权、闹独立、搞分裂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罗荣桓特别强调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观点，要求保持党的独立领导地位。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直率地谈到，部队改编后由于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他提出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机关，加强党支部的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威信。

罗荣桓尤其关注部队基层的政治工作建设。他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

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3)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罗荣桓领导 115 师开展建设模范党军的活动。

1940 年 10 月，他先后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规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加强营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出一系列具体规定。

1941 年和 1942 年，他先后亲自主持 115 师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4)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就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而又简明的论述。他指出：“连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完成战斗任务不仅靠军事，而且靠政治，没有政治上的保证，便不能发挥高度的战斗力。”他要求“巩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效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一贯主张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继续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他发表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继承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文章，多次讲述古田会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并具体领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几十年来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将政治工作的原则、任务和基本方法，简明而又系统地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法规。其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

## （二）毛泽东思想是建军的指导思想，同时要对毛泽东思想坚持科学的态度

罗荣桓是最早倡导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作过深刻的阐述，他在 1944 年 7 月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天才战略家，他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与实际，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了革命军队的本质”。(5)

罗荣桓倡导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一开始就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6)1958 年 8 月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他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一条线五结合”的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要以党史为线索，要求从具体历史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五结合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列著作相结合；和学习党

的路线政策相结合；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7)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所谓“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等口号，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引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歧途。罗荣桓针锋相对地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象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见影。”(8)1961年4月14日，罗荣桓给正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9)在同月30日军委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罗荣桓当着林彪的面，尖锐地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10)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罗荣桓与林彪的这一原则性的斗争，曾在党内、军内引起深刻反响。邓小平曾两次讲到这件事情。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11)1977年5月，邓小平又讲到：“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2)

### (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罗荣桓一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强调从部队实际出发，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罗荣桓就是一个扎根于基层，和士兵打成一片，善于根据士兵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党代表。他担任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仍然经常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建国后，他因切除一侧肾脏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曾向他建议：“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13)但是，罗荣桓除了经常找干部谈话外，还是坚持到部队视察，甚至到海边防部队调查了解情况。他经常用毛泽东讲的“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鞭策自己，教育干部。要求机关干部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14)他要求“政治机关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地顾及到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并把握与中心工作的联系。布置与计划工作时，要切实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与能力。”(15)由于罗荣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而能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他能及时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罗荣桓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联系实际。1942年3月，他在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非常明确地指出：“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学习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16)他还批评了“只追索小组汇报党员和战士的一些

日常生活检讨，而不去认真领导小组学习的做法。”(17)他特别提出，培养教育青年战士，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青年的积极性，要在不断的工作中去充分发掘出来。如果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太高了，把他们当成理想中的青年，那是不适当的，相反地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信心。今天那些繁多的‘模范’要求，可以说成了青年的手铐脚镣。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8)

罗荣桓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很严格，坚决反对危害部队集中统一、削弱部队战斗力的种种不良倾向。但是，他坚持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耐心说服，启发自觉，反对动不动就整人、惩罚人的错误作法。特别在“肃反”、“审干”等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神秘化观点和“逼供信”的做法，并身体力行，保护了大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大搞肃 AB 团(19)时，罗荣桓任红 4 军政委，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被诬为 AB 团分子的干部战士，“罗政委刀下留人”曾在红 4 军传为佳话。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微山）湖西地区出现错杀无辜的“肃反”事件后，罗荣桓赶赴现地，断然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数百名干部，处理了挑起这一事件的祸首，1940 年 5 月，他在给锄奸干部讲话时，特别强调了锄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克服脱离群众的神秘化倾向的重要性。他指出：锄奸工作的神秘化，表现在部队中有些问题可以公开的没有公开，应该去进行教育的也不说不讲，结果是只搞秘密活动，用隐蔽的方式，记帐式的把许多现象搜集起来，把问题搞得严重复杂化，结果不但不能打击敌人，相反地打击了自己。

1941 年 10 月 18 日，罗荣桓主持 115 师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处分党员的决定》，指出了过去思想斗争未达到耐心教育的目的，处分和开除党员未经过一定的手续，不发扬民主，甚至意气、成见用事，失掉党的组织原则等现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六项决定：一是强调开除党籍是对不可救药分子不得已的处分，应当慎重处理；二是处分犯错误的党员，要分别错误大小，分析主客观原因，作出适当的结论；三是开除党员党籍必须吸收本人参加，支部大会通过，作出书面决议，并经上级批准；四是被处分与被开除者如不服，可直接上诉至中央；五是接受上诉机关认为处分不适当时即应改正；第六条强调，对于党的纪律的执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耐心教育，不应主观主义，自以为是。罗荣桓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充分地体现了处理党内矛盾的实事求是原则。

**（四）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建立人民军队民主制度的工作，致力于清除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成为善于运用民主方法团结教育干部群众的模范。抗日战争时期，他在 115 师讲连队政治工作问题时指出：“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不能与军事管理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在军事方面有些是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的不足，巩固高度集中的行动，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通过更艰苦耐心他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政治自觉，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20)1956 年，他在论述军

队政治工作传统时明确地指出：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21）

罗荣桓把这种方法通俗地比喻为：“响鼓不用重锤敲”。就是要求对政治工作的对象充满热情和信任，对同志着重于鼓励、启发、诱导和说服，不用重锤去敲打。他反对随便整人，也不赞成在思想教育中树立“对立面”，或把一部分人划为“落后分子”。强调政治工作人员绝不能降低政治教育与说服的积极作用，认为“如果战士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愉快的情绪，一切消极的防范，都只有一种暂时的效果。”（22）

罗荣桓作为军队高级干部，他实施领导，不是靠他的地位、权威和命令，而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特别是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他说：“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23）罗荣桓对政工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他经常教育政工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强调，政工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在讲古田会议精神时谈到：“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24）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工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谈心。大家把他看作温柔敦厚的兄长，诲人不倦的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解放军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多次告诫大家，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发扬民主，坚持说服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党、军队历来是发扬民主的。现在由于许多制度改变了，实行了军衔制，戴上了军衔肩章，发扬民主就更为重要了。”他还说：“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25）

**（五）任人唯贤，公道正派，“五湖四海”，是干部工作的基本原则**

罗荣桓长期主管军队干部工作。他认为，干部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坚持党管干部的制度，把干部工作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下，提拔和调配干部要求由党委集体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干部管理工作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加强了干部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建设。

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反对拉山头、搞宗派，坚持团结“五湖四海”的干部一道工作。从秋收起义以来，他经历了从井冈山会师到1、2、4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大会师这样许多次各路革命力量的会合，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革命力量的大团结。他经常教育干部：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

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十分注意团结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同志。特别在部队整编时，他总是公平合理地安排使用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 115 师到达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很注意团结、使用从 2、4 方面军来的，以及山东本地的干部。他率山东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后，又强调对从全国各地调来的部队和干部要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建国后，他主持组建总政治部机关时，明确指示，总政治部的干部要从第 1、2、3、4 野战军与华北部队选调，还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红军的关系，特别叮嘱不要从四野调人过多。

罗荣桓坚持任人唯贤，反对按个人的标准去选拔干部。

1944 年 9 月，他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很深刻他讲到这个问题：“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那只有剩下亲近的人，也可能是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脚色了。”(26)

罗荣桓对于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根据德才标准，严格要求，大胆使用。他告诫知识分子干部克服“理想多于实际”的“个人英雄思想”；告诫工农干部克服“摸索多于理解”的“狭隘保守思想”。(27)强调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并且规定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要负团结的主要责任。

## 二 罗荣桓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贡献

### (一) 抗日战争时期，在建立敌后根据地，反击日伪军“扫荡”、“蚕食”中，正确运用并且丰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7 年 9 月，115 师刚刚到达山西前线，罗荣桓就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敌之翼侧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指示，率领师政治部的大部分干部和少数部队，到达山西和河北两省交界处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为在这一带建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此后，罗荣桓又率 115 师部队开辟晋西吕梁山根据地。1939 年 4 月，他与陈光率 115 师师部和主力一部到达山东后，又领导创建鲁南根据地。他根据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复杂形势，提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建立根据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的地盘，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势力范围；打，就是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进入山东的东北军和其他与我友好的国民党部队，孤立反共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磨擦。这六字方针，不但正确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而且概括了山东各部队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罗荣桓坚决贯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反对以大兵团正规战为主的思想。

1938 年 3 月，在山西前线，他与陈光指挥 115 师部队，采取以小部队打小仗的办法，将部队以营、连、排为单位，分散预伏在蒲县至大宁之间道路

曲折、地形复杂的午城、井沟一带若干个阵地上，此起彼伏地分段阻击和消耗活动在这条补给线上的敌人，平均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转移到别处打。连续打了五昼夜，共歼日军千余人，焚毁敌汽车 60 余辆。取得了用兵少、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创造了游击战争的范例。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罗荣桓介绍了午城、井沟战斗经验。

罗荣桓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后，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继续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反对脱离实际热衷于打运动战的思想。从 1942 年 8 月起，罗荣桓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文章，论述游击战争战略思想。他针对有的同志认为敌后抗日军队的战略指导原则应该逐渐走上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思想，明确地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低下，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更无法解决技术上之贫困。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或现在还有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地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行为：当着胜利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失掉信心。”(28)

罗荣桓同时指出：攻围寨战、运动战，在游击战中也是存在的。这是由于我们在普遍积极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围寨战）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都只限于局部战斗，我们一般的作战方法还是采取伏击偷袭敌人，完成于短促时间以内。如果少数敌人深入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等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消灭，甚至运用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敌援兵等，但这并不是完全的正规战，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29)

罗荣桓不但强调必须以游击战为主，而且号召普遍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他提出：“我们主力军，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组成的重大因素。因此我们主力甚至地方基干武装，在建设自己上高度强调正规化，忽视对民兵游击小组的推动，这对贯彻游击战指导方针是有害的。”他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并且是愈益趋于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一切违背这一指导方针的东西，都要去掉。”(30)

在坚持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的方针下，罗荣桓根据山东的斗争形势，从战略和战术方面，分别提出了坚持根据地的边缘游击区，和普遍采用“翻边战术”这两个重要决策。

罗荣桓认为：“敌人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形紧张。”(31)他指出，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在敌人继续紧缩包围的形势下，根据地将会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

为游击区，他认为，不很好地坚持游击区，就不可能巩固根据地；不大量地发展游击区，就不可能建设和扩大根据地。因此必须把坚持边缘游击区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坚持边缘游击区的斗争，罗荣桓提出了隐蔽、精干、分散、机动等一系列方法和措施。他说：“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32）

在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对边缘区进行大规模蚕食的情况下，罗荣桓为了扭转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困难的局面，总结历次反“扫荡”的经验，从1942年提出并逐步在山东战略区广泛采用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

开始，敌人用“分进合击”的战法“扫荡”时，八路军一般以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比较好的老区为依托，在根据地内分兵与“扫荡”的敌人周旋。敌人采用“铁壁合围”的篦梳战术以后，八路军在根据地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罗荣桓认为，如果我军仍然局限在根据地之内与敌周旋，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包围圈步步紧缩以后，更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为了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他提出必须采取“翻边战术”，就是把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人接近的边缘地带，当敌人“扫荡”时，主力部队不是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是趁包围圈尚未紧缩，还有较大的空隙时，及时选择敌之弱点，打到敌人的后方去，迫敌回援，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挫败敌人的“扫荡”。

罗荣桓亲自指挥115师部队，在1942年11月进行的海陵反蚕食战役和接着进行的郯城战役，就是运用翻边战术的范例。海陵在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南临陇海铁路，东接江苏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地。日伪军为了切断我军南北联系，极力“蚕食”这个地区，向北一直到了距115师师部长期活动的地带只有一二十里，对滨海抗日根据地南部构成严重威胁。1942年秋后，日伪军策划对根据地“扫荡”时，罗荣桓也制定了在海陵地区进行反蚕食作战的计划。当敌人集中1万余人兵力，分12路向沂蒙山区“扫荡”时，在战斗打响后第二天，罗荣桓即指挥115师部队，迅速向陇海铁路挺进，开始进行海陵战役。八路军出敌不意地逼近敌人控制的陇海铁路，6天内连克敌据点16处，歼敌1000余人，115师部队仅伤亡40余人。海陵6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后，由被动转为主动，使我军能够更有计划、更主动地反击敌人的“扫荡”。

随着军事斗争形势逐渐好转，罗荣桓又及时提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和在主要方面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由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发展。从1944年开始，罗荣桓指挥山东军区部队，发动了一连串战役攻势，有计划地进行讨伐伪军的连续作战，逐步打破了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并且逼进到敌之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附近，把斗争推向敌人的心脏地区。

1944年8月，山东军区部队在罗荣桓统一部署下，连续攻克由日伪军联合守备并有坚固设防的沂水县城和利津县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认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山东八路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

在向日伪军进行的局部反攻中，罗荣桓特别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重要性，各区普遍加强了对敌伪军的瓦解工作。从1944年7月起，连续争取了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等大股东伪军的起义。在罗荣桓指挥下的山东军区各部队，经过一系列战役攻势后，1945年8月展开向日伪军的大反攻，迅速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外的山东大片地区，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山东八路军部队发展到27万人，占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以上。罗荣桓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为山东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提出重要建议，坚决执行并且丰富发展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率领山东军区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他到东北不久，就正确地分析了东北地区的敌我形势，提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

1945年12月13日，他在致林彪和西满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控制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仍有造成国民党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展开创造根据地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并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33）12月11日，他还致电林彪，提出要抽调一部分主力给北满，但不能从南满抽调，以免影响南满之坚持与作战。（34）罗荣桓认为，南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他亲自向辽东军区肖华等领导干部交代：要在南满创建根据地，铲除日伪残余势力，不然我们在东北就站不住脚。东北解放战争的实践，证实了坚持南满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

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罗荣桓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1946年2月间，东北部队中有些同志认为和平很快就会实现，罗荣桓认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和平也不会很快到来，应当立足于长期战争，不能立足于实现和平。

1946年3月15日，他在给林彪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35）提出了努力加强主力，编组机动纵队，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加强后勤工作与兵工建设等一系列建议。

1946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讨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36），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扭转东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罗荣桓参与这次会议的领导，为“七七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荣桓参与指挥的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势结束后，在东北战场上，国共两军面临着最后的决战。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是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时难以决定的重大决策。罗荣桓根据东北战场的形势，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早于1948年3月4日，在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截断敌人退路，继续分割、孤立、围攻敌人，准备吸引和打击敌人新的增援，争取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敌”（37）的战略思想，并要求在部队中广为宣传，统一认识。虽然，在4月份他与林彪等一起向中央提出了先打长春的计划，并得到中央同意。但是他当时的想法正如毛泽东在4月22

日复电中所说：“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38)在试打长春没有成功后，罗荣桓亲赴长春前线，听取汇报，总结经验，并作了“长围久困”的具体部署。7月20日又与林彪等向中央报告了准备南下作战的设想。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工作，罗荣桓与谭政主持起草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指出：我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

在林彪、罗荣桓等联名于10月1日发出“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正向锦州前线进发时，林彪得知敌人在葫芦岛增兵四个师后，对先打锦州发生动摇，于10月2日晚向中央发报，请中央考虑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两个方案，实际上是想停止攻锦，回打长春。罗荣桓极力说服林彪，并亲自主持起草给中央的电报，表明仍攻锦州的决心，罗荣桓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关于集中兵力攻占战略枢纽锦州的正确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三）在革命战争时期总结人民武装建设经验；在和平建设时期提出民兵工作的正确方针，对丰富和发展人民武装建设理论作出了贡献**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荣桓任军委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部长时，就对如何发展少先队（民兵）、组织巩固赤卫队（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在《红军报》上发表过文章，当时的少先队，是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的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类似后来的基干民兵。罗荣桓认为，要扩大红军，首先要搞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因为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政学习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帮助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打扫战场，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或整连、整营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1933年8月2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表达了上述思想。

1934年3月25日，罗荣桓又在《红星报》发表了《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一文，指出要完成扩大人民武装的突击扩红运动，最根本的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强迫命令、抄写名册与会议举手通过等形式主义做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反对单靠主力打天下，不要人民武装，或使人民武装建设流于形式的倾向。继续运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设人民武装的经验，并有许多新的发展。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地实行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他要求主力部队保持一定员额，集中整训，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中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并抽出部分兵力加强地方武装；要求地方武装成为坚持地方性游击战的骨干，并且分批升级补充主力；要求民兵建设与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密切结合，使民兵成为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广大基础，并且成为扩大主力和地方武装的主要兵源。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根据东北战场的新形势，强调建立强大的后备力量对保证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从1947年7月起，他亲自主持组建二线兵团，其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

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部队。这是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简捷迅速地扩大主力部队的有效方法。到1948年，二线兵团共组建了一百多个团补充前方主力部队，为取得东北战场的胜利和组建百万大军入关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从1959年起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民兵工作。他对民兵在新形势下的意义、作用和工作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民兵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现代化战争，敌人不是先登陆，而是按电钮发导弹，首先从纵深开始，使你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工矿区、交通枢纽瘫痪。因此，我们对付这种战争，必须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而全民防御，光靠几百万人是不成的。……民兵是贯彻全民防御的最好组织形式。”(39)“民兵发展起来了，我们的陆军可以大减，大搞技术兵训练，大量削减军费，搞尖端科学，搞工业建设，如果敌人胆敢发动战争，我们即可立即动员广大民兵投入作战。”(40)罗荣桓对于和平建设时期民兵工作的方针，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他说：“民兵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服从生产，结合中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民兵教育要结合工厂、学校中的原有教学计划进行，不要争时间。”“民兵政治教育一定要联系地方的情况，联系农村的情况，联系民兵的思想和他们的切身问题进行，不要一般化地去讲。”“民兵野营活动也要搞小型的，一天、半天、几十分钟都可以，这样既不妨碍生产、工作和学习，又不影响群众休息。民兵训练的方式方法要生动活泼，要搞有实际内容又与其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要注意劳逸结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罗荣桓还特别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民兵的执勤任务不宜过多，过多就妨碍生产，请各地注意检查。”“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决不能使用民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分清矛盾性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动武，决不能派民兵去捆人打人。谁要是使用民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谁就是犯法，就要负责任。”(41)罗荣桓这些精辟的论断，对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民兵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注释：

(1)《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141页。

(2)(3)《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1983年12月16日。

(4)肖华根据罗荣桓的授意，并经罗荣桓修改审定后在115师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1941年8月22日。

(5)(6)罗荣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第91~98、89页。

(7)《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859页。

(8)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解放军报》，1983年12月9日。

(9)罗荣桓：《给罗东进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2月出版，第263页。

(10)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解放军报》，1983年12月9日。

- (11)(1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第33、36页。
-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第528页。
- (14)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56年3月16日。
- (15)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9月。
- (16)(17)(18)罗荣桓:《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515~516页。
- (19)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 (20)罗荣桓:《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515页。
- (21)《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1983年12月16日。
- (22)《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07页。
- (23)罗荣桓在115师教2旅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战士》月刊,1942年第6期,115师政治部出版。
- (24)(25)《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1983年12月16日。
- (26)(27)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9月。
- (28)(29)(30)罗荣桓:《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战士》月刊,1942年11月,115师政治部出版。
- (31)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斗争生活》第16期,1942年8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
- (32)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斗争生活》第16期,1942年8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出版。
- (33)(34)(35)《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649~650、648、659页。
- (36)“七七决议”是指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的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 (37)《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第33页。
- (38)《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 (39)罗荣桓在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
- (40)罗荣桓视察上海部队时的讲话,1959年12月。
- (41)罗荣桓关于民兵工作的讲话1959~1963年,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第141期。

**作者** 李维民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58岁。50年代任解放军报社记者。198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传记写作组,参与编著《罗荣桓传》。

## 概论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朱 玉

徐向前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军事生涯中，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建设，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国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对于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一)

徐向前在党的军事活动领域里的杰出贡献，是与他长期领导军队、指挥战争的斗争经历分不开的。1984年，他在《历史的回顾》序言中写道：“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事实上，这也正是他能够从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教师，成长为杰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基本条件和因素。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淖沱河畔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10岁开始上学，先后就读于农村的私塾、小学，当过店铺学徒。

1921年从太原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员。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奴役，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使年轻的徐向前壮怀激烈，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

1924年，他与几个同学一道，响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接受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洗礼，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黄埔军校，他不仅学习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实地测绘》等基础军事知识，而且受“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影响，成为我党领导的进步组织“青年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与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坚决斗争。毕业后留校任入伍生第三期排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

1925年调国民二军，曾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期少校队长，培养和训练革命青年。

1927年3月，徐向前在武汉分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终身奋斗的光辉道路。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中国革命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同年9月，徐向前受党的委派，去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

六联队队长，组织和训练工人，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撤出广州的革命队伍去东江地区，任团党代表、师参谋长、红4师师长等职，指挥部队与不断进剿的敌军作战、周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初步积累了创立革命根据地和山地游击战的一些经验。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去鄂豫皖边开展武装斗争，任红军师长、军长、第4方面军总指挥。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历次反“会剿”、“围剿”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和游击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近战夜战等战略战术原则，多次组织指挥重大战役战斗，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威震大江南北。徐向前和红军其他领导人领导部队先后开创了鄂豫皖和川陕边两大革命根据地，消灭敌军30余万人，使红4方面军从一支300余人的游击武装发展为8万余人的正规红军，成为三大主力红军之一。长征途中，徐向前率红4方面军数过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敌人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1、2方面军的北上，于1936年10月在会宁地区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决定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等友军部队，首先控制甘、青、宁、陕等省，背靠苏联，造成西北抗日局面。

1936年10月，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4方面军的3个军共2.1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不久，军委命令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与河东红军相呼应，适时打通新疆。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徐向前指挥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英勇血战，顽强搏击，共歼敌2.5万余人。虽终因孤军无援、粮绝弹尽等原因而失败，但牵制了河西的10多万敌军西向，有力的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等职。开辟晋东南、冀南、山东抗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贯彻和发展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为我军培育了大批抗日军政骨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野1兵团（后改为军委直属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个重大战役，歼敌30余万人，解放全山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大城市攻坚战和大兵团野战的经验。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曾任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国防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从1965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建国以来，徐向前一直参与军委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战略转变中，在长期的国防建设和民兵建设中，在新时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中，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向前在长期的革命军事生涯中，有许多重要军事论著。如红军时期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和一些战役计划及文电；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山东纵队建设任务及工作》、《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问题》、《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努力练成攻坚的铁拳头》、《临汾战役总结》、《晋中战役总结》、《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建国后的《国

防现代化》、《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历史的回顾》等。这些著作是徐向前戎马生涯的光辉结晶。

## (二)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徐向前长期领导军队，独当一面，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是他的军事理论、军事建树的首要组成部分。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是徐向前一贯坚持的根本建军指导思想。

徐向前认为，将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而斗争，是人民军队区别一切旧式武装的鲜明标志，也是它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所在。“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1)这种伟大精神因素，只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党，才能产生和形成，并使之切实贯注于部队之中。离开党的领导，军队就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精神支柱，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

1929年11月，由徐向前、戴克敏共同起草，经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就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地位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规定“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副署，才能发生效力。”“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不能充当”。要求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加强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加强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以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决议还对红军与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和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扩大红军、瓦解敌军、如何执行党的政策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这与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徐向前回顾在鄂豫边初期建军的情况时说：“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也不断加强。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通过送彭杨学校学习或举办党的骨干分子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培训党的工作干部；制定了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工作细则，并编印了《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等，教育部队贯彻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发展党员严格遵守入党条件，强调党员在战斗、训练、行军和日常生活中的模范作用；等等。

1936年7月，徐向前在向美国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介绍红4方面军的历史经验时，概括了8条：(1)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

(2) 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3) 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4) 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自我牺牲和斗争到底的精神。(5) 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支持。

(6) 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的社会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

(7) 红军在斗争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8) 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这些要点，是徐向前建设红军的指导思想的缩影，也是红4方面军从一支弱小游击队伍发展为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根本原因所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领导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力保证了建军和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他强调指出：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如何克服部队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及一切不良现象？主要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军队各级首长都必须知道，首长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针对某些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他说：“有些同志强调自己是首长，有些同志打下几个胜仗后，就老子天下第一，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了。实际上如果没有党的保证，你一个旅长一个团长又有什么办法打胜仗？你打了胜仗，即是在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也只是起了一分子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呢？”(3)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比重及相互关系，是部队建设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作战和其他任务的完成，徐向前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般地说，军事服从政治。但在军队里，政治工作是服务于军队的，要用政治工作保障军事的胜利。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统一的，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既要反对军事干部只管打仗、不问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要反对政治干部只管政治、不问军事的单纯政治观点。“军事和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不论是军事工作干部，不论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两者间的相互关联，只有主要与次要之分，而无绝对对立的界限。”(4) “军队中最高的领导机关，是党委会。加强党委会工作及其领导作用，就可以解决军政的磨擦问题。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军政干部分工去做，为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5) 这些，是对于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精辟见解和说明。

根据作战需要，严格训练部队，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杀敌本领，争取战场上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是徐向前历来强调的重要建军原则。

徐向前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训练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苦练出精兵，一支能在战场上过得硬的军队，平时必然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尤其是我们的军队，长期在装备上、数量上处于劣势地位，要想战胜敌人，就更要坚持经常、严格、刻苦的训练，从提高部队的质量上做文章。他说：“须知打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之上的。作一个首长，必须学会打仗又会练兵，否则就不是好的指挥员。”(6) “部队的士兵和干部训练好了，仗就可以打好，可以减少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部队训练不好，仗就打不好，就会增加部队的伤亡，战争就会失败。”(7) 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徐向前就要求部队“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士兵军事技术”，

“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他在总结红4方面军的练兵经验时指出：所谓练兵，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至少离不开这几项基础的东西。对于指挥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则要求更高，应学习军事理论，娴熟战役战术原则，提高灵活指挥的能力，真正做到智勇兼备，游刃有余，克敌制胜。

为使部队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适应各种艰险复杂条件的作战能力，徐向前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曾针对不同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装备状况和作战特长，制定训练大纲，突出重点，区别对象，规定项目，组织部队严练苦练勤练，不断提高战斗力，主要方法是：平时训练与战场练兵相结合，战前训练与战后总结相结合，官教兵与兵教官相结合。在敌人的两次“围剿”之间，则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例如，1933年6月，当红4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后，就抓紧三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一场大练兵运动。这次练兵，在政治教育上，主要内容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红军的斗争历史和纪律、革命的光明前途及其艰苦性、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等。在技术上，强调进行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的训练。在战术上，着重加强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训练。在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上，专门印发了方面军领导干部所写的《与川军作战的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并组织干部研究和总结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在练兵中，部队各级首长亲自动手，拟定训练计划，带领部队进行瞄准、射击、投弹、劈刺、跑步、爬山、夜摸、实战演习、紧急集合等等，大大改变了部队的面貌。大练兵结束后，全军发起外线进攻，连续取得仪南、营渠、宣达三个战役的胜利，共歼敌近2万人，部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建立了22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又如1934年冬，红4方面军在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后，也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大规模整训。各部队根据徐向前主持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的要求，组织和实施了技术以射击、投弹为主要内容，战术以夜间战斗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大纲对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以上干部及参谋的训练内容，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对营以上干部的教育计划大纲要求：（1）研究作战经验——注意方法；（2）研究作战原则——读军事文件，多讨论，有疑即问；（3）野外战术作业——演习指挥方法，锻炼迅速判断情况与定下决心；（4）机会学习与训练——行军学习时研究行军，利用各种实际机会来学习与训练；（5）图上作业与沙盘战术（即沙盘上作战术的演习）。在清江渡军事会议结束后，徐向前还将师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由他亲自讲课。一些老同志至今仍印象很深。

从实战需要出发，注意训练专长部队，是徐向前在练兵中十分重视的一环。在红4方面军，他曾培养出一批各具杀敌特长的主力师团：有的善长进攻；有的善长防御；有的善长追击；有的善长夜摸夜袭。打起仗来，集中在手，关键时刻投入战斗，能够有效发挥战役战斗中的“拳头”作用、“钉子”作用、“尖刀”作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在川陕根据地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议上，被授予“攻如猛虎”称号的9军73团、“守如泰山”称号的9军75团、“钢军”称号的30军263团、“夜老虎”称号的265团、“夜袭常胜军”称号的31军273团、“百发百中”称号的33军296团，就是一些各

具战术特长，在战役战斗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解放战争中当我军转入进攻阶段后，攻坚大城市的任务提上战斗日程。由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已随“刘邓”南下作战，徐向前指挥的多为刚从地方武装升级而来的部队，战斗经验少，装备也差，要完成攻坚大城市的任务，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徐向前并不气馁，坚信通过训练和实战，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定能完成解放全山西的任务。他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部队战前、战中的教育训练，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会打仗又会练兵”，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把部队“努力炼成攻坚的铁拳头”。他指挥的临汾战役，历时72天，是个啃“硬核桃”的典型城市攻坚战。由于部队战前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和战术技术训练，战中边打边练、战教合一，掌握了坑道对坑道、步炮工兵相结合、攻击和防御相结合、火力与爆破及突击相结合等多种战法，因而终于攻克了这座现代化的敌防御要塞。参战部队原来仅有两个旅会攻坚，战役结束后9个旅全都具有攻坚作战能力。

培养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在徐向前的军事理论和建军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8)因此，徐向前十分重视部队优良战斗作风的培养。他把红4方面军的传统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认为这是它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英勇善战，迭摧强敌，打不跨、拖不烂的重要原因之一。狠，即部队具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气概，求战心切，投入战场后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敢于和善于近战歼敌，或攻或防，500米不打，300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使敌人片片倒地。硬，即敢打硬仗、恶仗，坚韧顽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越是在艰难危急的形势下，越是沉着冷静，无所畏惧，“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五分钟”，直至化险为夷，熬垮敌人。因为当你最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困难最严重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谁才能胜利。快，即果断神速，“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进行战役战斗，在周密组织计划的基础上，集中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只有争取时间，抓住战机，才能速战速决，歼敌制胜。猛，即进若锋矢，战若雷霆。它既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又是摧毁敌人的强大突击力量。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插猛进，宛如行蛇利刃；迫歼逃敌时，猛打穷迫，摧枯拉朽一般。部队越是勇猛，指挥员越是应慎重从事，要把这种力量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免无谓的牺牲和消耗。活，即灵活机动性。善于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和敌军的矛盾、弱点，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灵活变换战术，机动歼敌；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徐向前认为，战斗作风是部队军政素质的综合体现，要在战役战斗中、训练教育中、日常管理中养成，最基础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尤其是使

用新部队，第一炮一定要打响，通过多打胜仗去提高士气，锻炼他们。开始的时候，“不用新部队打强攻或打阻击战，因强攻和阻击战伤亡大，而是用他们去打追击战。”“追击战，伤亡小，战果大，取得胜利，鼓起大家的劲头，搞上几次，新部队有了实战经验，士气越打越高，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就会形成。”(9)他的《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一篇全面阐述军队战斗作风的重要文献。

徐向前特别重视指挥员对培养战斗作风的重大责任和作用。他常说：红4方面军有的部队善长进攻，有的部队善长防守，有的部队勇猛，有的部队稳当，这与带兵的指挥员的不同特点，有很大关系。培养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指挥员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到晋冀豫军区指挥作战，就注意狠抓战斗作风的养成。他教育干部说：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抓住战机，英勇果断，不顾一切。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要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这种狠，为的是不失战机，减少而后作战的麻烦。临汾攻坚战中，部队伤亡较大，有人主张撤兵，徐向前坚持打到底，不拿下临汾决不收兵。晋中战役中，部队连续运动作战，疲劳已极，有的纵队领导干部要求休息两天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爬也得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正是有了这股狠劲，才取得攻克临汾和晋中战役的胜利，同时，也教育了干部，锻炼了部队。他在《努力炼成善于攻坚的铁拳头》一文中，特别强调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要养成“谨慎细致，迅速、果敢、勇猛、沉着，不怕困难，不怕苦，胜不骄，败不馁”的战斗作风。他还指出：“一个部队的作风，大半是依据指挥员的特点形成的；部队的作风，大半是指挥员带出来的；而且这种作风形成以后，很不容易改变。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同志，要很好地注意自己的作风，要养成良好的作风，因为你的作风是直接影响部队的。”(10)他强调选择指挥员，最好的是能顽强不屈，坚持最后5分钟。要修养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员须注意：一是勇猛果敢，但不要急躁粗暴。勇猛果敢是包括智慧的。二是谨慎细致，但不要犹豫不决。

从严治军与爱护士兵的统一，是徐向前带兵的一个重要特点。

军队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保护人民的武装工具，徐向前历来强调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管理，严格的纪律。军令如山倒，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决不许稀稀拉拉，松松垮垮，违法乱纪，败坏人民军队的声誉和战斗力。在红4方面军，他与其他领导人制定了十项军纪：

(1) 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 不拿穷人粮食；(3) 对穷人态度要和蔼；(4) 爱护枪不要弄坏；(5) 节省子弹勿乱打；(6) 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7) 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8) 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 得物质要先顾伤员同志；(10) 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对于违抗军令和违法乱纪者，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要求所属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教育指战员自觉遵守和维护纪律，同一切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他说：“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下级必须坚决服从。对命令和指示有意见，也可以提出；但当上级未修改命令前，仍须坚决执行。破坏制度、违抗命令，就是破坏纪律，破坏纪律要纪律制裁。我们要把军队的纪律严肃起来，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11)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部队面临解放并经营大城市的任务，徐向前特别强调执行城市政策、城市纪律的重要性。他用李自成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干部，

语重心长他说：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只图做官、享福、贪污、腐化，搞女人，抢东西，军队毫无纪律，把北京城搞得一团糟，“结果李自成身败名裂，最后在九宫山被杀头，真是亡党亡国亡头。”“谈到城市政策，首先我们要反对李自成思想。”(12)为严格执行行政市政策、城市纪律，他规定部队入城之后，要坚决服从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的决定和命令。如有违犯城市纪律者，首先逮捕起来，再查究明白；如果武装反抗或干涉城防司令部的逮捕，应加倍处分。

徐向前认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从严治军与爱护士兵是统一的，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同旧式武装的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就是爱护士兵的路线，为兵服务的路线。因为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人民群众；部队中最广大的群众是士兵，在战场直接冲锋陷阵的也是士兵。离开了广大士兵，就谈不上战役战斗的胜利，谈不上军队的巩固和发展，谈不上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因此，上自统帅，下至排长，不管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或其他机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牢牢树立爱兵观念，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要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教育和训练，要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要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13)如果官兵关系出了问题，干部首先要检查自己是不是爱兵？对战士生活关心怎样？对士兵训练怎样？对战士伤亡后的态度怎样？徐向前经常教育干部：人是最宝贵的，部队的有生力量主要是人。一个人从小孩子成长到当兵的年龄，需要18年到20年，是很不容易的。人死不能复活，而且我们的士兵都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干部一定要有强烈的爱兵观念，做到从政治上爱兵，从战术上爱兵，从生活上爱兵。新兵来了，要热诚相待，爱护他，教育他，巩固他，提高他的技术，使他从一个老百姓变成军队中的一员。战斗之前，要严格训练，不训练就叫他们上战场，等于“送死战术，草菅人命”，是不容许的。逃兵回来了，要安慰他，爱护他，感化他，弄清他逃跑的原因，再对症下药去教育他，决不能任意伤害、污辱、打骂、处罚他。带兵的干部，一定要反对不关心士兵、爱惜士兵，眼睛只向上看、不向下看的极坏倾向。他说：“干部首先是战士的，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集体，部队才能有战斗力。”(14)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只有把从严和爱护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才真正体现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才能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无往而不胜。

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是徐向前重视解决的一个问题。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对土匪、枪会及反动武装的政策问题，徐向前等领导人就作过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对于土匪队伍，“不能随便收编，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如有投诚者，须彻底改编。”“绝对不准土匪随便扯红旗，应使其扯有革命意义的旗帜（如人民自卫军），做铲除豪绅地主等工作。”对于各色枪会，要求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他们的群众中去；要通过他们的家属进行争取和瓦解工作；必要时坚决消灭枪会的首领。“在白色乡村我们的政治影响到成熟时期，须斟酌客观情形，即改变为赤色组织或灰色组织。”对于民团的团丁及其家属，“应发生社会关系，藉以联络感情”，“哗变过来的团丁，要慎重处理。”对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应举行慰劳会、联欢会等，

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变收买的形式，并须抖散改编。”(15)抗日战争开始后，各式杂色武装蜂起，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利用的可能，是各方面都在争取的力量。徐向前在冀南和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力进行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使八路军的兵力、枪支在短期内获得迅猛发展。例如，冀南的段海洲部 6000 余人，赵辉楼部 3000 余人，收编后分别编入八路军 129 师建制，其余 20 多个县的数十股杂色武装亦分别被收编溶化，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兵力发展到 1.8 万余人，枪支 1.1 万余支，有力推动了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 年，徐向前的《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一文，分析了旧式地方武装的特点及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他指出：“这些武装——如民团、警察、保安队及各种会门武装等，在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不论我们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周围，有很大的数量存在着。”“为了加强抗战的力量，争取他们和拯救旧式武装到光明路上来，这是摆在我党我军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对待这些武装，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我们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我军共同抗战者，我们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保证：（1）与八路军、新四军之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2）不缴枪。（3）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为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调整时，亦应先经过其同意，而不应勉强。（4）帮助其进步。关于如何把握这一基本方针，使之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徐向前指出：第一，由于这些武装一般原是地方旧势力的工具，内部组织成分相当复杂，有很多旧社会的恶劣传统和习惯；地方性较大，调动整训不易，接受进步思想迟慢，因而在我们的观点上，要首先承认这些特点，并承认改变这些特点是一个艰苦的较长期的过程。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方式方法，既不能操之过急，简单从事，又不能放松领导和宣传教育，听之任之。第二，应从他们的现有政治水平出发，逐步教育和提高他们，适当的迁就和让步是必要的。“这种必要的迁就和让步，表面上似乎是消极的后退的，可是实际上是积极的前进的。迁就是为着提高，让步是为着诱导其进步。”第三，在组织问题上同样不能要求过高，而应在其政治上逐渐提高之后，在其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组织调整和建立各种新的组织制度。第四，应善于分析他们内部各种不同分子的政治水准，使其先进者推动落后者一道前进。第五，在军政纪律和战斗行动上，我们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说服他们，并应善于等待和帮助他们以其自己的经验，来认识我军的特点及与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重要性。第六，适当的鼓励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只要他们有改正弱点和缺点的一点或半点进步，就应欢迎。“表扬其优点和长处，鼓励其进步，哪怕是极小的进步，同时也就是为着克服其弱点和缺点，是提高他们政治的组织的战斗的积极性最好的方法。”这篇文章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党的争取和改造旧式地方武装的方针和方法，对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迁就主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有重要意义。

### （三）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在 22 年的时间里，战争双方反复较量，呈现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形态，具有多种作战形式，徐向

前运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根据“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在驾驭战争、指挥战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原则，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源自红军的游击战。组织指挥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是徐向前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军事实践活动。

徐向前于广州起义失败后，就在海陆丰地区领导红4师坚持游击战争，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1929年6月至鄂豫边领导红31师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半年之内取得连续粉碎敌人三次“会剿”（“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的胜利，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年11月，他和戴克敏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将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概括为七条作战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徐向前说：“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16）上述作战原则和指导思想，是进与退、打与跑、集中与分散、红军力量与群众力量的辩证统一，反映了红军建设初期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使鄂豫边一支仅有300余人的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后来，红4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正规作战，仍然离不开游击武装力量的配合。在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或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游击区和游击武装，始终是红军军事斗争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战略转变，从正规红军的运动战转变为山地游击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徐向前与“刘邓”一起，率129师开辟晋东南根据地，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粉碎日寇的六路围攻、九路围攻，多次袭击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依据的基本作战原则是：小打而不能大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徐向前于1938年3月下旬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就是一个成功的战例。这次战斗以3个团的兵力，设伏于涉县和黎城之间的山险隘路地带，仅半天时间，即干净利落地歼灭日寇第14师团两个中队400余人，焚毁敌军车180多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威力。

1938年春，徐向前率一部兵力去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首次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战略口号，发动了群众，打开了局面。当时，许多干部习惯于搞山地游击战争，没有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能不能在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缺乏信心。徐向前对冀南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于5月间专门

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分析了开展河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后指出：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是广阔的平原。游击队在平原上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的便利，相反地，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便利的运动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得出平原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他说：“河北是人口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17)这是彻底的唯物史观在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上的鲜明体现，是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冀南地区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新鲜经验。在冀南一年反“扫荡”中，徐向前指挥军民战斗400余次，杀伤敌军5000余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他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将平原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概括为：(1)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

(2) 冬季防守，夏季进攻。

(3) 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4) 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5) 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6) 无固定后方作战。(7) 开展麻雀战。(8) 部队不断转移位置。实践证明，这些作战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徐向前调任八路军1纵队司令员，在山东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他在《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一文中，分析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基本形势，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第一，日军对后方的“扫荡”，日见严重与残酷，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差不多已成为正面的战斗。第二，敌人的“扫荡”是连续性的。第三，许多主要的城市及大的村镇，被敌占领，将来还会日益增多，敌人可利用碉堡政策来形成较巩固的据点与封锁线。第四，我们的游击区逐渐缩小，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困难也增加了。第五，汉奸政权、伪军及敌特更加活跃。第六，敌人在分区“扫荡”下，“扫荡”次数增加，时间短促，规模较小。在小规模“扫荡”难见效益时，大规模“扫荡”就会到来。第七，敌人在“扫荡”中，将多采取以游击战对我游击战的袭击战术。在重要据点上屯集兵力，进行短距离的袭击。同时将强化交通联络工具，组织特种部队。第八，敌人对我将更多采取经济破坏、封锁、掠夺、毒攻政策。针对敌人新“扫荡”的上述特点，徐向前提出的军事对策是：第一，要在战略战术上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基本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要争取向运动战发展。只有巧妙的把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第二，集中正规军和游击兵团主力，机动地歼灭敌人一路或打击敌人。第三，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被敌人所暗算，但须反对逃跑避战。要利用有利时机或创造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不利时则必须转移。不会保存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则应是进攻的。无论游击战或

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形势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分兵把口自处防御地位，是不了解争取主动权的原则，必须反对。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整训，充实旧的力量，扩充新的力量。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用政治保障军事的胜利，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保证在任何环境中不致受到严重损害。同时，注意供给工作和医药卫生工作的加强。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发扬互相策应、相互帮助的优良作风。但对专门创造摩擦，消灭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肃清。从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山东军民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积极贯彻上述作战原则，连续粉碎日寇的多次新“扫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部队和地方游击武装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等方面，都获得很大进步。

运动战是人民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劣势装备的我军战胜优势敌人的基本手段。在徐向前指挥的战役战斗中，运动战占主要地位，并往往具有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鲜明特点。

徐向前认为，作为以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运动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和规律所决定的。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战略态势，人民军队离开了运动战，不是流于与敌死打硬拼的军事冒险主义，便是流于畏敌怯战的逃跑主义，不可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达到逐步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目的。驾驭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中心点在于一个“活”字，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其中包括灵活分合兵力、调动敌人、避实击虚、选择战场、制敌机先、迂回包围、速战速决、乘胜追击等一系列作战指挥艺术。他说：“如果说阵地防御战、城市攻坚战叫，打死仗，的话，那末，运动战就叫‘打活仗’。离开了‘活’字，便不成其为运动战，更谈不上保持战役战斗中的主动、优势地位，达到大规模歼敌制胜的目的。”(18)

早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就以擅长“飘忽”战略、运动歼敌而著称。每当优势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临，他都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适时从运动性的防御转入进攻，在进攻中大量歼敌。

1930年冬的第一次反“围剿”，鄂豫皖红军当时只6000余人，而敌军的“围剿”兵力为8个师、3个旅，约10万人。红军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的指挥下，避开向鄂豫边区进攻的敌军主力，转而向深入皖西边区的一路敌军进击。东西香火岭一战，歼敌3个团，使该路敌军遭致命打击，余敌仓惶撤退；红军遂回师西向，迅速转至鄂豫边区作战。经磨角楼、新集、西出平汉路等战斗，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趁敌军调动之机，红军抓住北进突出的岳维峻第34师，将该敌包围于双桥镇地区，速战速决，予以全歼。活捉敌师长岳维峻，歼敌6000余人，终于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次反“围剿”，历时3个多月，红军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围点打援、奔袭奇袭、近战夜战、迂回包抄等战术原则，与根据地广大人民武装

力量相配合，先后共歼敌 1.5 万人，显示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威力。这是鄂豫皖红军首次进行的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标志着这支部队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的完成。徐向前回忆说：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红军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本身就是“运动战”，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的最可靠的保证。

1931 年，敌人第三次“围剿”前夜，红 4 方面军已经发展到 3 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鉴于根据地周围的敌军尚未完成“围剿”的准备，他决心一反过去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反“围剿”做法。“先发制人”，组织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从当年 11 月至翌年 6 月的 7 个多月内，徐向前集中红军主力，忽北忽南忽西，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在外线歼敌近 40 个正规团共 6 万余人。战后，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 4.5 万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350 余万，建立了 26 个县的革命政权，威胁武汉、南京，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恐。徐向前在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时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许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19）这次反“围剿”，主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战役战术手段（四大战役有三个战役是围点打援），即依托根据地，先用少部兵力把外线敌人的突出、孤立据点围困起来，吸敌大股援兵出动，主力红军选好战场，趁援敌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予以包围全歼。如苏家埠战役，徐向前指挥红军 3 个师从皖西根据地出发，东渡淠河，以一部兵力分别包围六安、霍山间的 3 个据点——韩摆渡、青山店、苏家埠之敌，而将主力布于六安以西的樊家桥、戚家桥一线，准备打援。第一次援敌出动 1 个师，被歼 1 个团，余敌逃窜。第二次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亲率 15 个团 2 万余人来援，钻入我预设的口袋里，经一天激战，即全部被歼，苏家埠等据点亦被解放。是役历时 48 天，共歼敌 3 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 5 个旅长、12 个团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的光辉战绩。徐向前也因此而被称为善于“围点打援”的红军将领。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从当地的地势、敌情、我力等条件出发，创造了“收紧阵地”这一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反“围攻”作战形式。每当优势敌人的数路“围攻”来临时，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法，即依托根据地内的山险、隘路、坯口、密林，先以部分兵力“分兵把口”，节节防御，步步抗击，逐步向心退却，诱敌深入，待大量消耗和疲劳敌人之后，再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大规模歼灭敌人。这种不同于鄂豫皖时期“飘忽”歼敌的作战形式，主要特点是：第一，在战役上是持久的，在战斗上是速决的，战斗形态多样化。如反三路围攻战役，历时 4

个月；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 10 个月。战役进程中，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各部队往往刚结束一个战斗接着又转入另一个战斗，几乎没有问歇的时间。第二，运动性的阵地防御战，是红军迟滞敌人前进，逐步消耗和疲劳敌人的主要手段。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红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地后退。敌人每夺取一个阵地，向前推进一里、二里，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红军则利用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在运动性的阵地防御中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大量杀伤敌人。第三，战役开始后，红军要在全线同时抗击多路优势敌人的进攻，与敌反复较量、“磨蹭”。因而从局部上、一个防御方向上看，红军兵力相对集中；从全局上、整个防御战线上看，则红军兵力相对分散。兵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向心退却，准备实施总反攻的过程。第四，战略退却的终点和决战战场，一般选在根据地的后部，而不是中部、前部，因为愈到根据地后部，山势愈陡险，红军兵力愈集中，愈利于实行决战防御和转入反攻。第五，大规模运动歼敌，在反围攻的最后阶段实施。红军利用敌人的沮丧、疲惫、恐慌、补给困难等雷霆一击，乘胜追歼逃敌，扩大战果。第六，部队要掌握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丛林战、阵地战、攻坚战、追击战、夜摸夜袭等多种战术手段，因地制宜，灵活歼敌制胜。这也是平时和战场练兵的主要内容。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8 月的为期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红 4 方面军的战史上占有光辉地位，突出表现了徐向前的卓越指挥才能和“收紧阵地”这一作战形式的强大威力。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集 25 万兵力 110 余团（后增至 140 余团），铺天盖地，压向川陕根据地，妄图“3 个月内”聚歼红军于大巴山下。为粉碎敌人的围攻，徐向前指挥 8 万余红军兵分东西两线，组成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与敌鏖战。在战役进程的前 8 个月内，红军经四期收紧阵地和两次反击战，先后共杀伤敌 3.7 万余人，使敌人的三期进攻计划严重受挫，加剧了各路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军心的混乱。7 月间，刘湘孤注一掷，发起以夺取万源为主要目标的第四期全线进攻。在东线，刘湘将其全部兵力的 4/5 计 80 多个团投入战场，向万源方向猛烈进攻。这时，红军收紧阵地已到了极限，同时面临粮食缺乏、弹药不足、部队疲劳、伤病员增加等许多困难，如果顶不住敌人的疯狂进攻，红军就有一败涂地的危险。徐向前成竹在胸，处变不惊，坚决排除了那种主张向汉中撤退的意见，决心利用万源地区险要地势，实行决战防御。面对轮番猛攻的敌第五路精锐旅团，他要求部队沉着应战，寸土不让，以少胜多，坚守到底。经过近 20 天的血战，红军连续打退敌人的 5 次大规模进攻，阵前敌尸累累，共毙伤敌万余人，终于使敌人的攻势到了“三而竭”的地步。徐向前抓住战机，立即组织反攻，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席卷两翼，扩大缺口，猛插纵深，将敌军的东线阵地劈成两半，造成大纵深迂回歼敌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不让部队按徐向前的意见东旋，结果未能兜住刘湘 3 个精锐师，打了个击溃战。徐向前继而挥军向西线突破，实施大纵深迂回，在黄猫垭地区切断敌第二路的退路，歼敌 1.4 万余人，获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徐向前总结说：“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

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皇失措，迅速分割歼敌。”(20)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军先后共歼敌 8 万余人，不仅创造了红军史上的辉煌战绩，而且提供了实行决战防御和大纵深迂回歼敌的宝贵经验。

红 4 方面军从 1932 年 10 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至年底入川建立川陕根据地，西行转战 3000 里，是一次属于战略退却性质的流动转战。其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程度，要比在根据地内的作战大得多。原因在于：一是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实行转移、退却。敌人的重兵前堵后追或平行追击，弄得不好，就有被敌吃掉的危险。二是红军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打了走，走了打，连续作战，连续行军，不仅疲惫至极，且供应困难，有耗无补。三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大为增强，红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易按自己的预想找到新的落脚点。在这种情势下，对于指挥红军转战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攸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徐向前率军在被动中求主动，在恶战中求生存，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大智大勇的素质和力挽危局的能力。枣阳新集之战，红军被敌 5 个师 1 个旅包围合击，右翼制高点被敌控制，甚至方面军总部亦遭敌突击，情势危险万分。他组织部队浴血苦战，反复突围，歼敌 3000 余人，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进至漫川关附近，又被敌重兵包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间。那里地势险恶，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可以突围，但已被敌人的交叉火力封锁。这时，张国焘主张化整为零，将部队分散突围，就地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结果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组织指挥下，利用暗夜，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山口猛烈突击，虽伤亡很大，但突围成功，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此后，红军一面打击敌人的堵截，一面打击敌人的追击，边打边走，和敌人比意志，抢时间：越秦岭，走关中；复越秦岭，南渡汉水；再翻大巴山，进军通南巴。先后共歼敌万余人，红军自身仍保存了 1.4 万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 3/4。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意见在危急时刻分兵突围、分散游击，那就不会有西征转战的胜利，也不会有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后来，红 4 方面军在长征转战中进行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之战，包座之战，数过雪山，三过草地，以及第二次北上中突破敌人的甘南防线等战役战斗，也都证明徐向前关于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保持兵力集中的思想的有效性。

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晋中战役，是一个大规模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的杰作。这次战役，历时 1 个月，人民解放军以 6 万余兵力（大部分是从地方武装升级不久的部队），在晋中平原与阎锡山重兵集团的野战主力决战，共歼敌第 7 集团军总部及 5 个军部、9 个整师、2 个总队计 10 万余人，解放 14 座县城，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典型战例，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徐向前说：“晋中战役，我兵力不如敌人多，装备不如敌人好，部队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自始至终居主动地位，一月之间，鲸吞敌十万之师，说到底，就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灵活机动性的结果。”(21)这次战役，徐向前坚持的作战原则是：第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整个战役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即诱敌进入我军伏击圈内，一举歼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全部和第 40 师大部，共 1.7 万余人。接着，转为我主力北进，断敌退路，合围敌野战兵团，又歼敌一部。最后，是

总攻合围圈内的 3 万余敌军和追歼逃敌，解放县城。也就是说，在战役进程中将敌 10 万余人切成几块，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们。第二，出敌不意。临汾战役结束后，部队仅休整 20 余天，即北上晋中作战；以少部兵力佯动于汾河以西，而以主力从晋中平原东侧的山区开进，突然杀向敌军腹地，拦腰开刀；初战胜利后，大踏步北进，直插太原附近，断敌退路；敢于以劣势装备的部队同敌机动能力甚强的野战兵团决战；等等，都出乎敌人的意料。第三，恰当创造战场。从晋中平原的地形地貌出发，选择战场着眼于既有后方依托，又能抓住敌人。第一阶段作战，战场选在平遥、介休之间。那里前有汾河阻隔，后有太岳山区作依托，南面的灵石被我占领，北面的祁大路被我切断，敌进退失据，便于我分割歼敌。第二、第三阶段则将敌野战兵团逼入远离铁路线的徐沟、太谷、榆次间，瓮中捉鳖，一举歼敌。第四，神速运动。时间就是无形的战斗力。为争取时间，抓住敌人，徐向前提出的战斗口号是：

“坚持最后一口气！”“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敌人就是胜利！”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行军、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赢得了时间，为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五，攻防交替，灵活变换战术。部队掌握两套本领，既善于进攻，又善于防御，随时根据敌情、任务的变化，变换战斗形态。进攻时，集中优势兵力、火器，采取火力、爆破、突击三结合的打法，迂回穿插，分割歼敌。防御时，控制要点，构筑阵地，组织火网，正面牵制与翼侧反击相配合。追歼逃敌时，猛打猛追，尽量扩大战果。

徐向前指出：“毛主席曾经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概括人民军队的作战特点，我以为深有道理。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重视灵活机动四个字。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尤其如此。它是运动战的核心，运动战的命脉，运动战的奥妙所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我军研究和实践的主要课题。”（22）

培养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攻坚战役战斗，也是徐向前带兵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条件下，应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但决不意味着放弃有利条件或必要情势下的攻坚战。红军时期，徐向前指挥部队作战，就打过一些阵地攻坚的硬仗。一种情况是，要拔除根据地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如鄂豫皖根据地初步形成后，不少恶霸地主和数以千计的民团猬集于新集，凭坚固守，成为根据地的心腹之患。红军在旷继勋、徐向前的指挥下，决心攻克这个反动堡垒。因城墙高达两丈余，全部用岩石砌成，红军缺乏攻城炮火，围攻一个星期，难以攻克。后根据徐向前的提议，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攻坚。部队利用城北的民房作掩护，秘密挖掘一条长达四五十米的坑道接近城堡，把数百斤炸药装到棺材里推进坑道引爆，一举炸开城墙缺口，攻入新集，首创了红军以坑道攻坚的战例。另一种情况是，红军要创建和扩展根据地，要消灭依托县城或山险防御工事的固守之敌。如在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的黄安、商（23）、苏家埠三个战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先围住点上的守敌，待解决来援之敌后，再利用守敌的慌乱心理，实行攻坚，容易一举突破。在川陕根据地进行的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则是典型的山地攻坚战。敌人利用山险要隘，层层筑垒防守。徐向前指挥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攀登悬崖绝壁，向敌阵地猛攻，连续突破敌人多道防线歼敌制胜。长征途中，他指挥的包座之战，歼敌胡宗南第 49 师，也是一个山地攻坚的模范战例。

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运城、临汾、太原战役，均为城市攻坚战。临汾战役历时 72 天，打得十分艰苦，但终于攻克，徐向前在《临汾战役总结》中说：此次临汾之役，双方均用堑壕作战，地堡对地堡、坑道对坑道，每一据点每方土地均反复争夺，多者达三四次，敌精锐 30 旅在各次争夺战中消耗殆尽，我全役共用炸药 10 万斤，炮弹 10 万发，战斗持久残酷，规模宏大，足称阵地战范例。此次作战又因时间拖长，最后发展为地面下的立体攻势，敌我在地面下均有交通壕，再下有地道及坑道，攻势剧烈复杂，紧张达于极点。部队因思想准备不足，对此缺乏预见，开始攻击时一般均操之过急，表现深厚之游击战运动战作风，猛打猛冲，队形密集，不爱筑工事，不精打细算，不讲求协同动作，因而招致过份伤亡，多走弯路。他指出，临汾攻坚战的经验教训证明：第一，部队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必须有思想的、物质的、组织的、技术的充分准备。第二，必须善于分散敌之兵力，以便迅速突破与分割敌人。应从两个以上不同方向进行突击，并保有两个以上的突破口，但火力不应分散，而应将 60% 以上火力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突破手段一般应以坑道爆破为主，强行爆破与炮火开缺口为辅。因坑道爆破具有较高之威力，并能以其突然性使敌猝不及防，易于攻克。第三，必须注意步炮工诸兵种之协同动作。凡火力集中使用，完全压制敌火力；坑道方向距离正确，爆破口填平外内壕；步兵乘爆炸烟雾于炮火向两翼纵深延伸之瞬间勇猛冲锋；——三者能密切配合者，突破必能成功，否则必遭受挫折，徒增伤亡与消耗。毛主席评价说，“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我军九个旅（7 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23）太原攻坚战中，徐向前鉴于部队对一些战术原则认识不够明确，战斗动作上往往不能协调一致，特规定了十条战术原则：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命令服从；坚决顽强，果敢勇猛；隐蔽突然，敏捷机动；主要方向，力量集中；插入切断，连续进攻；发挥爆破，步炮协同；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这些原则，在部队中深入教育，要求熟练掌握，从而有力保证了太原攻坚战役的胜利。

#### （四）

人民战争是我军依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位一体的战争。徐向前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早在 1928 年 5 月，在坚持东江游击战争中担任红 4 师师长的徐向前就向东江特委建议：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 2、4 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发展自己。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建设根据地思想的萌芽，但未被特委采纳。

1929 年 11 月，徐向前在鄂豫边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提出红军的任务是：

（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

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赤卫队的任务是：  
(1)保障革命区域。(2)肃清反动残余。(3)帮助临近区域民众斗争。红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是：  
(1)红军对地方民众团体，有帮助肃清一切反动势力的责任。(2)地方民众团体，对红军有帮助给养、侦探、向导、补充等责任。(3)红军游击到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政治部应负责组织之。在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应尽量帮助其发展并健全其组织。这些，都说明他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已经开始系统化具体化。1930年春，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后，徐向前和其他领导人抵制了“立三路线”要鄂豫皖红军攻打武汉的冒险计划，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西出平汉路，“三战三捷三扩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1年8月，他和曾中生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也是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进行的。当时，张国焘要红军主力占领英山后，远离根据地直出安庆，威胁南京，这显然是一个军事冒险计划。徐向前、曾中生等则主张“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梅）、广（济）、蕲（春），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反对东出安庆。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指出：“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24)1932年底，徐向前率军进入川北，分兵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川陕边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这块根据地发展到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建立了22个县市的革命政权。毛泽东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和作用。”(25)徐向前分析川陕根据地能够建立的原因，一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那时，四川军阀正在成都地区混战，川陕边兵力空虚；同时，四川军阀又反对蒋介石的兵力入川“剿赤”，因而给红军以立脚生根之机。二是红军入川时有1.4万人的兵力，有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才能打开局面，歼敌制胜，发动群众，建立一切。红军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是创建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三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群众受压迫很深，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

从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起，徐向前就重视“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强调“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在发展红军力量的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前。他提出红军与赤卫队的关系是：红军对各县赤卫队，应帮助其军事和政治的训练；赤卫队参加红军作战时，须绝对受红军指挥；赤卫队长应与红军发生密切关系，双方军事会议，应互派代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双桥镇大捷，歼敌岳维峻第34师，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拿着大刀、长矛参战，呐喊声响彻环水两岸，场面极为壮观。

1931年冬的黄安战役，红军歼敌赵冠英第69师等部1.5万余人，攻克黄安县城，也是广大群众积极参战和支援的结果。当时有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做饭。”就是军民一

体歼敌制胜的生动写照。鄂豫皖时期，地方武装曾发展到 20 余万人；川陕时期，亦达 9 万人。历次战役战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同红军一道作战，或运送给养、弹药，或转运伤病员，或修桥铺路，或转运缴获的胜利品，或帮助红军抓俘虏等，生动的事迹不胜枚举，对争取反“会剿”、“围剿”、“围攻”的胜利，确实起了重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在晋东南、冀南、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杂色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民兵武装，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制止国民党军队挑起的军事磨擦，发展八路军正规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冀南，人民群众挖掘的地道总长达万里以上，极大限制了日寇在平原地区机动作战的能力。在山东，从 1938 年下半年至 1940 年上半年的一年内，军民一体进行的游击战斗 2000 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 2 万名、伪军 2.5 万余名，破坏公路万余里、铁路 500 余里，炸毁火车头 36 个、车厢 162 节，有力打击和箝制了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指挥的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个重要战役，群众参战、支前的规模更大。在临汾战役中，支前的民工出动 20 万人，群众自动捐献的门板 26 万块、梁木 10 万根（供部队挖坑道用），粮食数百万斤。临汾周围上百里的村落里，门板全部献出，出现了夜不闭户的感人情景。战后徐向前说：“此次临汾战役所以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的支援。如广大民兵、民工直接参加战勤工作，后方的供应始终保证了部队的胜利进行作战。如要论功行赏，那第一功应该归之于后方的支援”。(26)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人民军队如果孤军作战，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那就不会有革命战争的胜利。

## （五）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积极主张人民解放军实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战略转变，以便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他参与了军委的一系列决策，对军事战略、编制装备、合成指挥、战区划分、训练教育、国土防空，院校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建设、军事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从 1963 年起，军委分工他主管民兵工作，担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徐向前对民兵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重视民兵在保卫国防、和平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反对任何轻视民兵工作的观点；在全面加强民兵建设的同时，重视搞好海边防地区和重要人防城市的民兵建设；通过整顿、教育和训练，不断提高民兵队伍的素质，尤其是基干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素质；民兵建设以抓好基层为主，不要铺大摊子，搞空架子，县以下组织民兵营即可，不要“大办民兵师”；劳武结合，以劳为主，城乡民兵都要带头搞好生产，民兵的活动要服从生产，军事训练尽量分散、就地、小型化、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建设的双轨领导制度；等等。这些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民兵建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解放军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新判断，实行新的战略转变，向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建设方向迈进。徐向前于 1977 年任国防部长、军委战略委员会

主任，重新审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战略和作战预案，主持了198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委新时期的国防战略思想，确定了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和原则。他对新时期的国防发展战略、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1) 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人民军队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本色。对于这一点，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2)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必须服从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要充分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研究和掌握现代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把国防现代化搞上去。(3) 明确作战对象，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作战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可能遭敌人侵犯的方向，或诱敌深入，或坚决抗击，要根据地势条件决定。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决不可轻视。军队要居安思危，立足现在，准备未来，重点设防，纵深配备，依靠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准备迎击和战胜大规模入侵之敌。(4) 精简军队，合理编制。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于总体力量的合理编制与合成。在我军精简100万人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定编定员定装。平时编制要为战时服务；领导体制要改革；各军兵种的比例要合理；各战区的地形、任务不同，编制不能机械划一；编制一旦确定，要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不要任意改动。

(5) 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要改变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必须大力加强对新式武器的研制，充分调动科研队伍的积极性。

(6) 人才是建军之本。军队的编制合成与现代化装备，要靠人去掌握，没有大批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编制再合理，装备再先进，也不顶用。要改革干部工作制度，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爱护人才。院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要切实把院校工作摆到战略地位，不断加强。(7) 大力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现代化战争和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军事科学的研究和创新。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既要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又要结合新的条件加以发扬光大；既要尊重我们自己的经验，又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军事科学。

(8) 寓兵于民，加强民兵建设。要贯彻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国防建设方针，改革民兵工作，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调整组织，确保重点。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加强战略后备力量。坚持对民兵的经常训练教育，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保卫海边防和维护社会治安中的积极作用。

徐向前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形成的，是一部丰富的军事教课书，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注释：

- (1)徐向前：《红军不怕远征难》，1986年10月《红旗》第20期。
-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90页。
- (3)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前线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 (4)徐向前：《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1947年12月。
- (5)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前线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 (6)(7)徐向前：《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1947年12月。
- (8)(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33、191页。
- (10)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前线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 (11)徐向前：《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1947年12月。
- (12)徐向前：1948年2月23日在前线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 (13)徐向前：《认真做好部队的训练教育工作》，1947年12月。
- (14)转引自《在徐帅指挥下》一书。
- (15)《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
-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88、87页。
- (17)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21日《群众》周刊。
- (18)(19)(20)(21)(2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752、188、375、753、759页。
- (23)军委1948年6月1日电。
- (24)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
- (25)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 (26)《徐向前将军论临汾胜利意义》，1948年6月3日。

**作者** 朱玉 国防大学副教授，57岁，1975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执笔整理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并发表其它研究论著20余万字。

##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初探

周均伦

聂荣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军事家。他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身经百战，迭挫强敌；建国后，以主要精力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建军实践中，他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有许多理性认识，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经验和精辟思想，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聂荣臻 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到苏联学习政治、军事，1925 年回国，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以后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征、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在华北地区指挥大兵团作战，取得许多胜利，曾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平津战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修养，丰富的战争实践锻炼，长期在毛泽东领导指挥下征战，毛泽东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深刻影响，使他对革命武装斗争的规律性问题，有许多重要认识，大体可概括如下：

（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武装。

1926 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便同周恩来等主张反击，以维护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认为斯大林关于“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的论断是精辟的。为此，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的决定，全力投入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日后始终高度重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2）精神因素对革命军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早在 1925 年，他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分别战胜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阀部队和白军、帝国主义军队，就是因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知道，“战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换言之，即为红军本身的利益。”（2）因此在日后的戎马生涯中，他始终高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启发战士们为革命理想而奋斗，把这看成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

（3）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才能取胜。1932 年 3 月，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闽南地区发展的意见，认为符合上述原则。4 月，红军终于取得了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

（4）红军必须执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广泛运用袭击、伏击等作战方式，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在总结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前者由于执行了上述原则，所以取得胜利，后者则相反，才归于失败。

（5）指挥员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决心定下之后不能轻易动摇，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长征中，他率部坚决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红军左翼的安全，顺利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

1936 年 11 月，由于他坚持正确的决心，指挥各有关部队取得了山城堡

战役的重大胜利，成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6) 战略区指挥员必须有局部服从全局的战略观念，这是我军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前提。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中共中央决定要首先夺取的战略基地。他先后组织大批华北部队出兵东北，主动将所属的冀热察军区、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并多次组织旨在拖住平津地区敌人不使出关的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7) 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主动权。1945年12月的绥远战役，敌我在归绥城下形成对峙，当时我军缺乏重武器和攻城作战经验，又值严冬，兵员补充和作战物资供应面临严重困难，他适时下令撤围归绥。

1946年10月，张家口东西两线强敌压境，敌我力量悬殊，显然无法固守，他建议主动放弃张家口。撤出张家口，使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战略全局上的主动权。

(8) 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1947年4月他指挥的正太路战役，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称这种打法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3)

(9) 坚决大踏步进退，力求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依此原则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他在总结此战经验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运动战的实质：“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找机会歼灭敌人。”(4)

(10) 大规模的攻坚战，只要善于掌握成熟的时机，就能取得胜利。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敌人陷于孤立惊恐状态，他建议乘胜夺取之。晋察冀野战军执行朱德“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一举解放石家庄，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

(11) 战略决战阶段，在我军占绝对优势，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使其进退失据时，应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两手并举的方针，力争和平解放敌占中心城市。遵照中共中央的决策，他的这一思想，在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是聂荣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思想概况。本文拟着重介绍他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思想。这是最具他本人特色的两个问题。

### 一、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荣臻是较早认识这一重要规律的成员之一。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利不久，他向中央军事部写信建议，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应“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5)以图发展。

1928年，他在香港总结广州起义失利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6)1929年，他在巡视东江地区党的工作时指出：东江红军应该坚决地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觉悟起来，支持红军，以造成广大的游击战争区域。这样，可以钳制敌人，“使敌人的战线延长，红军可得各个击破。东江目前的唯一中

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结合起来。”(7)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在早期就认识到，人民武装起义，只有深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根据地，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强敌。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有了系统发展。

1937年11月，他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名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72个县，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之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8)。到1943年的6年间，他率领晋察冀军民，先后粉碎了日伪军以2万至7万兵力发动的10次大规模的“围攻”和“扫荡”，挫败了敌人5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百团大战和多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作战1.7万余次，歼灭日伪军23.5万人。聂荣臻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获得重大成就。依据已发表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十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总结》、《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纲》、《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论敌后抗战》等著述。可将聂荣臻在农村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作如下概括：

(1)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依托，行军作战要以它为依靠，兵员和供应要以它为来源。聂荣臻经历了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备尝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根据地作战的艰辛，初到敌后所面对的种种现实，使他得出了必须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结论。他认为，晋察冀边区孤悬敌后，得不到任何后方支援，又处在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其中冀东、冀中区还分别面临北宁、津浦线)，利于敌人快速调动，我军易受围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必须集中全力，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逐步成为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9)基于这种战略性判断，他于1937年11月中旬率军区领导机关由五台挺进阜平，到12月中旬，即以阜平为中心，成立了4个军分区，使晋察冀根据地初具规模，迅速打开了抗战局面。

(2)不断壮大与巩固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人民武装相配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中心问题。聂荣臻率部挺进敌后不到一个月，就遭到日军“八路围攻”。虽然在正确的作战指挥下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军取得了反围攻胜利。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他已深有感受。加上日军正加紧组织伪军、伪政权，以图巩固统治；汉奸、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群众惶恐不安。据此聂荣臻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的创造者，无八路军则无边区”(10)的论断。并以此为指导方针，分配主力部队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打小仗，收集武器，抓住群众的抗战热情，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同时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民兵、自卫队等地方人民武装。并在一切为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间已有的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对众多的杂色武装进行整编改

造。然后对新部队整顿训练，淘汰不良分子，使之变成象八路军那样坚强的抗日武装。1940年7月，他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子弟兵”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以使“军政民分工合作，生产作战，血肉相连”(11)，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艰苦奋斗，1938年底，军区主力军和地方军已发展到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10万多人，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最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3) 必须建立与巩固同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劳动群众占绝对优势的抗日民主政权。日军侵占华北，晋察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聂荣臻认为这非常不利，为了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抗日，必须有一套政策，没有武装与政权，政策就无从实现，也不可能把各阶层群众全面组织起来。建立政权，是建立根据地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他提出，“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地恢复地方的政权。”(12)在他的领导推动下，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在河北省阜平成立。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一千余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这个边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的武器。”(13)1月28日，王明致电中央，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聂荣臻2月1日在复电中指出，如按王明的意见，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正符合阎锡山的要求，我们便要“为他人作嫁衣裳。”(14)他还重视用民主的办法促进政权建设。

1938年起，每年选举地方各级政权，并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巩固政权。晋察冀完善的政权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战争胜利。

(4) 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在于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聂荣臻认为，要发动群众，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与发展武装、建立政权相比，要使晋察冀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提高，群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在他的重视推动下，不到半年，晋察冀各地先后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会员达120万人。“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的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15)他还认为，要建立根据地，地形与群众相比，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条件。地形只是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之一，但基本上是人的条件。只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山地，平原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为平原村庄多，道路多，树木多，虽便于敌人调动，我们也易于隐蔽；平原人口多，资源也多，只要能在群众配合下控制广大农村，多组织小规模游击活动，就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徒有良好的地形也不能生存。1938年3月，他亲自到平汉路附近调查冀中平原的情形后，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建议开展平原游击战争。4月，毛泽东发布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巩固的强大推动力。

(5) 要想把千百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必须有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分配土地来发动群众的。抗日战争时期，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此，聂荣臻与边区党

政领导干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例如“二五减租，一分减息”政策，八路军到达以前，当地有所谓正租、杂租、小租等名目繁多的地租，农民收获农作物的2/3以上要交给地主；借贷年息有时高达本金的好几倍，农民遭受着残酷的盘剥。上述政策规定，地主只能收取农作物产量37.5%以下的地租，贷款利息每年不超过10%。“合理负担”政策，抗战初，一切军需粮款，规定都由地主、富农等富户出，负担过重。以后规定，农民收入多的也负担部分军需，大体做到按收入多少，合理负担。这两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也适当保护了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此外还有包括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逐步取代“伪钞”，实行统一累进税等为内容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敌占区政策，锄奸政策等各项正确政策。在执行政策中，聂荣臻鉴于中央苏区“赤白对立”的教训，提出当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偏向。他说，“敌针对我全民统一战线政策，专门挑拨我（进行）阶级斗争。过‘左’的政策，常为敌造成机会，所以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第一个矛盾，而不为敌乘。”（16）因此，晋察冀在《双十纲领》中规定，对罪大恶极的汉奸、逃亡地主的财产没收，对一般伪军官兵的财产不没收；由敌占区回归边区的伪军官兵、地主，发还其原有的土地、财产；没收汉奸、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须依法判决，不服判决的可向边区法院上诉。

（6）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上述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挫败敌人的“总力战”。聂荣臻认为，在根据地的各种斗争中，只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敌后抗战，又决不单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以简陋的武器与强敌周旋，必须依靠于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利用我们政治上的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才能对抗敌人的军事优势。“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17）晋察冀边区正是运用这种综合斗争的手段，才得以多次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总力战”等各种图谋的。

（7）山岳根据地与平原根据地，各块根据地之间，必须相互支持，互为依托。晋察冀边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几块大的根据地。它们被敌占主要城市和铁路干线所阻隔，又反过来包围着敌占城市和铁路干线。聂荣臻说，根据这个特点，“应把这一问题（各根据地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为依托）提到战略的高度。”（18）在他的组织指挥下，1940年10月的平西反“扫荡”，1941年5月的冀东反“扫荡”，1941年北岳区的秋季反“扫荡”，1942年冀中的“五一反扫荡”等几次大的反“扫荡”斗争，都由于互相配合支持和互为依托，或取得了胜利或减少了损失。他还认为，山地是依托，平原是粮仓，两者不可分离。抗战期间，冀中的兵员及棉花、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北岳区的军需民用，成为北岳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北岳区多山，地形良好，是晋察冀边区的发源地，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冀中、冀东等根据地的运筹决策、干部训练等大多在此进行。冀中遇到强敌“扫荡”时，部队常越过平汉路，依托山地坚持斗争，又在适当时机返回冀中。冀东则经平北与北岳区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态势。由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包围着敌人。晋察冀抗战的历史证明，各根据地

之间（包括与晋东南、晋西北根据地）的互相支持，互为依托，是战胜日军的重要条件之一。

（8）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发展，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困难时要着重反对保守主义，顺利时要着重反对冒险主义。聂荣臻初到敌后，即以北岳区为中心，尽力向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发展，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始执行的是从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到1939年初，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的指示，直到1940年，他着重抓了改造政权、整训军队、健全党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优势扩大统一战线等项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支持第120师挺进冀中，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向平北、冀东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执行的是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1941年以后，日军重兵“扫荡”、“蚕食”，晋察冀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他号召，“必须（在）发展中坚持……否则，（既）不能发展，亦不能坚持。”（19）终于渡过难关，到1943年进入重新发展的时期。1950年，他凭借创建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代中央草拟的一份复电中说，“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时）再行推进。”（20）这个答复，为毛泽东批准，只加了“既”和“又”两个字。（9）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要根据敌人的特点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综观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指挥特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正确处理“点、线、面”的辩证关系，着重控制面。聂荣臻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是占地广而兵力不足，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针对这种状况，他着重组织小部队和游击队，向敌后反复袭扰，以游击战不断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他还指示所部，在敌人占领的“面”之中，要千方百计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以不断缩小敌人对“面”的占领。这在“点线面”斗争激烈的冀中、冀东、平北等根据地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他还始终要求部队，只要一有机会，就用各种形式开展交通破袭战，以斩断敌人的“线”，孤立敌人的“点”。他说“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沧石路由津浦线上的沧州到平汉线上的石家庄，横贯整个冀中区，日军曾企图先修成公路，再发展成铁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21）抗战期间，由于我军的积极破击，沧石路始终未能修通，正太路、平汉路几度中断，这对遏制华北日军的行动和“点线面”扩展的企图都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关于“点线面”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战略指导思想，使晋察冀的各个根据地，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对“面”的占领，敌人只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被动挣扎。

（2）对于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敌人，则集结主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以运动战或伏击战歼灭之。为此，1938年10月，他决定整训一批大的游击兵团——团一级的作战部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使之不仅能打游击战，还能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

1939年，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连续取得了陈庄（1939年9月，第120师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于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附近歼灭日军1200余人）、大龙华（1939年5月，晋察冀第1军分区部队在河北省易县大龙华经激战，歼日军360多人，缴获日军机密文件50多册）、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其中尤其是1939年11月上旬先后举行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五个团一个支队，在第120师一个团配合下，诱敌至有利地形，伏击围歼了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1500多人，击毙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此后，加上各军分区组建了大批地方武装的主力——地区队，迫使敌人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边区“扫荡”了。这对根据地的巩固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3)“围攻”反“围攻”、“扫荡”反“扫荡”，成为晋察冀边区敌我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式。聂荣臻提出了反“围攻”、反“扫荡”作战的指挥原则：对分路“围攻”“扫荡”的敌人，一般先用小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不断袭扰，同时组织适当兵力打击敌运输供应线，以疲惫消耗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股或一部。在敌兵力占较大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时，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适时转至外线机动，免遭大的损失。对深入据守边区腹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破袭其运输补给线，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待敌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抓住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选择其薄弱的一路或最后梯队，突然包围歼灭之。敌“围攻”“扫荡”的兵力过于强大时（如1941年秋季，日军集中7万余兵力，对北岳和平西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主力一开始就适当分散，相机尽早转至外线，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并在外线选择有利时机，着重打击敌后方交通线及运输补给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他还亲率少量部队，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对付敌重兵合围，然后机动灵活地跳出合围圈，以造成转到外线部队的有利战机。这次反“扫荡”，经66天800余战的艰苦斗争，我军虽伤亡近2000人，但歼敌4700余人，挫败了敌人图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犹如“狮子扑鼠”，以失败告终。在反“围攻”反“扫荡”战斗中，他还充分利用群众支持、地形熟悉、山地作战等对我有利的各种条件，广泛组织夜袭战、伏击战，并率领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游击战手段杀伤敌人。

(4)以“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1941年秋季大“扫荡”失败后，敌人强调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我根据地周围普遍增筑堡垒及封锁沟、墙，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以“蚕食”与“扫荡”、制造无人区、经济封锁等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的“囚笼”政策，企图困死我军。到1942年夏，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几至逐村皆是，其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晋察冀根据地面积几乎缩小了一半，面临严重困难。聂荣臻鉴于当年“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以堡垒对堡垒”，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果断作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决策。他一面号召与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平毁敌人的堡垒和封锁沟、墙，一面命令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22)另以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缉成几十支百多人的

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颓丧日军斗志。经过一系列斗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至 1943 年，根据地大部分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具有理论意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首先要发展武装和建立政权，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思想；关于依靠政策发动群众，然后紧紧依靠群众来赢得战争的思想；关于只要有了群众，在平原也可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关于各根据地之间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在敌我之间形成包围与反包围，以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建立边区子弟兵，以增强军民鱼水情的思想；关于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人“总力战”的思想；关于根据地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思想；关于在“点线面”的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思想；关于反“围攻”反“扫荡”作战指挥的指导思想；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以打破敌人堡垒推进政策的战略思想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客观规律。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或补充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特点。在我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这些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样，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二、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荣臻历任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1954 年起，负责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

1956 年起，以主要精力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

1985 年，他按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决定精神，退出实际工作后，仍然关心着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他和全体科研、军工人员的努力下，我国 1960 年仿制成近程地对地导弹，1964 年研制成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同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 年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携带原子弹头的中程地对地导弹核武器实弹试验，1967 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 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 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0 年又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与此同时，研制成功了多种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

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聂荣臻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重大决策，深入实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始终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以顽强的精神，努力追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力争我军武器等备尽快现代化。从他的实践中，可将这方面的思想概括如下：

(1) 中国是个大国，迫切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应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最新的国防科学技术，用以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早在 1950 年，他就提出，仅有 540 万步兵部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和特种兵部队，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就无法加强，所以必须减少步兵数目，省出钱来，以加强海空军和特种兵建设。同年中央决定，解放军裁减至 400 万人。他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主持完成了这次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精简整编任务。并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人民解放军先后成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兵种领导机构，及一批国防技术院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1951 年，他引用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以现有装备是不能打败帝国主义的，所以我军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其物质基础就是新的

装备，搞新装备是困难的，但困难必须克服。

1954年10月，他负责军工生产后，为摸清“家底”，翌年春抱病到重庆、昆明等地，20天内视察了8个军工厂，反复强调要保质保量完成军工生产任务，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

1958年，他说“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原子裂变和热核反应，在各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最新技术，掌握无线电和电子学的最新技术，掌握喷气和火箭的最新技术……我们应该在这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装备起来……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掌握和与此有关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建立，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必要前提。”(23)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加强战争观念，国防观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威力。“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24)聂荣臻认为，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就没有现代国防。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外乎是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政治思想工作、训练工作与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新武器、新装备掌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就会发挥更大的威力，就会成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聂荣臻正是怀着如此强烈的愿望与坚定的信念，来狠抓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

(2)以研制先进武器为目标的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聂荣臻认为，研制现代化武器，由于技术上的高度复杂性，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都必须依靠国家各个民用工业部门的支持，“几乎没有那一个工业部门是和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用说间接的关系了。”(25)因此，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民用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仪器仪表等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这样，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就会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国防新技术成果，又可以迅速向民用工业部门转移，提高民用新技术水平，两者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起良性循环作用。他举例说，在尖端技术方面，以导弹、原子弹作为研制重点，就能带动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新型原材料的出现，带动化工材料、高能燃料、精密仪器仪表、无线电电子学、测试技术、计算技术、自动化技术、放射性医学以及许多理论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到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就已经有一大批导弹、原子弹、航空、军用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新技术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他的结论是，“国防现代化与发展最新技术的需要，不但强有力地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展，而且能够带动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提高。这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和最新工业生产部门，迅速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尖端技术带动一般工业技术的发展，不但在我国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很多尖端技术往往都是先应国防的需要而研究，等到技术成熟，经济上合算以后，就在国民经济中大量采用。如果我们不发展这些尖端，不过技术关，那么，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的进度就更加拖后了。”(26)

(3)在制定国家长远科学发展规划时，必须制定相应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只有确定正确的目标，才能使我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得以迅速前进。聂荣臻高度重视研制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他说，“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

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27)因此，他在1956年参与领导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主持制定了我军的第一个武器装备长远发展规划，提出了包括火箭、原子能、电子设备、飞机、舰艇、装甲坦克、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和军事医学等方面的武器装备发展要求，明确了前进目标。

1963年，他在领导制定国家长远科学发展规划的同时，又领导制定了“1963—1972年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了我国在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方面迎头赶上6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他按照规划要求，始终一手抓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一手抓陆海空军的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1961年6月，他在对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的意见中强调：国防工业有两个问题，即常规如何配套，尖端从哪里突破。常规方面一定要将当前装备配起套来，至少做到一有事就能动，即走得动，打得响。他还强调，陆军历来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陆军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应该予以优先考虑。他1983年1月同张爱萍谈我军武器装备发展问题时说：我们打仗历来主要靠陆军，海空军是配合陆军打仗的，这是条原则。因此要先搞好陆军装备。所以他一再要求，要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补缺配套，同研制尖端武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海、空军，他历来强调，要贯彻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发展歼击机，地对空导弹、中小型作战舰艇及岸对舰、舰对舰导弹等防御性武器装备为主，力争有效地保卫领空、领海。再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聂荣臻领导制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这些目标，是始终一贯的，体现了他既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又认真贯彻了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立足国内现实条件，能较好地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实践证明，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军武器装备的正确目标。

(4)目标确定之后，首要的任务是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根据中国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的特点，在组建机构方面，他先把各研究部门、工业部、高等院校的有关科研机构组织起来，积极承担国防科研项目。

1956年他提出，“目前全国科学力量分布在各个部门、各高等院校和各研究机构。哪个地方有力量，哪个地方有专家，就应该充分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在那里开展工作，建立研究工作基地，并依靠这个力量来向科学进军。”(28)1958年，根据中央的决定，他着手组建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两委都由他兼任主任。加上中国科学院，在他的统一领导下，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资的管理分配，都由这三个机构统管了起来。这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比较协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减少了互相扯皮，解决问题快，工作效率高。接着，他根据需要与可能，1960年，在已经有了导弹、核武器研究院的基础上，报经军委批准，又陆续组建了飞机、舰船、电子设备等武器装备研究院，相对地集中各专业的研究力量，形成若干个“拳头”，它们各有侧重，又互相密切协同，从而加速了武器装备的研制进程。他还领导组建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等科研服务机构，对科研工作起了良好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聂荣臻高度重视科技队伍的建设。作为应急措施，从1956年起，他先抽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爱国科学家，和海外回国的爱国科学家，集中到国防科研战线上

来，放手让他们担任各专业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并采取措施，大力争取爱国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成效显著。他更加重视培养新的科研人员。他说“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29)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采取多种措施，加速培养青年一代科技人员，把我国突破尖端技术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一面充分发挥老年和中年科学家的作用，让他们带研究生或助手，在实践中使青年科技干部迅速提高研究工作水平。一面选派优秀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着重学习国防新技术专业。更多的是努力办好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国防高等技术院校，或是在重点高等院校中开办国防新技术专业，将其中成绩优良的毕业生调到国防科技部门工作。经过几年努力，使国防科技队伍迅速扩大，满足了工作需要。他还模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科技人员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分配工作时尽量作到专业上学以致用。

1960年10月，他在宴请导弹研究院的教授专家时，勉励他们技术上要勇于负责，不要怕失败，尽快拿出自行研制的导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

1962年2月，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经他提议，周恩来、陈毅先后到会讲话，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同年3月，在听取钱学森汇报最近一次地对地导弹试射失败的经过时指出，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这与贯彻责任制不是一回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领导呼吁，尽快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水果等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国防科研系统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他说，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贝，研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靠他们，我们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我做梦也常在想这件事。平时专家们要见他，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建议。知识分子普遍把聂荣臻看成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聂荣臻花大力气组建科研机构、组织科技队伍、培养科技干部的经验是成功的，为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各项科研任务的及时完成。

(5)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大力协同，坚持攻关，是突破“两弹”的有效措施。1960年，苏联拒不执行“新技术协定”，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国内又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

1961年，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关头，对搞不搞导弹、原子弹？国内各有关方面形成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一定要研制出尖端武器的既定决策，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他提出，“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国家）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30)同时，通过前一段实践，他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攻关，这是他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聂荣臻1961年8月关于坚持攻关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大力支持，获得中央批准。他当时的想法是，要突破高度复杂的尖端技术难关，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他说，“在突破尖端方面，集中力量是非常必要的，仅是游击队是不行的，必

须组织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才能解决战略任务。由于我国当前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只能集中全国力量来搞，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散力量，不能互不服气……科研机构、生产部门、教育部门（指高等技术院校）和使用单位必须紧密结合，拧成一股劲，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要搞共产主义协作，互相帮助，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的争名垄断和互相封锁、竞争。这样，新产品、尖端的东西才能搞出来，国防科学技术才能高速度发展。”(31)聂荣臻还把尖端能不能过关，看成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事关祖国兴衰、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当时他在研制“两弹”方面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1)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科研与生产的安排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安排上，以尖端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原子弹，没有导弹，原子弹难起作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为主，地对地导弹突破了，各种导弹的技术原理基本差不多，就容易突破。与此同时，争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设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他还生动地把这比喻为“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32)(2)继续坚持狠攻新型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他提出，“要狠抓尖端的‘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33)这是他抓尖端攻关经验的科学概括。只有抓住了这七个方面，才能顺利突破难关。“开门七件事”，简明扼要，成为科研战线的动员令，在攻关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组织全国大协作。他提出了组织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要求这五个方面从理论研究到工业基本技术，都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我国研制“两弹”的突出成就证明，聂荣臻在攻关战斗中关于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难题，组织全国大协作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由此，他被国内外舆论界称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6)要研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必须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是聂荣臻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向中央建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34)为辅，作为导弹研究院的建院方针，获得中央批准。

1959年他又提出，“我们历来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科学技术上也应该如此……要攻克尖端科学技术堡垒，不能依赖，不能等待，要立志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突破。”(35)直到1979年，他仍然强调，“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技术全部卖给我们。”(36)聂荣臻关于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思想是宝贵的。实践证明，50年代中苏关系融洽的时候，苏联给了我国某些导弹、飞机等军工方面的援助，但都是第二、第三代的产品，有些是他们已经停产甚至是淘汰的产品。

60年代初，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变化，苏方立即片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停供技术资料、重要原材料及实物样品。这还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

尚且如此。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和战略目的，卖了一些第二、第三流的技术给我国，但关键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国防方面的先进技术是决不会卖给我们的。象 F-16 战斗机，美国可以卖给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就是不卖给中国。

1989 年 6 月的北京反革命暴乱事件，西方国家把“停止军售”作为制裁中国的第一项措施。这些历史事实，足资证明武器装备要现代化，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与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他又说，“在科学技术上的自力更生，绝不是关门摸索，相反地，需要千方百计地有选择地把国外对我们有用的成果迅速拿过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条件使用。”(37)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迅速掌握世界科学技术现有成就，避免不必要地从头研究国外早已解决的问题，少走弯路。越是强调自力更生，越应该注意学习和掌握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否则将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这是时代的要求，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因为强调自力更生，而想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应该注意和我国自己的研究、中间试验、设计工作相结合。光靠买国外的先进设备或技术，自己没有一个班子来消化、掌握并进一步提高，那就会摆脱不了依赖局面。聂荣臻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在我国大力提倡“开放”政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民用的关键先进技术，不强调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执行好“开放”政策。如何正确地解决好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的关系，聂荣臻的上述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7) 军工产品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这是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能否过关的关键。他说，“人不讲卫生，就会生病。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一件产品，特别是精密尖端的产品，从原材料的检验、保管，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存放、加工，成品的装配、检验，一直到包装出厂，都应该有准确的规程秩序，才能确保质量……(在)精密和尖端技术的工作中，注意必要的清洁和秩序，也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于我们在现代工业上能否过质量关的大事情，是掌握精密科学技术的起码条件。”(38)为了确保质量，1960 年他建议中央和国务院作出规定，军工产品“只有按品种、按质量、按数量完成了生产任务，才算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数量，也不算产值。”(39)1962 年 5 月，他对一些科技专业应届毕业生谈话时，希望同学们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国防工业和科研系统称颂为“三严”精神)，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工作，以确保产品质量。他举例说，“一架飞机或一座加速器，是由成千上万个零件部件装配起来的，要经过许许多多道工序，件件都要认真加工，认真检验，都要严格地合乎标准，有些零件就是多沾上一点点看不见的灰尘，也会坏事。”(40)1963 年 4 月，他再次指出，“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制、试验、组织生产，这是每一种武器装备成批大量生产出来的七道关口。”(41)各级领导都要狠抓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才能确保军工产品和一切工业产品的质量，这是被现代工业史证明了的真理。聂荣臻对确保产品质量，是身体力行的模范。1967 年 6 月，他到现场主持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得知氢弹弹体有颗螺丝钉脱落，不知去向，空投氢弹的降落伞有两根伞带模拟试验时没有按要求展开。有人说，这不影响试验，他坚持试验推迟，直到把两个技术疑点排除，才批准试验，并获得成功。工业产品质量差的问

题，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强调“质量第一”的思想，无论是对科研还是生产，对军品还是民品，显然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8) 努力做好科研服务工作。聂荣臻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因此他反复号召，为了使科研人员能集中精力做好研究设计工作，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政工和行政干部，都要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勤务员”。同时，必须努力做好科技情报、图书资料、仪器仪表、化学试剂、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科研条件保障方面的服务工作。

在聂荣臻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主要物质技术基础——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域里，聂荣臻对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有许多理论性论述。他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的思想；关于国防科技现代化与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建设能相互促进的辩证思想；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要符合我军战略总方针的思想；关于目标确定以后，着重组建机构、组织队伍，以解决科研力量问题的思想；关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坚持攻关的思想；关于发展武器装备必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研制军工产品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关于在科技工作中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等等，在我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仍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研制出技术上高度复杂的导弹、原子弹，这方面的经验尤为宝贵。经过十年改革后的今天，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各方面的条件要比当年好多了。但我们仍有许多涉及国家安危兴衰的国防和民用方面的重大科研课题有待解决。要突破这些难点，借鉴聂荣臻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的成功经验，至关重要。并且只要运用得好，相信一定能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就。事实上，目前各主要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对待高科技项目，科研上都在走集中力量攻关的道路。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筑波科学中心，美国的硅谷、“星球大战”计划的一些重要项目，还有象“超导”研究、可控热核反应、智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等某些高技术领域，都出现了跨国公司或本国几家大公司合作进行研究的事实或趋势。正是在这个主要方面，研究和发扬聂荣臻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注释：

(1)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

(2) 《黄埔潮》第5期第19页，1925年。

(3) 1947年4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99页。

(4) 1947年12月聂荣臻“在晋县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第1页。

(5) 聂荣臻给中央军事部的信，1927年11月4日。

(6) (27)(30)(32)《聂荣臻回忆录》（精装合订本），第97、779、814、8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7) 1929年11月6日聂荣臻《东江巡视员的报告》，《军史资料》1985

年第8期第5页。

(8)1938年10月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76页。

(9)(12)(13)(15)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第10、13、16、17、21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5月版。

(10)聂荣臻:《十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总结》第14页。1939年1月。

(11)(18)(20)聂荣臻:1940年7月《在晋察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纲》第24页,《军史资料》1985年第6期第23、32、31页。

(14)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8年2月1日。

(16)(19)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第20页,1943年10月。

(17)聂荣臻《论敌后抗战》第3、6页,1943年6月。

(20)聂荣臻答复罗贵波关于“固守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如何理解问题的请示。1950年4月。

(22)聂荣臻:“反蚕食斗争训令”,1942年5月。

(23)聂荣臻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党抓科学技术,实现技术革命》第7页。1985年5月。

(24)(25)(41)聂荣臻:《在军工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2、4、5页。1963年4月。

(26)(35)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第11、21页。1959年12月。

(28)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2页。1956年12月。

(29)(31)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第1、4页。1961年1月。

(33)聂荣臻:“关于1961、1962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第3页。1961年1月。

(34)《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第9页。

(36)聂荣臻在“听取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时的指示”。1979年11月。

(37)聂荣臻:“有关加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三项措施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第5页。1961年11月。

(38)“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聂荣臻同志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的报告”第2、3页。1960年10月。

(39)聂荣臻:“关于西北地区国防工厂情况给军委并中央的报告”第12页。1960年11月。

(40)《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第4页。1962年5月。

**作者** 周均伦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聂荣臻同志办公室副军职秘书,59岁,80年代起从事聂荣臻元帅生平研究工作,已发表研究论著20余万字。

# 叶剑英对现代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

范 硕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在统帅部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制定战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善于运用和落实最高战略决策，指导战争全局，又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从而发挥和丰富了最高战略决策。建国以后，叶剑英长期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上，运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参与制定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的军事理论已经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建设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叶剑英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早期创建者之一，曾经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驱逐桂系军阀统一两广的战争，参加国共合作后的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参与创建红军。在此期间，他对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孙中山提出的“武装力量应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在实践中加深了认识。他回顾这一段历史经验，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加以总结，有深刻的体会，他说：“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期，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以及当前的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1)叶剑英参加了这次整军，事后写道：“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的将士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的军队的精神。”他总结经验教训说：“可是那个时期，主要是运用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

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的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这支革命军不仅要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2)

叶剑英对党和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也有深切的体会。他说：“1921年的出师桂林北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后方的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北伐，……当北伐军打下赣州，节节推进时，盘踞广东根据地的陈炯明（当时在惠州）却密令叶举，由广西突然袭击广州，这就是陈炯明的公开叛变事件。那一次事件，中山先生虽然在永丰军舰上组织了朱培德、许崇智两部回师勘乱，并亲率永丰等五舰挺进广州作战，可是由于陈

炯明靠了运输上的方便，在韶关打败了自江西回师的朱培德及许崇智部队，以至中山先生不得不离开永丰舰，同时也暂时离开了广东。这个事件和以前的几次经验，使中山先生了解到，要想革命成功，北伐胜利，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他认为两广必须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1924年他规划了东征惠州、潮汕的战略计划。那时候，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并以黄埔一期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两个教导团，同时粤军已经过一番整顿。这些新生力量攻占了潮汕，回师消灭了驻在广州的滇桂叛军，初步实现了中山先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中国近代史上的1927年大革命所以能取得初步胜利，从军事角度看，那几年的建军、建立根据地等工作，也为大革命准备了条件。”(3)为了进一步阐明根据地的思想，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回顾历史说，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东联吴越，西取巴蜀，同曹操形成鼎足之势。西取巴蜀就是解决根据地问题。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就是搞根据地。诸葛亮的“隆中对”很了不起。

1927年冬，叶剑英在参加和领导广州起义中，对建立人民军队、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广州起义武装力量遭到敌人反扑、围攻，起义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他和叶挺向苏联顾问诺尔曼一再提议在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不宜坚守广州，要把革命队伍拉出去转向农村，与农军汇合。但遭到拒绝。起义失败后，他到香港与聂荣臻一起研读太平天国的史书，联系探讨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仍然认为，没有将起义军及时拉出去，与农民军汇合，殊为可惜，从这次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他写道：“广州起义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籽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4)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叶剑英对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有深切的体会，并广为宣传，坚持贯彻执行。

1959年11月7日，叶剑英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发表二十周年，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一文，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他写道：“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

这些原则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叶剑英针对有些人对毛泽东建军原则有所忽视的情况，强调指出，毛主席所独创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导原则，以及一套人民军队的规章制度，这不仅是民族范畴内的东西，而是国际范畴内的东西，换一句话说，是已经达到国际标准可以“出口”的东西，有人只知道需要“进口”，不知道自己可以“出口”，这是一种殖民地的思想。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作战指导原则，是中国勤劳和勇敢的劳动人民在自己长期解放斗争中，特别是从最朴素的人民游击战争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现代化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集中群众智慧的表现，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光辉创造。世界上有许多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都遇到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军队，才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匈牙利人民有过教训。所以，掌握自己的民族特点，吸取世界的先进经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军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 二 阐发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和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参与制定抗战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出席南京国防座谈会，作了“政略、战略”问题的重要发言，提出“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内线，但战术上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

叶剑英根据全国军事局势和各个战场的战况，撰写军事论文、发表演讲，阐发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如《论北方战局》、《在敌后的两年》、《东北的七年》、《论日军的跳跃作战》、《游击战线上的军事问题》、《粉碎敌寇新的战略进攻》等三十余篇被新华社汇编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出版，发行量很大，产生了广泛影响。叶剑英非常重视抗战全体性，他指出：“我们抗战，是全体性的战争，进行全体性的战争，需要有全体性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领导抗战的司令部参谋部，假使在战略或战术思想上，只因循着旧时的途径，把自己的工作内容，拘束在一个单纯的军事范围，只是单纯看到自己的部队，应如何针对着当前的情况，定出一些行动计划就算完事，把许多政治因素，例如政治工作配合的程度，群众动员的程度，游击运动的强度等抛开，不加以估计，不把这些力量（政治的军事的群众的）统一在一个作战计划之下，配合起来，组织成为带着更多全体性的战斗，象这种作战的领导，已经不适合抗战的要求了，必需重复说一句：全体性的战争，必须有全体性的领导。”（5）他在《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文中阐释持久战的问题，指出：“大家明白，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上有三个阶段，一为敌人进攻，我方防御；二为敌人保守，我军准备反攻；三为我方反攻，敌军败退，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多次阵地战中惨败的教训，他指出：“我们应该换一个新的作战方式，就是一方面正规军组成主力，在一些军事要点上和敌人打运动战，另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广大的游击战。”“这种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起来的新的作战方式，

在作战上，比从前进步了，我们在第二期作战采取了这种新的战术的结果，敌人进攻的锐气大大地消减了。”

1939年5月，叶剑英与司徒文森谈战局时，分析了当时日军采用“全面、跳跃作战的方针”。针对这种方针，我方的对策是：“以静制动”。“在某几条可以被进攻的线上，我们把兵力布置好，当敌动时我们以镇静的态势打击他，在敌人静的方向我们则积极的动作起来，争取主动的运动战。因此我们对付敌全面跳跃作战的原则，在战略上是以静制动，战术上以动制静。”“还须大规模在敌后进行破坏工作。在敌后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破坏重于作战”。“各方面的抗敌工作，均应引用到大规模的到敌后进行破坏工作上去。”

在“积小胜为大胜”的著名的演讲中，叶剑英指出，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必须是战而胜之，不是拖而胜之，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在战斗中获得胜利。”“由于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消耗敌人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的力量继续增加，这才使敌我力量起变化，获得力量对比的优势，可以进行有力的反攻。”他强调指出，在二期抗战中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在今日战术必须有所改变。虽然我们在战略上防御，可是在战术上必须采取攻势，战术的内容可以说“一切为着进攻”。战术上要“袭其所必来”，“攻其所必救，防御必须是为进攻的防御；退却的目的也是为了进攻。”他指出，“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整个战场的作风必须有这样一个转变，今后必须在战术上应用这些原则求得胜利，才能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6)

叶剑英十分重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1939年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政府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任副主任和副教育长，领导拟定教育计划和章程，亲自准备教材，亲自主讲。叶剑英被公认为“游击战争战略家”。曾经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获的一篇“新闻通讯”上披露了教学实况。文章写道：“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十二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静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本上爬过，到下课的铃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记满了硬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前，叶剑英亲自组织了一次为时四天的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收到好的效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报告》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游干班培养大批游击专家和骨干，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

后来叶剑英虽然离开了游干班到重庆工作，但仍然十分关心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他指出：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游击运动发展到有根据地时，可以由较大的游击战争形式，发展成为没有巩固后方可是有临时依托的运动战。”(7)他要求正规军也要配合游击战，“只有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时间上及空间上适切的配合，才能战胜凶恶敌寇。”(8)他分析华北以及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指出：“从战略观点看

来，要保障西北，必先巩固山西，欲保障山西，必须坚决地进军河北，而河北平原的游击队的支持，必须得到太行山与泰山两条山脉的游击战相呼应。”他提出为开展游击战创造必要的条件，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艰苦的游击战线上，我们要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只有给游击队以各种合理的自由的条件，才能想象。”接着他列举了要给游击队以动员群众的自由，以建立根据地的自由，以收复失地的自由，以向正规军发展的自由，“只有游击队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地发展起来，正确的执行游击队所担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务，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游击战，叶剑英将敌军对我游击战的对策概括为：“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旋磨打圈”“小群游击”“掠夺粮械”等五个特点，要求我们根据敌军改进其进攻方式，不断变化的战术，进一步研究游击战中的战术问题。(9)

叶剑英非常关注世界战局的发展趋势。

1940年1月，他发表了《新年论欧战》一文，分析各个交战国的特点，指出战争的广泛性和长期性。他写道：“尤其是在持久战中，这是无可争辩的。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得到说明。现代战争，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消耗的阶段，战争走向长期和消耗的阶段，经济作用占极重要意义。在经济战争中最本质的问题，便是许多交战的国家的，都没有支持长期消耗所必需的原料，而不能依存于世界市场。以英德两国为最。假使经济战争的结果，便足以屈服德国，那么世界战争发展前途，将发生严重的变化，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假使经济封锁德国，为德国反封锁政策所击破，最后，依然不免发动主力战。那么帝国主义混战，将急转直下的开展。……假使世界上没有新因素产生的话，帝国主义大战将继续展开的。”最后叶剑英归结道：“英德经济战争，和苏芬问题，对于战争前途颇有决定作用。假使张伯伦十八个月封锁德国的计划，可以成功，苏联红军，援助芬兰的行动，又不能及时的胜利的解决，那么，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的危险，将要增加；假使张伯伦封锁计划不能成功，而苏芬问题又可以及时的胜利的解决，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直的开展下去，要求以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混战。这就是欧战发展的两个可能的方向，同时也是全世界和平人类，准备用空前的力量，用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总指标。”

叶剑英这些独到的分析判断，经过以后的抗战实践检验是十分精确的。

### 三 坚持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等职。在此期间，他参与制定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并认真贯彻执行。叶剑英针对当时一部分人对自卫战争战略方针认识不清的情况，多次阐释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的关系问题。他说：“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是外线作战，内线作战是有后方的，是在十年来熟悉的战场上作战。”“总司令部已宣布解释了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进行全国的新反攻，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这样打法，即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有人问，何必打出去呢？叶剑英回答说：“这个方针肯定的是对的。今天打出去，不是一种偶然的动机，而是根据一年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斗争形势决定的。这即是蒋管区人民要求我们帮助他反饥

饿，得到土地，得到民主。在经济上，我们要开源节流。在军事上，打乱了敌人部署，便于消灭蒋介石。他还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外线作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过去一年的自卫作战，我军已经大量歼灭敌人，壮大了自己，我们有力量打出去；敌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已转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在它的中间出现了薄弱环节，有利于我们从中间突破；蒋军士气低落，后方空虚，便于我们打出去；为了保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后战胜蒋介石，我们必须打出去。”叶剑英强调指出：十年内战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毛主席即主张把主要战争引到蒋管区去，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但今天打出去，与过去一样，于我更为有利。不打出去，是蒋之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蒋介石要求我们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不打出去，即犯了错误。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高潮的前夕，刘邓大军一打出去，蒋介石就焦虑不安，暴跳如雷。一再叫嚣要加强长江防务，并在武汉正忙于设防搬家。中央指出，打出去要建立根据地，要大量歼灭敌人，大量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经过反复作战，才算是建立了根据地。(10)

在土地会议期间，对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曾经有过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解放区应在巩固中求发展；有的则主张现在是发展时期，应从发展中求巩固。叶剑英在答复这个问题时，他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红军长征到陕北，中央提出东征打阎锡山，很多人强调应在巩固中发展，不赞成东征。当时，毛主席主张东征，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巩固。应发展而强调巩固，这是保守思想；不顾主客观条件，不能发展而强求发展，这是冒险思想。叶剑英说：“今天发展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一定要发展，一定要它稳得住，老解放区有责任帮助正在发展的刘邓（大军）。一切保守自私，没有远见，没有整体观念，对我们是有害的。”(11)

叶剑英对毛泽东制定的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有关争取胜利的一系列指示有深刻的领会。在1948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后，指出，一年多来，扭转了蒋介石的形势，扭转了革命形势，我进攻了，把战争推向前进了。我们前面进攻，后面拔钉子。如石家庄被我们解放，石家庄蒋的守兵调走，不仅依靠于我们政策的正确，还要依靠于敌人的错误。……今后，我们更加努力，把所有解放区联系起来，蒋介石就成为瓮中之鳖了。现在沈阳、长春、吉林都已孤立，孤立之后，我们就能拿过来。军事和政治一样，也是先孤立它，后攻取它。孤立之后，才能打下来，守得住。他最后归结说，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胜利，就由于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略和战略，这十条军事原则很重要，也是毛主席的原则。”

但他并不主张机械照搬，而主张随着战争局势的转化，灵活运用。在解放战争面临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指出：“先前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目的为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今天要大量使用力量，不怕牺牲，大量歼灭敌人，大量发动人民。这样广大乡村人民的发动，即成为我们生根、稳步发展的关键。乡村城市同样重要，我们先占乡村，再占城市，要加强乡村工作。”(12)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新的发挥。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叶剑英在建国后，继续正确执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作战指示。在解放广东、解放海南岛以及建国后的剿匪作战、海边防斗争、巩固国防的自卫反击战中，他都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主持或参与制定作战

计划和布署，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沙之战中，叶剑英与邓小平一起，亲自坐镇总参作战室，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对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发出一个又一个的作战命令，粉碎了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的进攻，收回了国土，取得重大胜利。

#### 四 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八大关系

1954年，叶剑英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1955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理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20世纪中期，世界跨进核时代。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等新式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就给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叶剑英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建军任务，他说，军队的现代化和革命化是个统一的整体我们要通过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使我军革命化，又要通过军事训练使我军现代化。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

为了统一思想，妥善解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叶剑英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八个关系：

##### （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叶剑英认为，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则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军队的现代化。中央为了集中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加速工业和经济建设，减少国防预算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能够保卫安全的条件下，我们还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缩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并用积极的行动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反对那种不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而片面强调军事需要向国家多要钱多要人的错误观点。白我们也建议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当的照顾国防的需要，除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其它工业和经济建设，还应把平时和战时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有利于保卫国防安全的需要。

##### （二）人和技术的关系

叶剑英指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是军队中最主要的、最根本因素。不论是简单的技术或是复杂的技术。如果离开了人，没有人去掌握它，使用它，技术就成了死西，一无用处。过去我军之所以以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是由于高度发挥了人的作用。今后我们要完成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任务，要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的也还要靠高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那种认为我军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只应强调技术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加以反对。但是，军队没有一定的技术装备是不行的，技术落后了是要挨打的，我军现代化的技术水平还很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因此，忽视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对点，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我们的任务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充分的发扬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我军的技术装备水平。为此，必须加强部队的训练工作，使全军官兵不仅有高度的革命觉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手中技术，充分发挥现有技术的作用。必须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使我军的技术能不断的得到

改善。

### （三）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

叶剑英认为，我军是我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既需要有坚强的军事工作又需要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两者不可偏废。但军事必须服从政治，政治是主要的，军事是从属的。所以我军在创建的开始，就确定了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把政治工作看作为军队的生命线。这样就使我军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必胜的基础。

### （四）官兵之间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叶剑英指出，现在我军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融洽亲密。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必将削弱我军的战斗力。为此，除应加强教育外，建议还必须修改现有条令和制度中那些不妥当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贯彻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才能保证我军真正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 （五）集中和民主的关系

叶剑英说：军队有坚强的纪律，要统一集中，这是肯定的。一般军队如此，革命军队更是如此，我们革命军队的集中，是建立在广泛民主、自觉基础上的，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能有真正的集中，因此我们坚持军队中必须有广泛的民主生活。但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集中的领导，民主就会成为涣散、削弱部队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因此，民主、集中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是我军多年来的优良传统。现在全国已经统一，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为了实施有效的领导和指挥，进一步强调一下统一集中是必需的。

### （六）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的关系

叶剑英说，拥政爱民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家，乃是我军所以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近几年来，我军和人民的关系一般的说是良好的。但应当指出，在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缺点。自我们陆续进驻新营房，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以后，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逐渐疏远，对群众的的生活和对党的某些政策、政府的某些法令逐渐冷淡和不关心，特别是有些问题过分的强调了军事需要和军事安全，以致在修建营房、国防工事、训练场、机场、仓库时，占用耕地过大，迁移居民过多，并在军事设施周围随意划定禁区，妨碍群众生活和生产。这些现象必须加以纠正。为了密切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军队必须接受地方党的组织、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监督，军队负责人应参加地方党委，军队工作必须受军队的上级党委和所在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除此之外，只要情况许可，军队中有些重要的会议和措施，还应邀请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参加指导。

### （七）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

叶剑英认为，为了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军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我军过去的丰富经验，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和作战的要求，这些血汗的结晶，对现代化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说来，仍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不能丢掉，

而且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挥。墨守过去的经验，不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不对的，但丢掉自己的经验，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则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一再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固然必须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经验主义，但也要防止妄自菲薄的自卑观点，既要虚心，也要有信心。因此，在努力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必须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并把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之更加完备。

#### （八）现实和发展的关系

叶剑英说：军队现代化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适当的照顾到发展。既不能脱离现实而空谈发展，又不能只看到现实不考虑发展。我军要发展，而且要用尽快的速度，这是肯定了的。但发展不能只凭热情和主观愿望，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否则便是空想。现在我们有些工作就犯了这个毛病。例如，组织演习，拟制想定，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规模搞得庞大，兵力、兵器总是按假想的密度来计算，而且总是处处比敌人强。他们拟制想定时，不是根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而是根据假想的情况作基础，结果很多东西不仅现在我军没有，甚至在十年八年内也很难达到，训练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做法有使我们两头落空的危险，必须加以纠正。今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适当的照顾发展的情况，逐步地加以提高。

叶剑英这些论点在以后的讲话和论著中还多次出现过。他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的中肯意见，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新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五 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叶剑英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深知这支军队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愧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同时他也意识到，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现代战争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他指出：未来战争是人民战争，又是现代战争，这两句话用逻辑把它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他说：“时代不同，给未来战争带来许多特点，但未来战争的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思想，仍然是未来战争的指导思想，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未来战争，但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人民战争是在全民战、持久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的战争。人民军队是革命化、现代化、国防化的军队。这些问题是未来战争的问题，但都是建筑在现实物质基础之上的。不考虑这些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未来战争。”（13）

在把握未来战争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叶剑英进一步探索未来战争的指导规律，提出战争可能的规模；各军种、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技术兵器发展方向；军队建设；战争初期的作用；战争的持续时间等六个问题。认为核武器，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的决定的工具，但不能贬低陆空的决定的作用。胜利要经过一系列的巨大努力，每一次努力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战争是持久的。未来战争，空间规模是巨大的、高度机动的核战争，决定在开端，战争初期。

他把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为三个明显的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

以后，他又从几个方面展开阐述现代战争的特点：（1）战争规模是巨大的，尽管小打的可能性存在，但最后必将发展为大打。战争将在广阔的空间进行（空中、地面、海洋），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空前巨大，战争具有残酷性。为了支持这种战争，必须要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必须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2）总体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组织行动，它并不单独是武装斗争。除武装斗争而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还继续有着极其紧张而广泛的斗争。所以，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总和。

（3）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为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增大了袭击的效果。

（4）战争可能先从后方开始。现代空袭兵器使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处于它的威胁之下。敌人可能利用其侵略基地使用各种空袭兵器，首先集中突击我们后方。有时也可能前方后方同时开始。

（5）诸军兵种协同进行的战争。尖端武器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杀伤武器；但它并没有减低各军种、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原子武器神秘化。相反，更需要有装备着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各军种、兵种协同一致的努力，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14）

他还指出，在研究未来战争时，必须考虑到国际条件，但基点应放在自力更生上面。（15）在未来战争中，可能使用尖端武器，也可能不使用尖端武器，我可能有尖端武器，也可能无尖端武器，但基点应放在我以常规武器战胜使用尖端武器的敌人。未来战争，既有速决因素，又有持久因素，但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持久方面。

叶剑英分析未来战争战场的情况，认为只有顺利地实现战略进攻，才能达成战争目的，只有采取坚决的进攻，才能击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占领其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经济中心。防御，乃是一种武装斗争的暂时的和从属的类型。战略防御，乃是武装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一战区或某一战略方向上，为达成基本目的——疲惫和削弱敌人、迟滞和阻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必要的时间和为转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所采取的一种行动类型。反攻，乃是进攻的特殊类型，它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防御交战的复杂条件下进行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1959年叶剑英就指出：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世界上可能会出疯子，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应付可能产生的突然事变，但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大战暂时还打不起来。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总的规律。重点应放在可能打的上面，要准备打。但目前暂时还打不起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一时机，动员全国人民包括军队在内，大搞经济建设，苦战几年。国家在经济上强盛了，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才能有强大的军队。毛主席讲，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因此，我们整个国防力量，包括有生力量和技术力量，除积极建设和备战以外，还要大力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抓紧暂打不起来这一时机，大搞经济建设，大搞国防建设，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一起，领导高级干部开展关于防卫作战一系列重要战略问题的讨论，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关于武装力量建设。叶剑英提出，从人民战争的观点出发来建设我们的武装力量。因此，不应当把武装力量的建设单纯地看做是军队的建设而应当把广大民兵的建设也包括在内。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即常备军队）和后备力量。这两部份力量都应包括在我们的战略计划里边来。常备军队是全民武装的值班部队，又是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储备干部的学校。叶剑英强调常备力量应尽量地、适当地减少步兵，扩大技术兵。因为步兵容易训练，而且它有广大民兵做为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技术兵既难于训练，而且在未来战争中需要量又很大，同时，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一天天地提高了，也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对于海空军建设，叶剑英也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叶剑英认为，后备力量建设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兵的组训。民兵制是储蓄后备力量的所在。在现代战争中，民兵的地位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就是发展国防体育。国防体育包括无线电、摩托、射击的陆上运动，有航海、轮机的海上运动，有航空工程、滑翔、跳伞等内容的航空运动。过去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好玩的东西，其实它是属于武装力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培养技术后备力量。

关于国防工业。叶剑英认为，军工生产要力争上游，爬上尖端。现在谈到新的装备，就是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舰、空对地、岸对舰、舰对空、舰对岸的导弹。军工生产，要强调科学研究设计试制，少量生产常规武器，大量生产民用机器。他提出“军工生产在原则上必须自己设计制造逐渐代替进口。开头摸索也需要，但仿造也是要有的，有些自己根本没有工厂，进口一点也是需要的。但这都是临时现象，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军工生产要努力搞自己的东西，进而代替进口和仿造。”他强调，军工生产的基本建设重于制造。尖端重于一般。生产导弹先于原子。

1971年叶剑英亲自调查国防工办，对国防工业生产明确提出，“精密地设计、精密地制作，少量地生产，少量地试用，这是我们生产的原则。”（16）

关于人民防空。70年代，叶剑英对未来战争中的人民防空和城市防卫问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指出：人防工作计划不是孤立的，是整个国防计划、经济计划的一部分。

他很重视城市疏散问题，指出：战争没有打响以前，要做这个工作。要有个很周密的疏散计划。要在城市消灭敌人，打巷战（街垒战）、地道战。我们要拿出多少兵力才够用，才不拥挤，这要很好考虑计划，兵太多了，就拥挤，而且会造成粮也不够，水也不够，弹也不够的困难。要排除拥挤，对人民群众来说是要搞好疏散，对军队来说就是要节约使用兵力。关于坚壁清野问题，他说：所谓坚壁清野，就是将东西往山沟里搬，敌人走了就再搬回来。城市也是可以坚壁清野的，一定不要把东西给敌人。疏散有疏散的计划，坚壁清野也要有坚壁清野的计划，这些计划做好了，就可以准备同敌人打争夺战。他说，疏散、坚壁清野，第一是方向，第二是道路，第三是挂勾。这些都要计划好，要紧张而不慌乱。关于地道问题，他指出，地下工事工程很大，照明、炉灶、通气、缺氧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将来战争，空中、街道战比较容易，困难就是地下，关键就是地下，就是要通过地道战战胜敌

人。他强调要下决心“打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式的城市保卫战。敌人必争、我们必守的城市，那就一定要打这样的保卫战。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对这个有顾虑不行，打烂了不要紧，要把敌人引到城里消灭它。城市保卫战是个新问题，也是个大问题。”他还指出，城郊主要是准备打敌人的坦克。

关于政治工作。叶剑英历来关心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作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报告。着重指出：我军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各方面发生的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和保证作用，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关于后勤工作。叶剑英1957年3月在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级阶段进到了高级阶段，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基本上是单一兵种的后勤，建成了统一的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后勤，后勤工作不象过去那样简简单单了。在新的条件下，有许多新的问题，要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解决。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工业，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是“取之于敌”和“就地取给”。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整个国家经济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战争的形式也有很大变化，战争的规模巨大，物资的需要和损耗量也大大增强，从抗美援朝的经验也可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后方物质保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要战胜现代化的敌人确实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军队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后方的人民，后勤工作在今后战争中的任务，加重了不知有多少倍，因此，建设良好的强有力的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制度，在今天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要求加强后勤部门和人员的思想工作，克服争名逐利、贪图享乐的衰退现象，要坚决执行“勤俭建军”的方针，发挥工作的创造性，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尽量节约我们的物质和经费，真正做到钱要用得少，事情要办得好。

## 六 贯彻正确的训练指导思想

“训练是为作战”“训练也是打仗，这是叶剑英提出的军事训练的根本指导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撰写《实行教育军事革命》一文，介绍苏联红军军事教育训练的经验，指出：“它的一切训练都是在与战场最相类似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不但只在讲堂上与操场上训练，而且主要的是在野外、森林中、战壕里去训练。它不是用假的想定来训练，而且把战场上作战的实地情况与作战经验加以重演并加以发挥来进行训练。它特别着重夜间与恶劣气候条件下，以及在各种工事、堡垒、障碍前及反坦克动作的训练。它特别着重‘专长教育’，即各练一行的分科教育，而不是样样都学。”“随着战争的发展与战斗任务的变迁而实行所谓‘重点教育’。显然的，红军这种崭新的训练，就必然的反映到战场上，这就是它能够获得惊人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这伟大的红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红军军事教育的宝贵经验，实行军事教育的革命！”(17)

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部队训练?叶剑英在1955年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总结讲评时说,按实战需要训练军队是一句老话,是一个原则。他要求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要求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练兵,根据实战要求来练兵。他根据毛泽东给《军事科学院的训词》的精神,在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中,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问题。他说:“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力量是强大的、凶恶的、狡猾的。我们要战胜这种武装力量强大的敌人,除了需要政治经济的优越条件以外,在军事上必须有受过严格的现代化的军事训练的军队,必须有头等的现代化的装配,必须有大量的,优秀的、有现代军事科学头脑的指挥干部,才能够战胜敌人。”

在军事训练中,针对部队中有些干部对原子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和夸大原子武器作用的两种倾向,叶剑英从理论上指出:原子是时代的特征,是时代的代表,而实际上,原子时代是包括一系列的东西,不单纯是原子武器。他分析原子武器的性能及其威力,指出:原子武器是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是光靠原子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它兵种、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它兵种兵器的积极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的作用不但未减低,而任务反加重了。因为:第一,新武器大量采用和小量采用,对战斗行动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新武器刚出现是少量的,装备到部队是少数的,通常对战斗行动的影响并不大。当初在日俄战争时,重机枪是新武器,最初只有少量的装备到了部队,对战术的影响不大,只有当它普遍装备到部队时,战术运用和战斗队形才起了变化。因此对原子弹应做具体的分析,要看看装备到部队的是大量的,还是小量的。第二,新武器出现,不可能完全代替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发明了坦克,当时都感到很奇怪,但它不能够代替原来的常规武器。即使新武器大量装备到部队,也不能完全取消和代替常规武器,还必须结合常规武器来使用。原子武器只有结合炮兵火力、航空兵的突击,才能产生更大效果。第三、原子武器的使用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战术性原子武器虽正在装备到部队,可是它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目标,随便可以乱打的。能否使用原子武器,地形、气候、战斗发展的态势都有影响。第四,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武器(原子弹、导弹、火箭,包括洲际导弹在内,以及放射的、生物的、化学的等等)出现后,依然必须依靠诸军种、诸兵种的合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陆军战役、空军战役、海军战役的结合,整个国家战略指导意图是不能够实现的。整个战略指导一定是若干的空军、海军、陆军相结合的、统一的战役行动,不能单纯靠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合同作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第五、军事学术常常落后于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常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也很容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未来战争中去,这因为新的东西没有看到,老的东西记得很牢。如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认为有了马其诺防线,就可以保全住法国,这个思想很牢固。他不知道,有了飞机和坦克后,马其诺并不是不可超过的防线。所以,对原子武器,一方面不要估计过高,另一方面也不要用过时的老观点来对待新事物,把老的观点企图用在未来的战争。新武器出现后,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它、了解它。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它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对付它和利用它。

在军事训练中如何适应原子武器带来的新特点？叶剑英在 1959 年 12 月全军训练会议上强调指出：在作战原则上机动灵活。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集中兵力的原则未变，但在方法上要求：分散配置，多路开进；集中突击；再迅速分散；以充分利用原子突击效果和避免敌人的原子突击。现代战斗中的集中，首先是在短期内集中军队的火力，主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火力。由于使用原子武器，双方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要求灵活运用进攻与防御这两种基本战斗类型。原子武器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杀伤兵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应着眼于利用原子突击效果，广泛实施机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要求军队广泛地实施机动（兵力、火力）。战斗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军队实施广泛机动（包围、迂回）的可能性。要求军队具有坚决顽强、迅速勇猛、主动灵活的独立作战的精神。在军队指挥上，叶剑英强调及时了解情况，迅速定下决心，用最简便的方法迅速传达任务，要求各级指挥员机断行事。叶剑英认为，从实践需要出发训练部队，就要充分考虑现代战争中这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1955 年 11 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并担任演习的总导演。这是一次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通过演习，训练我军指战员和部队。他在讲话中指出：“可以预见，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进行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有若干的改变。所以我们研究在新条件下进行战斗、战役新颖样式的同时，要改善军队指挥的组织的保障的方法，并寻找在战斗和战役中最有效的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方法。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来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他说：“二十世纪是原子的世界。原子的发现和运用到战场，无疑将给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带来重大的影响。但这应该指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

演习中，叶剑英还同参加演习的同志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如关于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关于战役的布势，关于抗登陆战役过程中的反突击时机的反突击地区，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关于军队指挥和协同动作问题，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问题，等等，从中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作出了精辟的论断。

军事训练中充满着各种矛盾。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中，十分注意研究解决各种矛盾，他经常提到的有：

（1）军事训练时间与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矛盾；（2）训练与国防施工的矛盾；（3）军队训练同支援地方的矛盾；（4）训练与物质保证的矛盾；（5）训练与兵役时间上的矛盾；（6）条条块块的矛盾等等。他要求各部队领导不断解决这些矛盾，把军事训练推向前进。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叶剑英多次召开全军训练会议，分别参加海、空、防军训练工作会议，提出训练工作上有四项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和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即（1）红、专、健结合；（2）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3）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4）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此外，他还强调正确解决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学习现代军事技术与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军队技术训练与装备的关系；以及训练任务与援外任务的关系，等等，进一步明确全军军事训练任务和方

针，保证训练质量的提高。

叶剑英还要求部队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他说，勤俭练兵是我军训练的光荣传统。海军已经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也初步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总之，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俭练兵这一指导思想。

叶剑英十分重视海防边防部队的训练。他认为如何对付敌人在边境的各种困扰，和我们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海防边防，除了解决编制装备等问题外，就要突出海岛部队训练，边防部队训练，战术技术训练，这些问题都要很好研究。如海岛方面，敌人如果进攻，我们除了依托预设阵地进行顽强抵抗之外，如何作小规模短距离的冲击，如何进行反冲击和反击，以及海岛的阵地设防，阵地防御的组织指挥，阵地战斗中的技术使用，海岛上的各种储备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边防也是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训练。东南沿海蒋介石不断的进行小股窜扰，每次窜扰都被我们完全消灭了，可是他并不停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怎样对付他们从海上爬上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如何动员教育、训练部队，如何训练民兵，如何同民兵结合起来，把海防巩固起来。在边缘上除了寸土必争以外，是否也可以设想在浅近的纵深内进行些机动。

叶剑英在指导部队军事训练过程中，注意研究解决未来战争中的近战问题。他认为，不管敌人从海陆空来，空中力量如何强，海上力量如何大，要到我们国土上来作战，就势必要在地面上和我们作战。合成军队在地面作战是决定问题的一个关键。其次，不管敌人的武器射程有多远，威力有多大，归根结底他要同我们进行近战。所以陆上作战又有个远战和近战问题，远战为近战创造条件，远战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靠近战。尽管敌人有什么几千里的洲际导弹，几百几十公里的战术导弹，只管他打就是了。只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有对付敌人远战火力的办法，他们就必须进到我们附近来，或者我们分散隐蔽地冲到他们的战斗队形里去和他打混战。敌我部队一混合起来，他们的炮兵也不敢打了，核武器更不敢使用了。这时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和政治的威力，在近战中战胜敌人。近战的形成和产生无非是两条，一是我们冲进去，一是把敌人引进来。这就要求加强训练我们的尖刀连，大胆勇敢地钻到敌人的队形里边去，要有和敌人打混战的决心、勇气和技术。这两条一定要使全军在思想上把它肯定下来。不然我们心里惶惶无主，不晓得导弹怎样厉害，不晓得对核武器该怎么办，不晓得将来究竟怎么对付它。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战争经验，一定要抓住这两条。合成军队在地面作战，要适应打近战。

他强调在近战中，出现一种难对付的东西，就是坦克。如何训练我们的部队在近战中打坦克的问题。根据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验，说明坦克是可以对付的，如果加上现代的技术，就更容易对付了。我们现在的装备比那时强多了，除了在技术装备上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以外，在战术上究竟应该怎么搞法，应成为今后训练中近战训练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指导部队近战训练中，叶剑英还要求加强夜间训练。他联系革命战争的经验，认为夜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未来战争，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武器，使用不使用原子弹，不管他们的火力多么强，射程多么远，机动力如何大，我们还是要靠夜战、近战来对付它。夜间，他们那些比我们优势的东

西总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认清了这一点，进攻时，在远战阶段，就要很好保存自己的力量，利用夜暗秘密迅速接近敌人，和敌人打近战，猛打猛冲，克服敌人的各种障碍物和堡垒，用白刃格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防御时，就是要躲、打、杀、反，千方百计地打掉敌人的坦克，利用夜间反突击，死打硬拚，消灭敌人，守住阵地。因此，一定要把我们的部队训练得敢打近战，善打夜战。他说我们的军队政治上是强的，再把近战、夜战的技术、战术搞好了，真正能过硬，就象周总理所讲的，我们就无敌于天下，就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全军必须要有个统一的认识。

叶剑英指导军事训练，不断研究解决训练方法问题。

1963年秋，他亲自到南京、镇江等地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为使郭兴福教学法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它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指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他认为，不能把郭兴福教学法单单看成部队训练的一种具体方法，还要从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拿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称赞：“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支持下，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取得了显著效果。(18)

## 七 军队院校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叶剑英是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是中国军队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战争年代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延安军事学院及华北军政大学，使军队院校成为培养和输送革命人才的基地，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军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是1932年秋在瑞金诞生的。不久，叶剑英接替第一任校长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尽管叶剑英有一些在黄埔军校积累的办学经验，但是当时学校教员队伍成份比较复杂，水平参差不齐，如何办好这样一所无产阶级的军校，对他来说仍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在办校中，叶剑英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定期组织军事、政治学习研讨会，组织“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工农红军问题”和“游击战问题”等专题研究。办校初期没有教材，叶剑英以苏联红军的《步兵战

斗条令》为主，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编写教材，亲自给学员讲授。他还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少讲多做，组织野外演习，解决实际问题。他重视直观形象教学，创建模型室，展出实物、模型、图表 600 余件，提高了教学效果。(19)

1948 年，叶剑英受命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这个学校是由原晋冀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及晋察冀方面的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等 5 个单位合并组成的。学校成立之初，学员中既有旅团级干部，也有普通的战士，有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和地方干部，还有刚解放过来的青年军官；文化程度有大学生、中小学生，还有文盲；教材奇缺，突出的问题是教员严重缺乏。

一个学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教员。叶剑英到校以后就着手调查教员状况。当时，各校合并过来的教员，能任课的只有 30 多人。叶剑英一方面重视发挥这批骨干的作用；一方面着手解决扩大教学队伍的问题。他借鉴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利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派人四出“招贤”，把二三百名具有真才实学的旧军官请来任教，充实了教员队伍。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这批新教员的政治水平和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为教学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叶剑英向全校提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言，动员大家搞好教学工作。他反复号召教员与教员、学员与学员、教员与学员之间，要互相为师，教学相长。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不耻相师的精神，不论对方身份如何，级别高低，年龄大小，只要“闻道在先”，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懂得多，就应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师，在什么场合都可学到学问。

他要求领导干部都要结合业务选学一门课程，力求精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要准备一旦新的形势到来，一个工兵大队要扩大成为一个工兵学校，一个炮兵大队要变成一个炮兵学校。叶剑英有预见地指出，到全国胜利，我们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卫生事业，所以，不要把学习看成是一种额外负担，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党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是时代对于部提出的迫切要求。

建校初期，没有现成的教材，叶剑英主张把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收集起来作参考，然后按照华北军大的教学目的，由学校组织力量，自己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过程中，他和编写人员一起研究吸收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使教材内容更加具体充实，更符合于实战的要求。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了 30 余种军事教材，编写了 20 余种政治教材。

叶剑英十分重视学习各战场的实际经验。他在教员缺乏的情况下，仍然抽出一部分教员组成参战组，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诸战役，收集作战经验，回校帮助学员了解战场的最新情况，把学校教育与前方的实战紧密结合起来。

在教学中，叶剑英大力倡导群众路线和教学民主。他要求教员教什么，如何教，要征求学员的意见；要经常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地，把群众中的好意见、好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叶剑英把整个教学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教学准备阶段；二、教学实施阶段；三、教学检查阶段。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大成果斐然。朱德在一个题词中说：“‘七一’是军大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年中，你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收集了过去的

战争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训练了一部分教员，教育毕业了大批学生。这是你们与全体教职员努力的结果。你们的教育方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国防教育打起了新基础。”(20)经过华北军大的实践，叶剑英关于军队院校建设的理论也趋于成熟。

建国以后，叶剑英领导全军的训练工作，其中也包括军队院校建设。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军队院校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理论体系。

叶剑英认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干部训练是一个重要环节。干部如果不加强训练，不但完不成训练任务，也完不成战斗任务。现代战争既需要大量的兵员，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干部。培养干部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如果不培养、储备大量的干部，那么即使将来国家供给我们最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是无法掌握的。为了满足建军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必须大办学校。他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剑英用很大的精力从事院校建设工作。他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的指导。

1955年初，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前，就先后召开了十四次小型院校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着手制订全军院校培训干部的规划。担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期间，他参加了第六次、第七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担任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时，又出席第八次、第十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和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每次会议他都发表讲话，认真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方针和原则，大力纠正与这些方针、原则相脱离的倾向，使院校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叶剑英认为，军队干部必须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的训练。他说：“所谓德育就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智育就是善于掌握新武器，能组织和发扬新武器的综合能力，陆、海、空军和防空军在同时、同地发挥综合的力量以歼灭敌人；体育，就是要有健壮的身体。没有强健的体质，不能忍受现代战争昼夜连续的战斗活动；没有高度政治觉悟，不能忍受这样大的杀伤和破坏；没有现代知识，不能掌握和发挥新武器的综合力量。没有这些，就不能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军官。”

关于军队院校体制，叶剑英主张“三级制”，就是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干部（包括营以下指挥员和相应的参谋人员），必须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由校官晋升为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包括各军种、兵种正师以上的军政后干部、高级参谋人员和校以上的学术研究干部），必须入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

叶剑英还提出“两股绳”的训练程式，即军官训练分“完成”和“速成”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且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其方法是采取轮训或集训。要求学习内容少而精，时间短而少（一年以内），毕业后通常是留任原职。(21)

坚持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是叶剑英抓院校工作的重要环节。他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教学制度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1962年5月至7月，叶剑英先后对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进行了检查。为了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他于3月30日，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他建议进一步明确训练任务、内容和学制：加强教员工作，充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教材，提高教材质量；加强学术领导，严格教学要求，健全教学制度，等等。此报告于1963年1月30日经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他在西安召开了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对工程技术院校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意见。接着他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会议。会上，叶剑英从十个方面回顾了“抗大”的基本经验；（1）有正确的方针；（2）有坚强的领导；（3）有良好的校风；（4）有正确的教学原则；（5）教学内容少而精；（6）学制短；（7）教学方法生动活泼；（8）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9）十分重视政治教育；（10）自力更生、勤俭办校。他号召各院校“以‘抗大’做榜样，向‘抗大’这个目标前进”。不久，他又奔赴大连，参加了全军指挥院校的教学改革会议，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战备姿态办校”，“培养会打人民战争的指挥干部。”

## 八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领域

毛泽东一向重视并亲自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指出，“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全国解放后，他提出“钻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要求以我为主，总结经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为军事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和任务，是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动力。(22)他经过调查和酝酿，于1956年向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1958年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

建立军事科学院，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1958年3月15日的建院大会上，叶剑英指出，军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研究战争的理论科学。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这种理论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战争的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此后他指出：“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他提倡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要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作为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制订军事科学研究的规划，促进军事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奋发努力，攀登军事科学高峰！（23）

叶剑英提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构”。在1958年5月25日他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是：“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叶剑英提出，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我军三十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高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其次，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着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要研究敌军，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后来，叶剑英又明确提出军事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24)

关于军事科学的研究范畴，叶剑英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把它划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三个方面、三个范畴。

1960年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

在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中，叶剑英注意不断解决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在要不要坚持“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以我为主”，这就是“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军事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叶剑英解释这五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孤立分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统帅和灵魂。总结经验、学习友军、研究敌人，都必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现代国防的一个指导方针。我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基础。“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照顾将来”，就是要看到发展。总起来贯穿着一个“以我为主”的精神。所谓“以我为主”，就是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以我为主”，有主就有次，主次是对立统一。“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立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因此，“以我为主”，还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敌人。“我”本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将来。(25)

在如何认识科研、教学、“生产”的关系上，叶剑英认为这三者是有机

联系的整体，是统一的。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三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研究人员不能只在室内来写教材、编条令。他说：“在室内研究的东西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反复的实践。什么叫实践呢？在操场、野外所进行的各种训练、实验都叫实践。没有经过这一道工序，行不行呢？恐怕不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吗？你写出这一套，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合乎原则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只有经过反复实验。这样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反复的实验，才能生产出一定的产品。”(26)

对于如何使战备、训练、研究紧密结合的问题，叶剑英的看法是：训练也是为了战备，研究也是为了战备服务。把研究的成果提供部队，改进我们的训练，改进我们的技术兵器。这也是为了战备。他还提出，利用援越抗美战场的实践经验，开展科研工作。

叶剑英不仅提出一些科研中的重大指导原则问题来进行讨论，把它们提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加以解决，统一认识，而且深入到一些工作细则中去探讨研究，把研究成果体现在各种论著、条令和教材的编写之中。他强调研究军事科学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试验的方法，来整理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整理成为科学。”(27)他在领导军事科学院工作中，同大家一起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不孤不空”（不孤立、空洞地研究）；善于“知识积累”；发扬学术民主；进行“计划生产”，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等等。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在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倡导和发扬“攻关”精神，要求认真进行学术准备，拿下一个一个“攻关”项目。他模范带头并组织全院同志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军事著作，以及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外文等各方面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不论在院里或到外地，一有机会他就检查大家的学习效果。一次在武汉，他和大家重温恩格斯的《步枪史》，颇有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样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甚至花费那么大精力，对步枪的历史作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还写不出那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他严肃而又诚恳地教育大家，要以革命导师为榜样，认真从事科学研究，挤出时间下苦功夫读书钻研学问。

叶剑英还提出，进行学术准备，要向部队学习，向老同志学习，总结我军经验，挖掘“宝藏”。他说，我们自己有经验没有？打二三十年仗，经验多得很，一个小小战斗，都包含有理性。但是这些真理的颗粒还被埋藏着，没有钻探、整理，得出结论。如果不趁现在有战争经验的老头子们还在，赶快整理，再过几个五年，老成凋谢，就谈不上整理了。这很有时间性、现实性。战史的资料，在保险柜里头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在人的脑子里头，几十年来战争的经验埋藏在毛主席脑子里头，在元帅、兵团、军领导同志的脑子里头。为此，必须把各个负责同志脑子里的东西用什么方法搞出来。一颗珍珠，一颗珍珠，都是散在的，要用红线穿起来。原料取出后又如何整理？要象国棉工厂那样，经过多少道工序，把棉花织成布；脑子里拿出的原料，也要经过很多工序，整理加工，才能变成成品。(28)他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取经“探室”，整理我军著名战例、战役战斗经验和战史资料九万多件，并邀请老红军、老八路座谈体会，撰写文章。

向外军学习，向敌军学习，是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叶剑英提

出“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要经常按住地球的脉搏，按住苏美战略的脉搏”。他说：“我们重视自己的经验，因为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更适合我国我军的情况与特点。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察问题。一切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尊重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尊重他人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从来就注意吸收前人理论的精华，毛主席也是如此。他们都做到了集人类知识精华之大成。当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扬弃和改造。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不是反对学习外国的经验，学习苏军的经验，而是要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国经验。”他非常重视外军的报刊杂志，亲自指导翻译出版外国军事著作。

正确地对待中国历代军事遗产，开展古代近代军事学术的研究，是科学“攻关”的又一个重要项目。叶剑英一向重视军事历史学的研究。他经常教育大家说：“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确实有东西，许多原则至今还适用。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剖古代的东西，整理古代的东西，给以批判的总结，一定要为国防建设服务。他亲自下达研究任务，规定研究课题。在赋予这些研究任务时，他每次都交代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一再指出：研究历史要用历史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进行。研究历史问题要能够概括，要有分析，避免一钻就钻到古书里，只搞材料的堆积。同时，特别强调要注重现实。与解决现实有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与现实无关的可以一带而过。

在军事历史学研究中，叶剑英尤其注重我军的军史和战史的研究。他指出：“我们还要抓紧研究和编写我军的战争史，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对我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对的。要通过编写战争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29)

研究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以及其它各科的军事学术，编写各种条令，是叶剑英确定的重大研究课题。他指出：“要尽快研究撰写出充分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和其它军事学术学，不断完善各种条令条例，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补充。”(30)

在谈到撰写这些学术著作时，叶剑英主张要分主次先后，进行科学安排。他说：“战略、战役、战术是有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但做工作又要分开。”“战术指挥员和战役指挥员，研究一下战略也有必要。”他曾设想先编写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纲要》作为编写战略学的第一步。经过几年努力组织编写出一本战役学初稿。同时，汇编了200多种1千多万字的敌我友军资料。

叶剑英说：“编写战斗条令，在我军来说还是个创举。”(31)

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经过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从1961年至1964年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他还组织编写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在他指导下，空军、海军、各兵种完成了各种条令的编写工作。在军委条令验收会议总结时，叶剑英指出，“尽管这些条令还有一个指头的

问题，还不能看成十全十美，但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只要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上升。所以验收了这一批条令，是一件大事，解决了历史上多年来想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使部队训练和战备有条令的依据。”(32)

### 注释

(1)(3)叶剑英：《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1956年10月10日。

(2)叶剑英：《忆孙中山先生在桂林》1938年3月12日。

(4)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1958年7月30日。

(5)叶剑英：《从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1938年10月1日，《国民公论》一卷三期。

(6)原载《救亡日报》第三版，1939年5月30日。

(7)叶剑英：《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1938年1月13日，《抗战三月刊》。

(8)叶剑英：《正规军当前的任务》，1939年7月12日，《新华月报》。

(9)叶剑英：《游击战术上的军事问题》，1939年7月，《战地组织》三、四期合刊。

(10)(11)(12)叶剑英在土地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

(13)叶剑英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闭幕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8月。

(14)叶剑英在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21日。

(15)叶剑英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8月。

(16)《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第276页。

(17)《解放日报》延安版，1943年2月23日，第四版。

(18)《叶剑英传略》第241、244页。

(19)《叶剑英传略》第59—61页。

(20)《叶剑英传略》第177—186页。

(21)叶剑英在全军训练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11月3日。

(22)《军事学术》第四期，1978年。

(23)(24)(29)(30)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1978年3月15日。

(25)(26)(27)叶剑英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9年1月。

(28)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建院大会上讲话，1958年3月15日。

(3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1960年2月。

(32)叶剑英在军委条令验收会议上讲话，1960年2月。

**作者** 范硕 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军职研究员，63岁，《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1975年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主编《叶剑英传略》，并发表《叶剑英在1976》、《叶帅诗词探胜》、《应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党的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风雷激荡的十月》等研究论著约200万字。

## 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

王希先

粟裕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的军事思想，是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长期实践和刻苦探索的产物。他的许多独创性的实践和理论，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对解放战争指导规律和大兵团指挥艺术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粟裕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投笔从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学习。

1927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转战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1934年6月，他担任过班长、连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7月至1937年9月，他担任军团参谋长、军区参谋长、省军区司令员和挺进师师长等职，参与领导了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开辟和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他在实践中学习战争，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对敌斗争策略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结合实际比较系统地总结出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游击战作战规律，由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初期，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副指挥、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

1941年以后，粟裕任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浙区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担负全面领导工作，他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得到了全面提高。在军事方面，他发展了平原水网地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参与指挥了黄桥决战，并组织指挥了车桥、天目山等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役。对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1946年9月至11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师，两个指挥部合一，他任副司令员。

10月15日，他受中央军委之命，负责两个野战军的战役指挥。1947年初，两个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粟裕任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

1948年5月，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他指挥和参与指挥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泰安、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大规模歼灭战。这一时期，是他统率大兵团作战施展指

挥艺术最出色、军事思想特别是战略思想最活跃最丰富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粟裕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参加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他依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阶段性的军事理论。他的军事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粟裕的全部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第一，坚实的实践基础。在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粟裕是始终处在战争第一线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他身经数百战，参加过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形式和样式的战役战斗，是在殊死搏斗的战场上逐级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了解部队，精通战法，熟谙指挥，这是他进行科学的理论升华的基础。第二，内容极为广泛丰富。粟裕是全军唯一的由士兵逐级晋升到大将总参谋长的军事干部。他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员，作过政治工作，还兼任过地方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的军事思想涉及的内容广泛，对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都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论述。第三，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粟裕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思想锐敏，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是一名胆略、谋略和文化科学知识兼优的高级指挥员，人称“儒将”。他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事物，探求规律，尤其注重联系实际，去寻找那些特有的规律及其指导原则，并付诸于行动。他的一些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不但在战役战斗的实践中获得成功，而且对改变战略全局起到了重大作用。

本文拟对粟裕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认识和把握解放战争及其指导规律、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探索五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研究。

## 二 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

粟裕的战略战术思想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粟裕认为，“毛主席依据革命战争实践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法宝。”(1)要发挥这个法宝的威力，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要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敢于发展。这是他能够不断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思想理论基础。

### （一）作战方法是不断发展的

粟裕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作战方法的运用和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自有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总是同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人和武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常是首先或最终必然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而军队装备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又必然促使作战方法改变。

1979年1月，粟裕根据当前各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指出，“现代武器装备，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作为先进武器使用的那种飞机、坦克、大炮相比，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即发展到了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装备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2)至于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他认为，超级大国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完成由轻武器为主到以重武器为主的过渡，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过渡到了以炮战为主。”(3)目前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正处于由轻武器为主转变到以重武器

为主，或者说是由枪战为主转变到以炮战为主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4) 针对上述情况，他明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向传统战法提出了挑战，它迫切要求发展战略战术，努力探索和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导规律。

### (二) 战略战术的运用要灵活机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

粟裕对战略战术的运用，不仅以高度的灵活性著称，而且在理论上作了极为透彻的阐述。他认为，主动性和灵活性是打胜仗的重要条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军情，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消灭敌人，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什么战法有效就采用什么战法。他强调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他说，在战争史上，没有出现过在同样的地点，以同样的兵力，打同样的敌人的情况；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再用同样的作战样式去打，是不能胜利的，甚至要失败，因为敌人也吸取了教训。所以，这就要靠发挥主观能动性，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

### (三) 辩证地对待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粟裕认为，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两者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运用中，要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发展。在革命战争中始终是把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这样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5)他在强调消灭敌人的同时，也阐述了保存自己的重要性。他十分重视在未来战争中如何保存自己的问题。他说，“由于敌人拥有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的武器和远战技术兵器，可以对我们的前方和后方同时造成严重破坏，并且有可能使我军在消灭敌人之前遭受重大杀伤，或者在我军歼灭敌人之后又遭到报复性的重大杀伤。这样，在未来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6)

### (四) 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是打败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但不是绝对的

粟裕认为，为了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争取胜利，必须坚持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打败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敌人有强大的后续力量，每次战役战斗都对敌达成优势是困难的。因此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不能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如果指挥员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达成优势，也能以少胜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同样是适用的。他强调指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实行这个原则，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变化了的情况，采取一些新的做法。如对以坦克为主的敌军打歼灭战，“集中兵力，主要是对敌人坦克、装甲战车而言；形势优势，不仅仅是指兵力对比，也包括火力对比……要避免出现那种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火力并不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的情况。”(7)

### (五) 适时转换作战形式和作战样式

粟裕认为，基本作战形式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在不同的战争时期和不同的阶段，应根据全局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适时地实施以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转变，以一种作战形式为主，另两种作战形式配合。这

是战争指导上的重要任务。1935年，他在革命低潮时节，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率挺进师进入国民党腹心地区浙江，自觉地实施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1941年，他在苏中又成功地领导实施了由对顽固派的以运动战为主向对日伪军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粟裕还认为，不同的战役和战斗，也要根据作战的需要，适时注意作战形式和样式的转换。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以运动进攻将敌人合围，但因敌守备技术加强，构筑工事效率提高，能迅速形成野战防御工事体系，作战形式就转换为阵地进攻了。

#### （六）诱敌深入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战法，但不是积极防御的唯一打法

粟裕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认识到，弱军在强军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一般地是诱敌深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确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一种有效作战方法。但粟裕并不把它看成是任何情况下都可采用的作战方法。他说：“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而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诱敌深入也不是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8)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解放战争初期，未采用诱敌深入，而是在苏中解放区前部迎击进攻之敌，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粟裕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对待现代化敌军的进攻，诱敌深入的运用，与过去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是通过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逼迫或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把它包围起来予以消灭。

#### （七）战略转移是特殊形式的进攻

粟裕经历过多次战略转移，有较深刻的体验。他认为，“战略转移，就红军来说，既是退却，又是特殊形式的进攻，即从一个方向和区域向另一个更有利的方向和区域去求得发展”。(9)要重视出击方向和时机的选择，他说：“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10)他还指出，在长距离的转移过程中，作战指导上“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转移当然要走，但要走得好，既要尽量避免不利的和不必要的战斗，以保存力量；又要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夺取主动。”(11)

#### （八）把握好战区战局转折

粟裕认为，战争中除了有个战略转折和战役转折之外，还存在着战区战局转折。这是他在战争实践中提出的一种新观点，并运用于自己的战争活动中。粟裕说，在战争全局转折和战役转折这两个高低层次之间，还存在一个层次，就是战区战局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在一个战区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依据敌我双方的变化，又形成若干段落。在这一个段落与下一个段落之间，形成了战区的转折。这时，战争的许多方面，如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规模、作战方法会发生变化，各方面的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这是在战区指挥上，最不容易掌握的时节。”(12)他还指出，要实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区战局转折，有时不是一个战役能够完全实现的，还必须经过新的作战的胜利，才能实现战略意图，取得完全主动。粟裕用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一系列重要战役来说明华东战区出现的几次战局转折。

1946年9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初期作战告一段落，战场由前部转入纵深，这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战局转折的开端。宿北战役的胜利是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鲁南战役是宿北战役的继续。鲁南战役的胜利，实现了基本战略意图，完成了这个转折。从此开始，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实现了统一，把运动战推向了更大的规模。华东战区的第二个战局转折，“是由集中兵力到兵分三路扯散敌人，再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之敌，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也是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军在鲁西南荷（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地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57师，标志着这一次转折的胜利实现。从此，华东野战军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而且取得了在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主力南下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胜利会师中原。”（13）华东战区的第三个战局转折，“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豫东战役，那是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14）这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为后来的南线战略决战战役创造了条件。

#### （九）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去处理战略战术中诸多矛盾着的事物

粟裕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战役的具体经验，将失去其参考价值，但是在战争舞台上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却会长期放出光彩。”（15）在战争中，全局与局部，被动与主动，集中与分散，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永远地占领地方和城市，都是经常遇到和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粟裕认为，局部必须服从全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全局也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有的局部还会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既要高瞻远瞩，纵观全局，从全局的利益来考虑和确定本地区本单位的作战行动，又要明确自己所在的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自觉地把局部同全局结合起来，抓好这个局部，使其对全局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主动与被动，粟裕认为，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是主动与被动的物质基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敌人逼到被动地位是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变被动为主动，指挥员的准确判断和正确决心起着主导作用。只要善于运筹，指挥得当，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是能够从被动中夺取主动的。

关于集中与分散，粟裕认为，集中和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但都是对付敌人的手段。“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16）华东野战军主力的分兵外线出击和集中打沙土集战役，就是这样做的。

关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夺取地方和城市的关系，粟裕认为这也是一对矛盾。解决这对矛盾的方法，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有所不同。如解放战争的头两年，在敌军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为了避免被动，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把作战行动的着眼点放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是完全正确的。那时攻城阻援、围城打援和攻城打援，都是为了

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到济南战役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17)他还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歼敌有生力量与坚守和夺取大城市的关系，将有更大的变化。

### 三 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

游击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粟裕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长达十余年的游击战争中，即使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游击战。

#### (一) 阐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早在1938年1月粟裕就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正规军在正面进行的正规战争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赶出去。游击队深入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可以有效地配合正面战线的作战，争取战争的胜利，以保卫国土和民族。游击队在敌后作战，可以更好地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长期消磨敌人。游击队在敌后，可以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与团聚广大群众为国效劳，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光复国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积蓄力量。”(18)

#### (二) 确立本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

1935年初，由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而成的挺进师，在师长粟裕和政委刘英率领下开赴浙南，开展游击战争。500余人的挺进师，在强大敌人的“围剿”下，特别是1935年8月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国民党军队先后两次调集40多个团的兵力，对挺进师进行了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围剿”时，他们适时提出了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粟裕说：“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战略支撑点，我们确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19)挺进师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不但打击和牵制了敌人，而且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培养锻炼了一支战斗经验丰富的队伍。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2年以后，日寇对苏中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清剿”和“清乡”。以粟裕为主要领导人的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根据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结合苏中的实际，适时地确定了各个阶段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1942年4月，粟裕在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20)6月，日寇由“扫荡”改为“清剿”。苏中区党委为了长期坚持斗争，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的干扰，又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21)，区的武装不离区，县的武装不离县。

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为了粉碎日寇的“清乡”，苏中区党委又及时提出“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22)，并提出了五项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拚；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

人打算；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党内外团结，拥护党的绝对领导。”(23)这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提出，为苏中区开展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从而取得了反“扫荡”、反“清剿”和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 （三）提出本地区的游击战作战方针——敌进我进

在浙南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而浙南挺进师只是一支小规模游击队。粟裕认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不可能如中央苏区那样以运动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只能以游击战来对付敌人。他提出“敌进我进”(24)，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挺进师按照这一方针，两次粉碎敌人40多个团的“围剿”。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作战对象和敌我力量的新变化，粟裕提出敌进我进和与敌人进行根据地基本区的“要点争夺”(25)相结合，粉碎敌人无数次“扫荡”与“清剿”。当日寇在苏中实施“清乡”时，他又适时提出了主力部队实行敌进我进、清乡区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各种斗争形式紧密结合的方针，从而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把苏中建设成了巩固的根据地。

### （四）概括本地区游击战的作战原则

粟裕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概括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敌进我退(进)，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26)为贯彻这一基本原则，粟裕又提出了游击战的行动准则：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支配敌人，掌握主动；积极进攻，绝少防御；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越是深入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粟裕还对游击队提出了战斗要求。一是游击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敌人，不论敌情明了与否，部队首长应迅速下达打或走的决心，通常在敌情不明时不盲目进入战斗，应机智脱离敌人。二是游击队在宿营或休息时遭敌袭击，应迅速而有秩序地退出战斗。如有部分队伍陷入敌围尚未退出，已退出的部队应乘敌立脚未稳而混乱之际进行反击，救援被围部队脱险。而被围部队应乘机坚决果敢地冲杀出来。三是战斗动作要迅速、勇猛、坚决，不论能否取得胜利，均应迅速地结束战斗，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四是游击队的主要作战样式是伏击和袭击，主要战斗方法是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全部兵力一下子投入突击而消灭敌人。五是应该选择便于自己使用全部兵力，而使敌人无法展开的地方进行战斗。六是要做到突然袭击，不可开枪过早，最好做到完全不开枪而接近敌人，突然发起冲锋，只要手榴弹一响，刺刀就杀到敌人的肚皮上。

### （五）总结本地区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相结合的新经验

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和特点，总结出的一套以武装斗争为后盾，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基点和“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粟裕指出，“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27)何为游击基点和怎样建立游击基点？他说，“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28)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

半公开的和秘密的，做到公开的与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护。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是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的后方和基地，而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落脚点”和“跳板”。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对苏中根据地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布局，并确定“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29)在此期间，粟裕领导苏中军民改造了地形，创造了水网、半水网地区和海上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使武装斗争成为建成巩固根据地的决定性因素。

#### 四 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

粟裕是一位在战争的舞台上经常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的杰出统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参与指挥和独立指挥了一系列大规模歼灭战，他胸怀全局，气度恢宏，多谋善断，出奇制胜，迭挫强敌。对于他的战役指挥，毛泽东曾称赞“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30)陈毅誉之为“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31)

##### (一) 统观全局，把战役放在战略的高度去考虑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作为战略区指挥员，每酝酿筹划一次战役或战略行动，都是从华东战局甚至全国战局着眼，结合作战地区的客观实际，全面权衡利弊，既考虑到完成任务的主客观条件，又预见到作战行动的后果给战局带来的影响，使每个战役行动都有利于战争全局，有利于总的战略意图的实现。

1947年5月，在国民党军以24个整编师、45万余人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华东野战军进行了孟良崮战役，选歼整编第74师这个强敌，就是首先从战略上考虑的。粟裕认为，歼灭整编第74师，可立即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作战效果。因为该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全部美械装备，又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高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之师，曾被誉为“荣誉军”、“御林军”。把它消灭了，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将宣示人民解放军既能歼灭整编第74师，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消灭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他不受“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束缚，不是首先从弱敌打起，而是直接向敌人最强的主力开刀。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出其不意，“猛虎掏心”，从敌人作战阵势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整编第74师与其友邻的联系，经过三昼夜激战把整编第74师全部歼灭。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在战略全局上的特殊意义在于：一是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军最强大的和几乎是唯一的进攻方向；二是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最精锐部队；三是这个打击出现在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统帅部的“鲁中决战”计划，严重挫败了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军内部，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上的胜利攻势。

##### (二) 缜密运筹，正确地选择打击目标和作战地区

在战争中，选择作战目标，是指挥艺术的基本功。打强敌或者打弱敌，是指挥员对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情况和地理、气候条件分析的结果。

在通常情况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或者说“拣弱的打”，是一条重要原则。粟裕一方面遵循这一原则，一方面又不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说，“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这样的决心也并不少见。”(32)除了前述孟良崮战役外，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歼灭顽军最强的独立第6旅，1947年1月鲁南战役歼灭敌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都是在敌重兵集团中先打强敌的战例。其中鲁南战役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首先被歼的整编第26师，是国民党军中全部美械装备的主力师。第1快速纵队是美国与国民党合建，由美军装备和训练，并在印缅战场对日军作过战的部队。国民党称它是“国军精华”。华东野战军先打这个强敌的依据，正如粟裕所说的：首先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要在鲁南作战。如果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鲁南巩固了，以后我军南下北上或西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其次是战争正在向解放区纵深发展，歼灭该敌，就可以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汇合，实现华中、山东两个战区的统一作战，进一步集中兵力，开辟战场，调整布局，为尔后在山东战场作战和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创造良好条件。第三是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优势在我军方面，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即可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6个团，是绝对优势，可以实现战役上的以多胜少。最后是敌孤军突出，态势不利，而且与其它敌军有矛盾，在它受攻击时，有很大可能不会来援。战役的结果证实了粟裕的上述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作战地区的选择，粟裕认为，也是打胜仗的条件之一。他在选择作战地区时，有时选在根据地前部，有时选在纵深，有时选在山区，有时又选在平原地区。但不论选在哪里、都是依据战略意图、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当地的政治、经济、地理条件而定的。解放战争开始时的苏中战役，是初战。通常情况下，在强敌进攻面前，应实行诱敌深入，把歼敌战场选在解放区腹地。而粟裕却把战场选在苏中解放区前部。粟裕说，这“是从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出发的，又是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条件的。”(33)首先，华中解放区的存在，是抗日战争中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打几个胜仗就放弃大块土地，对广大军民是不好交待的，对士气民心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 响，对当时的土地改革更为不利。其次，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中解放区在总体上是 有准备的，但和平麻痹思想也有所滋长，战争准备发展尚不平衡，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 完成各项转变，这也需要在根据地前部作战以作掩护。三是苏中战役要起战略侦察作用，必须在根据地前部作战才能迫敌提早实行战略展开，暴露其战略意图。粟裕分析在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分析它的可能性。他指出：“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没有条件。我们认为，战争初期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作战又是完全有取胜的条件的。”(34)这些条件是：第一，苏中解放区前部的人民群众，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水运便捷，支前工作健全。第二，华中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打仗的时间较长，有丰富的水网、半水网地区作战经验，军政、军民关系密切，同地方武装和民兵相当协调。第三，敌人恃强，以为在其大军进攻时，我必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 其反击，必可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他根据上述分析，定下了在苏中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决心，并实现了七战七捷。

### （三）审时度势，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

创造和捕捉战机，是指挥艺术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运用计谋造成敌人的错觉，逼迫敌人就范，不仅需要智慧和胆略，而且还需要积极与主动。粟裕在战争中既善于捕捉战机，更长于创造战机。例如豫东战役，就是粟裕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毅然放弃原定作战方案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在豫东战役之前，预定的作战计划是由粟裕率部南渡黄河，会同仍在外线作战的部队在鲁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5军。但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尚未集中，阻援兵力不足；原定作战地区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离黄河较近，处于背水作战的状态。为此，粟裕又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他认为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我攻开封敌人必援，便于在运动作战中创造战机；开封守敌孤立，战斗力较弱；作战部队有攻城经验，攻克开封较有把握。当粟裕率部渡过黄河之后，敌集中9至11个整编师急速增援，粟裕当机立断，放弃歼敌整编第5军的计划，迅速定下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战役第一阶段仅用5个昼夜即攻克开封，全歼守敌。战役第二阶段着重于寻歼援敌。为分离邱清泉和区寿年两兵团，粟裕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诱敌邱兵团南下，一路隐蔽待机，寻歼区兵团。待敌两个兵团拉开距离之后，诱邱兵团的一路突然回头东转，改诱敌为阻敌；一路突然包围并歼灭了区兵团。粟裕捕捉和创造战机，不但在实践中运用的得心应手，而且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曾说，要打胜仗，很重要地是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靠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指挥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捕捉和创造战机方面。战机不是“守株待兔”可以得来的，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通过指挥得当，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所谓创造战机，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暴露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他还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指挥员充分了解和正确判断敌人的各方面情况，包括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素质、士气，以及敌军指挥官的指挥能力和作战个性。所谓作战个性，就是说，他在作战时是猛打猛冲，敢于打硬仗的，还是巧于智谋，能够随机应变的，或者是懦弱胆怯，犹豫多疑的，等等。要善于根据敌人指挥官作战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打法。”（35）

### （四）气度宏伟，敢打大仗、硬仗和连续作战

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处在何种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从来无所畏惧，敢于同大敌强敌作战。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苏北地区归他指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有16万人，其中属韩德勤系统的约8万人，号称10万。韩德勤还与日寇信使往来，狼狈为奸。

1940年10月，韩德勤指挥顽军3万余人，向黄桥地区新4军7000余人发动进攻。在大敌进攻面前，粟裕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全部情况之后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36）并决心“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37）歼灭进攻之敌。粟裕只用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当进攻之敌逼近黄桥时，突击部队突然进行反击，首歼顽军1个主力旅，再歼顽军1个师，最后又歼顽军1个军部和1个旅，共歼1万余人。黄桥决战的胜利，导致新4军完成挺进苏北、夺取抗日领导权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的豫东战役，华东野战军参战兵力约20万人，而敌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

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5军和3个快速纵队。粟裕以其特有的坚强决心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率领外线兵团在河南东部的广阔战场上，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持续20昼夜的大规模的战役决战，其艰苦、紧张和剧烈程度是空前的，超过华东野战军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当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是否按原定计划进行第二阶段作战，当时存在两种意见，粟裕坚决主张连续作战，在睢杞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粟裕号召部队“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继续投入新的战斗。经过两阶段作战，共歼敌9万余人。在淮海战役中，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粟裕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的36万余人，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协同下，歼灭敌人4个兵团计44万余人，又一次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范例。粟裕不仅敢打大敌强敌，而且善于组织指挥部队连续作战。如苏中战役连续打了七仗，历时一个半月；鲁南战役连续打了两个阶段，历时18天；豫东战役连续打了两个阶段，历时20天。粟裕敢于打大仗、硬仗和连续作战，是因为他有非凡的智慧，超人的胆略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强敌大敌也摆脱不了被歼的命运。

#### （五）变被动为主动，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扭转战局

粟裕在战略指导上，善于洞察全局，因势利导，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面发展。1947年9月鲁西南沙土集战役之前，外线出击部队在鲁西南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7月1日，华东野战军为配合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开始的战略进攻行动，以5个纵队分别向鲁南和泰安、兖州出击。8月初，两路出击部队会师后进入鲁西南地区。这时敌人调集5个整编师和8个旅与我4个纵队纠缠。华东野战军由于从内线转到外线，离开根据地作战，物资供应和伤员安置都很困难。又逢连绵大雨，洪水遍地，桥梁倒塌，人员、马匹、重武器长时间浸泡在齐腰齐膝的泥水中，行动十分艰难。敌人多路围追堵截，空中有飞机轰炸扫射，地面有追兵近距离尾随，部队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战斗减员严重，思想也比较混乱，对战略进攻产生怀疑，有的指挥员对无后方作战缺乏信心，有人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9月初，陈毅、粟裕率两个纵队渡黄河南下，与在鲁西南的4个纵队会师。粟裕分析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经陈毅同意之后，下达了歼灭敌整编第57师的命令，并立即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找外线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谈话统一思想。粟裕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38）在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之后，又周密地组织各部队的协同动作。9月7日沙土集战役发起，至9日就将整编第57师全歼。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扭转了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恢复了鲁西南根据地，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部队的战略行动。粟裕在总结从被动中夺取主动的经验时说，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处理好走和打的关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是避免被动，保持主动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运用起来颇不容易。打得赢就打，还比较好办一些，打不赢就走，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一支游击队还好办，一个大兵团却不好办。大部队天天被敌人咬住尾巴，被迫打掩护战、撤退战、遭遇战，不但供应补充困难，士气也受影响。这时要处理好走与打的矛盾，关键是要打个好仗。在敌人前堵后

追，对我实行分进合击时，我们可以逐步地把兵力向弱敌方向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果断地打掉他一路，敌人就不那么轻进了，间隙就大了，我们的自由就多些了。这时指挥员的分析、判断和决心起主导作用，如果指挥得当，就可以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反之，如指挥不当，不但不能夺取主动地位，接下去就可能是失败。

#### （六）了解部队，充分发挥各部队的作战特长

历史悠久的部队，在频繁的战役战斗中，都形成了各自的作战特长和战斗作风。熟悉部队的特长，并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既是指挥艺术高明的体现，又是打胜仗的重要条件。粟裕在指挥部队作战的实践中，深知熟悉部队的重要性，并且有许多亲身体会。他在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宿北战役时说：“深感责任重大，心情紧张。”（39）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参战的山东野战军不熟悉。粟裕认为，了解部队，不但要在平时了解，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了解。要了解部队的成长历史、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武器装备、战斗作风、指挥员素质和部队对他的信赖程度等。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就是部队的作战特长和战斗作风。在区分作战任务时，粟裕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作战特长，赋予他们最有把握完成的任务，做到了领导放心，部队有信心。如豫东战役第一阶段，以擅长攻坚的部队攻克开封，以擅长野战的部队担任阻击；第二阶段又以擅长野战的部队围歼固守村落的敌人，以攻城减员较大和擅长防御的部队担任阻击。又如济南战役，以擅长攻坚的部队为主组成攻城集团，以擅长野战的部队为主组成阻援、打援集团等，都胜利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務。粟裕在注重培养和发挥各部队特长的同时，十分重视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使各部队既保持自己的特长，又学习兄弟部队的经验和长处，以求全面发展，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粟裕说，“宿北战役把第1纵队英勇顽强的野战作风传开了，鲁南战役则向第8师学习了攻坚、爆破技术。在战争中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不断地进行经验交流，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和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40）

#### （七）全力以赴，把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役转折点上

粟裕在指挥历次战役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不管战役规模大小，也不论战役持续时间长短，在两军交战决定最后胜败之前，都会出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胜谁败的转折点。指挥员应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有利于我的战役转折点及早实现。粟裕说，“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41）如豫东战役分为攻城和打援两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攻克开封，是全战役的转折点。战役发起后，攻城部队连续突击，仅5个昼夜，即用了全战役的四分之一时间，攻克了敌长期经营、具有半永久性防御体系的省会开封，从而实现了全战役的转折，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这时的攻城部队又可作为强大的机动力量出现在战场上，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条件。全战役的两个作战阶段又有各自的转折点：突破开封城垣主阵地，是第一阶段的转折点；在睢杞地区歼灭援敌区兵团部和整编第75师主力，是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关于转折点出现的时间，粟裕说，“在敌人有强大兵力增援的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如果转折在全战役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后到来，就会因时间紧迫而仓促作战，使部队伤亡增大，疲劳加重，士气受到影响，有时还会陷于被

动，不得不撤出战斗，打成夹生仗。”(42)因此，粟裕强调指出，战役指挥员“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43)

#### (八) 果断收兵，适时巧妙地撤离战场

大兵团作战，撤出战斗、撤离战场，特别是打了硬仗、恶仗之后，能否顺利地撤离战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粟裕说：“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很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44)例如豫东战役，攻克开封和歼灭了大量援敌，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这时，部队经过连续半个月的恶战，减员相当大，十分疲劳，下一步主要是怎样组织部队撤出战斗，撤离战场。当时，敌黄百韬、邱清泉两兵团仍由东西两面对攻，胡璉兵团也正由南向北逼进。为了在三面援敌的夹攻之下，将大批伤员和军用物资运走，使敌人不敢尾追而来，粟裕决定先声夺人，在歼灭被围残敌的同时，给增援积极、战斗力较弱、而又立足未稳之东路援敌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经3昼夜的激烈战斗，既歼灭了被围之区寿年兵团残部，又歼灭了黄百韬兵团3个多团。在与敌脱离接触时，惊魂未定的黄百韬兵团，一动也未敢动。邱清泉兵团在遭到回击后也未敢再进。而我军却在多路援敌逼近的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的休整地区。当敌人查清情况时，我军已休整一周，并开始了进行济南战役的准备工作。

### 五 对解放战争及其指导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人民解放军所向无敌、取得战争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制定这些方针和原则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总是征求各战略区指挥员的意见，并吸收其正确的建议，以充实、完善和修改原定的方针。粟裕作为战略区指挥员，着眼于战争全局，立足于本战区的实际，对解放战争及其指导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他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肯定和采纳，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场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粟裕作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去对待当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1945年10月，粟裕对华中地区的战略部署提出了重要建议。他认为华中的战略重点，不应置于津浦线，而应置于华中年线，扫除华中根据地内的敌伪据点，占领徐州至海州铁路中段，将华中与山东联成一片，为未来的华中内线作战准备一个以山东作依托的广阔战场。为此，他建议目前不必采取控制津浦线铁路的作战行动，而应组织高邮和陇海路东段战役。粟裕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以华中野战军15个团的兵力，于1945年12月19日发起了高邮战役，至26日胜利结束，攻克了高邮、邵伯等城镇，歼日军1100余人，伪军8000余人，并击退了由扬州出援的国民党军。这次战役的胜利，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的安全，扫除了心腹之患。高邮战役胜利后，新4军军部又批准了粟裕关于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的建议。以

华中野战军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山东鲁南、滨海两军区部队的配合下，经两天作战，彻底破坏并控制了大许家至白塔埠段铁路，给拒降之日伪军以严重打击。这一战役使新4军控制了徐州到海州的铁路线中段300里，扫除了日伪军在这段铁路线上的一切据点，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控制这一段铁路，以割断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战略联系的妄想，第一次使我山东、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为坚持华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野战军机动作战，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准备了内线战场。

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后，粟裕不断揭露敌人准备发动战争的种种阴谋活动，教育部队在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行动上要积极准备对付敌人可能的进攻。他反复对指战员讲，和不和得成，打不打得起，是中央的事，我们作为军人，应该立足于打；不但要准备打，而且要准备长期打。1946年3月6日，中央要求包括华中在内的三个战略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但是粟裕和华中军区其他领导人，鉴于华中地处南京与上海的对岸，兵力已北调山东及东北十余万人，敌人在停战后不断侵犯解放区，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除精简老弱病残人员2000余人外，主要是整编扩大部队，开展百日大练兵，积极动员参军，在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将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此外还建立了支前司令部和组织民兵参战团、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等。

1946年6月，经中央军委和新4军军部批准，为确保沿江财经区域，扩大政治影响，把第1、第6师及第7纵队集中于苏中地区。这一切为华中野战军在战争初期夺取胜利作好了战略上的准备。

## （二）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将告结束

粟裕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当看到这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就开始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从分析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着的诸因素中，探索解放战争的指导规律。粟裕认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都有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430万，它接收了日军100万人的武器装备和大批军用物资。美国除给国民党大量经援军援外，还为其装备了22个美械和半美械整编师，使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发展到统治中国以来的最高峰。此外，国民党还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与蒋系之间的战争不再存在。因此，国民党军队可以全力来进攻我们。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停战生效时止，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127万人，民兵已发展到200万人。此外，解放区的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500多座城市和1亿3千万人口，分别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52倍和24倍。同时，各解放区除个别地区外，都已连成一片，打破了敌军长期四面包围根据地的态势，成为一个历史上空前巩固的根据地和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虽然从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敌我力量的重大发展变化，使以往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要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运动战为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后，转入战略进攻。

## （三）探索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规律

粟裕从解放战争的特殊规律着眼，认为解放战争有一个初期作战阶段，

并有它自己的规律。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如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则兵力要更多地集中，这将使敌人的兵力也随之更为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年6月2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部队提出了一个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战略计划，要求他们分别以徐州、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徐州、开封。中央于6月26日又要求华中野战军由粟裕和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准备打大仗，歼灭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7月17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新4军军部根据这个指示，也于27日命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粟裕接到上述指示后，全面分析了苏中和华东的形势，并于当日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建议，华中野战军“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个仗再西移。”(45)并立即去淮安，同华中分局的几位领导人共同研究。他们都同意粟裕的意见，并于29日联名上报中央和新4军军部。中央军委、毛泽东采纳了粟裕和华中军区几位领导人的建议，命令华中野战军停止西出淮南，仍留在苏中。7月4日，中央军委获悉胶济、徐州、豫北、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发起进攻，指示华中野战军：“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46)7月13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47)“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48)7月13日苏中战役发起，至23日取得了宣（家堡）泰（州）和如（皋）南两战两捷的胜利。8月1日，即苏中战役的第三仗海安战斗打响的第二天，粟裕再次向中央提出，战争初期“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中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49)“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的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50)

宣（家堡）泰（州）和如（皋）南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受到一定的打击，但进攻之势仍未减弱，并继续增兵，向苏中的海安推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突破。此时，陈毅再次从执行外线出击的作战方针出发，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向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两铁路，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8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提出两个作战方案，征求他的意见：“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埠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5日12时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51)粟裕把全局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经过反复考虑，于8月8日和14日，两次报告中央军委：“我们意见再在苏中打仗为有利，其理由如下：甲、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前次淮南八个团作战，已感到民夫应付不上）、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可直接拖住敌人，不仅使其无法他调，且将吸引其继续调兵来援。乙、苏中敌人在进抵如皋、海安等地后，前锋已分散，遭受我军三次打击，现其未被歼灭者均

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已很动摇，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说，亦较淮南为有利。丙、现整个淮南仅敌人4个团，如我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和天长，以开辟战场。但要打下该两城，除付出一定代价外，不一定能调动敌人。如舍天长、盱眙而直趋铁道线，则战场狭小，后方亦无法安全。”(52)从全面情况衡量，在苏中打歼灭战的条件比淮南有利。8月13日中央军委电复粟裕、谭震林并陈毅、宋时轮：“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53)同日，陈毅亦复示：“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利配合各方。”(54)中央军委于8月15日再次复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55)到这时，战争初期南线作战方针就定下来了。苏中战役自7月13日至8月31日，歼敌53700余人，俘虏敌军将领11人，证明了粟裕在苏中内线作战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此后，中央军委鉴于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内线歼敌的优越性日益显著，再次推迟了外线出击的时间，到1947年3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友军之配合，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这样，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实行内线持久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了。

#### （四）运动战、歼灭战将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粟裕认为，解放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必然是运动战、歼灭战。战争规模特经过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发展下去，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苏中战役时，粟裕就提出，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战争规模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装备技术的改善和战局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扩大，“由一次歼敌一个放，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56)苏中战役结束后，粟裕认识到，随着战场从解放区前沿逐步向纵深转移，正面战线逐渐缩小，兵力也随之集中，运动战、歼灭战的规模也将逐步扩大。他主张不应不战而放弃苏北，应在苏北打一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这个战役（宿北）打胜了，“就可以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良好开端，成为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57)宿北、鲁南战役胜利之后，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和华中两个战区实现了统一，兵力进一步集中。粟裕据此提出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的规模。此后，接连打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战局发展的总趋势是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参战兵力越来越多，歼敌数量也越来越多。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后，粟裕依据当时华东和中原战局的发展，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认为我军的作战方针应有改变，我军的歼灭战应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

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长江以北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以求彻底歼敌一路。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实践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58)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电告粟裕：拟令山东兵团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两兵团北援，此时，你们已转入内线作战的西兵团寻敌一部攻击之。并指出在作战步骤上，山东兵团可先占

领机场，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敌或先攻城。粟裕在接到军委的这一指示后，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应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既攻城又打援。中央军委采纳了他的建议，确定攻济打援同时进行。华东野战军集中全部主力，只用了8昼夜即攻克了济南，歼敌10余万人。援敌因惧歼而未敢出援。

在淮海战役即将发起之时，粟裕敏锐的认识到，战略决战即将全面展开。为了使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共60万大军密切协同，打更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他向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59）中央军委第二天就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并决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临机处置一切。淮海前线部队在总前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取得了战略决战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南线精锐部队，南京、上海和武汉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之后，总前委又统一领导和指挥了百万大军参加的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突破了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来看，粟裕关于主要作战形式、战役规模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 （五）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

粟裕关于南线作战要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思想，是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的。

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就是想把敌人主力尽可能多地歼灭在长江以北。4月，他提出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依托老解放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更明确提到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消灭敌人主力，比在江南更为有利。济南战役前夕，他提出了打下济南，“就会使徐州完全置于我们包围之中，就会造成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更多有利条件。”（60）他的着眼点，仍然是在江北打大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而不是去江南。淮海战役发起后，粟裕又根据全国和当面战场的形势，两次提出了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的陆上退路，争取在长江以北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战役，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建议。第一次是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即11月7日上午，他在给中央军委、中原野战军、华东局、中原局和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现在即请告豫皖苏对该段破击，淮南已告江淮破击）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我运东部队解决黄兵团后，即以一部加入运西，歼灭李兵团，主力则协同中原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尔后，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可能回撤）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可能收缩蚌埠），或者夺徐州，当依实况再定。但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这样可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61）军委于8日7时复电：“估计及部署均很好……”（62）11月8日辰时，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上午，粟裕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再次向中央军委、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将徐州集团就地歼灭的报告：“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如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63）。为此他建议，老解放区“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

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64）军委在接到粟裕的报告后，于9日复电：“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65）10日又电中原野战军，“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66）粟裕的上述建议，符合淮海战役发展的客观实际，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和采纳，将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决战。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央军委、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完满地实现了就地歼敌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的战略意图。

#### （六）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要以解放区作依托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关于坚持内线作战的建议中，就有依托解放区作战的内容。到解放战争中期，又经过内线作战与外线出击的实践，他的这一思想就更加成熟，他说，目前作战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困难太大。

1947年6月底和7月初，向国民党军展开了战略进攻，到1947年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主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地区，打败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但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主力及太岳兵团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为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于1948年1月给粟裕发来电示，其主要内容是为了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中的3个纵队由他率领渡长江南进，以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进入闽浙赣边，使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要粟裕把对这次行动的具体设想和筹划情况报告中央军委。

粟裕接此指示后，一方面率3个纵队于3月中旬北渡黄河进入濮阳地区，积极作渡江南进的准备；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更有利于改变中原的战局。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研究和反复思考，粟裕得出结论：大兵团背靠老解放区作战，比渡江作战更有利于改变中原战局。于是，4月中旬粟裕将意见电报中央军委，后又奉中央指示与陈毅一起到城南庄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当面汇报，建议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背靠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在中原的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这一建议的主要根据是：在中原的黄淮地区作战，一是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能较好的安置和治疗伤病员；二是中原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三是3个纵队不渡江南进，留在中原，就可以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且中原黄淮地区地形开阔，敌防守的城市、要点较多，便于我以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如3个纵队渡江南进，虽可给敌以威胁和牵制，但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的主力美械重装备师和桂系部队，不会随我军南进而去打游击，预期的战略目的难以达到。相反，3个纵队渡江进入新区，却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我大兵团

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67)二是“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68)三是“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69)四是“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全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70)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听了粟裕的当面汇报后，当即批准了粟裕的建议，并根据这个建议，再次对南线的作战方针作了调整和改变。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但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的战略态势，为拉开战略决战序幕的济南战役创造了条件，而且“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71)

## 六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的探索

建国以后，粟裕在军委、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时刻注意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情况，并与我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性质、特点和作战方法，对国防现代化建设，都作了长期的孜孜不倦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的理论。

### （一）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建国初期粟裕就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的、全面的战争，不单是军事上的作战，而且是政治上、经济上，也就是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的总竞赛。是原子、导弹、火箭这样一种战争，它的突然性、剧烈性、残酷性、广泛性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战争都不同。又说，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它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必然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极大可能是首先从常规战争开始，它将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先发制人，实行大规模的闪电式的突然袭击。以导弹和远程轰炸机，在短时间内即可突袭到我政治、经济、军事的主要战略目标。突袭很可能是从空中、地面、海上一起来。在地面坦克、机械化兵团密集突击的同时，配合以战略和战役的空降和大规模空袭，妄图一举瘫痪我们的防御体系，合围、歼灭我重兵集团，占领我战略要地，摧毁我们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新的特点，并没有改变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我们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72)要重视武器，但不能搞唯武器论。他指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的发展。但是，如果只看到武器的作用，夸大某一种武器的作用，是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事实证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武器是不可以对付的。”(73)

### （二）战争初期首要的任务是挡住敌人的“三板斧”

粟裕认为，战争一开始，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场十分尖锐剧烈的突袭与反突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我们能否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进行战争动员和战略展开，掌握战争主动权，以及战争中后期的战局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就我方来说，虽然会有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但在敌人实施战略突袭的情况下，我们的指挥系统、通信设施、交通枢纽、战略要地和人员、物资，以及预先建立的防御体系等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由于敌人还没有深入我国国土，我们实行人民战争的优越性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将是明显的，我军的作战指导将遇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时期也将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初期，怎样去对付敌人的战略突袭？粟裕认为，“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团决战，又要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敌人的进攻，大量削弱、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我防御体系，从而顿挫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的相持局面。”（74）这个时间如能争取三个月到半年，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就可以为尔后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粟裕认为，在战争初期，敌人军事力量处于优势，希望我们集中主力与之决战。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当以主力同敌人进行战略和大的战役决战，而要保存主力，迫使敌人打持久战、消耗战。在打法上，要把坚守要点与诱敌深入、重点守备与机动作战、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在战略上坚持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打防御战，同时，以相当数量的兵团进行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样既可以制止敌人的长驱直入，又能力运动战创造条件，一有战机，就不失时机地发起攻击，打规模不等的歼灭战，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歼击，以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促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当敌人已经深入我国纵深地区，兵力分散，补给线延长，士气低落，而我们的力量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就应当在某些重要方向上，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决战，以转换战局。

### （三）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打法都要有新的发展

粟裕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为适应战争情况的发展，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的运用，要有新的发展，研究新的打法。我军初期作战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只能从可能达到的装备条件考虑。主要打法，将是依托阵地的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作战，配合以广泛的游击战。

粟裕认为，现代化作战，日益引起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关于阵地战，粟裕着重阐述了阵地防御战的打法和要求。他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一上手，为了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并且分割、分散和消耗敌人，给主力兵团在适当时机和有利地区打运动战创造条件，我们就必须守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要点和城市。这些要点和城市，已经不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打坚固阵地防御战。要树立顽强坚守、反复争夺、独立作战和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有些重要城市不但要守住，而且还要打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仗，把城市作为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战场。他还强调指出，在现代条件下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要做到：既能对付敌人在地面上使用坦克的连续突击，又能对付敌人从空中实施的垂

直包围；防御阵地和兵力部署要有重点，要构成环形防御，加强纵深防御力量，各级都应建立强有力的预备队，保持反击力量。

关于运动战的新打法，粟裕认为，“战争初期，我们必须在搞好战场建设的基础上，力求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包括屯兵设施）和不远离阵地，打一些中小规模的运动战。”（75）这是在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战法。“第一种是，打与坚守要点相结合的小规模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预先配置在第一线坚守防御要点的附近和间隙地区，构筑必要的防护工事，人员武器藏在里面，当敌人向我要点进攻或由间隙向我纵深发展时，趁敌在运动之中歼灭其一部，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营到个把团。第二种是，在我第一线防御部队后面的预设战场上，打中等规模的运动战。这种打法就是，把打运动战的部队配置在便于歼敌、并筑有作战工事的预设战场，当我通过坚守防御和运动防御逼迫或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把它包围起来予以歼灭，每次歼敌的目标可以是个把团到两个团。”（76）除此之外，还要打不依托阵地的运动战。“一种是打游击性的运动战。……在正面战场的翼侧或敌后战场，我以机动作战部队的一部，或以转入敌后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分散孤立之敌，用奇袭的办法打，一次歼敌一两个连到个把营，抓一把就走。另一种是打规模大一些的运动战。即当我军初步取得对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且能够夺取短暂的局部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创造和捕捉战机，每次歼敌一至两个建制师。”（77）以上是未来战争初期运动战的几种打法。“到战争的中后期，随着我军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进一步改善，我军必定要在我纵深的平原地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战役的和战略的决战，歼敌重兵集团，从根本上解决敌败我胜的问题。”（78）

粟裕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游击战对于离开后方供应就不能持久作战的装备现代化的敌军来说，其威胁就特别大。现代化军队作战，必须有现代化的交通、通信条件及其维修设备，有现代化的给养、用水、油料、弹药补给系统，不然，现代化的装备不但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会成为累赘。“战争初期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运输补给线，特别是它的油料供应系统，这会对敌人的正面进攻迅速发生重大影响。断敌油料供应比断敌粮秣供应更为重要。人员，一天不吃饭还可以作战；机械化部队，一分钟也离不开油料供应。”（79）此外，运用游击战袭击敌人的供应基地，前线机场、导弹阵地、通信系统和指挥机关，也是制止敌军猖獗的重要手段。粟裕还指出，“为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新的水平，更大地发挥游击战的威力，必须增强打游击战的力量。除地方武装和民兵要在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游击战之外，有些坚守要点的部队，在完成坚守任务，或者确实难以继续坚守时，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入敌后作战。在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还可以从野战中抽派一些师和团到敌后去。这些主力部队，除了带领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外，还要力争打游击性的运动战。”（80）为了说明游击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还具体地估算了歼敌的数量：如果一个团能在一次战斗中消灭敌人一至两个连，一个月打四仗，就可以消灭敌人四到八个连，那么，如果向敌后派遣三、五个师，即九至十五个团，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敌人几十个至上百个连队。这样就会迫使敌人“从预备队里，甚至从前线进攻部队当中，抽调力量出来担任守备，使其正面战场的兵力受到很大削弱，……就达

到了有力地配合我正面战场作战的目的。”(81)他还指出,我们执行游击战任务的部队和民兵,要学会现代条件下打游击战的本领,要具有打坦克和装甲战车的能力。

#### (四) 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粟裕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导弹核武器外,常规武器已经具有装甲化、快速化、大威力、远射程四大特点,并且正在向精确制导和隐形等更高的水平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建国以后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量的还是步兵,主要装备还是常规武器中的轻武器。轻武器,在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和次要战场上,在近战夜战和一定条件下作战,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主要作战方向上,特别是在进行战役决战和战略决战的时候,就必须以重武器为主。”(82)

粟裕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情况指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从过去的打步兵为主,转变为以打坦克、装甲车为主,把打敌集群坦克摆在对付地面敌人作战的首要位置。同时要重视对付敌人的飞机和空降。在正面战场和主要战场,要对付敌人成千上万辆的坦克集群,必须发挥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和民兵等各种力量,以火炮和导弹为主,辅之以其它的武器组成多层火力,近、中、远,地上、地下、空中,构成严密的反坦克火网。炸药包对付敌人的个别坦克、行军中的坦克还是有用的,但对付敌人的坦克集群就不行了。因此,军队编制、装备、训练等,都要加强对付敌集群坦克的建设和发展。粟裕还指出,在未来的战场上,敌必依恃其空军优势,对我进行狂轰滥炸。为了保障军队的机动和打歼灭战,除了要加强陆军的对空作战力量外,还应加强歼击机和其它防空兵器的生产,使其在主要战场和关键时刻能够掌握制空权,或者夺取局部的制空权。如果我们连局部制空权也不能掌握,要打大歼灭战将是不可能的。

粟裕认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过去如此,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如此。但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应当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并且要在新的条件下研究对付敌人的新办法。要立足于现有,着眼于发展,从现代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作战方法。

#### (五) 把战场建设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对待

粟裕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搞好战场建设非常重要,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他深刻地指出,“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现代化武器装备赖以活动的战场。因此,战场建设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增强或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场建设也是战斗力。”(83)粟裕还对战场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看法,他说,“一定要搞好重点守备的要点、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要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的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防御体系。”(84)在阵地编成上,要构成环形防御,适当加大防御纵深,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和纵深防御力量。在工事构筑上,要做到山上山下、地面地下、市内郊区、敌前敌后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有相应的附属工程,既要隐蔽有生力量,又要发扬火力;既要坚固耐用,又要适当疏散,又不能削弱火力,分兵把口。在火力配系上,凡是长期坚守的阵地,都要建立同敌人持久作斗争的火力配系,构成与障碍物相结合的多层火网。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加强指挥工程建设,

交通建设和打游击战地区的建设等。

战场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组成部分，而国防建设要与国家建设配合起来。粟裕认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又要注意与国防建设相结合。他认为，今后决定战争胜负，除政治条件外，物质技术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我们再能在这方面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则敌人是否敢全面大打是值得考虑的。因此，集中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向科学进军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国家的工业建设成功了，科学技术发达了，将来战争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万一发生战争，才能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和重视国防建设。他还指出，要使陆海空三军及其各兵种以及军委各部门的建设计划有机的结合起来，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要把有关国防方面的交通道路、通信联络、水陆运输和水障、防护林带的培植和战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人员的培养等，与国家工农业发展计划衔接起来。

粟裕的战争实践与军事理论是极为丰富和造诣很深的。他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军事遗产。本文只能就若干重点问题作一些浅探。如果能有更多同志对粟裕的军事思想进行全面的和更有深度的研究，那么对于深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都是极有意义的。

注释：

(1)(5)粟裕：《毛主席战争指导路线的伟大胜利》，1977年8月6日《人民日报》第1、2、4版。

(2)(3)(4)(6)(7)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年5月15日《解放军报》第1至第3版。

(8)(9)(10)《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63、84、89页。

(11)(12)(13)(14)《粟裕战争回忆录》第84、425~426、508、507页。

(15)《一代名将》第566页。

(16)(17)《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2~513、579页。

(18)《粟裕军事文集》第1页。

(19)(20)(21)(22)《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82、265、273、278页。

(23)(24)(25)《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88、159、256页。

(2)《粟裕军事文集》第4页。

(27)(28)(29)《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72、172、256页。

(30)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第232页。

(31)陈毅在华东前线接见来记者时的谈话，1947年3月10日。

(32)(33)(34)《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36、363、364页。

(35)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年5月15日《解放军报》第1至第3版。

(36)(37)(38)《粟裕战争回忆录》第228、229、524页。

(39)(40)(41)《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14、447、558页。

(42)(43)(44)《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58~559、558、568页。

(45)(46)(47)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第77、88、100页。

(48)(49)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第100、149页。

(50)《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82页。

- (51)(52)(53)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第170、203、199页。
- (54)(55)新四军丛书《苏中七战七捷》第201、205页。
- (56)(57)(58)《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83、427~428、601页。
- (59)(60)(61)(62)《粟裕军事文集》第416、389、418~419、420页。
- (63)(64)(65)(66)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31、132、138、139页。
- (67)(68)(69)(70)《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4、354、354页。
- (71)《周恩来传》(1898~1949)第721页。
- (72)《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46页。
- (73)~(74)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79年5月15日《解放军报》第1至第3版。

**作者** 王希先 原南京军区司令部研究室主任，62岁。70年代开始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并参与整理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回忆录《激流归大海》、《鲁南大捷》、《豫东之战》和《解放军将领传》中的粟裕传略等。

## 左权的军事思想浅探

陈浩良

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左权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的军事思想。因为，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牺牲在太行山上，为国捐躯了。然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左权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周恩来称他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1)朱德称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2)左权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十分丰富的战争实践，在军事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军事著述。左权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战术思想和军事学术思想，是他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和升华。探讨左权的军事思想，挖掘这份珍贵的军事遗产，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着重从左权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学术思想两个方面，作些初浅的探讨。

### 一 左权的军事实践

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因此，研究探讨军事思想，应首先了解军事思想产生的军事实践。在探讨左权的军事思想之前，我们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左权的军事实践。左权的军事实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 左权经过长期军事院校的系统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

左权于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爱好学习，慧敏聪明，被当地誉为“神童”。上中学时，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1924年，19岁考入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设在广州的陆军讲武学校。他在这里，学习了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等军事基础课目，并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他转入黄埔军校，为第1期学员。在黄埔军校，他进一步学习了《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步兵操典》等许多课程，成绩优秀，并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经历严格的军事生活。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他作为优秀军官，被选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他与邓小平、傅钟等同班。1927年，他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等同班。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战略思想、战术教程、军事地理、军事筑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许多课程。他除了完成规定的课程以外，还自修了正规战和游击战战术、部队建设等军事理论课，并和同学们一起探讨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军事理论。他于1930年回国，同时带回了一大批在学校学习的笔记和收集的军事理论资料和书籍。这样，左权从1924年至1930年期间，经过了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等4所学校的系统学习和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掌握了优良的军事技能，养成了良好的军政素质。

还应该指出的是，左权不仅是正规军事院校培训出来的高才生，而且后

来在我军军事院校中，在一些训练班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和讲授过许多课程。这对于他的军事理论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他军事实践的内容。他 1930 年回国后即进入中央苏区，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闽西分校任教育长，并亲自给学生讲课。1931 年，他在红 1 方面军总司令部任职时，利用战斗空隙，和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治委员等给干部、战士讲课。左权讲授军事地理课。

1932 年，他又到工农红军学校担任政治军事教官，讲授苏联红军的各种战术。抗日战争中，他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仍抽出时间，给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 6 大队学员讲授步兵战斗条令等课；还给中共北方局党校讲授过军事课。

## （二）左权经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实践

1924 年 10 月，左权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期间，随学生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平定广州商团反革命叛乱作战，初次得到实战锻炼。1925 年 3 月，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排长，后升任连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第一次东征作战。作战中，他率领连队冲锋陷阵，作战勇敢，缴获甚多。6 月，又率部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军事叛乱作战。战后，改任攻鄂军司令部卫队营连长。

10 月，参加第二次东征，打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左权 1930 年从苏联莫斯科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特别是在 1932 年的漳州战役时，他任红 15 军政治委员，率部首先消灭敌前哨补充营和民团，继又攻占南靖，协助红 1 军团解放了漳州。在长征中，他任红 1 军团参谋长，参加和参与指挥了红 1 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攻占施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攻取腊子口等重大作战。随后，他又参与了直罗镇战役指挥，参加了红军的东征、西征作战，并先后担任红 1 军团代理军团长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他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部队在华北广大地区，进行了百团大战及反“扫荡”、反“围攻”、反“蚕食”等重大对日作战，取得了作战胜利，创建并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八路军部队。1942 年 5 月 25 日，他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南艾铺地区率领八路军总部突围作战中，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在太行山上。

## 二 左权的战术思想

左权在战略思想、战术思想、建军思想、军事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其中，特别是在战术思想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十分重视战术问题。他结合战争实践，努力研究战术问题，在战术问题上学术造诣尤深，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位难得的战术理论家。他发表了《袭击战术》、《伏击战术》、《战术问题》、《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等许多重要的战术方面的论文。这些文章，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特别是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借鉴古今中外，特别是借鉴苏联红军的战术经验，阐明了我军战术思想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思想，结合八路军在华北和日伪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

提供了战术理论武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及以后的时间里，左权的这些战术论文，亦成为我军指战员学习、研究和运用战术的重要理论文章。左权的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 11 个问题。

### （一）要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情

作战时，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亦即知彼知己，才能战胜敌人，立于不败之地。左权认为要熟识敌人的情况，就要侦察敌情，采取各种手段搜集敌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敌情，了解敌人。他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在 1941 年 2 月发表的《战术问题》中提出：要加强自己的侦察警戒，提高警觉性，保持经常充分的战斗准备，“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人，不松懈，不疏忽，不麻痹，不受敌人突然的危害与损失。”对于了解敌情的方法，他认为，主要的应依据民众的优良条件，把我们的耳目，散布到民众中间。特别在敌联络线的沿线和某些重要的方向，要教给民众必要的知识与报告的方法，密布自己的谍报网，使敌人的一切动作及其企图都能及时被我了解。同时，应以一切方法肃清敌人的间谍与汉奸，经常地封锁消息，特别防止敌特和侦探，使我们的一切行动与企图不为敌人所发觉。

左权要求各部队要特别注意加强侦察工作，对周围的敌情必须具体地了解，切实地研究，掌握敌人的动态，要全面地昼夜不间断地对敌人实施侦察，并严密戒严，派潜伏哨。

1941 年 8 月 7 日，他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出的《关于对敌伪侦察的指示》，对侦察的内容讲得十分具体。《指示》要求各部队，除了了解敌人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外，还要侦察敌人的装备编制、兵员补充、军官简历、战斗力及特点、士气等情况。

1940 年 7 月 22 日，为了保证正太战役（后改称百团大战）作战的胜利，他和朱德、彭德怀向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发出《关于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侦察工作是保证战役成功的首要工作，并明确指示了战役侦察的重点、要点和注意事项。由于八路军各参战部队，按照《指示》的要求，对敌人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对侦察到的情况，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分析研究，从而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取得了光辉的战绩。

左权不但要求部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亲自了解研究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向各部队通报敌我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敌人的战术特点及我军应采取的作战方法。如在 1940 年 1 月，他就向八路军各部队发了 11 份电报，专门通报各种情况。为了解敌情，他在 1941 年 5 月 2 日，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出了《关于搜集敌军政治文化等建设材料的通知》。要求收集有关敌人在华北各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材料，以便全面系统地了解敌情。并要求各部队上报的材料，要有具体的数字和生动的事例。

左权还十分重视利用缴获敌人的材料，来直接了解敌情。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在总指挥部编印的内部刊物《情报》第 1 号上批示：获得之关于日寇侵华材料，应汇编印发，以供研究。

1938 年 4 月，八路军第 129 师在广阳战斗中，缴获侵华日军支那驻屯司令部参谋处编印的《华北战术之参考》一文。左权立即组织了几位懂日文的同志翻译出来，并亲自写了前言，印发八路军各部队参考，以便了解日军的战术。凡是缴获敌军的文件、刊物，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敌伪材料，他

都细心研究，同时结合我军的经验教训，从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中，探索规律，确定对策。

为了了解敌人，左权亲自参与组建了八路军司令部情报处。1941年10月，情报处组成后，他兼任代处长。情报处的建立，加强了八路军的情报工作。

在指挥作战中，左权经常亲临火线，侦察研究敌情，察看地形，调整作战部署，保证作战的胜利。如在1935年9月的腊子口战斗中，左权（当时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和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亲临红2师前沿阵地，察看地形，了解敌人情况，制定作战方案，指挥部队采用正面进攻和侧背突袭的作战方法，迅速消灭了守敌甘肃军阀鲁大昌所部，胜利地攻克了天险腊子口。

**（二）要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创造敌人的弱点，同时要善于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以夺取战斗的胜利**

在作战中，指挥员如何发现敌人的长处和弱点，以及如何发扬自己的优点，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亦即做到知彼知己，这是关系作战成败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左权熟谙军事理论，根据战争实践，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1940年8月15日，他在《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敌人虽然有不少长处，然而也有许多弱点。“要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善于逐渐削弱敌人有利条件，从而扩大它的弱点。同时，要利用各种方法，去创造敌人的弱点。”他还认为，只有在敌人的弱点暴露以后，才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进行能把握的作战，夺取战斗的胜利。

左权在这里提出的要善于“创造敌人的弱点”的战术思想，是一个新颖而十分精辟的思想。它要求指挥员在作战中，仅仅做到了解敌情，能够发现敌人的弱点，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谋略，想方设法，去调动敌人，使敌人犯错误，使敌人的计划、布置和行动出问题，出纰漏，迫使敌人就范。

左权在上述文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弱点。“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发扬自己的优点，要善于消灭自己的弱点。”在作战过程中，如果不善于消灭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正好给了敌人可乘之机，作战就难免要遭受损失，甚至于吃败仗。那么，怎样消灭自己的弱点呢？他主张，在战役战术范围来说，就必须在战斗行动中做到以下3点：一是一切战役战斗的组织，应该有详尽的考虑，周密的计划，不出于粗暴与轻率，特别是不就敌人的范，不受敌人的欺骗；二是加强自己的战斗保证，要严密自己的侦察警戒，保持紧张的战斗准备，使敌人没有可乘之机；三是加强指挥上的保证，依据情况定下正确的判断与决心，保持对部属的不断指挥，贯彻自己的决心，局部行动要服从总的行动，反对游击习气。

应该指出的是，左权提出的要善于创造敌人的弱点和消灭自己的弱点的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要发挥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在战术上的发展和深化。它要求指挥员在作战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聪明才智使敌人犯错误，使自己的弱点得到克服。这里的一个“创造”、一个“消灭”，这4个字便将毛泽东发挥战争中自觉能动性思想深化得易于掌握和运用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象左权这样把敌我双方的长处、弱点进行辩证地分析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从敌我双方及其优、弱

点的相互关系中，来揭示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这是将军事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指导作战的一个典范。

### （三）不论大小战斗，都应有周详的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卒应战

左权认为作战指挥，应有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要有应付各种出现的情况的考虑和准备，要反对仓卒应战和鲁莽从事。他在1938年1月22日写的《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中指出，无论大小战斗，都不能当作儿戏，首先应有周详的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惶应战。他还多次发表文章，严肃批评了把战斗当儿戏，没有任何准备，甚至一切情况都不了解，便粗暴和轻率作战，随便乱撞的现象，他指挥与参与指挥的一些重要作战，都组织计划得十分出色。如1936年底，他参与指挥的山城堡战役。当时，他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和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部队向甘肃省环县山城堡之敌第78师进攻。他们首先指挥部队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尔后发起攻击，经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的兵力。后来，刘伯承在《纪念左权同志》一文中称赞道：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又如1940年8月至12月，他协助朱德、彭德怀组织指挥的百团大战，由于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使八路军百团精兵，在华北广大地区协同作战，共作战1824次，歼灭日伪军4.6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对于这次战役，当时连北平（今北京）日军发言人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就是说，连敌人也认为这次战役组织得很精密。

### （四）要自主地调整与摆布战争，要找敌人来打，不要让敌人来找我们打

左权认为，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丢失了主动权，就是丧失了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他1941年2月在《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主动，就是我们在指挥作战中，可以自由地选择时间、地点，与敌人进行作战，此外，还要逼迫敌人不能向我作积极的活动。

左权还认为：主动不是现成的东西，要努力去寻找。在作战中，怎样去争取主动呢？他主张要依靠每个指挥员，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环境中，善于发现与正确运用对我有利的条件，要找敌人来打，不要让敌人来找我们打，“要自主地调整与摆布战争，不要受敌人的拐骗。”<sup>(3)</sup>左权在这里提出的“找敌人来打”和“调整与摆布战争”的思想，是颇有见地的。这就揭示了指挥员如何掌握作战主动权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主动权要靠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靠动脑子，积极行动，去左右敌人，才能掌握。这一点，正如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与战术问题》中明确提出的：“主动行动是要有意识地去求得，从正确的情况估计与正确的处理情况中去求得，不是现成的东西。”他还提出，要善于利用地利、天候与时机，经常以小股兵力接近敌人，扰乱与侦察敌人，有周到的准备，寻找自己的主动地位；同时，要具备充分的积极性，敏捷性与弹性，刻苦耐劳，坚决勇敢，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他认为，懂得这个道理容易，而做起来很难。许多人只是口头上讲主动，实际上常常是陷入被动。主动和被动是以进行战争的力量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在与优势装备的敌人进行作战时，仍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争

取作战的主动权。

#### （五）要灵活地使用兵力，以灵巧的机动突击敌人，消灭敌人

左权认为，要灵敏地机断专行地采用适当部署和积极行动，打击敌人，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使敌防不胜防，使敌兵力分散。他严肃地指出，一切隔岸观火，企图苟安一时，或各自为战的现象，都是不容许的。他要求，在组织战斗时，“应大胆地与灵活地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融合组织各种力量到战斗里面来。”（4）他在这里将组织战斗时如何灵活用兵问题，概括为“3个善于”，在理论上很有新意，在实战中，也便于指挥员具体掌握和运用。

左权还认为，在作战中，要灵巧地运用战术，发挥我军机动、敏捷、迅速、勇敢的特长，旺盛的攻击精神和艰苦卓绝的传统，打破敌人的目的与企图。

1938年3月，他《在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采用运动战，以灵巧的机动寻找敌人的附兵突击，往往能够消耗或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且，我军消耗会很少，容易取得战斗的胜利。单纯防御战、阵地战的结果，则是相反地招致了敌人一切技术兵器威力的发扬，使我遭受最大的消耗与损失。他还指出，在敌人的翼侧或侧后实施机动，往往容易取得战斗胜利，正面的袭击与突击，有时不仅劳而无功，而且经常遭受大的损失。

在实战中，左权十分重视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作战方法。如1938年2月，他参与指挥的古县阻击战，就是一个范例。当时，他和朱德总司令率领两个警卫连，在山西省安泽县的古县地区与日本侵略军3000多人突然遭遇。左权首先率一部分兵力顽强阻击敌人，拖住敌人，掩护朱德等转移。然后，他率领一个骑兵班，用伏击方法，打击日军。最后，他用疑兵计迷惑敌人，使敌人弄清八路军的兵力情况。他却率部乘机绕到敌人后边，袭击敌人。由于，左权采取灵活的作战方法，以很少的兵力，拖住了敌人，使朱德和八路军总部机关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区，并歼灭日军一部。

#### （六）要弄点新花样，出敌意外地行动，使敌人难于应付

左权在指挥作战时，往往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时间，给敌以突然的打击，使敌人不知所措，难以发挥技术装备的优势。这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一个有效的作战方法。他十分重视这个方法。1938年3月，他《在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敌人的战术一般的是根据战斗纲要或典范条令中所规定的条文去运用的。因此，不要去钻敌人的圈套，只要在敌人战斗纲要或典范条令以外，“弄点新花样，作出点出敌意外的动作，就能使敌人感到棘手，难于应付”。他还认为，要出敌不意，就要使作战具有突然性，部队的行动要有计划，有准备，行动要迅速和秘密，“突然性愈大，战斗胜利就愈有保证。”（5）“如果在作战中，已造成不利于我战斗的条件，徒消耗我的兵力时，应当立即主动地退出战斗，迅速秘密转移兵力，突然出现于可能取得胜利的方向。”（6）他指出，这样的退出战斗，同机动与争取战斗胜利的顽强性，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助的。也就是说，要善于出敌不意地进攻敌人，也要善于在不利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退出战斗，并将兵力用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去争取战斗的胜利。

#### （七）强调机动作战的地位十分重要

左权指出：机动作战，在军事科学系统上无论是以往和现在，都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各级指挥员在自己的机动计划中，应具有旺盛的、不断歼

灭敌人的企图。在战斗前、战斗中和战斗以后的一切兵力转移，“都应时刻保持自己的机动地位，而灵敏地查明与回答敌的机动，不被吸引，不屈从于敌人企图，进行己所不愿的战斗。”（7）

左权还认为，歼灭战的获得，是靠着基于兵团的灵巧的机动得来的。兵团机动的意义就在于兵团的一切运动和动作相联系。这些运动和动作的目的：第一是整兵团对于敌人采取很便于战斗的部署；第二是迫使敌人诸部队处于不利战斗的地位。左权还明确指出，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和积极参加作战，是我军进行机动作战，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歼灭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 （八）强调作战中不要平分兵力和逐渐增加兵力，要集中兵力，突击敌人的弱点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在作战时，平分兵力和逐渐地增加兵力，是古今中外兵家所忌。左权在他的军事著述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反对平均使用兵力和逐渐增加兵力的做法。他主张，当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线的部队应保持强大的兵力与优势的火力，以便能够连续向敌人冲锋，不要逐渐地增加兵力，而遭到敌人的各个击破。他还主张，要隐蔽地集结自己的主要兵力与兵器于突击地段上，保持最优势的力量，压倒各个敌人。他认为，一切轻意地投入战斗，或者平均地分配兵力和兵器，逐渐地使用兵力的做法，都是有害的，1941年2月，他在《战术问题》一文中还指出，战术上的突击目标是敌人的弱点，应在突击的时间以内，以最优势的兵力，突击敌的弱点。要反对平均地分配兵力与逐渐地使用兵力。在一切向敌进攻的行动中，应有切实的战斗队形和各分队间战斗动作、火力与运动的配合的规定，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地形，力求以小的牺牲，取得大的胜利。

在实践中，左权善于运用集中兵力，突击敌人的弱点的作战方法。如1939年4月，他协助朱德和彭德怀指挥晋东南军民反击日军九路围攻作战，就是一个典范。当时，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与驱逐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以第108、第109师团等部，共3万人，采用分进合击战术，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及邯（郸）长（治）公路等分九路向晋东南的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进攻。八路军总部以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在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的配合下，进行反围攻作战。八路军先以主力跳到外线隐蔽待机，以小部队在内线和游击队阻击牵制敌人。当出现歼敌良机时，即马上集中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打击围攻日军的一路，在武乡县长乐村布下歼敌的大口袋。他亲临战场指挥，一举伏击成功，歼灭日军3000余人，其他各路日军被迫纷纷撤退，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

#### （九）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左权所处的战争环境，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局部反攻以前，所面对的敌人，无论是国民党军，还是日伪军，从总体上看，在兵力、装备上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摆在每一个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和作战实践中，都十分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夺取作战的胜利。

1938年3月，他《在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要在适当的时机、决战的地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消灭

敌人的有生力量。”他主张，一切战斗，应以歼灭敌人之目的。击溃敌人1个联队（相当于团），不如歼灭敌人的一个中队（相当于连）、1个大队（相当于营），歼灭敌人1个联队，胜于击溃1个师团。干脆地歼灭敌人，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最好方法。在这里，左权将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的歼灭战思想，运用于抗日战争实践，使毛泽东歼灭战思想深化了一步，更加具体，便于掌握和实际运用了。1937年11月7日，左权在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专门就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敌人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2000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用3个团打他的1个团，实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方法。左权还反对拼消耗的作战。他指出，有些部队把一切战斗，都以消耗敌人之目的。作战时，缺乏雄图，往往与敌人长时间的正面对抗，拼火力消耗，以为给了敌人一些火力杀伤，消耗了敌人一些弹药，就达到了战斗目的，就满足，对于可能歼灭的敌人，也不去努力消灭。

#### （十）作战中要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一鼓而歼灭敌人

左权主张，部队要养成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他认为，战斗一经开始，就应最迅速、坚决地向敌前进，最猛烈地连续向敌冲锋，歼灭敌人，迅速地干脆地解决战斗，迟缓、动摇都是不许可的。左权还主张，在战斗中，要英勇歼敌，毫不犹豫，坚决与敌人进行白刃肉搏。他认为，运动、火力与白刃战斗，应有正确的配合，一般的应避免向敌运动中的火力准备，力求缩短火力战斗过程。最好的战斗，是战斗一开始就向敌人发起顽强的白刃拼搏，把一切火器与白刃兵器，同时发出其威力。他还认为：“对于已被压倒的敌人，必须有连续冲锋的毅力，一鼓而歼灭敌人，不能给敌人以余裕的时间，站稳脚跟”（8），使得战斗形成对峙。他还要求，要不断提高部队坚决歼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提高部队的顽强性与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术艺术。他还认为，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自于广大指战员对于国家民族无比的忠诚和对于战争的最高信心。所以，只有提高部队高度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才能使部队产生英勇牺牲的精神，不屈的意志，顽强刚果的毅力，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和敌人。

左权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常常在关键时刻，亲临前线，率部奋战，取得作战的胜利。

1925年上半年，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中，他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长，率领连队，奋勇冲杀，负伤后，仍率部杀敌获胜，战后受到传令嘉奖。

1932年1月，左权任红15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攻打江西赣州作战。在兄弟部队处于危急的时刻，他亲临前线，率领战士用大刀与敌人进行白刃肉搏，激战一天，冲垮了敌人，胜利地掩护了兄弟部队转移。

1936年6月，左权（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和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参加西征。作战中，所属红2师攻进了甘肃省曲子镇，部队冲进了城内，但敌人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他和聂荣臻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敌人的手榴弹，在他们不远处爆炸，机枪、步枪弹猖狂扫射。但他们仍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与敌冲杀，迅速消灭了敌马鸿逵部，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

### （十一）不可留恋无把握的胜利，不要与敌打相持不下的阵地战

在作战中，战场情况，瞬息变化，往往会突然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于己的被动局面，甚至极其险峻的情况。因此，如何处置战场突然出现的被动局面和险峻情况，往往是对指挥员的严峻考验。左权在1938年1月22日撰写的《论山西目前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作战过程中，不可留恋无把握的胜利，不要被吸引而陷入维谷，不要与敌人作相持不下的阵地战”。当发现敌人已展开了兵器，占领了优势阵地，而确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犹豫地迅速退出战斗，寻求新的机动，以免消耗自己的兵力兵器。左权在这里主张的撤退是积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消耗，保存有生力量，寻求新的机动，歼灭敌人。

左权曾严肃地指出，我们不要绝望的进攻，我们须要有胜利把握的进攻。绝望的进攻是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那只能是保存了敌人，消灭了自己，有背于战争的基本原则。我们需要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过程中，保存自己持久作战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他将毛泽东关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基本作战思想，作了通俗易懂的详尽阐述，深化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 三 左权的军事学术思想

左权善于联系战争实践，研究军事学术。左权在红军学校任教期间，就开始利用时间从事军事论著的翻译与写作，先后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等文章，并写了《军语解释》，供学员和干部学习。这对于提高学员和干部的军政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长期担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在战斗异常频繁，情况十分复杂，环境非常险恶的情况下，仍努力随时收集敌、我、友军的情况，深夜勤读，手不释卷，潜心钻研军事学术，撰写了大量军事理论文章，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运用于华北战争实际，指导华北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打击日伪军。仅从1938年到1942年，他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50余篇文章，并和刘伯承翻译出版了《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还有数十万字的军事论述遗世。他撰写发表的《战术问题》、《袭击战术》、《伏击战术》、《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内容深刻系统，通顺易懂，观点新颖，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为了指导华北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左权从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的3年多中，撰写了“一月来华北战局概况”和“一月国内军事动态述评”等大量的军事评论，发表在报刊上。这些军事评论，及时详尽地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及其变化的趋向，论述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明确提出应该采取的对策和应付的措施，提高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也为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进行对日作战提供了正确的作战方法。

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中，不仅阐明了战略战术思想上和军队建设上的许多新观点，发表了许多重要看法，而且在军事学术思想上，亦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下面谈谈左权的军事学术思想。

### （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现在，我们军事理论工作者，把军事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早在 48 年前，左权就明确提出将军事作为一门科学，并号召我军广大指战员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这是独具慧眼的。他在 1942 年指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9)他还指出，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与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以后，还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10)

在这里，左权提出的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号召，具有远见卓识。这个号召，除了明确提出军事科学概念以外，还有两个观点很重要：一是创造的观点，就是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他曾多次写文章指出，我们要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如苏联红军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红军的都要吸收。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凭空创造，要根据中国的客观情况和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具体环境，从战争实际中，来创造中国光辉的军事科学，并推动中国军事科学向前发展。二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左权特别强调，我们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要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大前提。他还多次指出，不能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研究军事科学。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战争的夹缝中，为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写出了一大批思想深邃，观点新颖的军事论文。

### (二) 要创造新的军事思想

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我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和现状及我军军事思想的特点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军事思想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他认为。我们的军事思想不能完全从外国搬来，也不能凭空创造，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在中国的客观环境内，逐渐从斗争中产生出来。他还认为在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时，要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左权在这里，精辟地回答了军事思想的创造与继承、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军事理论，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三) 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在战术思想上除了有诸多真知灼见，补充和发展了毛泽东战术思想外，在战术问题的研究上亦有许多好的思想。

第一，要认真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应付的办法。

1938 年 1 月，左权在《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现有战术为满足，在战斗过程中，敌人的战术，亦在不断改善与进步，我们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不断的胜利。他还指出，我们应该精细地认真地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的原则及其运用，研究敌人的技术兵种与兵器，窥破其特长与特点，根据我们的战略战术的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方法。为了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水平，他在 1938 年初，组织八路军总司令部编印了《战术参考材料》，作为内部刊物印发部队。该刊刊登了许多八路军指挥员总结与日伪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的文章及研究日伪军战术的论文，为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必须批判战术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左权在战术研究中，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

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严肃地指出：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不变更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看风水，方择吉利的地方住下，军事行动以前，要扶乩卜卦。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种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以更大的困难，而且在将来的共和国的军事思想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危害。他在40多年前指出的这些问题，现在，在战术研究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进行批判，加以克服。

第三，要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左权十分重视创立我军的战术。他曾主张，要逐渐地完善我们的战术，创立更正规的、诸兵种联合的、更富科学内容及更富组织性的战术。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是最具创造性的。我们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件非常大的事情”。左权在这里明确提出要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的光辉思想。这个思想有两层含意：一是要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只能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理论指导，不能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适合我军斗争的具体历史环境，不能照搬中国和外国现成的战术。

左权还认为，要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环境，敌我具体条件及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来进行。他主张用辩证的观点来创造新的战术，认识新战术。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11)他还指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

左权指出的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思想，至今仍熠熠发光，仍是我們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从事战术理论研究的同志，要为之艰苦努力去完成的重要军事科学研究任务。

#### （四）要学习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寻求战争规律

左权强调指出，要加强政治学习，同时也不能忽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只有加强军事理论学习，好好研究战术，研究我军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才能提高军事水平。他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战争经验，“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学理推向前进。”(12)他还认为，战争的指导者，为了战胜敌人，要在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下，细心地去寻求战争发展的规律，认识敌我不同的具体条

件，灵活地去指导和组织战争，正确地规定战略与战术，以调动与控制战争。

左权还一再写文章和作报告，向指战员指出，要弄清战局形势的特点，只有认清了战局形势的特点，才能认识战争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正确的斗争方针与方法，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术，使战争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军事理论，探索战争发展规律，正确地指导战争。如他在1940年8月撰写的《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基本问题》，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战局的形势特点，并将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值得掌握的原则归纳为8条：反围攻与围攻的统一、民众抗日运动与军队行动的统一、正确的内线的和外线的作战争取主动、运动战与游击战之配合、开展交通战、关于积蓄力量的问题、加紧敌伪军工作与锄好工作。他对每一条，从理论到实践，逐一作了详细的阐述，为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8条也是对我军作战指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其中有些内容，对今后反侵略战争，保卫国防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1942年6月24日。

(2)朱德《悼左权同志》，1942年6月15日。

(3)(4)左权《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1949年8月15日。

(5)左权《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1940年。

(6)(7)左权《在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的发言》，1938年3月。

(8)左权《战术问题》，1941年2月15日。

(9)(10)(11)(12)左权《论军事思想的原理》，1942年6月30日。

**作者** 陈浩良 军事科学院办公室秘书，40岁。1972年起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已出版和发表《左权军事年谱和文摘》、《百团大战一瞥》等论著数十万字。

